

陈独秀著作选编

1923－1925

第三卷

主　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著作选编

1923—1925

第三卷

主　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革命与反革命

吾人对于指导人类行为一切名词之解释若无一定的概念，则行为者及批评此行为者均易于堕入迷途而不自觉。中国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往往堕入迷途，正以对于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名词无明了的概念故。

综计人类社会兵争之祸有四：(一)外患，这是种族间的侵略战争；(二)内乱，这是野心家抢夺政权的战争；(三)革命，这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四)反革命，这是社会组织退化的战争。

遍一切现象界均日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动不息，人类社会也是现象界之一，在如流不息的渐变中，积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往往现出组织上的顿变，革命便是这种顿变之代名词。

革命既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反革命必以违反进化为条件，内乱乃以社会组织之进化或退化两无主义为条件。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必须明白了解这些观念，然后才不至堕入迷途。

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在这些最大而最显著的社会组织进化之中，又各有几多比较小的比较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因此，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都应该明白了解革命与进化之关系，对于一个革命运动都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

意义定功罪，不应该以他的行为者属何阶级何党派定是非。因为一个阶级一个党派的理想比较是静的，社会现象比较是动的，以静的阶级党派理想应付动的社会变化，便往往因前后对象不同，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是反革命的。动的社会进化日在新陈代谢之中，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

封建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长制建设比较的统一政治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在这些阶级争斗亦即社会组织进化最显著的时代，固然明白显出他们革命的及反革命的性质；在这些时代之每个时代中，又复有几多小的进化阶段现出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在一些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

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文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赞成辛亥革命反对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时，本是革命的人物，后来组织卖国机关（安福俱乐部）讨伐西南护法军，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于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赵恒惕在参与辛亥革命及讨伐洪宪时，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据湖南惨杀黄、庞时，便是反革命的军阀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①，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吴佩孚在奉袁世凯命讨伐护国军时，在奉段祺瑞命讨伐护法

---

① 在1922年9月17日《努力周报》第20期，胡适发表题为《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一文，文中把陈炯明发动的对孙中山的武装叛乱称作“是一种革命”。

军时，本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他讨伐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张作霖、安福部、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不但封建式的党派人物在这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同时现出革命的及反革命的两种行动，即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也往往前后取革命反革命两种不同的态度。例如：法兰西的共和派，在十八世纪打倒帝政时是何等急进的革命先觉，在二十世纪因为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不惜与帝制派宗教徒妥协；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在帝政时代是何等革命的英雄，现在因为反对劳农政府不惜和一切反动派合作。

因此，我们对于革命与反革命可以决定两个概念：（一）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因为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武力暴动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争斗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进化）。（二）我们称许一个革命派攻击一个反革命派或自命为一个革命派，都不应该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

我们若是明白了解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我们又可以看出益友社反对一个较开明的军阀取媚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之政策的错误。

1923 年 1 月 18 日 《向导》周报第十六期 署名：独秀

反动政局与各党派

中国政治上主观的需要是实现民主的统一的政制，不幸社会的基础日久建设在家庭农业手工业之自足的经济状况上面，以致客观的民主的统一运动犹未发达到全社会普遍的舍命的要求，以致军阀尚完全掌握着统治权，以致除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个党派不徘徊于军阀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因此我们敢说：中国政治改造之目前第一步，还说不上建设民主的统一政制；目前第一步的奋斗是要比较进步的党派即刻觉悟自身的价值与使命，相互捐除宿怨联合起来，打破最黑暗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及卖国官匪（新旧交通系、安福部等）互相勾结的反动的政局；这种反动的政局，是中国政治向民主统一的路上之唯一障碍物，此物不去，民主的统一政治永远不能开始工作，去此障碍即是民主的统一政治开始工作之第一步。

杨以德[①]杀伤唐山工人事件，最高问题贿买议员事件，破坏司法独立事件，这都是反动政局所必然演出的反动现象，固然是我们应该起来积极反抗的；但同时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万万不可以只看见这些反动现象之各个问题，而忘记了这些各个反动问题都是一个反动政局所必然演出的现象。因此我们固然应该向这些各个反动现象加以攻击，我们尤其应该向产生这些现象的反动政局加以根本的总攻击！

全国工友们！杨以德不过是有威权者的爪牙之一，他枪上所染的唐山工人血，是应该用我们全国工人血来洗去的。恶政治日日来压迫我们，我们应该即刻抛弃工人不干涉政治的谬论，大家站起来做打倒军阀官僚改良政治的急先锋，比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革命家还要加倍勇敢前进！

---

① 杨以德，时任天津警务处长。

国民党诸君！保障民族、民权是国民党人唯一的使命，要奉行这个使命，第一要认清最违反这个使命的敌人是谁；第二要将奉行这个使命的基础建设在每个民众革命的行动上面，勿失去一个参加民众运动的机会，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

好政府主义者！你们在政治的信用上，对于目前的反动政局固然不应该取消极的态度，即在个人的友谊上，依封建时代的道德也不应该袖手旁观！干！干！干！

青年学生诸君！"五四"的光荣由你们自己消失了，也可以由你们自己复兴起来呵！希望你们万勿只看见蔡校长辞职问题，和罗文干下狱的问题①，而不看见汉口的市民和工人同胞被英国帝国主义蹂躏的问题；更希望你们万勿把蔡校长辞职当作仅仅一个教育问题，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政治是一件整个的东西，各项行政作用是绝对不能够分离的，"司法独立"、"教育独立"不但不是革命的口号，并且是不可能的梦想，像这种消极的退缩的哀求，是万分不应该出诸青年之口！

工商业家诸君！你们要明白在这种贿买总统、破坏司法、摧残教育的反动政局之下，裁兵、制宪、理财的理想又何能够见诸事实呢？你们出来与闻政治是中国一个好现象，但游说哀求是必然无效的，望诸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益友社②诸君！你们党中很有许多有气节有骨格的革命分子，你们若真心要打倒军阀，我们焉有不敬仰之理。但不幸眼前的事实，你们却一面跪在一个最黑暗的军阀面前，一面来抵制一个较开明的军阀，这种反动的态度，是国民所断不能容忍的呵！

研究系左派诸君！你们过去在政治上虽然做了许多很大的错误，然终究不但不是军阀，并不是官僚；你们的态度虽过于温和，然终究还

---

① 1922年9月18日，吴景濂（众议院议长）等认为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迫使黎元洪下令逮捕了罗文干。其他阁员对此不满。吴佩孚电责黎元洪违法，曹锟则通电攻击罗。"罗案"反映了以曹锟为首的（天）津保（定）派同洛（阳）吴（佩孚）派之间的权利之争。

② 原系南方国会议员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员有吴景濂、褚辅成（众议院副院长）、王正廷（参议院副议长）。

算有点政见的；凡是一个政党，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绝对不许取消极的态度，诸君若不决心抛弃政治生涯，便应该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

政学会诸君！你们目下开始与革命的国民党合作，是很能洗去以前的过失，应该受人赞美的；因为我们评判各党派的功罪，应当以目前行动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为标准，不应怀抱成见的。但希望你们对于目前反动的政局应该有积极的表示，仅仅消极的否认彭允彝为非政学会会员是不够的呵！

小孙派诸君！诸君由进步党的左派而加入革命的国民党，已经证明你们有了一很大的进步。诸君既已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一天不抛弃革命事业，你们便应该和他一致行动。在现在这样反动情势之下，已经迫使退步的政学系前进一步；你们已经前进了一步的，便当更向前进而与革命的国民党密切的合作呀！

洛派军人诸君！你们在打倒安福部段祺瑞打倒张作霖交通系的行为上，不但是爱国者，并且是一种革命的行动，但同时你们谬误的方法和软弱的心理酿成了现在的反动政局，简直是你们的罪恶，你们若没有立功赎罪的决心，国民是不能宽恕你们的！

反动政象的恶空气几乎堵住了我们的呼吸，国会议员的行为完全丑化了人间社会在畜牲界以下，全社会各阶级人格在畜牲以上的各分子快快起来加入打破反动政局的联合战线呵！谁是爱国者便应该担任这联合战线上之第一个炮声！

1923年1月18日　《向导》周报第十六期　署名：独秀



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

一、议员受贿案

二、国会违宪案

我们曾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见地上攻击外交系之前内阁，无所谓个人的好感与恶感；现在对于罗文干卖国嫌疑，不欲作事实及法律以外之攻击或辩护，亦无所谓个人的好感与恶感，惟对于司法行政长官，以命令干涉审判及不依诉讼法之声请再议、拘押被告这两点，不得不警告资产阶级的和平派梦想在军阀势力下能实现“司法独立”和“保障人权”。至于一个教育总长结党营私，一个大学校长愤而辞职，我们除了感觉得是反动政局开始崩溃之征兆以外，更没有特别注意讨论的价值。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上，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讨论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刑法上的议员受贿案；一是约法上的国会违宪案。我们注意讨论这两件事，不是厌恶反动政局之心理的推测，乃根据下列两个事实：

（一）（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手乎？所谓包办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与政团接洽，余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号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致发生此种误会。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之新民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经手银钱谢绝，几为亚农所恼，何厚之有？（节录一月十六日北京《京报》高凌蔚谈话。）

（二）昨日下午一时，北大学生约千人，自该校第一院出发赴象坊桥众议院，每人持旗帜一面，上书“驱逐教育败类彭允彝”、“拥护司法独

立”、“保障人权”等等字样，列队而行，沿途发散传单。学生军维持秩序，队前有大旗一面，书“警告国会”四字。二时四十分，至众议院门前，时法专、医专学生已先至。三校学生相见，呼声雷动。各校正拟推举代表呈递请愿书，突有警察百余人……或用枪刀或用皮带，向人丛中突进，学生手无寸铁，皆披靡奔避。警察仍拼命追逐，致学生有倒卧地上不能行而受践踏者。当时情景，旁观者多战栗惊愕，目不忍视……而此时有类似车夫之流氓多人，亦应声呼喝，大打学生。警察将学生驱出象坊桥后，始行退回院前。事后调查，计受伤二百余人，受重伤者约五十余人，其伤脑及内脏者北大有八人。如夏应池当时重伤，至呕吐鲜血，黄日葵、呼霹雳皆头部受伤极重。现受重伤学生皆分别抬往瞿氏、德国、法国、首善、尚志诸医院。（节录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

第一件议员受贿的事实，由《京报》登载出来到现在已过一星期，议员及内务总长高凌蔚两方面均无一字之声辩，其真假便不用讨论了。并不是点名发饷，为什么某军需官来京即将各党名册送至红罗厂？正在轰说所谓最高问题时，曹巡阅使忽然送议员炭敬，联络感情，究竟是何用意？在欧、美、日本诸立宪国，此种事实若在新闻上披露出来，行贿者、受贿者均早已由检厅起诉拘押在监狱里了。化日光天之下，公然行贿受贿，内务总长公然向新闻记者直言不讳，真是目无国民，目无检厅！

第二件国会违宪的事实，也是百口莫辩的。凡是立宪国无论君主民主，人民在宪法上都有请愿的权利，中华民国的约法也有明文；现在学生是向护法的国会请愿，不是向皇帝京控，议长竟纵令警卫流氓殴伤学生多人，这明明是不承认人民在约法上有请愿的权利，这样若不算是违宪，什么是违宪？议员诸君试扪心自问：若以前安福国会在北京有此举动，诸君在广东高唱护法时，是否要通电严责非法国会违宪之罪？当真诸君即是约法之化身得任意或违或护吗？现在教职员学生似乎重视驱彭留蔡问题而轻视了国会违宪问题，一般社会以为此次风潮是国会殴打学生问题，而忘记了是国会剥夺人民请愿权利问题（今日学生请愿被打，将来农、工、商人请愿也可被打），都是大错而特错。原来宪法上请愿权之用意，是使含冤受苦的人民有路可走，是和缓革命之方法；我们向来不赞成这种叩头下跪式的请愿，正因为他是非革命的方法，是和缓革命

的道路，现在既然由国会宣告“此路不通”，大家赶快另外寻一条可通的路去走罢！

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家及学者诸君！你们向来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你们向来是迷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可是今天横在你们眼前的议员受贿、违宪两个问题，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不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问题，乃是一般人民权利被损害的问题，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不容许的问题，你们若不出来为此问题而奋斗，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司法界诸君！检察官对于这样明白受贿、违宪的事件若不提起公诉，不能说不是溺职，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司法独立！

1923年1月24日 《向导》周报第十七期 署名：独秀

最 低 问 题

现在各报上差不多没有一天不谈什么最高问题，我们却要谈谈最低问题。

杨以德恭维洋大人杀伤了许多开滦矿工，至令这些工人的家属颠连无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屠戮中国工人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英国的军警在汉口开枪打伤了许多棉花工人及商人，象这样帝国主义者公然屠戮我人民、侮辱我国权的大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一个军人毒打一个肚子疼拉车不快的车夫，从廊房二条胡同一路打到西四牌楼，一文不给（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益世报》），这是关系军纪、劳动两个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中国鸦片之害未除，复加上吗啡，最近又加上金丹，毒遍全国，北方各省尤甚，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种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在科学发达之二十世纪，而同善社、悟善社、道德学社、普化学社等，公然遍立于中国，均以扶乩请仙敛钱为事，吕纯阳前在上海某杂志做文章，现在又在北京某银行做行长，内幕中还伏有扶清灭洋之阴谋，这是什么一种东方文化，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安定门外教场前土匪啸聚之露天大赌局，近由军人保险，每日聚赌者三四百人，居然抗拒侦缉队（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益世报》），这是关于地方治安问题，何等重大，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西城东斜街张医生的十八岁幼妾，被大妇毒打自杀，经地检厅验称无故轻生，不予起诉结案（见一月二十日北京《京报》），这是不是应该发生人权问题，大家何以不谈？

北京内外城无食贫民现有九万八千九百八十六名之多（据最近警署所调查），大家何以不谈？

青年会原为美国人传教机关，日前美国兵在北京青年会赛球时打人，大招青年会中国人之反感，青年会干事并不向美兵交涉，此种有意侮辱中国人之事，大家何以不谈？

保定师范学生驱逐素行恶劣之校长，省长竟拘押学生代表，以军警护送校长复校，开除学生代表十七人（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晨报》），这种武装的校长，岂非教育界之耻辱，大家何以不谈？

这些最低问题，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大家都从来不注意不讨论；总统问题虽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不过是价值二百圆的一个小小政治问题，实在合不着天天用他点污了舆论机关的清白，而且叫做什么最高问题，真是令人看了肉麻。

1923年1月24日　《向导》第17期　署名：独秀

评蔡校长宣言

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恶浊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有奶便是娘”、“助纣为虐”、“在文化事业上做装饰品”、“在衙署里面之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高明得万倍；但是我们以责备贤者之意，对于他这种“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认为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所以不得不竭诚把这两个观念的缺点忠告于蔡校长且以告国人：

（一）是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的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因为社会上领袖人物若取消极的态度，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并且往往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东洋民族之所以衰弱不振，正以消极的思想为最大病根，因此我常常痛恨中国的老、庄学说，及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为东洋民族唯一的仇敌；甘地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及非暴力的抵抗主义大失败之经过，消极的东洋民族之弱点已暴露无余，现在北京《晨报》竟称蔡校长为中国之甘地，竟称不合作主义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厄运！我们当如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以保护群众的革命运动之一线生机；而《晨报》记者反希望蔡氏之主张能如甘地风靡印度，真是岂有此理！

（二）蔡校长宣传不合作主义，明明不过是希望一般做装饰品做机械的学者官吏采取折〔拆〕台政策，他这种政策，可以证明他眼中只看见一班无良心无能力的学者官吏，而不看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只看见武力不看见民众，蔡校长打倒

恶浊政治的运动，也只看见学者官吏而不看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辛亥之役，清帝政府虽倒，而革命并未成功，正以这个缺点为最大原因，蔡校长的宣言竟引据推倒清室为不合作主义成功之例，正是一个相反的证明。

我们敢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1923 年 1 月 24 日 《向导》周报第十七期 署名：独秀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

我们一方面天天骂军阀官僚包办政治败坏国家,一方面却又天天主张我们不干预政治,这种思想是何等矛盾!中国社会向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人(教育界属之)说:我们只要专心办学求学,不必问政治;农民更在那里睡觉,连政治这个名词还不大知道;工人说:我们只求改良生活,我们不愿干预政治;商人也说不谈政治。好了,士、农、工、商都不问政治,有个国家又不能没有政治,如此政治只得让军阀官僚来包办了。因此,我们敢说:中国政治坏到现在这样地步,不是军阀官僚自己要包办政治的罪恶,乃是士、农、工、商都放弃责任而且忍心害理的主张不问政治,甘心让军阀官僚包办的罪恶。单就教育界的士说,政治不清明,财政紊乱,教育费无着,你们如何能办学、求学?于是你们妙想天开的说:教育独立,不问政治。我现在要问: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去〔中〕去独立?我又要问: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中〔去〕?若无人圆满的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教育独立,不问政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勿再出诸知识阶级的教育家及学生之口!现在有些人对于学生请愿被殴风潮又说:我们只主张教育独立、司法独立及驱彭,不干预政治。其实教员学生除了教书读书以外,出来主张教育独立,主张司法独立,主张驱彭,也都是些政治运动了,还说不干预政治,真是掩耳盗铃。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除非不是人,那能够不问政治!"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是中国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

1923年1月31日 《向导》周报第十八期 署名:独秀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

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只有“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八个大字为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然而自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改革家，总脱不了浪漫的倾向：激烈的往往走到暗杀或暴动（一时无组织的暴动）的路上去，和平的往往走到不合作（新村运动也归在这一类）的路上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绕来绕去，总不肯向正确的有效的革命轨道上走。这些浪漫的倾向，自然是社会改造运动中不幸波折，却是阶级根性上历史的遗传，非一时所能脱净的。从事暗杀或暴动的人，不能不算是激烈的革命分子；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老实说还是封建时代非组织的一时冲动的浪漫根性之活现。实行不合作主义的人，他那种愤时疾恶的热诚，比起一班同流合污之辈，自然值得受人赞赏；但是他那种消极的态度，老实说确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心理之模范的暴露。

这些把戏——暗杀、暴动、不合作，现今都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或隐或显的照例扮演出来了。

中国经济的变动及紧迫，已造成新势力民主革命的条件，而旧统治阶级——军阀官僚之黑暗昏聩腐败无能力，又日夜舍命向被革命的路上狂奔，无形的革命空气一天增涨似一天，至少也充满了沿江沿海沿铁路各城市。“山雨欲来风满楼”，只恐怕国内一班新势力之领袖及青年，仍为浪漫的理想所迷，而不知采用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因风造雨，致失时机，岂不可惜！

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因为善与恶都是社会的关系、阶级的关系，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

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不但不是革命的行为，而且是革命之障碍；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暴动这个方法，比暗杀进步得多，但革命固然要采取暴动的手段，而暴动都〔却〕不尽是革命；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暴动，我们所反对的是有些人误解迷信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一时冲动的暴动就是革命。我们所尤其反对的是妄想利用军队或土匪或红胡子一时的暴动，达到革命之目的。这种浪漫的暴动，决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即使能得着一时的胜利，也决不能在实际上推倒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种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好像水上浮萍毫无根据，而且没有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基础，往往有以暴易暴的危险，他自身决无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至多不过真象胡适之先生所说："快意一时"、"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决没有使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罢了。要达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说〔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也只有在这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无数的民众运动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得到无数的新教育新经验新人才，才能去掉许多恶因，才能产生许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必须如此，才能使复杂的社会组织现出一度变更；这种暴动这种革命才是科学的，这些结果都不是浪漫的暴动所能够得到的。

我们反对不合作主义，不用说不是赞成与恶浊政府合作，乃是反对社会上领袖人物只知道拿消极的不与政府合作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而不知道采用积极的与民众合作方法，来做积极的进攻的革命运动。这种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不但有引导民众离开积极革命的恶果，而且不合作主义的自身，是浪漫的，是和平退让的，在印度百余万甘地党徒尚且是行之无效，明白的破产了，结果只变成了革命的障碍物，变成了革命党人看做在英政府以上的仇敌；何况中国式的不合作主义，蔡校长一个孤家寡人

的不合作主义[1],简直无产可破,请看蔡校长所希望在衙署里面之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正在那里得意洋洋的代表总理大人说什么"彭蔡解除误会,或更至交欢"这一类的话,便是一个明证。以前蔡校长等所发表的政治主张(见二号《努力周报》)上说:"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为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又说:"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这种积极的精神,实在是治疗中国人恶劣的消极根性之圣药,想不到现在蔡校长又回到笼手消极的旧路上去了!我们现在要请问当日和蔡校长发表同一主张的十五个要做奋斗的好人们,是否也都跟着蔡校长笼起手来让恶人背着走?是否也要做当日自己所痛骂的"罪魁祸首的好人"?

我们明瞭正确的主张是:

科学的革命运动——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反对一切个人的浪漫的消极的行动;

创造武装的民众,不赞成个人的暗杀;

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训练有纪律的暴动,不是一时无组织浪漫的暴动;

积极的与民众合作,决不把消极的不合作当做一种主义,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

1923年1月31日 《向导》周报第十八期 署名:独秀

---

① 1923年1月19日,蔡元培为财政总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因此,蔡发表《不合作宣言》。宣言说:"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弹劾质问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院乃竟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同时,递辞职呈文,谓"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等等。(见《北大日刊》)随即,蔡元培又刊登"不再到校办事"之《启事》,悄然出京,到天津小住,准备出国。

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

现在全世界的大患都是兵患，但欧、美、日本各国的兵患，不在兵之本身，而在帝国主义的政府拿兵来压迫殖民地，拿兵来互争殖民地。中国的兵患，乃在军阀拿兵来拥护他们私人的地位，增益他们私人的财产；而中国的兵何以甘心供军阀私人的利用和牺牲，乃因中国兵是由军阀雇佣的土匪及各种无业游民而成，军阀的威权乃建设在这班土匪游民之上。这班土匪游民专以当兵为职业，职业兵靠兵官吃饭，兵官靠大帅吃饭，大帅一旦失了地位，兵官及兵便失了饭碗，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兵患乃在兵之本身。救济中国兵患之根本方法，不专在裁兵，而在改用征兵制来代替现在的职业兵；因为征兵服役有一定的期限，退伍后有一定的职业，和官长大帅没有永久不可离开的经济关系；而且征兵区域有法定的限制，势不能任意的无限增加；所以在征兵制之下，无论如何野心家，至少也不能够造成中国土匪头的军阀。

议会制度虽在欧美各国已成末路，而他们当初发生及存在却有历史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他们的资产阶级都很发达，大部份的议会议员都有相当的职业，都隶属于政党，每个政党都能代表资产阶级一部的意见与利益，所以他们的议会制度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后援的。中国的议会则不然。产业幼稚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尚未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阶级，因此至今不曾有一个代表阶级意见与利益的政党，所有的政团，无非是一班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单纯为自己个人利害关系凑拢起来的。因此，中国的各阶级议会都没有阶级的后援，各级议会的议员都没有相当的职业，这种以议员为职业的议员，自不得不视职业为谋利的工具，这种浮萍无根的议会，自不得不

仰权门的鼻息以图生存，他们助纣为虐固然可以横厉无前，若真为民权奋斗而抗权门，直不能一朝存在，议员只能为恶不能为善，乃是必然无可逃免的事实。所以我敢说：全国各级议会的议员种种失德败行横暴堕落无人格的行为，并不是议员们本身的罪恶，乃是强效欧美的议会制度而不合中国社会状况的罪恶，循此不变，虽改选数十百次，也必然是后先一辙。救济之道，惟有用革命的手段废去现行各级议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改用由现存等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此种国民会议，不但代表其团体的意见与利益有一定之后援，能收监督政府之实效；而且每年改选一次，每次会期不过一二月，不妨碍议员固有的职业，谋生无后患，至少也不至像现在的职业议员长久群聚废业，为谋利求官而有奔走结纳煽动政潮的必要与经验。

1923年2月7日 《向导》周报第十九期 署名：独秀

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

蔡校长是我们最敬爱的人，但我们对于他消极的方法之宣传，认定在青年思想界，在革命的民众心理上，都有极大的恶影响，故不得不进以忠告。以前蔡校长只办教育不问政治的谬误主张，已经收了恶果，以〔已〕经引导青年学生到了极沉寂的睡眠状态几于不可救药；他现在虽然觉悟到恶浊政治使他不能再忍受而希望政治清明，却已后悔迟了，而且仍然取"退的"消极态度，又来宣传第二个谬误主张，北京《晨报》记者指明他是不合作主义，并居然称许为"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我们认定蔡校长这第二个谬误主张，又要造成恶果，第一个恶果已经遗祸无穷，一时很不易改正过来，现在又要收第二个恶果，真是青年思想界之厄运重重，我们实在忍不住不出来反对；因为中国人婴退的懒惰的病根甚深，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正合他们的口胃，若是有人附和盲从起来，婴退懒惰不肯挺身奋斗的人们，正好借此鸣高，其实是拿不合作主义为安乐窝为避难所，以遮掩他们懒惰怯懦的羞辱。

北京《晨报》记者现在也承认："现时我国可否鼓吹'不合作主义'，的确是一个问题。"也承认："我们中国在军阀政蠹盘据的政状之下，非有一种更深刻的标语，更严厉的手段，恐怕不会得群众底了解。"我们深深感谢《晨报》记者这种论调可以加〔给〕宣传不合作主义者一个很大的打击。《晨报》记者又说："不合作主义是打破现状底一种方法，而恐其不是有效的方法。况且蔡元培宣言，仅仅说到正谊主张者，不要替政府帮忙一层，此外有无其他主张，及蔡自身辞职之后，有何活动，都无从知道，我们决不愿轻易替他鼓吹。"这些话都说得极其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恶浊政局是有历史的有组织的一件东西占住了空间，必须有一件东西能够积极的打倒他代替他来占住这空间，才是有效的方法；不合作主义的本身决没有这种性质，不但没有这种性质，而且是消灭这种性

质的利器，因有民众心理尤其是懒惰怯懦的民众心理，遇有人示以解决困难之比较的和平方法，他们的精神希望便集中到这个方法，痴心妄想以为他足以解决困难，非等到这个方法完全失败，便不会发生另寻方法的精神作用，更不会——而且以为不须——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我们认定宣传不合作主义，在打倒恶浊政治方面看起来，是绝对无效的方法；在消灭民众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来，却是第一有效的方法。蔡校长若不愿与恶浊政府合作，辞职出京，别有所活动，则不合作只是别谋活动之过程中一个行为，决不能说是一个主义，但是他不独辞职宣言后无所活动，而且宣言中明明只是宣传某君"相率离京"、"相率辞职"、"不再替政府帮忙"等名言和他自己对于研究学问的兴趣，此外并没有别的主张，蔡校长痴心梦想用这种浪漫的消极方法来拆散恶浊政府的台，来求政治清明，已经是大错而特错了；《晨报》记者又从而盛称他"宣传不合作主义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更是错上加错。我们应该竭诚忠告《晨报》记者，个人立言错了是小事，因为要回护自己的错遂不顾社会的错是大事；因为不忍社会的错遂不惜承认自己的错，这是最勇敢的行为呵！

《晨报》记者不承认"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有害的主张，不承认甘地主义在印度已经失败者，不承认甘地"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在第一点，可惜我们没有这种逻辑的头脑可以认识"不合作主义"不是消极的，至于他的害处，前文已详，现在不必再说。在第二点，这有事实的证明，本报另有纪述，也不必重及。在第三点，这是《晨报》记者根本的观察错误，我们不可不讨论一下：第一，《晨报》记者所列举的甘地八种主张，若说都不是消极的，便可以说人间行为无一不是积极的，而西文字典上也可以将 Negative、Passive 等字永远删去。第二，若说"不"字是他们的手段，决不是他们的目的，此话便差了；我们正是指斥他们所取的手段是消极的，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之可能，而且阻碍革命运动；至于说到目的，出家求仙学佛及山林隐逸的人，何尝没有积极的目的，蔡校长想拆散恶浊政局的台，又何尝不是积极的目的。第三，《晨报》记者举出甘地许多积极的行动，证明他不是消极的人物，这便更差了；正因为他积极的"树起'不合作主义'的旗帜之后，遍历全印，到处宣

传，演说不足，继以文字，务使一般印人彻底的了解他的主义”。革命运动因此大受了釜底抽薪似的打击，甘地的奋斗，正是他的罪大恶极处；他若是愤而辞职之后，隐遁起来，独善其身，所遗下的恶影响还小得多。第四，《晨报》记者说：“他（甘地）根本上对于现代欧洲文明，异常反对。他觉得机械工业，而〔是〕演成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底最大原因。英政府想把这种机械工业制度，移植到印度去，所以非极端反抗不可，民族观念还在其次。”如此说来，甘地运动决不是民族的革命运动，乃是复古的反革命的运动，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性，把资本私有的罪恶和由他产生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些罪恶也是历史进化的必然性），都归到机械工业物质文明身上，简直和从前英国工人打毁机器是同样的见解。托尔斯泰、达哥儿、甘地都是这一流的昏蛋，他们妄想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拿主观的空想来改造的，他们妄想以为手工工业可以和机械工业竞争的，他们妄想以为人类历史可以由人力开倒车的。吴稚晖先生说：“印度比中国更无望，因为印度反科学反物质文明的民族性比中国更甚。”这乃是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二大病根之一（其一是消极的思想）。第五，《晨报》记者说：“劳动阶级底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底表现，难道《向导》周报记者连罢工也不赞成吗？”我们的答复是，工人罢工，乃是被雇者在承认现制以内，对于雇主在一定的要求条件之下所采用的手段，部员罢工索薪，也是这一类，与所谓“不合作主义”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合作主义应该是无条件的，这一类的运动，只是一部分的改良生活的有条件的经济要求，不是无条件的根本推翻的政治争斗。像工团主义派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妄想单用总罢工的手段推翻统治阶级，简直和蔡校长想拿总辞职来打破恶人政局是同样的谬误，我们当然也是不赞成的。此外还有几种罢工（如不适时机及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等），也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晨报》记者以为我们对于工人罢工都应该盲目的一概赞成，这个思想未免过于简单了，过于浪漫了。

我们很敬爱的《晨报》记者！请你们去掉成见，去掉浪漫的思想，平心静气的就客观上精细研究一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是个不能实现的空想？是否有打破恶人政治的可能？恶人政治是否必须积极的民

众革命才能够打破？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有消灭民众革命心理的恶影响？倘弄清了这些问题，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同做思想界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1923年2月7日 《向导》周报第十九期 署名：独秀

为自由而战！

“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现在恶浊政治热烈的指教我们，使我们渐渐知道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了。北京学生为了向国会请愿受警察殴打，这明明是不许国民享有宪法上请愿的自由权利了；京汉铁路工人为了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会被军警强迫解散，这明明是不许国民享有宪法上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了。我们盼望各界人士都要认清这两件事是一般国民失了自由的问题，不单是学生、工人自身一部份的问题，各界人士其同时速起，为自由而战！

1923年2月7日　《向导》第十九期　署名：独秀



统一的国民运动

军阀们的罪恶，国民都已经亲眼看清楚了，非打倒军阀不能救国救民，国民也渐渐觉悟了，但是如何打法才有效呢？

我们要知道：军阀的运命固然已去末日不远了，然自古道"困兽犹斗"，他们最后必死战，却也未可轻视；况且他们的知识力量固然不过是些土匪头，不能当真算个什么军阀，但是政权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比起我们组织很弱的人民来，还是矮人国的长子，若是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

所以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

现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工人屡次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大家说是学潮；林超然非法被捕，只有新闻界出来抗议；商界虽号召裁兵运动，而眼见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省的人都是隔岸观火。这样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

1923年2月27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期　署名：致中

致 胡 适

适之兄：

弟已于前月廿六号到广州，一切平安，勿念。秋白兄的书[1]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此间局面尚称巩固，决不似京、沪各报所传之恶。孙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特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努力》出版，望每期赐寄一份为叩。

弟实庵白[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

① 即《赤都心史》。

怎么打倒军阀

中国的统治阶级还是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下面的臣仆，是中国政府上面的太上政府；他们利用政权来卖国，来紊乱全国的财政军纪，做出在法律以外压迫人民的一切黑暗罪恶；他们断然置外交紧急、国库破产而不顾，一意索款增兵，藉口统一，屠戮异己。这些都是昭然的事实，人人知道，不用我们再说了。近来以外交内政上种种事实的教训，国民各方面救国的思想及方法都已渐渐集中到“打倒军阀”这一点，这也不用我们再来解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打倒军阀，但是在决定这个问题之前，必须了解军阀存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运命。

第一我们要了解军阀们所以存在，决非偶然，他们有两个强大的基础：(一)是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后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荣华，所以自来各帝国主义者都不愿被他们压迫的民族能够自强，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在中国极力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压迫民党，这是以往的明证；现在对于地方的军阀还是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给军械，英国在广东援助陈炯明，上海的领事团极力结纳何丰林，连市民对于孙中山的欢迎会都禁止了，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周刊》都不许发行，这都是眼前的明证；所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若不因中国国民之反抗或国际形势之变迁而失坠，终是军阀最有力的后援。(二)是国内无业游民的后援。军阀的势力在兵多，兵从那里来，不用说不是依法征调而来，乃是一班无业游民，由军阀出钱招雇来的。这种兵匪不分的兵，原来本无职业，或是失了职业，现在以兵为终身职业，终身要靠大帅吃饭，自然不得不昧着良心服从大帅命令去杀人、放火、抢钱，无所不为，大帅拿出吃饭不饱饮酒不醉

的小钱，雇用一些土匪兵，去抢政府人民成百万成千万的大钱，真是一本万利；可怜这班职业兵，打死一队，马上可以再招一队，解散一师，马上可以再招一师，这种非阶级化的游离无产者(即无业游民)，不是他们心里之恶特异于人，乃是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得不供军阀牺牲，不得不为军阀作恶。中国此时无业游民群众日见增多，他们简直是供给军阀势力之无限的活动资金。

第二我们要了解军阀的运命固然已去末日不远，然而自古道困兽犹斗，最近曹、吴、冯、齐有在“北洋正统武力统一”口号之下大结合的趋势，他们这最后的决死战，却也未可轻视；况且他们的智识力量固然不过是些土匪头，算不得什么真的军阀，但是政权与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比起我们组织很弱的人民来，还是矮人国里的长子，若是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

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打倒军阀，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一) 必须做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造成自主的国家，以根绝军阀之后援。有一班人以为只须做拥护民权打倒军阀的运动，不必牵扯到反对帝国主义，多树敌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在国际地位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军阀自身究竟没什么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所以我们固然要根本上反抗列强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侵略，而目前最急的是要抵死反抗他们以各种名义的外债直接或间接供给军阀。

(二) 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在产业幼稚兵匪不分的中国，召来便是兵，散去便是匪，根本的救济固然只有开拓工业农业来吸收这些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然而目前救急，裁兵也算是缩小军阀势力救济财政破产之一法。但我们要知道：(1)只裁一部分兵，其结果反使军阀荷包增加一笔裁兵费，而他们压迫平民和兵争战乱的力量依然存在；(2)希望军阀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3)希望军阀行兵工政策，更是附虎以翼，这些方法都是不行的。我们主张：(1)以平民的宣传力量使兵士倒戈而自散；(2)资本家合力兴办浚河、筑路等公司，以兵工政策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3)农村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乡团，城市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工团、商团，如此，不但可以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并且

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

（三）必须做民主的统一运动，使同一国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之下，才能根本改变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然而这种统一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统一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军阀们“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所可冒牌；民主的联邦固然不害于统一，然而军阀们所提倡的“联省自治”，却是破坏统一之变相的封建割据。赵恒惕、卢永祥都主张联省自治，到了人民真要实行省宪法都害怕起来；吴佩孚口口声声主张统一，实际上处处破坏中央政府财政军事的统一，而且见了工人联合统一的运动便害怕起来。这班军阀们，力量小的便想借口“联省自治”以图割据，力量大的便想藉口“统一”以扩张自己的地盘，这种军阀割据的省自治，这种军阀兼并的统一，不但去自治与统一都有天渊之隔，而且同是纷争战乱的源泉。我们主张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和民主的省自治并行不悖。

（四）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现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工人屡次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大家说是学潮；商界虽号召裁兵运动，而眼见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省人都是隔岸观火；这样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统一的国民运动之具体办法，最好是各省各团体集合在国民革命军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解决政治之统一的战略。

（五）必须做民主革命势力集中的运动，在国民运动中，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此时全国各党派倾向军阀官僚的分子，当然不必说了，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势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军阀延

长生命。

（六）必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全世界的各种革命史，大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热血所造成，眼前的中国事实更可证明。知识阶级诸君呵！最近政象已明白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愿投降于军阀，只有民主革命这一条路可走，别无中立徘徊之余地。你们切不可迷信宪法可以革军阀的命，白纸黑字的自由是骗人的废话，自古只有革命造成宪法，没有宪法造成革命；你们切勿想单靠你们决战的舆论和学生运动来打倒军阀，你们的舆论与运动倘不中途退却，固然也可以造成革命的空气，并且你们当中富于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的分子，自然在革命运动中恒站在指导地位，但是你们离了工人、贫农的劳动群众便没有当真革命的可能；这是因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之现实生活的要求及阶级的战斗力，都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并非是些浪漫的革命分子可比。你们勿怕，我们现在并不是鼓吹劳农革命，即在国民运动中若忘记了劳动阶级是重要部分，这种国民运动也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所以知识阶级、工商阶级不但不应当怕劳动阶级的组织及运动，而且应当竭全力以赞助此等组织及运动：(1)保障工会之权利，(2)扩大工会之组织，(3)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如此方能运用此最有实力之社会阶级来反抗军阀。劳动阶级不但要求真民主主义最切，而且能为真民主主义奋斗的力量也最大。并且此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劳动阶级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试看铁路工人已经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便可明白。他们此次的血战，不只是为工人的自由与人格而战，乃是向军阀们黑暗势力为全国人民之人格与自由而战；凶手们北洋军阀的罪恶，不只是因为杀伤了几百个工人，并且是对全国人民之民权、自由与人格而宣战。

1923 年 4 月 18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一期　署名：独秀

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

二月中李根源到上海，向孙中山游说什么孙、岑携手平分粤桂，孙中山未应从他这种分赃而且是买空卖空的妙计，他同〔回〕到北京便翻转面孔，替曹吴向黎元洪催发闽粤令了。

沈军未变前数日，广州即轰传岑春煊、杨永泰催沈就职并为筹饷之函电；沈军败后，林正煊(省议员)以赴新街会议之嫌疑而逃，容伯挺(沈军谘议)以密探之罪而伏法，政学会在省港之秘密机关，已破未破者闻共有八十余所。

此次沈鸿英叛乱，固然是北洋军阀与南方冲突之开始，主要原因还是政学会与国民党第二次破裂之表现。

和平的研究系，他自前清直到现在，还能抱定他始终一贯的立宪主义，政学会的主义是什么？不过是“鼠窃狗偷做官发财”八个大字的党纲。他们纵彭允彝以大湖南主义入寇教育界，来讨反动的军阀之欢心；他们牺牲沈鸿英在广东做投机买卖；他们还想利用黎元洪做首领来组织政党，与吴佩孚妥协来压迫南方；他们以如此一来，在南北政治舞台上都能占得势力了。但是他们在南方的投机买卖，眼见得要失败，可怜牺牲了一个沈小军阀，政学会虽无所失亦无所得；他们在北方策略，到第二次奉直战后，无论谁胜谁败，不知道他们将来又用什么一种迎新送旧的面孔来处置他们的新首领黎元洪？这种蝇营狗苟的政客们，其败坏国事的罪不在军阀之下！

1923年4月25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　署名：独秀

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

什么对等会议！不过是孙曹携手的变相名词，阴谋孙曹携手的人们，以为用这个名词稍稍冠冕一点便于公然宣传。什么孙曹携手！不过是劝孙降曹的变相名词，阴谋降曹的人们，以为用这个名词稍稍体面一点便于向孙劝说。孙中山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是为民主革命向北洋军阀奋斗而存在的，若与北洋派首领曹锟携手，试问携手去做什么？

这班政客们欲降曹便去降曹，为什么要拉孙同去，又为什么造出这种名词？这是因为他们有的想靠曹做总理，有的想靠曹做总长，又觉得单是自己降曹终属人微价低，不如用孙做一份见面的厚礼；并且他们都曾列名党籍，若单独降曹和孙分离，恐怕在舆论上站不住，将来要蹈陈炯明的覆辙，所以索性拉孙下水，以便遮羞而免后患，这就是他们造作名词淆惑听闻之苦心。

北洋首领曹锟，代表帝政余毒的旧势力，民党首领孙中山，代表民主革命的新势力，两者不能并存，民主革命的企图中，必不容北洋军阀有存在之余地，有了北洋派，便没有民国，此种顺逆是非之大义，炳若列星，我们希望民党贤者若汪精卫、胡汉民、徐谦三君，慎勿为降曹派诡词曲说所欺，致犯误国叛党之罪！

全民社一班人已经睡在粪坑里了，我们希望小孙派勿跟着他们倒下去！当年孙毓筠辈迷信袁家武力，故不惜抉破民党与北洋军阀之大防，以苟图富贵，现在你们勿再迷信曹家武力罢！你们要知道：阴谋孙曹携手使孙自杀的人们，比公然联曹攻孙的政学会罪恶更大！

1923年4月25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 署名：独秀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们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

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

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

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扒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

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蟊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1923年4月25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　署名：独秀

海 军 态 度

海军态度之变动，在近年政局上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一九一八年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分离，对北京政府宣告独立，并拥护孙中山南下至广东组织护法政府，使北洋军阀至今不能统一中国。此次驻沪海军宣言拥护福建省自治，对北京政府取脱离态度，这是中国海军反抗北洋军阀第二次之表示。林司令通电上说：

“国家之有海军，所以卫国保民，原非供一二人政争之武器。”又海军将士复旅京福建协会电上说：

“统治大权旁落于军阀之手，今日国家已如军阀之私产，元首等于傀儡，内阁俨若家臣，四百兆人之国家将成一二人之天下。苟不念及国家，尚可靦颜视息；设以国家为前提，能不投袂而起，以解倒悬？军人所服从者，建筑于民意上之政府命令耳，岂其牺牲千万人之生命，以逞一二军阀之私欲！”

这样严正的指责北洋军阀，不但加军阀以打击，即被军阀支配的傀儡家臣，也应听了面红耳赤。

但是我们要忠告海军将士诸君两件事：(一)是始终固结团体，勿为北洋军阀金钱所惑中途改变态度；(二)是要结合南北各省革命的军人、工人、学生，彻底打倒北洋军阀，以建设全国统一的人民政府，勿单以福建省自治为满足。

1923 年 4 月 25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　署名：独秀

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或者不尽然，“昏乱政府无外交”，那便是自然的结果了。国民不便直接办理外交，无论如何奔走呼号，只是做政府的外交后盾，北京政府历来卖国误国的行为姑且不说，即以此时昏乱的现状看来，对于西南的内交尚且弄得颠倒错乱，不成话说，如何能够对列强办外交呢？因此国民起来干涉内政比干涉外交还加倍重要紧急！可是中国国民并且是国民中自称觉悟的青年学生，竟有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倾向。我们敢说这种倾向是青年们回避革命的心理引导出来的；我们敢说这种非革命的外交运动，开会、游行、通电、排货等运动，因为是钦命的官许的，便一文不值！“五四”运动因外交而牵到内政，而牵到一切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运动，一时颇现出一点革命的空气，“五四”的真价值在此。随后空气销散之原因，是误于“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及“只读书求学不做社会运动”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心理，归纳起来，就是“不革命”三个大字。

现在又来了！懦弱的青年啊！听凭你寻找任何不革命的道路(如道德救国，基督教救国，农村救国，人道互助，地方自治，不问内政，读书运动，宪法运动，不合作，合作而促其速倒等道路逃走)，军阀官僚总非追着“革你的命”不可，你往何处逃！

1923 年 5 月 2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三期　署名：独秀

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

军队应该属于国家，湘军、滇军、粤军、桂军、奉军等名词，已经很表现地方主义的色彩，不成其为国家的军队了。等而下之，更有所谓龙济光之济字营，陆荣廷之荣字营，这明明白白是私人的军队，完全是部落酋长时代的把戏。陈炯明旧部之为陈家军，也是在事实上人人都知道的。陈炯明向来把持以陈家军为中心的粤军，垄断粤政，只知有广东，不知有中国，这种部落酋长思想，是国家主义之大敌，是国民运动之障碍，这是我们所以反对他的最重要之点，别的事还在其次。他现在反抗中山先生之阴谋，仍旧利用地方主义煽惑粤军；即使他这种阴谋能够达到目的，除了使全国进步分子厌弃他这种部落酋长人物之感想增加强度以外，恐怕别无所得。第一，正在南北酣战中，他不劝告粤军一致对北，却利用吴佩孚、齐燮元之势力金钱，来团结粤军，谋袭南军之后，此计果成，其结果必至引狼入室，明白大义的粤军，未必盲从他的阴谋诱惑，为他争权位报私仇，以贻乡土无穷之患。第二，即使中地方主义毒的粤军一时为其诡词所惑，而陈炯明之部落酋长思想，将由广东主义一缩而为惠州主义，再缩而为海陆丰主义，三缩而为陈家军主义，陈家军势力支配之粤军团结，怎能不凶终隙末！

我们希望粤军健者：以国家主义代替地方主义，以"团结革命军"口号代替"团结粤军"口号，无论何省军队、工人、农民、学生，凡是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都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合力打倒北洋派军阀，建设统一的真正民国，那才是粤军的真正光荣。若团结在北洋派雇用的陈家军旗帜之下，岂不要受两重奴辱！

1923 年 5 月 9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四期 署名：独秀

杨森果为统一而战吗？

"国民的统一"，在内政上、外交上及国民经济上，都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不但在理论上为有害而无利，在事实上也是绝对的不可能；因为军阀阶级自己不能统一，加之兵队军需输送之困难，想用武力征服全国，真是做梦。

进一步观察，所谓北洋派统一中国，也是吴佩孚欺骗北方武人的话；他曾对我一个朋友说："什么统一！就是我吴佩孚统一。"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吴佩孚并未奉北京政府命令，竟私自助杨森打四川，袁祖铭图贵州，孙传芳到福建，陈炯明、沈鸿英扰广东，不过雇用一班新式的胡大海[①]、常遇春，为他打江山罢了。

再进一步观察，中国封建的势力，已被新发展之地方的经济势力逼得濒于灭亡，封建的道德纪纲因此已完全破坏，所以冯、段不能始终服事袁世凯，曹、张、靳云鹏不能始终服事段祺瑞，吴佩孚也自然不能始终服事曹锟，至于吴佩孚雇用的一班胡大海、常遇春等，更不过一时利用吴佩孚之金钱声势各遂其割据之私图，自始就没有服事吴佩孚的心理。假使王承斌得了东三省，杨森得了四川，袁祖铭得了贵州，孙传芳得了福建，陈炯明或是沈鸿英得了广东，都会马上变为吴佩孚的敌人，吴佩孚想雇用这班新式的胡大海、常遇春，来为他打江山，也真是做梦。

杨森！诚实说罢！你如其说"为中国统一而战"，不如说"为吴佩孚统一中国而战"。更诚实些，还不如说"为杨森统一四川而战"。最诚实无欺，应该说"为杨森割据四川而战"。

1923年5月9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四期 署名：独秀

---

① 胡大海，明初将领，从朱元璋起兵，曾任江南行省参知政事。

好个救国的妙计

曹、吴等反动的局面越开展，他们去崩溃的日期越近，在客观上的观察，诚然合理；然在主观上以促成反动的行动为救国妙计，则未免荒谬绝天下之伦了！杨度曾公然厚着脸说："我办筹安会助袁世凯称帝正是倒袁的手段。"如此说来，杨度不是帝制犯乃是民国功臣了；如此说来，端、庄、刚毅辈都是排满巨子了；如此说来，严嵩、魏忠贤、客氏之义子干儿，都是除恶锄奸的义士了；这是什么一种荒谬绝伦的逻辑！无耻下流何代没有，所可痛心的是此时自命清流的教育界，也要和他们所攻击的光园拜寿议员走到一条路上去，还要厚着脸公然说是救国妙计，廉耻道丧，天地昏霾，何一至于此！

1923 年 5 月 9 日 《向导》第二十四期 署名：独秀



吴佩孚与康有为

康有为好似丑妓从良，又复见弃，老而不安于室，万分无奈，只得看重了众人共弃的吴秀才；吴秀才近因放纵无行，乡党自好之士，都不屑和他往来，也自然只得垂青于康氏了。他们这种天然的撮合，本来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一）康氏为吴秀才拜寿时，适与清帝代表同至；（二）康氏公然以中兴辅弼劝诱吴秀才；（三）康氏与吴秀才晤谈秘室，至于涕泪俱下。以如此情状推之，吴秀才扬言张作霖要复辟，还是恶言出于仇口，倒是吴秀才自己或者要做张勋第二！

1923年5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

我老说洋人血肉的价值比华人的血肉要贵些，大家不说我媚外，便说我疯癫；可是现在中国新闻记者大部分都以为洋人的血肉比华人的血肉重得多！

欧美、日本人杀伤华人侮辱华人事件，几乎无日无之，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英国人、日本人勾结萧耀南杀死四十多工人，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乐志华无辜被英、日包探打得血肉横飞，英官公然宣告凶手无罪，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现在山东土匪掳去二十几个洋人，[①]算得什么大事，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便大惊小怪，连篇累牍，说个不休，你们是什么一种心理！连年军阀杀人无算，这姑且不说，土匪掳人勒赎，南北各省是常见不鲜的事，从来不曾因此惩罚地方官，独偶然小小触犯了洋祖宗，连地方最高级的文武长官都要受处分，为什么独有洋祖宗这样圣神不可侵犯。北京政府如此懦弱昏聩，真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此次被掳的人，华人一百余，洋人不过二十余，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独注意被掳的洋祖宗，是不是主张土匪只可掳华人不应该掳洋人？土匪掳人不分华洋，却毫无媚外的心理，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说此事是国耻，我敢说只有你们这样媚外真是国耻，比别的一切国耻都厉害，这班无耻下流媚外的新闻记者，实在比土匪还不如。一班洋商洋律师在中国欺吓敲诈，无恶不作，现在受点小小委曲，还算是很轻的报复，重的报复还在后来；他们在中国搜刮了堆积如山的金钱，使中国人穷而为匪，可怜无用的土匪们只知道分润这一点，还算是小小的光复，全部的光复还在后来。

---

① 山东临城土匪劫车案。1923年5月6日晨2时50分，津浦路北上快车在山东临城沙沟间，为张敬尧旧部孙美瑶匪军毁轨抢劫，掳去车客二三百人，其中有外人二十余名。

我更要正告一班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一向立意要宰割中国，做他们永远的殖民地，因为他们非此不能生存，华盛顿会议不过稍稍抑制日本独占中国之野心，他们共同侵略中国之色彩更加浓厚；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若不能实现有力的国民革命，无论无耻下流媚外的人们如何长跪哀求，决无幸免之理。欧美、日本各国若借口区区土匪掳人问题来实行军事的自由行动，决不能使我们格外恐怖，因为欧美、日本在华海陆两方面军事的自由行动，已不自今日始，而且他们和平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使我们更加恐怖。

英国人想借土匪掳人问题遮掩乐志华冤案，日本人想借此遮掩旅大问题，他们这种卑劣手段，只能欺骗一班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决不能够欺骗良心上还知道华人的血肉和洋人的血肉有同等价值的人们！

1923 年 5 月 16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与交通安福

国民党唯一的使命，是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政治。辛亥革命，第一目的是扫荡清室的恶浊政治，为扫荡恶浊政治，不得不推倒清室统治权，这还是第二目的。清室倒后，北洋军阀袁、段等继承清室的统治权，辅以交通系、安福部等蠹国乱政的妖孽，政治之恶浊更甚于前清，所以是国民党不得不继续革命，以求政治之清明；也正因有此志此心，虽革命战祸再延长数年数十年，国人也应该谅解。

国民党欲以革命手段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必当重视全国革命分子，建设势力于倾向革命的民众之上，不得重视官僚分子，建设势力于蠹国乱政的官僚之上，如此明白无疑的逻辑，简直和二加三等于五是一样。

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引用黄芝祥、沈秉坤等一类官僚，颇轻视革命党人，其结果如何？交通系、安福部一班妖孽，力助袁、段为虐，民国以来政乱财溃，正坏在这班人手里，这班人若能使政治清明，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便不必继续革命了，国民党若引用这班人，便是根本的自杀！真心忠爱国民党的人们，应该一面消极的洗刷蠹国乱政的官僚，一面积极的造成拥有全国大群众的革命党，才不至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1923年5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吴佩孚爪牙阎锡山第二——杨森

我们以前只知道杨森是国贼吴佩孚的爪牙，现在可在他对于四川父老宣言中，知道他并且是阎锡山第二。阎锡山第一的欺世用民政治，已令人衔恨刺骨，现在又有一个阎锡山第二！

杨森宣言中所说治川的方法，其中谬误之点，此时当然没有讨论的必要，而且总算他说出一点方法，但是这种欺世盗名的鬼话，我们对于陈炯明的为人已经得着经验了。

在他的宣言中，我们应该注意两点：(一)他说："我们至少要做到像阎锡山之在山西。"他这样辛辛苦苦打回四川，辛辛苦苦做一篇皇皇大文想劝四川人归降他来统一四川，好让他仿行阎锡山的欺世用民政治，所以他公然说："以后，我在前台唱戏，所望的，就是要你们在后台打锣鼓，合着我的板眼！"(二)是他说："吴子玉将军决不贪占我们四川的土地，这次，一是吴将军本于素来的旨趣，想把四川弄好，好做别省的模范。"他又说，"而且能信仰吴将军是怎样热心为我们四川谋幸福了"！此时中国最反动的军阀吴佩孚如何纵兵惨杀工人，如何主张封禁全国工会，如何责骂蔡孑民使北京政府敢于蹂躏教育界，这些都不须说，我只回答杨森道：吴佩孚叫萧耀南督湖北，搜刮得湖北民穷财尽，这也是决不贪占湖北的土地，也是本于素来的旨趣，想把湖北弄好，好做别省的模范，也是为湖北谋幸福；吴佩孚助沈鸿英图广东，派孙传芳到福建，想必都是同样的旨趣。可惜孙传芳、沈鸿英不像杨森这样会做文章为吴将军宣传，不然福建人、广东人都会感戴吴将军的德意；更可惜沈鸿英不会打战〔仗〕，不然他督理广东，又可使中国多一个模范省。

杨森若以四川民众的势力，打倒熊、但等武人政治，我们便应该赞成；但是他现在假借最反动的军阀势力，打回四川，有造成四川为第二

湖北的危险，无论他如何大言欺世，无论我们如何原谅他，也只好说一声“卿本佳人，可惜从贼”！

1923年5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闽赣局势之新发展

奉张、段、卢、孙传芳、臧致平、王永泉、萨镇冰、刘冠雄、王占元等，联合倒吴运动，酝酿已久，行将见诸事实。最近各派代表在厦门开联席大会，会议结果如下：(一)各派共同出兵倒吴；(二)卢小嘉为联防办事处主任；(三)以福建总司令畀孙传芳；(四)抽调驻闽各军先出江西；(五)援赣军以李协和、臧致平为联军正副指挥；(六)改编舰队以便收复长江。

在此消息中，我们应该有两个极明白的观念：(一)孙传芳居然加入这个，即以证实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是做梦，吴佩孚想雇用一班胡大海、常遇春替他打江山也是做梦；(二)此次联合倒吴佩孚运动，纯然是两派反动旧北洋军阀争夺地位，别无他项意义，在此争夺中，自然予民主革命发展的机会，然亦仅仅是民主革命发展的机会，他们争夺本身的性质，和民主革命却是风马牛不相及，陈炯明联吴是认贼做父，我们对于这班倒吴派也断然不可认做贼子！

1923 年 5 月 16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段派之活动

段祺瑞虽隐居天津，山东、浙江两省都还有他的军事势力。奉直形势紧急，上海海军独立，粤中民党胜利，这三件事都是给段派复活的新刺激，他们北由奉天、南到福建这一条线路的活动，已是彰明较著的了，他们想占据津浦路，与直系占据京汉路对抗，隐然是直系的敌国。曹、吴蠹国乱政，自然是全国所痛愤，但若由段派的势力打倒曹、吴，其政治上的反动现象，岂能减于今日？安福部过去的罪恶：如亲日卖国，滥用卖国金钱，用兵西南，残民以逞，贿赂公行，权倾一世，使国民敢怒而不敢言，这都是国民所永不能忘的；他现在的罪恶：如卢永祥、何丰林等压迫人民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和曹、吴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将来的罪恶：如徐树铮、吴光新、陈宧曲同丰朱深、姚震、王揖唐、段芝贵这班人的腐旧横暴，我们可以预想而知。段派安福部是中国极腐旧而横暴的军阀官僚之结晶。段派背后是日本，和吴佩孚背后是英美一样，表面虽是皖与直之争，里面实是日本与英美之争；国人若希望他们打倒吴佩孚，比以前希望吴佩孚打倒段派安福部，是同样的荒谬！

1923 年 5 月 16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

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的中国是常有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独有此次临城事件竟闹得全国震动，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乃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英、日、美三国，欲借此掩盖他们凌辱中国人的丑行并达到共管中国的贪欲，所以在他们的通信机关特别张大其词，可怜我们无知而又媚外的中国新闻界，竟不能窥破其中奸计，随着几家外国通信社的吠声盲目的附和，不知不觉的为他们利用了，外人竟能利用全中国的报纸做他们的宣传机关，岂不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

政府社会都专门注意几个被掳的外国人，中国人被掳的一二百，至今无人过问，这又是什么理由？

一切党派自然都应该起来反对并打倒恶贯满盈的北京政府，但打倒北京政府应该集合民众势力，堂堂正正的作政治奋斗，若是藉临城掳案来极力攻击北京政府，并想借此机会，利用洋大人的势力来推倒曹、吴，这是何等卑劣而且懦弱！我们固然要打倒军阀，我们断然不可借洋大人来打倒军阀，因为洋大人比军阀是我们更大的仇敌。

当吴佩孚大杀京汉工人的时候，张大总理大骂这班过激派应该杀，越多杀越好，此时临城案发生，这位张大哥吓得屁滚尿流，当日大骂工人的威风安在？

杨以德也曾禀承洋大人的意旨大杀唐山工人，现在又要为了救搭洋大人亲到匪巢作质，他这样“轻视工人，畏惧土匪，孝顺洋人”的态度，真是中国军阀官僚之代表。

有人说此次掳案是安福部破坏北京政府之阴谋，安福背后还有日本的教唆；此事如果属实，更可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造的幸福！

临城掳案固然是件小事，即此这件小事，便可以将帝国主义者在半

殖民地的中国之阴谋与骄横完全暴露出来；同时也可以将中国军阀资产阶级（政党及上海商会）、知识阶级（新闻界）之懦弱与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来。

1923年5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孙曹果然携手了？

滇桂军占领韶关后，搜得曹锟致沈鸿英电云：

万急！南昌源潭电局速转韶州，探送沈督理冠南兄鉴，诚密，顷接吴巡阅使马电开，接洪湘臣来电，略谓现杨、熊、何之三部，向石龙袭击，林军向五华反攻，兴宁谢、徐、陈三部，反攻江门，胡部反攻高州，尹、李、赖、苏四部，分途作战，大浦、潮州、寻邬、准暂日前动作等语。又接祃电云，接港电报告，林指挥已下动员令进攻梅县等语。查林、洪各部，既经出发，乘此时机急进，合力进剿，敌氛不难廓清。驱孙定粤，在此一举。除电促林、洪一致进行外，特电奉达。务望激励贵部，奋勇进攻，以期一鼓荡平，早定粤局，是所盼切。曹锟寝。

不知主张孙、曹携手的人们见了此电作何感想？

1923年5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

日本人在宜昌杀死中国学生；美国人在上海三育大学因为学生有爱国的演说，要强迫解散全体学生，并且公然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又说："本会宗旨，断不容任何人有国家之观念。"（教会学堂学生听者！）

这两件事想必中国新闻界都知道，不是我们造谣言。新闻界诸爱国记者，关于临城事件，已十二分巴结为洋人宣传，诸君若还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请在为洋人宣传的余暇，也做几行批评，为孤愤无援的青年说几句公道话。

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你们试问良心：你们为临城被掳的洋人说过多少话，何以对于洋人杀中国人辱中国人，竟一概哑口无言，难道你们都入教会学堂读过书，谨守教会之宗旨吗？

1923年5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国会议员宣布张阁罪状与曹吴态度

议员温世霖宣布张阁罪状如下：各报馆均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民国成立，历任内阁违法失职之事，虽曰数见不鲜，然未有无法无天若此次张阁举动之甚者也。查总理张绍曾执致以来，任用私人，宄法乱政，授意秘书长吕均，借势招摇，更与财政总长刘恩源、农商总长李根源，朋比为奸，卖官鬻差，营私舞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除已经同人通电宣布其对于日本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之外交失败情形外，兹再举其紊法乱政之最著者为诸公陈之：(一)私印印花税票五百万元，纵使印刷局长薛大可偷运密售，朋分票价，是为监守自盗。(二)未经国务会议议决发额外流通券一百万元，密使彭解等私向裕华银行押款，是为诈欺取财。(三)擅改国务会议议决，将印花票案查办大员之庄蕴宽，改为赵椿年，又魏联芳本系简派劝办实业专员，无端变为特派字样，是为伪造文书。(四)违反国会决议，先抽签偿还外债内之日本部分债券四千万元，又私向美商运动，竟敢过户承认津浦北段德国部分之债票七千万元，再对于法国庚子赔款，擅自承认纸佛郎改为金法郎，损失国款七千余万元，以致各国援例要求，是为构成外患罪。(五)朋分中日实业公司之官股二百五十万元，偷将股票改填张绍曾、刘恩源、李根源、文群、彭解等私人名义，是为侵占国有财产。凡此种种，证据确凿，无一不触犯刑章，至于贩卖烟土，私售芦盐，公然列诸阁议，无非祸国殃民。最近更向新银行团举债五万万，而以关余烟酒税为担保，秘密进行，以抵偿向无担保之外债，及回扣贴款，而以四万万七千万元，所余之三千万元，作为垫款，按六个月分期交付。此项借款，举中国所有财源抵押以尽，忍将中国财政交之各国共管。自新银团成立，其宣布之政策，即在掌握中国财政；今政府竟迎合新银团意旨，订此借债条约，倘成事实，则将来一切政费，非得银团许

诺，丝毫不能动支；共管之局一成，亡国之祸立见，而所得之三千万元，外人于八个月内只将关余、烟酒税收入拨付政府，已无不足，按之实际，确系毫无所得，只以张阁贪此二千余万之回扣，遂将国家主权财权断送无余，稍有人心，宁忍出此。众议院日前开会，要求当局出席说明，张绍曾、刘恩源均避不出席，仅派财政次长张竞仁到会；经同人质问条件内容，坚不答复，近更向各国公使秘密谈判，热烈进行，若非揭破奸谋，先行防阻，沦胥之痛，即在目前，此尤我国人应急起一致反对者也。其他违法失职，书不胜书，报章所载，固已国人共见。总之张阁存在一日，则外交挽回无术，内政日见纷乱，非立予罢斥，国事愈不可为。现参议院已通过不信任案，而张阁抵死不去，并特设机关公然贿卖，抉廉耻之藩篱，破政治之常轨，瞻念前途，言之滋痛。诸公热诚爱国，义愤同深，尚冀同声申讨，去此恶魔。谨贡区区，贮候明教。

张绍曾贪劣无耻，人所共知，而国会议员贪劣无耻的程度，比张绍曾只有加无减，张之罪状出诸议员之口，已足令张绍曾齿冷，何况出诸保派嫡子温大烟灯之口，更显然是一种“伪作正言”的作用，果然曹锟复电表示赞成。在地〔他〕方面，吴佩孚却电京反对改组内阁，再摧两院制宪，同时参议院提议先选总统，敦促黎元洪下野，再议制宪，吴佩孚又极力反对。这些消息，或者都是曹、吴翻脸之征兆。

1923 年 5 月 23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

中国土匪头(军阀)不能约束小土匪，居然冒犯了洋大人，洋大人自然要赫然震怒，自然要责问土匪头的军阀——曹、吴，昏蛋的中国人民，切不可因为洋人所办报纸有非难曹、吴的论调，遂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者，也痛恨中国军阀不再予以援助了。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双管齐下，直弄得中国民穷财尽兵匪满地，又复扶助军阀，抑压革新进步的人民(如助袁、段、曹、吴攻打国民党，助北京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上海租界两次封闭全国学生总会，洋人勾结军阀大杀唐山矿夫、大杀汉口铁路工人之类)，断绝中国维新自强的一切道路，所以临城案件，第一罪魁是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才是军阀曹、吴。洋商也鼓吹废督、裁兵、理财，这是一面笼络华商使其不依附军阀而依附列强，一面威吓军阀逼他们对待列强益加恭顺；外报因临城案痛责曹、吴，明明是借此威吓军阀，令他们伏地叩首绝对屈服于列强，不但不因此召人民之反感，而且因此博得一般昏蛋的中国人民之同情；列强们对待军阀，一面加以威吓，一面又加以抚摸，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大借款现仍在京进行，象这样恩威并用，军阀们焉有不绝对臣服之理！蠢如曹锟还知道列强的用意，故敢于临城掳案热闹声中，积极进行总统问题而毫无所顾忌。昏蛋的中国人民，若还不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勾结为患，若还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现在痛恨中国军阀了，以后不援助曹、吴了，那真是昏蛋的程度还在曹锟之上。

1923 年 5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七期　署名：独秀

黎元洪与曹张

曹锟有了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的援助，又有黄金收买议员，只要吴大军阀不反对，想过总统瘾不是难事；近来且有曹正张(作霖)副之说，曹锟想做平安总统，这种妥协也是意中之事。黎元洪的助手只有政学会，那是曹三的敌手？我们于黎曹张均无从轩轾，我们只主张：以民众的革命势力打倒北京军阀政府，建设不受外国列强及中国军阀势力支配的国会，组织保障国权伸张民权的新政府，他事不屑过问。

1923 年 5 月 30 日 《向导》第 27 期 署名：独秀



社会之历史的进化[①]

——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中国人对于社会的进化，常有三种错误的见解：(一)有人以为社会的进化是循环的；(二)有人以为社会是退后的；(三)更有人以为社会的进化是超越的。讵知社会的进化，非速亦非迟，乃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依照历史的阶级，自然地演进，必无循环、退后或超越之理。简单说来，社会的进化，其程序可分五个时代：

一、原人时代——这时人类的生活，非常简单，和现代最野蛮的人的生活略同。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摘生果充饥，所以当时人类与野兽无大差异，文化遂无从发生、无足陈述。

二、渔猎时代——原人以摘生果为活，到了生果食尽的时候，就不得不下水取鱼，入山寻兽，来维持生活，这才演进而为渔猎时代。从原人时代至此，可成一个段落了。

渔猎所用的器具，不外木棍、石头、鱼网三种物件；后来有人将石头安置木棍之上，用以杀野兽，于是有锤子的发明。这种发明，可算为社会进化中的一个大纪元，不容我们忽视的。当时生活情形，仍甚简单，经济问题，未曾发生，因为那时人类都是日食其所得，并无余物的存留。

他们因怕野兽侵害，就结合数十人，共居一块地方，互相护卫，于是成了小小的社会。他们渔猎所得的鱼兽等，只够一日的食用，毫无积蓄；纵有余物，都是鱼兽的皮肉，也无法收藏，所以当时那种小社会，完全是共产的，没有私产的发生，这种社会，我们就叫作原始的共产社会。

这种社会，是由数十人自由联合而成，实行共同的生活，初无所谓

---

① 为中共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于1923年3月26日来到广州，五六月间，在广东高师讲演四次，并汇集成《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于1923年9月1日出版。本讲演是系列讲演的第一次。

组织；但是，后来因为其间发生利害的冲突，他的秩序渐变纷乱，同时就有些强勇的好汉出，恃强压众，独自称尊，众人因怕他的威力，也都屈服于他，于是他就居然作了众人的首领，而社会的安宁，赖以维持着。这个好汉，历史上即称为酋长，亦即为那些小社会中的君主。

这个时代，已经有宗教发生，即是拜日、火或猛兽的自然宗教，当时宗教的观念，大约是由恐怖和美感所构成。野蛮人看见太阳光线那般辉煌，脑中就发生一种美感，同时又起恐怖之情，故生崇拜的心趣；更因火，古代的火，野蛮人用作军火，防御猛兽，为火焰美观，就生审美的兴趣，为火性猛烈，便起恐怖的情绪，所以他们崇拜他；猛兽如金钱豹等，既有美丽的毛色，又具可怕的形状，野人见而崇拜他，同属此理。总之，这种自然的宗教，内容非常简单，他的对象，除上举三种自然界的物件外，并无其他如鬼神的对象。

三、游牧时代——发生于有历史之前，故难推算他发生的年岁，大概总在封建时代之先。这时人类的智识，比较渔猎时代的人，稍有进步，能用种种方法，驾驭那些驯良的野兽——牛罢等——于是发生畜牧的事业。当时土地都是公有的，畜牧者就得随时选择一些多水草之地，作他们畜牧的场所；因此，他们就没有一定的寓所，逐水草之地而居住，故名之为游牧时代。

到了畜生蕃衍之时，各人就拥有大群的牛羊，一人用之不尽，则所余的牛羊，就变作一己的财产，于是由渔猎时代共产的社会，一变而为游牧时代私产的社会了。这许是社会进化途中的一大变迁咧。

四、农业时代——自渔猎时代至游牧时代，人类都取鱼兽之肉，作唯一的食料。后来因人类数目增长，而鱼兽的供给渐减，于是人类为要维持生活，就不得不向植物界寻求食料。恰好有些地方产生谷类，一经野人找得，就试拿来做粮食，觉得很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舍渔猎游牧，相率栽种谷类，而农业就由此发生了。

到了这个时代，社会的组织，经济状况，道德观念，及宗教思想，都呈变化。又因栽种谷类，必须在一定的地方，不能随意迁移，于是发生了居住的问题；因居住既定，则男女的关系更为确切，夫妇的观念遂明，而从前男女杂婚的事，也都渐次消灭了。家庭制度，由此勃兴。各家所

种的麦稻等，供食有余，就设法储藏起来，拥为一家财产。至此，私产制度，更加发达，而社会经济，同时发达。凡此种种变迁，都是依照生活的要求，而自然发生的。

当时的小社会，各有一个酋长，执统辖之权，后来因生活上发生变迁，小社会已经不能单独存立，就合几个小社会而成一个大社会，又由几个大社会而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国家；几个小酋长，推举一个大酋长，几个大酋长结合，就产生了一个君主，所以君主制度，即发生于这个时代啦！

君主既出，那末宗教的思想，跟着也就变了。由前代的自然宗教，一变而为多神教了；除美感和恐怖之外，复生有神——不可思议者——的观念；即由具体的事物，进而为抽象的思想，这也算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时至今日，很多人厌恶宗教，但是，古代人类能发明宗教，已经算是一种大进化了。

当时道德观念，也更进步。夫妇名义确定，实行一夫一妻制。这时的不同现代的，没有什么劳动界，只有家庭劳动。家庭劳动，妻子为劳动者，家长即为资本家。各家都盼望多生儿女，以助耕种或开垦，更有农人出贱价多买女子做小老婆，以助农耕；但是又怕妻妾子女，不为己用，故创设宗法制，使丈夫对于妻妾，父亲对于子女，有无限的统驭权。这种道德，在现代要不得，但是在当时足以维持社会安宁和生活，是很需要的。亚理士多德赞成奴隶制，孔子主张宗法制，也不过为着这些制度适应当时社会的状况罢了。

综合上述的农业社会的状况，拿来和现代的中国比较起来，是大同小异的，差异之点也很少，从可知现代的中国，还只是演进到农业时代啊！

五、工业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状况，又都变更，和农业时代大不相同；但是这些变迁之所以发生，也只是原于生活中自然的要求。工业社会首先发起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地方狭小又瘦瘠，不大适于农耕，所有出产物，不能满足欧人生活的要求，惟欧地滨海，很利于交通，故欧人就得向工业发展。但是欧洲的工业，又以发生于英国的为最早，因为英国是小小农国，地狭人多，生活的要求也

更大，农业既不足以维持，于是不得不向工业谋发展了。

工业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组织，而后可以发达，是故工业一发达，则社会中各种事业，都受影响了。譬如工业上所需的原料，不下数十百种，本国必不能完全供给，所以要到外国去购办，于是交通和商业，直接受其影响而发生了。交通商业既兴，则外交的事务日多，而且外人势力，由外交而侵入国家内政，由此，农业时代闭关自守的风气，完全消灭了；而政治组织方面，也由专制政体，变为共和政体，工商界和外人交接既多，见识日广，经济也日见充足，他们为维持自己的权利计，就起来争政权，遂将贵族制度，完全打破，尝查工商界之所以要求政权，并非好出风头或好作官，实因政治和工商业，有密切的关系，工商界的受福蒙祸，全视政治的良否以为准绳，假如他们没有政权在握，任凭贵族和军阀的宰割，那末，他们的职业必蒙无穷的祸害，故为生活的要求所逼迫，他们才来争政权。所以平民政治并非一般平民所必须，乃是工商界的护身符咧！军阀所以还能存在于中国，实因国内没有强健的工商界和他对抗，若到工商业发达的时候，军阀必自归于灭亡了。

到此时代，宗教的观念也变更了，因为此时交通发达，集各处人士于一处，必须创一共同的信仰，而后可以相安，故由多神教，变为统一的一神教。

在这工业时代，工厂林立，所需人工甚多，非家庭劳动之力所能维持，势必雇工，而后工厂才能发达，于是劳动制度，由此发生。又因人人要到工厂去作工，以维生计，故家庭羁绊遂脱，至是则农业时代所遗的家庭制度，自行破除了，家庭制度既破，宗法的道德也随之消灭。由此看来，中国的家庭制度，非可勉强废除，只须工业发达，则此制自破。所谓三纲五常的道理，是建设于宗法思想之上，颇适合于农业社会，以其能维持当时社会的生活和安宁；但是民主社会的道德，是建设于爱国、合群义务之上，用以维持大工业的发展，虽前代的宗法思想，不再适存于此时代了。

工业时代的社会，虽较前代为进步，但仍留存着农业时代的私产制度，这却算是一个大缺点。因此，我们可以测知工业时代，将来亦不免发生变迁。在工业时代，工厂最为发达，所制商品（商品和生产品不同，商

品乃供销售，非供应用），必然日见增加，但当时社会上的资产，多为少数资本家所占有，于是社会一般平民，都降为无产阶级，那里还有钱购买这些商品呢？到这时，商品必至积滞，无从销售，于是工厂就要亏本，随至资本破裂了。即如一人食物而不消化，积之日久，必至肚破肠断咧！将来的变化，必须除掉私有的财产，而大工业仍须保存，藉他供给人类以生产品。

由此看来，自原人时代以至工业时代，都可发见社会进化的痕迹，伊都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而发生的，我们若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然后才知所从事。末了，我们须知社会的进化，不是循环的或超越的，也更不是退后的；乃是依历史的阶段而进步，非速亦非迟，不过采用革命的手段而促其进化，或许能使他变快一些罢。

龙眘兴、李钰　合记

《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3 年 9 月 1 日)

在京汉路被难工友追悼会上演说

关于京汉工人被残杀之事，李之龙君已有详细报告，可不再赘。我观察中国历次劳动运动可得下列三个教训：

一、工人运动第一要在政治上努力于集会结社运动，以求得集会结社之自由。若是此而不能，则劳动运动甚难发展，若集会结社得有自由，则此次京汉路悲惨之残杀无由发生。故此主张工人反对政治运动，乃一种绝大之错误观念。

二、在国民革命事上，劳动阶级实有伟大之势力。中国国民运动，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同时参加。然中国资产阶级有极多缺点：彼辈一面反对督军，虽然有些须革命之意；但甚易与国内之军阀，国外之帝国主义妥协。如上海商会因反对北廷，但自己不努力革命，而希望外人干涉。劳动阶级之国民运动则不然。试观海员、唐山、京汉各次罢工，绝不与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谋妥协，由是观之，中国劳动阶级不独在自己阶级争斗上，而且在国民运动上亦甚有力量。不特有国民运动上是重要分子，如果缺乏他们，革命就完全无望。可以说：无劳动运动则无国民运动，此是第二个教训。

三、（略）

原载《劳动周报增刊》1923年6月2日

选自《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香港新苗出版社2002年版

呜呼！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

北京军阀官僚政府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中国之大患兵与匪，不单是我们素所深恶痛绝的，并且是我们应该出力处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工商业侵略中国，使中国人贫而为兵为匪，又极力明扶暗助北洋军阀（现在还正在进行大借款），故意造成中国乱而益贫、贫而益乱的重复因果，这罪魁祸首是谁？不待说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正因为这个缘故，并非是感情的故意排外。

组织商埠同盟，并且同盟起来，自治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军阀政府，抵抗兵匪的侵略，这都是我们赞成的；但是我们却不忍心赞成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

上海《字林西报》载西人投函说：英、法、美均以用费太巨不愿以兵来华，鼓吹中国人组织商埠同盟，以武力防御兵匪，并且加压力于各省当局，这话都不错；但同时他说什么“不得不于外国政府赞助之下”，什么“以各商埠中外人士间之合作为根据”，什么“警士可用华人警官则用外人”，什么“利用外国兵舰保护江政”，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什么一种商埠同盟？这种在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不过是各国共管中国各商埠之变相名词，这样变相的和平共管，比用巨费派兵来共管的方法，更是巧妙！

1923年6月6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国土匪也来了！

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党，其反动的理想与行动，简直是土匪，他们近来在意大利的成功，并在德国、法国恢复帝制运动，不但是世界工人阶级之危机，并且是世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危机，日暮途穷的欧洲官僚资产阶级利用他来救济一时之急，真是引虎自卫，所以欧美、日本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都把〔为〕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捏着一把汗。

中国已被土匪闹的不得了，不料上海《大陆报》记者又要介绍外国土匪到中国来，他说："上海现有一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代表，名为马郎柴纳(Signor Maranzana)，倘华人商会向他访问，他必乐得以他们成功之方法及原则见告。"《大陆报》记者又说："中国现在遍地皆匪，匪有良好组织，为布尔雪维克主义所传染，向闻布党中人曾在彼等中传布主义，鼓吹推翻现在社会秩序已经数年；据临城劫案中被掳之苏罗门氏说，匪中有一人能操俄语(其实匪中还有多人能法语)，其妻为俄人，彼曾服务于俄军中。"临城案件和安福部显然有多少关系的痕迹，若说抱共产主义的布尔雪维克在土匪中传布主义，希望土匪来推翻现在社会秩序，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丝毫不懂得布尔雪维克主义是什么！临城匪中也许有俄妻能操俄语曾服务俄军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俄国白党在西伯利亚及蒙古失败后，他们和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纷纷溷到内地活动的很多，他们活动之目的，我们应该知道，若以为凡是俄人及与俄人接近的别国人都是布尔雪维克，这种简单的头脑，实在未免可笑。《大陆报》记者一面诬蔑俄国布党和中国土匪联络，一面他自己却介绍意大利的土匪给中国商人，请问他是何居心？

1923年6月6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八期 署名：独秀

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

冯玉祥在北京长老会堂演说："五月七日那天，兄弟的军队全招集到南苑，开一个国耻纪念会，不料正开会的时候，从城里头来了一个电话，是某部长给我打去的，我接电话，说我是冯玉祥，什么事呵？他说，方才听说贵军在南苑开会提倡抵制日货，那不要惹起外交吗？我当时真是火冒三丈，遂回答说，必得把军队解散，枪炮都送给外国人，才算不排外吗？你还是有骨头的人吗？"冯玉祥这段说话，我们十分赞成；但同时我们要警告冯玉祥："你须知美国人也是外国人！你须做一个始终有骨头的人！"

他又说："回头看看中国的现象，穷的寻死上吊跳河，日有所闻，但是那文武大官僚，终日吃的山珍海味……"冯玉祥这段话，我们也十分赞成；但同时也须请问冯玉祥："你的衣食固然很吝啬，你的荷包里究竟怎样？"

我们固然不以人发言，我们更希望冯玉祥：反对外国侵略勿把美国除外，反对文武官僚贪横勿把自己除外！

1923 年 6 月 6 日 《向导》周报第二十八期 署名：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①]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②]，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

---

① 为代表大会之误，下同。

② 原文无货币单位。

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①，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

---

① 此处俄文稿为“ежедневник”（日报），德文稿为“Die Woe-chentliche Ecitung der Partei”（党的周报）。

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工会的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

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在工人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邓同志①在唐山和科乌②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俄文稿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根据陈独秀在本文中说，“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而在党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姓邓的只有一人，即邓中夏，故判定为邓中夏。

② 音译，俄文为“Koy”。

儿戏之北京政府

北京目下之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黎元洪本来是个昏蛋而且奸险，他做总统本来没有法律的根据，不过一般下流政客，至少比黎元洪还要昏蛋十倍，为了要拥曹上台，忽然想起老黎非法，我们不知他们将来有何神通使老曹为合法总统？

黎、段本有不解之仇，今黎为曹锟、张绍曾逼走，李根源、彭允彝竟主张"即走亦当任段祺瑞为总理使捣乱"，政学系的特质于此暴露无余。

曹三有的是兵，尽可拿出惨杀京汉工人的态度去到北京，爱做什么做什么，为何要利用军警索饷及乞丐变相的公民团来逼走黎元洪？

黎元洪走便走了，为什么要挟一颗不值钱的印，曹党也偏要拦路抢印，简直是戏台上"抢帅印"的把戏。

所谓驱黎运动的国民大会，天安门布满了军警侦探，到会散驱黎传单的只三四个国民，与其说是国民大会，不如说是军警侦探大会。何人指使这三四个国民的国民大会，现有两说：一说是由交通部发出；一说是张绍曾从天津印刷寄京，托吕均雇车夫着长衣散放；后说大半近实。

军阀官僚们见了人民集会散传单，便喊道这是过激派，该杀！现在他们也采用过激派的方法了，究竟是谁该杀？

所以目下北京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1923 年 6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期 署名：独秀

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①]

临城事件不过是土匪掳去二十几个外国人，外国报纸中国报纸都责骂得不亦乐乎；长沙事件是外国水兵杀伤了四十多中国人，上海《字林西报》竟说：华报对于临城土匪劫车案，不知激厉民众，力促政府营救被掳人士，今对长沙事件，反有意大吹大擂的论述，殊非正当。果然洋大人是神圣不可侵犯吗？中国人生命等于猫狗吗？无耻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们，看了《字林西报》这种"正当"的议论，该有点觉悟了罢！

1923年6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期　署名：独秀

① 长沙市学生为抵制日货巡视终夜。1923年6月1日晨，日清公司武陵丸由汉抵长沙，学生巡视查货，日水兵枪杀华人。同日下午日商金陵船也由汉抵岸，日兵向华人发射排枪。2日，长沙罢市、罢工、罢课。

告上海纳税华人会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本年大会的会务报告列举四事如下：(一)界内行政司法两事，其权完全操诸外人之手，吾人在工部局方面，以无正式华董在内，不获享有发言之权利，以致所受种种不平等之待遇，在洋泾浜条约未经修改以前，进行十分困难。……吾人居住租界者，只有年终纳税之义务，而无发言之权利，虽自民国十年起，工部局有五华顾问之加入，然因非正式代表之故，春季纳捐人大会，各国均可参加，独摈我市民于纳捐人会议之外，世界不公道之事，更无有甚于此者。本年为乐志华被虹口捕房无辜虐待受伤一案……公函五顾问，要求向工部局建议，为此后全市民保证安全之法……此案在交涉中，尚未得复，将来结果如何，断难预料。(二)会审公堂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当日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之规定，自辛亥光复，领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己有，迄今已历十二年矣。……完全华人诉讼，须听领团裁判，视租界若殖民地，种种违背约章，侵犯主权之处，不可枚举。(三)工部局比年来对于界内各业商店，时时发生加捐问题……首当其冲者为银楼，此外如米业、西式成衣业……小菜场及食物业现在又有加捐之举，从此以往，必至无业不加。(四)苏州河因关系全省水利，不在洋泾浜条约范围之内，而工部局竟任意填塞，不特视主权若无物，且为害于全省水利者甚大。

即此上海一隅四件小事，已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中国人真正民族的觉悟，也渐渐表现出来了。

我们更要敬告上海纳捐华人会诸君：要收回主权及排除租界虐政，只有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可靠，和平请求或希望媚外的北京政府出来交涉，都是不济事的呵！

1923 年 6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期 署名：独秀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①

——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一　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与前几天讲的《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接续下来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讲起来很复杂,前一次因时间匆促,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之进化及崩溃,未能详细解释,今趁此机会,接续讲演下去。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来讲呢?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改造社会,并不是将原有的社会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给我们居住。我们改造社会,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仍然是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所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程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为什么由渔猎社会进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对于这些客观的境界,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不懂得客观的境界,但凭主观的要求,在不曾开步走的时候,尽可由你胡思乱想,若当真开步走,第一步便发生

① 本文一、二、三原载1923年9月1日出版之《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为系列讲演的第二、三、四次。

困难，第二步便绝对不能前进了。到了走不进的时候，便要走到很危险的路上去，更或者走途无路，索性走到向后转的路上去；所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注意客观的境界，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要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的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张社会革命简直和张勋复辟是同样的价值。张勋复辟也说现社会不好，非把他改造不可。这完全是他主观的要求，并不是客观的境界。所以离开客观的境界，单由主观的要求，只是不满足现社会来谋改造，在主观上，无异于张勋。在事实上，这种不懂得又不注意客观的进化之人，不满足现社会，而又走途无路，会竟至和张勋走到一条路上去。

现在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即资本制度的社会。前天讲的由渔猎社会进至农业社会的历程，现在把农业手工业社会进至机器工业社会，再由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社会进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略情形说一说：

我们须知道资本制度有很大的优点是资本集中。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推倒农业手工业社会，就是这个资本集中的作用。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他们的资本不能集中，因此社会亦不能进步。而资本制度把全社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农业手工业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质的文明增加可惊的地步；这种资本制度之功劳，我们是应该承认的。

封建军阀的农业手工业社会，是过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是将来的社会。而现在则为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我们生在现社会制度之下，为什么去相信社会主义？这并不是我们发疯，也不是我们好奇；实在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叫我们不能不相信社会主义。资本家由农业品手工业品之商业资本初步的积累，逐渐集中资本，推倒了家庭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中国还小，在西欧及北美各国，其势力很大很大，真是厉害到不可一世的样子。资产阶级他们成功的要素有二：一是资本集中；一是财产私有。资本集中是发展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组织之进步的方法，然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的资本集中，资产阶级之成功

在此，其崩溃之原因亦在此。一方面资本集中，一方面财产私有，其结果在生产上分配上都发生不可挽救的危机。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从事于分配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惟分配方法不好，生产方法也有二大缺点：(一)是生产组织之扩大，已自然日趋于社会化，而无量数生产群众，仍为少数私有生产工具者所统驭束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少社会的统计和调节，陷在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不受任何机关之管理依照社会之需要而生产，只为竞争私利，自由生产，盲目的增加商品，往往有超过需要之剩余生产，使社会金融发生恐慌；所以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盲目的增加商品为“商品拜物教”。我们往往不高兴读马氏的资本论，就是因为他开宗明义便说起这不易了解的“商品拜物教”。但是我们若不懂得这个“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就不会懂得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这是很紧要的，望诸君牢记牢记。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产出来的；而欲明资本主义，不可不明“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因为增加他们出卖的“商品”而生产；只为出卖而生产，非为使用而生产，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资本家盲目的增加他们的生产品——即“商品”，他们这样超理性的崇拜“商品”万能，好像非洲土人盲目的崇拜各种异物的宗教，所以马克思把他叫做“商品拜物教”。他们盲目的增加商品，以商品换货币，又以货币造商品，复以商品换货币；把商品货币轮流不已，他们的资本遂递增不已，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他们这样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方法，他们没有社会需要之统计的设计，一任供求之自然的消长；资本家在此自然消长之原则中，盲目的竞争商品之增加，迨至他们投机的竞争过烈的时候，往往受自然消长之原则所支配，发生经济的恐慌，这种恐慌不惟资本家自己要破产，即在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也要受失业的痛苦。例如数年前南洋群岛因树胶的产额骤然增多几倍，树胶充斥，资本家因而破产的不知多少，种树胶的工人因之大受痛苦的也不知多少。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面的缺点。

复次，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这个缺点是从财产私有产生出来的。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了。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我们须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一切生产品，都是卖的“商品”，不是用的“用品”，所以生产与消费是互相为用的，有生产而无消费，则生产不但没有用，而且和吾人只增加饮食而不消化一样，结果必至胀死。譬如有一千匹布于此，只有五百人来买去五百匹，则其余之五百匹若消费者无力购买，则由必需品变为无用的废物了。而盲目的没理性的崇拜“商品”的资本家，不顾生产消费的均衡律，一味去生产，所以往往弄出剩余生产的恐慌。——我们须注意：资本制度下之剩余生产，乃伪的剩余生产，是由生产力超过消费力发生的，非生产力超过社会需要之真的剩余生产。——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除这剩余生产之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外国去，以期换得货币。于是发生殖民地——如非洲、印度……或半殖民地——如中国……的问题。他们在那些工业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不但可以销纳他们大规模的机器的剩余生产品，并且可以获得无限的贱价原料。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此争彼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武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的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亦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侵略工业落后的弱小民族之别名。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一千九百十四年的大战，明明白白是英、德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夺殖民地及远东商场的战争，这次战争已经是帝国主义致命伤发作的开始；此时英、法争夺远东的煤油矿，日、美争夺远东的商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机，这些杀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

他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失业问题、劳动运动或民族问题，都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

现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资本阶级简直没有办法。他们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仍走旧路，在世界战争的血泊中，侵略弱小民族，以销纳他们的剩余生产，以维持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一是停止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放弃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威权，建设世界的和平。前一条路终究是走不通的，后一条路便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

社会主义的制度，简单说是：(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所以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制度的资本集中，并不反对。所反对者，就是财产私有。那么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和社会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公有两相对比起来，中间所差别的，不过是财产私有的私字和财产公有的公字罢了。所以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只在资本主义立脚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为公字。因为这一个字的更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便完全改变了。在财产公有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生产上，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病，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陷于无政府状态，所有生产品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非为资本家利润而生产，是为用而生产，非为卖而生产；在分配上，免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没有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之战争；如此世界的和平方可实现。

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他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现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惟有答之曰：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旧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新的。除了这两条路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那条路不好走了。所以我们惟有去找社会主义那条路来走。换句话说是：我们因为客观的历史

进化之历程明白指出我们的必由之路，就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社会主义。统括说起来是：

（一）旧经济组织的自然变化，已指教我们：帝国主义的那条旧路是不能再向前走的了。

（二）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已指教我们：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了。

（三）我们不要自己妄想现在没有比帝国主义更好的路可走，也不要妄想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四）我们固然要知道历史先生已经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但同时要知道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因为这条路上荆棘满地，障碍重重；我们努力开辟荆棘，扫除障碍，然后才可以通行。若是我们不去努力创造，只坐候历史的自然进化，那历史先生对于这种懒惰专想吃现成饭的人们是不负责任的呵！

1923年5月13日于广东高师 （赖特才、侯昌龄笔记）

二 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

我们从“社会之历史的进化”观察起来，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主观的要求；乃是事实的理性的——客观的境界。换句话说是：我们确有相信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实行的可能。但是从古以来，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很多；我们究竟相信何种社会主义，这是不可不研究的。现在我把社会主义的学说，至今尚存在的、有力量的，分为四派，并加以简单的说明和批评。

一、基尔德社会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

三、工团主义；

四、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

基尔德社会主义发生于英国。他们的主张简单说来，便是经济和政治分开。

管理经济属之生产机关——生产者。

管理政治属之国家机关——消费者。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因为他们看见现在的国家机关很有力量，如政权啦、军队啦、裁判权啦、警察啦……种种都是资本家的屏障。他们想，把这些东西拿到工人手里来，很难办到，不如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各管各的。入手的方法，是用蚕食手段，渐渐获得生产管理权，以达到工业自治的目的。其实这个主张是很错的。我们要知道，社会上生产的工人，固然同时也是消费者；而资产阶级多属不生产的消费者，他们拥有私产，又拥有国家机关——海陆军、警察、裁判权等为他们私有财产的保障。除了社会革命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何妙法，可以用蚕食的手段一步一步取消剩余劳动的掠夺，达到工业自治的地步？

以前基尔德社会主义只盛行于英国，现在欧洲大陆如德国、奥国等社会民主党，也渐渐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了。这党的势力在欧洲北部、中部、东部都曾发生很大的影响。他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他和基尔德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民主党主张工人须取得政权，基尔德主义主张经济和政治分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同样主张取得政权，所不同的，就是方法不同。共产党主张用革命方法，取得工人独裁的政权，社会民主党主张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这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大不相同的地方。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知道无产阶级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是办不到的了；而又不赞成共产党之革命方法，于是索性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爽爽快快把国家机关让给资产阶级专管了。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虽很接近，却不相同。两者都是反对国家、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但工团主义赞成阶级战争，无政府主义则否。工团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打倒资产阶级，打倒了以后，不再去建设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政府、法律等，并不认识社会上有阶级的区别，只要指导他们走到善的方面便罢。所

以他们始终不主张什么阶级战争。这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不同的地方，这两种主义，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关系。

无政府主义先前在俄国最盛行，工团主义在法国最盛行，他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于此，我们不可不考察为什么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一到了法国，便变为工团主义。这是因为从前俄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基尔德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自然都不容易发生，法国工业则比俄国发达得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感情的，没有大工业组织的国家，农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然会产生这班的空想的、感情的人物，如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他们都是贵族出身，怎么真实感觉得工团组织的必要？法国的工业比俄国发达，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然明明白白判若鸿沟，所以工团主义得以发生；无政府主义者一到法国，若不稍变宗旨改为工团主义，便一步也不能行动了，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再看日本在劳动运动未起以前，无政府主义也很发达。近年劳动运动，日趋日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改变为工团主义者，许多工团主义者改变为共产主义者，即此可以证明空想的无政府主义，在现代大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任何国家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大工业的社会，必须有大规模的复杂组织，只有大工业不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如南欧洲及中国），容得无政府主义者的游魂。

自然，工团主义比较无政府主义进了一步，但他们仍是糊涂。因为既要用革命手段，贯彻阶级战争的目的，自不得不采用一切武器，国家组织乃是最大的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后，若是不把这最大的武器拿在自己阶级手里，利用这最大的武器，彻底破坏资产阶级之根底，那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起反革命，重复用这最大的武器压迫无产阶级。所以工团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争斗，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反对国家组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和无政府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

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上述四种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有点比较的说明，讲到最有精密周到的办法，自然要算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我现在再把马克思派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则，说个大概：

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和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我们对于改造社会，不可只看见我们自己主观上意志上改造的必要，必须由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的条件有何种改造的可能，要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观，不可陷于唯心派的思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造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从组织共产党一直到实现共产社会，其间须经过几多步骤，每个步骤之中，或者又须经过几多曲折的步骤，但每个步骤都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这是革命的马克思派之特色。以上三个原则，是马克思派共产主义最重要之点，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他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赖特才、侯昌龄笔记）

三　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

这次讲演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与第一次的《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第二次的《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是串贯一气的。

在第二次讲演中，我曾把各种社会主义比较过，结果以**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我现在再重复说几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马克思的根本原则，就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然后才能明白他的主义，配谈他的主义。

这一点既然这样重要，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况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象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

现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怎样？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后，把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破坏，重新组织。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都起来了，并且有劳工革命的趋势，似乎不久可以发生世界的革命。后来因为德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社会党，匈牙利的劳农政府，次第失败，于是世界的劳工运动连受极大的打击，那些资产阶级又复活起来取反攻的态度了。如英、德、美、法……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反攻也最厉害，他们的反攻兼有政治及经济两个原因。

政治原因：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因受俄罗斯革命的影响，遂起很大的恐慌。或明或暗帮助德、意、匈的反动派破坏工人阶级的新运动，又复乘德、意、匈各国的劳工运动失败的机会，竭力压抑他们本国的工人阶级，英、美、法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最为厉害。同时又联络起来去反对俄国的劳农政府，如俄国白党之扰乱和波兰打破俄军，表面上虽说是内部的问题，或两国军事的问题，实实在在还是英、美、法各国在里头弄鬼——帮助波兰打破俄国的兵。他们见俄国的资产阶级被劳工打倒了，都未免兔死狐悲，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一致反抗苏俄，压抑工人阶级。

经济原因：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告终，欧洲诸国不但是政治弄得稀糟，而且经济的损失很大——几乎要到破产的地位了。如英国素来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战前是世界的债权国。战后变为美国的债务者。法国则为英国的债务者。至于德、奥战败之国，更不用讲。只有美国成了世界的债权国家，得了许多利益。所以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想要恢复他们的经济力，于是就想出两个法子：

1. 向国内掠夺本国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等。

2. 向国外加力掠夺殖民地——列强在柔来、海牙、华盛顿开过几次会议，其目的都是一面设法和缓资产阶级的国家间自己竞争，一面设法共同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进攻，一方面从政治上扑灭劳工的革命，一方面从经济上掠夺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

在资产阶级进攻的当中，其步趋日紧一日，其政治的反动也随着一天厉害一天。在英国，从前路易乔治的内阁是代表工业资本的，那时颇主张与俄、德妥协，好销售他们的工业品，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还和缓一点；其后白那劳内阁是代表商业银行资本家的，他的政策在注重向俄、德索债与赔偿，不甚措意于工业政策及俄、德通商，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更加反动起来了。现在鲍尔温内阁也是代表银行资本家的，和前内阁毫无变更。法国的反动，自克里蒙梭内阁、而白利安内阁、而普恩赉内阁，一个加甚似一个压制劳动阶级。

意大利反对工人阶级，比英、法两国更闹得凶，他不但对工人阶级紧紧的压迫、进攻，连民主政治都不要了。反动的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不独握了意大利的政权，而且成了国际运动；他们已在法、德做君主复辟的运动，美国也都有他们的组织，日本也有了他们的运动，中国上海也有他们的党员了。

法西斯蒂党颇效法共产党的方法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他也有严密的组织；共产党注重国际运动，他也注重国际运动；共产党对敌党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他也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所不同的是一个有阶级的基础，一个没有阶级的基础。

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分子，一大部分完全是觉悟的工人，一小部分是无产阶级化的知识者；法西斯蒂党的分子，一部分也有工人——无觉悟的工人——部分是腐败商人和军阀官僚的资产阶级联合一起的。这党的首领意大利的现内阁总理墨索里尼年纪还很轻，从前也是社会党里的中坚分子，曾经做社会党机关报的主笔，他对于社会主义本来持激烈的态度，到后来竟一变而立于反对的地位，竭力压迫工人，是世界反动分子的代表。

以上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以下再讲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是怎样？

中国的政治情形：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何以呢？你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义存在，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若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公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

现在的北京政府，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你看那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简直是中国的太上政府，政治上重大的举动，都得仰他的鼻息。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在外人和军阀压抑之下，不但无产阶级不能参与政治，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政权。每个总统内阁都必有军阀的后援，方能存在。中国的国会也是受军阀豢养的机关，不是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所以京汉工人被军阀大惨杀，国会不曾提出抗议，外人要取销棉花出口的禁令，国会不曾提出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会固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

中国的经济情形：中国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了——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现在举几桩重要的说说：

1. 关税　所谓协定关税管理权完全掉在外人掌握中，中国政府不能自由支配。以条约的限制，不得外人同意，不能更换税务司，不能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中国的工业能与外货竞争；不但外货进口税甚低，而且纳过什么子口半税，便通行全国；中国货则遇卡抽厘，因此

外货容易推销，而中国货反不能畅销于中国。所以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

2. 工商业　我们试跑到天津、上海、汉口看看，是何等伟大的商埠，可是这些大商埠，不是由中国自己的工业发达起来，乃是由输入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业发达起来的。这种商业越发达，中国越穷困。试看永安、先施、大新等公司，细细考察里面陈卖的货，外国的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外货多进口一分，中国的手工业便多破灭一分，内地的中国人就愈见穷困一分。输进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人虽然能增加他们的商业资本，虽然可以运用他们的资本开发工业，然以协定关税的抑制，不能与外货竞争，贱价的原料又不能禁止出口，因此不敢投资工业。因此这种偏畸的商业发达，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国掠夺中国之结果，他的发达和中国人的穷困成为正比例。所以近年以来，各大商埠繁华的程度和内地穷困的程度相随增加，两方生活程度相差数世纪，因此商埠变成买办世界，内地变成兵匪世界，长此下去，没有不灭亡的道理。

3. 金融　中国的金融，也是操纵在外国人的手上。你看中国有几个银行，就是有些小小的银行，也都是受外国银行势力的支配，所以外国人随便可以操纵中国的金融。现在我们本国的纸币，移地就不能通用，而外国的则到处受人欢迎。其实外国银行中不少中国人的资本，中国人信服洋老爷，说他们可以保险，一班军阀官僚们所吸收老百姓们的脂膏，大半存在外国银行里，作他们的资本，他们便将中国人所有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得重利，这是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形式。

4. 交通　中国的铁路，虽然尚未遍设周密，但现在已有的几条，不是归外人管理，便抵押与外人。这是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工商业若望发达，亦要铁路为之运输；主权在人，实可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要明白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就是铁路了。

5. 矿业　煤铁矿是军事、交通、工业最紧要的。现在大一点的都是操在英、日的掌中，如唐山之煤在英人手，汉冶萍之煤铁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本溪湖、抚顺(即千金寨)乏煤俱在日人手里，安徽皖南铁矿亦为日本所有。

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了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了。

现在下面把劳动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说一说。因为讲社会主义的人，总离不掉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劳动阶级的奋斗有两种：一是政治的奋斗，一是经济的奋斗。

凡是奋斗总有一定的对象，中国劳动阶级奋斗的对象是什么？

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倒资产阶级，即行社会革命。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象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再说劳动阶级经济奋斗的对象是什么？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说过差不多完全在外国资产阶级手里了。中国只有棉业为最大的新兴工业品，但十分之五归英、日所有，中国资本家仅占一半。其次中国烟草业，大的只南洋兄弟公司一家，还有外资的嫌疑；中国的矿业，如抚顺、本溪湖、唐山等俱在外人手里，前也说过了。中国的铁路，除潮汕很短很短的是本国商人办的外，其余多属军阀政府所管，或抵押与外人了。中国海员方面所争斗的对象如轮船公司，也完全是外人办的，中国只有一招商局，还是官商合办的。所以中国的劳工运动，几乎无一次不是反对军阀阶级或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如唐山罢工是反对英人与杨以德，陇海罢工是反对洋管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反对曹锟、吴佩孚，香港海员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香港官商，上海日华纱厂罢工是反对日商。总计中国著名的罢工运动，不是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很少很少是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至于农业劳动者，多属自耕的小农，农民所受地主的痛苦，远不若外货侵入、官绅压迫及军阀扰乱的痛苦之甚，因此，有地之自耕农往往有剧烈的运动，而为无地的佃农所不及。

据世界情形看来，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的缘故，因为他们要弥缝国内的破裂，不得不向外发展侵略。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劳工运动首先便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同时在国内的政治奋斗，也不得不

反对军阀阶级，合这两种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国民运动。所以我们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开始工作，只有国民运动。

因为社会主义者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而奋斗的，劳动阶级既然应该做国民运动，社会主义者目前的工作，对于国民运动也自然是必取的步骤，这是客观事实的必要一条路。但是同时社会主义者应注意两点：第一点，于国民运动以外，同时须特别注意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的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第二点，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

甚么叫做半国民运动？就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如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或者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又如靠吴佩孚的兵去打倒张作霖军阀，或靠张作霖的兵去打倒吴佩孚军阀；这种运动就叫做半国民运动。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是不然的，团结民众的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做纯粹的国民运动。

现在中国的国民运动，差不多完全为半国民运动。试看中国商人也反对军阀，也做裁兵运动，但他们仍希望吴佩孚或是外国人来帮忙，这就不成了。中国学生颇知道反对一切军阀，但同时却请求外国公使团帮忙，这都是半国民运动。

大家试想，靠帝国主义的外国来做中国国民运动，靠军阀来打倒军阀，这岂不是笑话吗？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是纯粹的国民运动，绝对不要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军阀来帮忙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靠国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的力量！

有一些革命分子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这是很错误的。中国军阀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不反对拥傀儡的人们而反对傀儡，这傀儡是永世不会绝迹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

讲到这里，或者有人发生一种疑问：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做国民运动？国民运动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答案是：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仅是民主主义对于军阀的革命，还是平民主义对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革命。能够推翻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只有两种势力：

1. 资本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

2. 殖民地的国民革命。

这两种革命的势力合拢起来，才可以打倒帝国资本主义。若是缺少一个，一时都不易成功。

以前已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国际帝国主义倒了，国际资本主义也自然倒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也自然解放了，在此时世界各国才有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可能。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

假使抛弃这个所应做所能做的工作不做，只是天天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义等名词写在纸上，挂在嘴上，一步不能开始进行实际上有效的工作，试问有什么用处？

1923年6月20日于广东高师　（丁愿、郭瘦真、李立成合记）

选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署名：陈独秀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

北方的政治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示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员身份要求您裁决下列两个问题：1. 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为此，应特别注意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和广州等地。如果这些中心地区的组织不完善，整个工作就会肤浅分散。2. 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近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早在黎元洪在北京出任总统前曹锟就觊觎政权。安福系(段祺瑞)不能与直系和解。吴佩孚、冯玉祥与曹锟的关系和黎元洪、张作霖与段的关系实质相同。甚至即使派系内发生什么变化，其斗争也仍将是在北洋军阀头目曹锟和段祺瑞之间进行。这场斗争与民国的改进并无关系。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 10 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起初，我们的力量不会强大，但我们会发展成一支劲旅。列强每天都在处心积虑剥削我们并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他们的代理者。用空话央求他们的承认来壮大我们自己，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运动，而且会丧失革命气节。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议会在全国人民眼中一钱不值。北庭议会是曹吴豢养的。如果我们试图让国会议员来穗，那么人民怎么能把我们看得比吴和曹锟好呢？

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即令我们用一切办法把这些将领们联合起来，那么南北方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而绝不会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我们岂能让千百士兵为此丧生并把沉重的负担加于百姓身上？这样也还会有危险，即因为我们在中国这一隅的地方主义而把国民革命的速度减缓下来。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①，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您是 4 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我们深知中国尽快获得解放和我党获得发展的必要性，特致函先生，望能采纳我们的建议。盼复。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80 号德文打字件

1923 年 6 月 25 日(广州)

选自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

附：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同志的信②

广州 1923 年 6 月 25 日

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

---

① 1923 年 1 月 4 日，孙中山通电讨伐粤军陈炯明。滇桂联军攻克肇庆。2 月 21 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宣布设立大本营，续行大元帅职权。5 月 9 日，陈炯明部通电讨伐孙中山，东江战事复起。

② 五位中共中央委员致孙中山函，原作为马林写给季诺维也夫等人信的附件，在附件之前有马林信的全文。

亲爱的同志们：

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名委员以国民党员身份就中国的政治危机事今天寄给孙中山信的德译文①寄给你们。李大钊和陈独秀同志仍在设法同孙谈一次话，尽快做出一个决定。关于这件事，我早已经常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谈过。如果这些人和孙一道不能同意朝新的方向前进，因为他们至今还不相信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群众基础的党，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H.马林

① 这封信是斯内夫利特从英文译为德文的。

中国农民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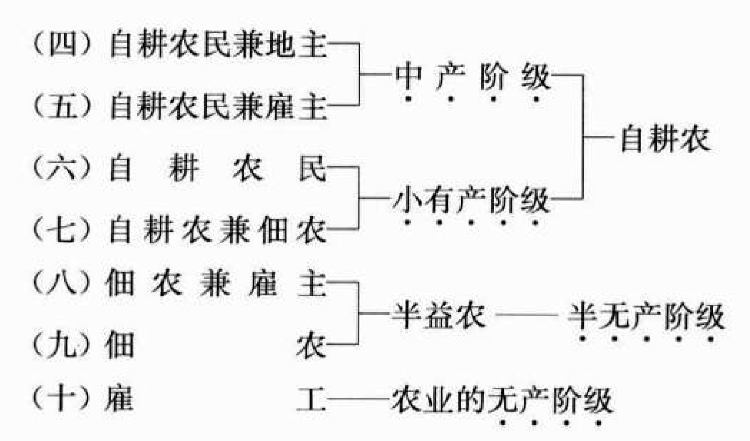
（一）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到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二）

中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户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此农民大群众，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相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复杂之区别，兹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下表：

等级	类别
（一）大　地　主	自己不耕作之地主
（二）中　地　主	自己不耕作之地主
（三）小　地　主	自己不耕作之地主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份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经营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下：

农户总数	43 935 478
自耕户数	23 381 200
佃农户数	11 307 432
自耕兼佃	9 246 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二种农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缴纳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

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属之中产阶级。

纯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则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则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虽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属之小有产阶级。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佃农们租地时，须向地主缴纳押租金(或名羁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约一元左右；耕种时须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等)；所得生产物须缴纳一部分与地主，缴纳之方法，或预约一定之额租(或名铁租)，无论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议租；缴纳之数量，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须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谚。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讼案往往占各种讼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属之半无产阶级。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资雇用他们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两类，和长工及短工两种办法；长工以年计，每年工资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间计算，工资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轻工作，每年工资不过数元；惟各种雇工的伙食均由雇主供

给，且间有供给衣服者，长工多给以住所，短工则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费反较佃农稳固；惟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没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纯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们是无产阶级。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至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据农商部之统计，农民耕地多寡别，民国六年七年比较如下表：

	十亩未满者	十亩以上者
民　　六	17 805 125	13 248 474
民　　七	17 914 231	11 303 570

三十亩以上者	五十亩以上者	百亩以上者
10 122 214	5 348 314	2 835 464
6 712 366	4 137 136	2 278 355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计如下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 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中国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b. 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

项统计证明之：

1. 耕地减少亩数

民　　三	1 578 347 925
民　　七	1 314 472 190

2. 被灾亩数

民　　三	653 475 445
民　　七	61 717 113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最甚。

3. 荒地增加亩数

民　　三	358 235 867
民　　七	848 935 748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廿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

4. 农户减少数

民　　三	59 402 315
民　　七	43 935 478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小，岂是模范省缘故？

c. 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税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税，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哄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a. 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b. 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c. 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于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传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二）组织及实际运动　组织有四种：

a. 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组织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

举之劣绅为对象；以“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b. 乡自治公所　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组织，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组织中应以组织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c. 佃农协会　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内，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给耕种该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纳地主之租额，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d. 雇农协会　以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

1923 年 7 月 1 日　《前锋》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寸　铁

国民运动

我们为什么要做国民运动，不用说，第一是因为受不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第二是因为受不了国内军阀的压迫，二重压迫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国民运动以自救。由此看来，既然是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中国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外国势力，因为国民运动第一目的正是要排除外国势力；既然是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军阀势力，因为国民运动第二目的正是要推翻军阀势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势力或利用一部分军阀势力来做国民运动，这种四不相的国民运动，其结果必然是“王婆照应武大郎”。

国　学

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不得已还只有承认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的话：“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

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更

奇怪，他们好费力寻得点香水，出卖时还不肯舍去粪秽的商标，惹得想专利的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因有人假冒招牌，“瞿然大惊”，“夷考宵小之所为”，“终必申罪以致讨之”。这本是胡、曹诸君自寻烦恼！

曹聚仁先生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

中国国民经济基础，还停顿在家庭的农业、手工业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号称新派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君迈、章秋桐、梁漱溟等，固然不像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那样糊涂，然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张君迈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

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

仇孝论讨父会

湖南宁乡县县议员提议小学读经的议案：陈独秀倡无家庭无政府无宗教者，竟忍谓父子成于肉体之乐，无须亲爱。著有《仇孝论》，发起讨父会。甚矣邪说祸人，较兵犹酷。盖兵祸显然，不戢自灾，人犹恐惧。独此灭人邪说，设心阴险。乖废古经，号倡新学，是无形之秦火，率天下之人陷入禽兽于不觉。此人禽关头，虽康有为游欧记陈焕章经世报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然发诸言语，以争人格，赖有遗贤。而施诸政治，以正人心，责在议会。以议会权操立法者也，设法惟何，反经而已。经正

民兴，邪慝自息。

什么"三无主义"是一些所谓无政府党人的话，不知何以无端加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上？父子成于肉体之乐，乃一千多年前的人所说，不知何以恭维陈独秀说是他所发明？我知道陈独秀他未曾著过《仇孝论》，我更知道陈独秀他早已无父可讨，此人之子或有发起讨父会之资格。这些怪话我在各处尤其在广东听得很多，现在穷乡僻县居然传到，可见系朱宗熹这班圣人之徒现在还着实很多，可见中国社会思想还在何时代！

中国人读了二千多年经，人心也不曾正，邪慝也不曾息，可怜这班老先生还想拿读经来正人心息邪慝，真是做梦；希望议员先生们来正人心息邪慝，更是梦中之梦。

1923 年 7 月 1 日　《前锋》第一期　署名：独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红色工会国际的信

寄莫斯科

广州　1923年7月1日

亲爱的同志们：

惠寄支援中国工人运动的278英镑（折合2 353墨西哥元），已收到。自3月到6月，用于各省工人运动的款额总计2 274墨西哥元，尚余79墨西哥元。

自7月初起，在工人中进行工作每月预算应有1 630墨西哥元。（墨西哥元略贵于金卢布）。望每月支援我们1 000金卢布。其余630元由我党自筹。每月预算随信附上。

由于工人运动被镇压，全国劳动大会未能在5月1日召开。现在广州形势已有好转，我们计划于下月即8月召开会议，约需费用2 000墨西哥元，望支援1 000墨西哥元。其余部分拟请国民党予以帮助。

致

共产主义敬礼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关于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

Ⅰ．自开滦矿工和京汉路工人罢工失败以后，中国军阀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镇压。国内大多数工会遭到破坏。

Ⅱ．京汉铁路工人中的秘密小组正在发展。汉口已取得良好成果。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数目在增加。京奉、陇海两线的秘密组织未被破坏。正太、津浦两线建立小组的工作也已开始。6条铁路的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迫切希望恢复工会的合法地位。

Ⅲ．湖南的工会（有30 000会员）仍合法存在。萍乡矿工工会有

11 000人，是最好的工会组织之一，其反抗活动十分强烈。目前，军阀们正企图用一切手段破坏这个工会。危险尚未过去。

Ⅳ．湖北省被解散的工会正在逐步组成许多小组。

Ⅴ．海员工会由于组织不健全而面临内部危机，目前处境艰难。两个码头约 5 000 工人至今尚未组织起来。我们的计划是改组海员工会，并把码头工人组织起来。

Ⅵ．广东省没有大工厂。许多手工业工人参加了工会。我们准备建立工人俱乐部来改善他们的组织状况。

Ⅶ．上海是中国工人高度集中的地方，但工会空有其名。工会领导人多为反动分子。我们准备组织工人俱乐部来吸引有觉悟的工人，为成立真正的工会奠定基础。

Ⅷ．山东和哈尔滨的组织工作已经开始。哈尔滨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使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矛盾。望红色工会国际指示哈尔滨的俄国工会与我们合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
每月预算

墨西哥元

项目	金额
支援京汉铁路工会	200
支援汉口的湖北联合会	150
支援上海工人俱乐部	50
支援广州工人俱乐部	50
支援北京的周刊	60
支援上海工人周刊	40
支援广州工人周刊	80
支援劳动组合书记部	100
支援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200
支援工人俱乐部	200
支援劳动组合书记部香港分部	100
支援通讯交通费	200

支援印刷宣传材料……………………………………………………… 200

1630

每月共计1 630墨西哥元。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0/3071号英文

选自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铁路工人联合会的信

（1923 年 7 月 1 日）

寄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

我党收到贵会济助京汉铁路罢工受难者的$\frac{564}{1\,000}$①美元。并在收受款项之际向贵会对中国工人阶级所表示的精诚团结之意谨致谢忱。

不仅有许多工人被杀害，还有大量工人遭解雇，我们正设法帮助他们。虽然年青的铁路工会组织受到军阀们的致命打击，但是重建组织的工作已经开始，特别是汉口工人正在建立秘密工会，为更加成功地打击强大的敌人做好准备。

致共产主义敬礼。我们是你们的革命战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书记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0/3073 号英文手稿

选自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原文如此。

给萨法罗夫的信

敬爱的萨法罗夫同志：

民族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革命都是必要的。根据经济条件和中国的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懂得开展国民运动的必要。

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强烈反对中国军阀的统治，在这个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倾向。大部分工人还是老式手工业作坊中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尽管在这些工人中政治觉悟开始发展，但他们的要求充其量只是直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本组织的自由。如果我们想要同他们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就会害怕而离开我们。只有极少数人加入我们的党，即便这样也是通过友好关系。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人则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建立革命力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这只能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只能使工人离开我们，站到敌人的一边。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只会是非常严肃的、强有力的小团体。我们不能允许国民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敌人妥协并向右转。

中国国民党当然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党，因为在这个党里还存在着许多旧思想，但这个党已有多年历史；其中有许多革命人士。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不与他们合

作，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在许多城市，恰恰是我们能够组织国民党的地方团体并把它们掌握在我们手里。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

只有在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阶级分化明朗后，我们共产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

既然共产党第三次会议①表示赞同这一主张，我希望您也同意这一点。

我们将利用这一策略，对国民革命施加巨大的影响。

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这样，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 1 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由于我党还很年轻，我们希望经常得到您的来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陈独秀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① 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致胡适信

我们发行《前锋》(月刊)由弟编辑,三四日内即出版,收到时求吾兄细看一下,并求切实指教。此报为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视前几年确有进步,尚望吾兄不客气地指示其缺点。

弟实庵　白。〔一九二三年〕七月五日

久不见吾兄来信,至为想念,务求拨冗示我一函,以当面晤。

选自《胡适日记全编》(4)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民国十二年之乱，如癸丑之战、洪宪之役、复辟之变、护法之战、安福之乱、直皖奉直两次战争，以至此次曹党之变，那一次不是帝政余孽之北洋军阀在那里作怪？即至三次小小的广东变乱，也都是北洋军阀在岑、陆、陈炯明、沈鸿英背后作祟。这都是因为辛亥革命不激〔彻〕底，革命的国民党未得着政权，统治中国的仍是帝政余孽，北洋派——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之旧势力，才有这种怪现象。

国民党究竟怎样？我们用不着夸张，我们敢说：国民党两次在广东执政，为期尚短，虽无什么积极的建设，而消极的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这是我们所亲见的；至于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这些事实，便是反对党也不能否认。

现在国家的大难又到了，国民党应该怎样做？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固应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以及无耻的国会议员，他们虽然也都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只有用国民的力量来做国民革命运动以靖国难。

我们也知道此时国民的力量很弱，然却只有此很弱的力量是国民党真的力量，是国民党永远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不但不是国民党的力量，而且实是国民党的敌人，无论他们此时对国民党说的如何好听，去年今日直系军人拥戴黎元洪又何尝说的不好听。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

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我们想想四派势力是什么东西，直系、奉系、皖系不用说都是罪孽深重的军阀，国人全知之；西南诸省象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刘显世又是些什么东西，那一个不是拥兵称雄的军阀，那一个能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这四派势力果然结合起来更是人民的厄运，希望他们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即或裁点空名的兵，他们残民的势力依然存在；希望他们行兵工政策，他们的势力更加巩固了。若是联合三派共讨直系，这种军阀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无意义的战争？

西南诸将不但无心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其中有些还是国民党的敌人；皖系、奉系虽与直系敌对，而终有他们历史上的首领，我们何苦为他们做幌子！

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断不可站在和国民敌对的战线那边，那边战线也终不容他人混迹，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

1923年7月11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学生

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们的确在国民运动中做过些实际的工作，例如全国学生非基督教运动，唐山学生援助矿工反抗外力与军阀，北京学生为军阀压迫教育界举行示威运动，为军阀惨杀京汉工人举行示威运动，为反抗军阀政治的元宵运动，武昌、沙市及长沙学生反抗日本的国民示威运动，这都是明显的事实。

现在学生社会对于北京政变的态度如何？北京学生联合会之不承认已辞职的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并反对武人为总统及现在之国会三个决议，都十分正当。同时他们所办的周刊上说："对于所谓五头(孙、段、张、黎与政学会)的协商，我们仅认其性质为反对直隶系的共同，不是反抗军阀的共同，更不是个革命的同盟"。这几句话将各派政客的行动批评得入骨而合逻辑。只可惜他们的主张中，是消极的而缺乏积极的。

在上海学生总会的意见：否认曹为总统及僭内阁，号召国民不纳税，反对军阀政客合组行政委员会，这些主张都很对；惟其电劝国会勿举曹锟为总统，又请上海总商会知照使团与僭阁绝交、知照税务司等勿以关余盐余交僭阁，那便错了。

无耻而又曾恶打学生的国会议员，学生总会为什么还承认他有选举总统之权？乞怜中国太上政府的只有军阀官僚，他们本来是和洋大人同恶相济，为什么学生的国民运动也要请洋大人帮忙，惹得洋大人笑着说：以中国主人翁自命的骄傲学生到底也要来求教我们了！

同学们！积乱的中国，非国民自力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援救的呵！

国民革命，同时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反抗强邻侵略两个意思，利用军阀打倒军阀，利用外人打倒军阀，都是可耻而无益的办法。你们应该在上海召集一个全国学生会的代表大会，并努力实现商界所主张的

国民会议，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实的基础力量。我们要站在这个基础力量上造成国民对于军阀的战争，万不可像各派政客们只知结合奉、段等反抗直系，造成军阀对于军阀的战争！

1923年7月11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军人

把有枪的军人都当做军阀，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民国十二年的历史，是大小军阀(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等)的乱国史，也就是一般军人(下级军官及兵士等)困苦牺牲的史。一般军人都是为少数军阀傀儡，供少数军阀的牺牲；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个个成了富翁，何等逍遥快乐，可怜下级军官及兵士在营里被种种军律管束，变成了活死人，平时连正当的饷都领不齐；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都拥有三妻四妾，阵亡的和未阵亡的下级军官、兵士，可怜他们的家小是如何困苦度日！

民国十二年中，伤亡的下级军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伤？不用说是为少数军阀私人的利益与地位而战而死伤。在这十二年少数军阀驱遣多数军人到火线上，为军阀们私人利益与地位的战争中，老百姓所受的困苦损失，真是计算不清。军人无罪，罪在军阀。

现在曹大军阀正在抢总统做，他何所恃？他所恃不过有许多军人替他打江山。可怜的军人们！请看着曹家花园的奢侈，比你们的生活如何？你们何必千辛万苦拼着可贵的生命为曹锟个人争地位。你们也是国民一分子，你们也应该设法合拢起来，赞成全国商界、工界、学界所提倡的国民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派出代表在这国民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军人代表中如有受军阀指使，有左袒军阀的言行，国民会议应该取消其出席权。

1923 年 7 月 11 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

曹锟之贼民乱国，全国皆欲起而诛之，虽平日最稳健和平不敢开罪北洋派的上海商人，现在也出来反对曹锟，曹之不容于国民，已可想见。在这反曹的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说素以革命党自负的国民党首领孙中山肯与曹锟携手，真所谓"出人意表之外"了。国民党能做这种违反民意的事，甘为国民公敌吗？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

国民党数年来重要的口号是"北伐"，北伐伐谁，不用说是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为什么讨伐陈炯明，始终是因为他通北，阻挠北伐；为什么讨伐沈鸿英，也因为他受曹、吴的命令来攻取广东；若孙中山可与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孙伯兰一派主张孙曹携手，固然十分荒谬，然他们是公开的，而且说话还冠冕一点；另有一班所谓"民党"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孙、曹携手，和曹锟嫡裔温大烟灯南北相呼应，这是什么一种勾当！这是什么一种民党！

田桐君说得好："孙、曹联合之说……温世霖在京亦极为努力。迨大兵入川，闽粤督理命令发表……从此去十分之四五；及沈鸿英作乱，被破于韶，检得曹锟之电若干种，而孙、曹联合之精神，从此又去十分之九矣；至北京政变时，孙伯兰犹劝曹氏撤退攻粤之师，而直方终不见听，联合之说已至山穷水尽矣。"

孙、曹携手说已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并且在反曹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仍鼓吹孙、曹携手，我们不暇责其人格如何，我们只责其何怨何仇于民党，而必欲其名誉扫地以尽也！

所有国民党的忠实党员，都有痛辟此邪说的责任。

1923 年 7 月 11 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致中

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

将来管理中国的不外三种势力:第一,是英、美、日、法等列强势力;第二,是中山先生所分析的直、奉、皖、西南四派军阀势力;第三,是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

第一派势力,现在已经是利用军阀政府间接的管理着中国,做他们的半殖民地;自华盛顿会议英、美、日、法四国协定以来,时刻在那里寻找机会——如临城事件、北京政变等——来直接共管中国,做他们公共的殖民地,一旦他们的意见利害一致,至少也要在中国沿江沿海沿铁路的地方实现他们的计划。

第二派势力,中山先生细分为四派,其实只有一派,我们无理由把他们分家;直系军阀固然是罪恶昭著,政学会所号召的"反直系大联合",也只是军阀政蠹的大联合。直系无论其挟宪法或武力窃取政权,或并挟二者统一中国,其蠹国乱政将更甚于今日。反直系之军阀政蠹们即能联合起来,无论其以任何形式——高等行政委员会、总裁制或元老院、最高级军官等——窃取政权管理中国,观往察来,其蠹国乱政,亦与直系是一丘之貉。这两派——直系及反直系——军阀政蠹无论那一派管理中国,都同样是列强的经理人,不但不能改变列强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其蠹国乱政,必且引导列强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日近一日。

第三派势力,乃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这派势力目前自然还是混乱、散漫、软弱;但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

我们究竟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不用说是希望第三派势力,因为第一第二派都是制中国死命的势力。

负有历史上国民革命使命的党派,当然要建设在第三派势力之上,

对于其余二派敌方势力，不应稍存妥协或利用的想头。凡社会上有声望的团体或个人，对第一派势力发言，都须万分谨慎，一是恐怕引导国民误走错路，一是恐怕列强据为“中国人希望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

1923年7月18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三期　署名：独秀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致素民

编者按：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宣布设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陈独秀为筹备中共“三大”也于3月26日来到了广州。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6月1日，陈独秀启印视事。7月19日，致函彭素民，彭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这封信录自李三星先生《读陈独秀的一封短函》，载《党史信息报》2006年6月28日。

近启者本会为宣传起见，时有印刷品分送及与各方通讯之必要应请贵部将国内外党各支部通讯处及部长姓名开列到会俾便通讯至纫公谊。

此致

素民先生

陈独秀

民国12年（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欢迎《民治》周刊

经济落后的民族，一切小工商业家与小农其对于政治的需要与欲望，自然不发达，所以中国农民一向酣眠商人说在商言商不望政治，教商界主张教育独立不问政治。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外力及军阀压迫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或者本地工商业发达已到须与外力冲突的程度，国民运动也会起来，此所以向来不问政治的中国人民，大都会的商人、学生近来也出来谈谈政治了。代表这种国民运动的是上海商人及北京上海的学生。浪漫的青年学生们，有时说几句激烈话，似乎比商人更急进些，实际上并不然，这是可以拿上海商联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言论行动比较证明的。

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出版的《民治》周刊，我们已见过两期，其发表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政治的观念上三个优点：(一)主张民治运动应由国民自干，不倚赖任何方面的军阀；(二)反对任何派别的国会议员，(三)不曾有求助外力的观念，不曾请求外国政府或公使团取销北京政府，予列强共管中国的口实，这一层商人的观念比学生的观念清楚得多。我们竭诚欢迎商人阶级起来做国民运动，我们更欢迎商联会的《民治》周刊富于国民运动的精神。最后，我们要忠告中国商人阶级：在国民运动中，勿忽视了劳动阶级是革命的急先锋，是你们有力的友军！

1923年8月1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四期　署名：独秀

呜呼！北京学生联合会！

我们在前期本报上，曾不满意于上海学生总会乞怜于公使团的态度，以为北京学生的见解总要高明些，那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曾致函使〔团〕，请各国保留北京政府承认案，这种认敌为友非国民运动的态度，不但取笑于外人，其结果只落得外人与外人的经理员——所谓摄政内阁——勾结一气，饬警厅前行取缔，这是何苦来！

我们最痛心的是：北京、上海的学生及上海工人这种倚赖外力的谬误观念由何种引导而发生？

1923 年 8 月 1 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四期　署名：独秀

答李子芬（乡村共产主义运动）①

来函所谓“空想的文哲派，他们都是直接间接的御用学者，引导国民回避革命心理主要犯”，这句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当头棒喝，真是一针见血的话。先生所主张的乡村共产主义运动，鄙见以为未免浪漫一点，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须以工厂工人为主力军，小农的中国，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共产主义的运动如何能在自耕农居多的中国乡村成功群众的运动？此时乡村里只宜于国民运动，而且国民运动是中国目前所急紧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运动能打倒军阀，开辟我们共产运动的途径。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1923年8月1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四期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粤局与革命运动

陈炯明已无闽南后顾之忧，潮梅军队有南下之可能，若同时洛吴续援沈鸿英①，国民党也会再失广州。反对者将或以此轻视国民党，即党人自身也将或以此沮丧，其实大谬不然。革命的空气若不充满了社会，若没有组织强大的革命党，革命的事业决不会利用他人可以侥幸成功的。现在的国民党为了广州这一块土地，为种种环境所拘囚，对内对外不得不降心妥协背着主义而行，日夜忙着为非革命的军队筹饷拉夫，那有片刻空闲在社会上制造革命的空气，那有片刻空闲来筹划党的组织，所以真的革命党人，对于广州之得失不但无所喜戚，或者还以失去广州为国民党真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发展。

1923 年 8 月 29 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 署名：独秀

① 1923 年 3 月 2 日，孙中山大元帅的大本营成立。3 月 20 日，直系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后又任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以谋抑制孙中山。4 月中，沈通电请孙中山离粤。孙令各军讨沈。沈失势，退往南雄。

护路提案与美日

日政府素抱传统的侵略中国政策，无人不知；美国自大战以来富有余资，急想垄断中国的工商业，遂不得不改变其从前对华不干涉内政的策略，这件事实，除了美国留学生也都感觉着危险。此次美国、日本对于英国护路提案都表示反对，难道他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吗？尊重中国主权吗？不是，不是。他们明明是不愿英国再行独占中国路政机关与海关、盐务署鼎足而三罢了。本月二十六日巴黎电，据法外部确讯，美政府提议列强各添兵二万来华，分驻重要口岸，这本是中国之好友大美国侵略中国的特有方式——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1923年8月29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 署名：独秀



章炳麟与民国

贪儒章炳麟、刘光汉当初本只提倡排满，不知共和民国为何物，刘光汉拥袁称帝时，曾明白宣布此旨；章炳麟始终排斥中山先生。前只排满，今只排北，也和刘光汉同一见解。

民国元二年间，章炳麟贪袁氏金钱官(东三省筹边使)爵(勋二位)，遂公然反对孙、黄，公然宣言中国非袁世凯统治不可。他这种罪状，实与刘光汉、孙毓筠相等，而且在他们背叛民国民党之前。

此时中国是军阀与民治之争，军阀派与民治派南北均有，章炳麟主张南北对抗，于理论事实已都不相合；而且他所拥戴的黎元洪何尝不伙同北洋军阀压迫西南，他所左袒的陈炯明、赵恒惕何尝不和杨森、沈鸿英同样是曹、吴的爪牙！

即以南北对抗而论，为什么不赞助南方革命的民治派，而赞助投降北方的黎元洪(第一次投降于袁，第二次投降于曹、吴)，赞助南方诸将中明白的勾结曹、吴之陈炯明、赵恒惕。这岂不是利令智昏！

社会制裁有时比国家法律还重要，像章炳麟这样贪昏叛国的小人，他自己还像煞有介事的高谈国事，固然是不知羞恶，而社会上不但不加以制裁，反以民国元老相待，似此是非紊乱，确是军阀官僚们敢于肆行无忌之一大原因。

1923 年 9 月 8 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九期 署名：独秀

日本大灾与中国

此次日本的大灾，不但是日本的大变故，并且是全世界的大变故，日本军事上经济上损失之大，不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打了个大败仗，他的伤痕决非十年以内所能恢复，因此日本在国际地位及他传统的对华侵略政策，都必有相当的变动。

华盛顿会议，原来是英、美、日、法四国想合起伙来侵略中国；其实法国自身本非大工业国，又集全力于中欧及东欧之霸权，在中国除云南铁路及一些奢侈品的商场外，本没有多大的奢望，现在日本又被大灾，四国中只剩了英、美两国是专门高压中国之死敌。

中国国民不但对于灾难中的日本人民应有充分之援助，而且在外交上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上，也须有个缓急轻重之别。

1923年9月8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九期 署名：独秀



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

国会本是统治阶级之附属品，统治英、美等国的是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的最大多数国会议员，分析起来，不是代表工业资本家，便是代表商业资本家，或者是代表农业资本家。统治中国的是军阀阶级（无论中央或地方），所以最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分析起来有五派：（一）直派，（二）奉派，（三）段派，（四）陈（炯明）、唐（继尧）派，（五）徘徊各军阀间之投机派（如一部分之研究系与政学会），他们一向只仰军阀鼻息，与人民丝毫无交涉，这种状况，被近日上海各报专电“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十二个大字，描写得淋漓尽致。

无耻的议员们冒充人民代表还不足责，最奇怪的是一班反对军阀的人们，明知国会议员是一堆臭粪，为了苟且的拆台政策，遂不惜将臭粪当香料看待，真是认贼做子！这班议员们将来不是回京为曹锟维持旧台，便是在南方为段祺瑞搭新台，或者为陈、唐帮帮场面，始终和人民无交涉，与民党无关系，欢迎议员南下的人们，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何苦来！

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商界根本不承认现国会，他们阶级的意识却很明了。

1923年9月8日 《向导》周报第三十九期 署名：独秀

黎元洪南来

黎元洪居武昌起义之名，倘好自为之，本来可以弄假成真，做一个历史的人物；怎奈他一通款于萨镇冰，再通款于袁世凯，三通款于吴佩孚，他政治上的节操，早不与共和民国有什么关系。即退一步言之，倘他能始终坚持以不署名解散国会令而去职，以不署名扰乱闽粤令而去职；更好是以坚持废督裁兵等重大政治问题而去职，国人对他还能表示同情；怎奈他两次去职，都硬是被动的丢掉了饭碗，并不是什么因为政治上不妥协而去的，倘敌人不硬要赶他滚蛋，他任何样妥协都办得到，但求不丢饭碗。即再退一步言之，黎元洪此次南来，倘诚恳的痛悔前非，以个人的资格，到民间去，做颠覆一切军阀官僚的平民革命运动，国人还可以原谅他；怎奈他一到上海，和中外新闻记者谈话，开口便是什么“本人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今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故不得不转而至沪。”又说“曹、吴等果能一反前行……余亦极愿与彼等合议，不愿复有反直派名词。”原来他是为做总统而南来，原来他还在和曹、吴吊膀子，这种人是何等可恶而又可怜！

章行严君见上海舆论不满黎元洪，发愤的说：“窃以为天下群为黄陂之故而反曹。”这句话只是代表政学会诸人的心理，不但不能代表全国商民、工人、学生的心理，并不能代表军阀间反曹的心理。为黄陂之故而反曹的人，除了政治上投机的政学会诸人外，只有买空卖空的唐少川、章炳麟等几个人；章炳麟等又还是唐少川之傀儡。吴大翁做总理梦在北方弄鬼，唐少翁做总理梦在南方弄鬼，这两位新旧官僚的“大”、“少”，拥曹拥黎之行事不同，其心迹卑劣都是一样。

此时中国之大难，是帝国主义的英、美和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同时而又勾结为患，真能救济中国大难的，除了全国商民、工人、农民、学生

及其他职业团体之合作，实行平民大革命，没有别的方法。章行严君所谓同事，所谓合作，是指被革命的军阀官僚政客们反曹运动之合作；我们所谓合作，是指革命的平民扫荡一切军阀官僚政客运动之合作。反曹的军阀官僚政客间，为什么由合作而不合作，为什么有所不满，为什么不能了然其所不满者何在，又为什么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我们实在不暇为行严君解释这种烦闷；只得把我们了然平民所以不满于一切军阀官僚政客不能与之合作的缘故，明白告诉行严君。

行严君！死守着前五年的头脑观察现在的事，便往往未免所见不广呵！

1923年9月16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期 署名：独秀

东铁地亩问题

究竟俄国人是中国之好友，还是美国人是中国之好友呢？我们现在该可以明白了罢！

中东铁路所用地亩，本是旧俄用强力所占据，除迫令吉、黑两省与之订立展地合同明定的数目以外，还强占了二十余垧。加之俄旧党盘据该路，专以压迫俄新党及残害华人为事；凡沿路地皮，经华人呈领者，所索租价比俄人要多十倍，且每因勒索不遂，即以命令强迫华商拆屋，本年拆屋风潮竟有十余起之多，被害华人竟至一千四五百户之众，此所以沿站商民一体向本国官厅请愿收回此项地亩。新俄官场对于中国接收管理此项地亩，并不反对，却是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勾串俄旧党首领关达基出来反对。舒尔曼在东铁俱乐部演说，竟胆敢指责中国收回地亩是侵犯他国主权。原来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主权，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事件都可以自由行使，不许侵犯吗？当事的俄国还可以放弃，到是事外的美国横来干涉，并且唆使哈尔滨之领事团，将中国接收东铁地亩处之文卷概行查封，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自由行使主权而蔑视中国主权的态度，应该如此吗！

究竟俄国人(新俄)是中国之好友，还是美国人是中国之好友呢？我们现在该可以明白了罢！

1923 年 9 月 23 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一期 署名：独秀

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

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拥戴雌伏在直系袴下监印的黎元洪来反抗曹锟，这丑计已是失败；欢迎助曹为恶的国会议员南下来反抗曹锟，这丑计也是失败了；结合直系爪牙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来反抗曹锟，这妙计不但现已失败，而且将来还要出丑。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

曹贼贿选若真成事实，其结果是英、美、曹、吴外交系主奴结托的北京政府，将以正式政府名义断送国权大借外债，以供其征服异己武力统一之用。其统一不成，战祸固遍全国（曹、吴不去而妄想和平，江、浙绅商真是做梦），统一即成，反动黑暗的政局必更甚于今日，这是我们观往察来，可以断定的。

或者有人说：中国左右是军阀政治，曹锟做总统不做总统没什么分别。其实不然。曹锟若做总统，其意又是使英、美的金力曹、吴的兵力结合起来，人民所受的桎梏将格外加紧。

国民若欲打破此种桎梏而得自由，必须于曹锟贿选未实现以前，各阶级同时起来做一严重的表示；尤宜组织一个全国职业代表的国民会议，来努力驱除国贼，建设真正的人民政府，别的方法都是不中用的呵！

1923 年 9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二期　署名：独秀

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

一般国民渐知干涉政治，渐知声讨军阀的罪恶，实在是好现象，虽空言也算是进步。

但是只知道军阀的罪恶，而忘了在军阀背后作恶之帝国主义的列强，实在是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了！

袁世凯若没有善后大借款，他能横行吗？安福部若不是勾结寺内内阁大借日债，他能做出如许罪恶吗？曹锟所以得志，岂不全靠外交团外交系和直系之大结合吗？临城案件之要求已公然以使团觐见为交换条件而承认了；直系诸将公然主张由外交系组阁，最要的理由是借外债；外交系不顾全国唾骂而悍然帮忙曹锟，其目的并不在做官而在经手大借款。直系政权倘真巩固，必然要假手外交系第四次断送国脉（庚子赔款是第一次，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是第二次，安福参战借款是第三次，曹锟要做第四次了），大借美债，以供他武力统一及收买政客之用。直系固然明明知道非借得一笔巨额外债，便无法削平异己；恰好美国也正须在中国输入余资，获得利权；岂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受内外二重压迫的国民，应该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首当扫除一切误会，以承认苏俄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现在的苏俄是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中心。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首当抑制一切感情，以扶助及扩大国民党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国民党是在过去现在历史上反抗北洋军阀比较有力的团体。国民联合的运动中，非有一个有力的大党做大本营不可。

这两件事实在是国民目前所能取的态度，不但是所应取的态度。

1923 年 10 月 17 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三期 署名：独秀

研究系与中国政治

一国政治的进步，全靠有一班洁白而强硬的政治家提携每个时期的反对派，反抗每个时期的统治者。中国研究系诸人未尝不富有知识，只可惜他们政治生活的态度始终与此相反，他们始终结托每个时期的统治者，压迫每个时期的反对派。他们的良心未尝赞成清室、袁世凯、段祺瑞与曹锟，而他们的政治生活，却明明是拥清、拥袁、拥段、拥曹，其结果每次都使政局益趋反动紊乱。他们的知识战胜不过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一念，遂至屡次蒙了政治上的耻辱而不自觉。他们忏悔一次又一次，若不毅然决然抛弃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旧观念，亦终于忏悔而已。

或者有人问我们研究系拥曹的证据在那里？我们的答案是：(一)请检查该系议员出席贿选的有多少人；(二)请看上海《申报》上张君劢劝人承认宪法的文章；(三)请看上海《时事新报》关于国民讨贼军的社评。

尤其是《时事新报》这篇社评，盛称直系两次战功八省地盘，承认马上得天下这句话并不十分错，大骂讨贼戡乱的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心理，由这几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若他们终不改易此心理，却也算得中国政治进步一障碍，我们盼望研究系诸人勿看轻自己！

1923年10月17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三期　署名：独秀

临城案与侨日华工被杀案

临城案不过因为土匪掳了几十个洋人，便闹得天翻地覆，结果还要撤换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赔偿巨款，由外人管理路政，列强的借口，是非此不能保障在华外人生命之安全。现在日本的军警浪人合起伙来，杀害无辜华人至一百七十四名之多，伤者数十，在日华人生命之安全，将如何赔偿如何保障？

我们既没有陆海军派往日本，日本又没有贿选总统承认问题供我们要求条件之交换，只望媚外求官的外交当局替被难的同胞抗议更不必作此想。我们国民自己所做得到的，只有一面继续剧烈的排斥日货，一面停止救济日灾之募捐，将已捐而未送去的类项移作抚恤被难华工家属之用。

我们更有一种不可忍的痛苦，是中国媚外无耻的新闻记者们，对于临城案件如丧考妣的号叫，助长外人气焰，外人也一半因此才敢于小题大做，提出无理的要求；现在这们〔么〕多侨日同胞被杀，中国各报竟一声不响，两下比较起来，当真洋大人的生命才是人的生命，华人的生命竟猪狗不如吗？外人贱视我已可痛心，媚外无耻的中国新闻记者们，遂亦尊人贱己到此地步，更是痛心极了！

1923年10月17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三期　署名：独秀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死的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饭穿衣生儿子的行尸走肉。现在这班行尸走肉，比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更要沉睡过去，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这班青年学生愈为一班行尸走肉所厌恶，他们的责任愈加重大呵！

行尸走肉的老废物不用说了，现代的青年们，一部分教会学生被教会教育汩没了性灵与爱国心，简直没有希望了，一般官僚的子弟，把学校和科举同样看待，也算是一些活的死人；又有一班将要醒觉的青年，却被老庄哲学或什么东方文化引到睡眠状态去了；更可怜的是一种半醒觉的男女青年，妄以个人的零碎奋斗可以解决他生活和恋爱问题之困难，此路不通，便由烦闷而自杀或堕落的亦往往有之。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

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这是何等危险！

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摇动；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

德国、俄国的青年在革命运动中，都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社会更有特殊状况，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他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然不同。

中国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做，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

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和欧美的学生界不同的地方。

1923 年 10 月 20 日 《中国青年》第一期 署名:实庵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

贫学的中国，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译成外国文的可能了。

由此观察，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了技术上的价值；即令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儿？

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1923年10月27日 《中国青年》第二期 署名：实庵



苏 俄 六 周

苏维埃俄罗斯在此开国六年中，因为政治组织与人不同，遂引起世人无穷的疑谤；这些疑谤虽然已经由事实解释了许多，而尚在疑谤中的亦复不少，今再略述事实，以解世人之疑。

疑谤中第一可笑的是说俄罗斯过激党实行公妻，妇女国有，连南高师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徐州演说时，也公然如此闭眼乱骂，实在可笑极了。其实果然公了，还何妻之有，妇女非财产，如何能归国有，过激党中不少女党员，如何能承认其自身为财产，所以这等无稽之谈，除了毫无常识的人断不会再相信了。

其次就是说俄国革命杀人无算；其实俄国革命不说政治犯了，就在战争中杀人也不多，他们在革命中所死的人不比中国辛亥革命多，比起法国大革命来，真是天渊之隔。

再其次就说俄国仍是专制政治；其实苏俄在国家的组织上，或为省或为自治区或为联邦，一任民族之自由；在政治的组织上，各级苏维埃皆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上级苏维埃代表，全俄苏维埃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人民委员会之委员。现在世界上能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

又有人说苏俄拥六十万红军，号召第三国际，是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现在不谈俄国党人的理想，且说事实，若说是经济的侵略吗？大家应该知道俄国一时无此可能。若说是军事的侵略吗？六十万陆军如何能侵略全世界。若说是理想的侵略吗？这应该是我们所毫不恐惧的了。加入第三国际的有五十几国党人，他们的野心是以全世界被压迫者合方〔力〕反抗全世界压迫者，不是以俄国来侵略全世界。

更有人妄想俄国一经革命，共产自由的天国便当涌出，现在还闹什么新经济政策，未免是变节欺人。其实共产自由的社会，在任何产业文化发达的国家，都不是旦夕所能促成的，何况是产业文化落后的俄罗

斯。俄罗斯十月革命的主义及其成功，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过是走向共产党主义的路的第一步，由此第一步，运用此政权以创造无产阶级的经济力，以建筑共产社会物质的基础（因为共产自由的社会，必须是工业的富有的，不应该是农业的俭朴的，如章士钊等所想像之古代共产村落或原始共产社会），这些工作，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环绕窥伺中的苏俄，自然非旦夕所能成。因为俄国革命不能即实现共产社会，便失望而悲观，这未免把共产社会看得不值钱，而对于俄国革命也未免太乐观了。

还有一班妄人以为中国若再革命，必蹈俄国紊乱困苦的覆辙。殊不知俄国目前只是物资不足，不能向共产主义猛进，至于一般政治上的建设，不但比中国，比欧美哪国都好。经济的恐慌是没有的；失业的困苦是没有的；政治的阴谋与暗斗是没有的；国家的财政是有严格的预算决算的；城市乡间的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六年未曾借过一文外债；红军的知识和学生一般，拥戴个人争政权争地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市上虽有警察，我们不容易看见，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站在街心指挥市民，然而争斗失窃的事竟不大有。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闹越糟；俄罗斯革命才六年，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建设？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几十万人的过激党，负了为国家由破坏而建设的大责任同心戮力的干。所以疑谤苏俄的人，每每只是疑谤苏俄的过激党；可是感佩苏俄的人，也应该首先感佩苏俄的过激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章士钊仿佛说只有工业国应该有党，农业国不应该有党；富国可以有党，穷国不可以有党。其实主张无政治的尚有无政府党，何况有政治，有政治便自然有党，无所谓应该不应该，并且必须有好党才有好政治。若云农业国穷国不应该有党，苏俄却正是农业国穷国，他何以有强大的过激党？眼前的事实还闹不清楚，何苦高谈政治误人家国！

十月三十一日于广州

1923 年 11 月 7 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独秀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开展承认苏俄运动

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兹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亟宜联合各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其理论的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Leo D.①

〔一九二三年十月〕②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② 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时间是根据签署人名及印于同一纸上的另一文件时间判定的。

标题中的十九号系九号之误。

《科学与人生观》序

亚东图书馆汇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无事，却很欢喜的做这篇序。第一，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文化落后的俄国前此关于这问题也有过剧烈的讨论，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进了步，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门径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无常识的讨论了，和我们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不至于讨论什么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等问题一样），而却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寿康先天的形式说，及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说）。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出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大家的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张君劢那边离开争点之枝叶更加倍之多，这乃一场辩论的最大遗憾！第二，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这两个缘故，我很欢喜的做这篇序。

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和人生观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本不用着讨论。可是后来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应用到活动的生物，更应用到最活动的人类社会，于是便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

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不用说和那些自然科学都还在幼稚时代,然即是幼稚,已经有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若因为还幼稚便不要他,我们不必这样蠢。自然科学已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及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明得对,他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得不对,他仍旧是那样;玄学家无论如何胡想乱说,他仍旧是那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来在那里绕日而行,孟轲以后,渐渐变成了无君的世界;科学的说明能和这死板板的实际一一符合,才是最后的成功。我们所以相信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就是因为"科学家之最大目的,曰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为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张君劢语),必如此而后可以根据实际寻求实际,而后可以说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死板板的实际,和玄学家的胡想乱说不同。

人生观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很显明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讨论?哈哈!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之本身,也可以证明人生观和科学的关系之深了。孔德分人类社会为三时代,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象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象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种社会的实际现象,想无人能够否认。倘不能否认,便不能不承认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譬如张君劢是个饱学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尝学问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张君劢立意要延医诊脉服药;他的朋友丁在君方从外国留学回来,说汉医靠不住,坚劝他去请西医,张君劢不但不相信,并说出许多西医不及汉医的证据;两人争持正烈的时候,张君劢的家族说,西医、汉医都靠不住,还是符咒仙方好。他们如此不同的见解,也便是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

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形而上的玄学可以说明的。

张君劢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而不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今就其九项人生观看起来：第一，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纯粹是由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之自然的现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亲与夫都把子女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会兴旺起来。第三，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于兽，势必结群合作，原无财产私有之必要与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单一性的张先生，生在那个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到了农业社会，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仓库，谷物又比较的易于保存，独立生产的小农，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没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到了工业社会，家庭的手工的独立生产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万的人组织在一个通力合作的机关之内，大家无工做便无饭吃，无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没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已为少数资本家私有了，非将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大家只好卖力给资本家，公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第四，守旧维新之争持，乃因为现社会有了经济的变化，而与此变化不适应的前社会之制度仍旧存在，束缚着这变化的发展，于是在经济上利害不同的阶级，自然会随着变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冲突起来。第五，物质精神之异见，少数人因为有他的特殊环境，一般论起来，慢说工厂里体力工人了，就是商务印书馆月薪二三十元的编辑先生，日愁衣食不济，那有如许闲情像张君劢、梁启超高谈什么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第六，社会主义之发生，和公有财产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为我利他两种本能，个人本能发挥的机会，乃由于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之不同而异。第八，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亦由于个人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而异，试观各国自杀的统计不但自杀的原因都是环境使然，而且和年龄、性别、职业、季节等都有关系。第九，宗教思想之变迁，

更是要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据所传神话，大都是崇拜太阳、火、高山、巨石、毒蛇、猛兽等的自然教；后来到了农业经济宗法社会，族神祖先农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后来商业发达，随着国家的统一运动，一神教遂至得势；后来工业发达，科学勃兴，无神非宗教之说随之而起；即在同一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产业进化之迟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随之而异，非洲、美洲、南洋蛮族，仍在自然宗教时代，中国、印度，乃信多神，商工业发达之欧美，多奉基督；使中国圣人之徒生于伦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颂耶和华；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国穷乡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与狐狸。以上九项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

梁启超究竟比张君劢高明些，他说："君劢列举'我对非我'之九项，他以为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梁启超取了骑墙态度，一面不赞成张君劢，一面也不赞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见是：

>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他所谓大部分是指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他所谓一小部分是指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他说："既涉到物界，自然为环境上——时间空间——种种法则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项，固然不离物界，难道情感方面事项不涉到物界吗？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应，情感如何而起，这都是极普通的心理学。关于情感超科学这种怪论，唐钺已经驳得很明白。但是唐钺驳梁启超说："我们论事实的时候，不能羼入价值问题"。而他自己论到田横事件，解释过于浅薄，并且说出"没有多大价值"的话，如此何能使梁启超心服！其实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田横、乃木自杀等主动，在社会科学家看起来，无所谓优不优，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无所谓有价值无价值，无所谓不可解，无所谓神秘，不过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应有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乃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传说及一切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试问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这样举动，有没有这样情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

意志？

范寿康也是一个骑墙论者，他主张科学是指广义的科学，他主张科学决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他说："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决不是主观所应妄定。"他所谓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类做各人所自认为善的行为。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意杀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长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一个女子生在中国阀阅之家，自然以贞节为他的义务，他若生在意大利，会以多获面首夸示其群；西洋人见中国人赤膊对女子则骇然，中国人见西洋人用字纸揩粪则惊讶；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满族初入中国不知汉人礼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为耻；中国人以厚葬其亲为孝，而蛮族有委亲尸于山野以被鸟兽所噬为荣幸者；欧美妇女每当稠人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得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娼妓亦羞为之。由此看来，世界上那里真有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我现在举出两个证据：

第一，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此所以张君劢说："既已存疑，则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学，不应有丑诋之词。"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

第二，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但丁在君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

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得来的。如果离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排科学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造成这样空前的大战，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君劢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真有力量了。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十二〔一九二三〕，十一，十三。

《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署名：陈独秀

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先生在他的序文的结论里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我不知道丁先生要如何回答他；但我个人的意见先要说明：(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

说明了以上两层，然后我可以回答独秀了。我们信不信唯物史观，全靠"客观的物质原因"一个名词怎样解答。关于这一点，我觉得独秀自己也不会说的十分明白。独秀在这篇序里曾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序页十)那么，"客观的物质原因"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了，——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这样解释起来，独秀的历史观就成了"只有客观的原因(包括经济组织，知识、思想等等)可以变动社

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秃头的历史观，用不着戴什么有色彩的帽子了。这种历史观，我和丁在君都可以赞成的。

然而独秀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一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解成“经济的”（序页十一，行五）。因此，他责备在君不应该把欧战的责任归到那班非科学的政治家与教育家的身上。他说：“欧洲大战分别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制度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出来的？”

欧洲大战之有经济的原因，那是稍有世界知识的人都承认的。在君在他的两篇长文里那样恭维安基尔的大幻想（玄学与科学页二六，答张君劢页一六），他岂不承认欧战与经济的关系？不过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序页二），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那么，他究竟还是丁在君和胡适之的同志——他究竟还信仰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十二（一九二三年）、十一，廿九，在上海。

陈炯明与政局

曹锟贿选以来，他的第一政敌张作霖以前此单独作战为前车之鉴，此次决不肯为天下先；他的第二政敌段祺瑞在浙、沪、山东虽有实力，又怯懦没有发难的〔勇〕气；因此曹锟真正的敌人，只有肯负责冒险举兵北伐的孙中山。孙中山的军队倘进了江西、湖南，四川、奉天、山东、浙江自然会同时并起，那时曹、吴遂不得不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了。曹锟幸而得了一个有力的爪牙陈炯明，出死力将孙中山的军队困在广东，孙中山正要出兵北伐，陈炳明更出死力打得利害起来；若果能将孙中山赶出广东，去了曹锟真正的敌人，使曹、吴武力统一的梦得以开始实现，那时陈炯明对于曹锟真算是"圣主开基第一功"了。但同时我们要想想陈炯明这种举动，在民国史上功罪如何！

前有人以孙、陈两军在东江作持久战，实有利于曹锟，主张弃战言和，移师北伐，孙中山先生极以为然，而陈炯明的条件是中山须离开广东并向广东人谢罪。中山须离开广东，俨然是曹锟的口气；去岁广州之变，由洪兆麟军先发，今年北江之战由沈鸿英、李易标先发，东江之战由杨坤如、熊略先发，是谁应该向广东人谢罪？

陈炯明等口口声声说孙中山如何不好，国民党如何不好；今无论孙中山与国民党如何不满人意，而自以为好过孙中山的陈炯明，却对于全国共恶的曹锟贿选一言不发，而炮弹专对着反对曹锟的孙中山与国民党打来，试问他何以自解？

尽瘁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我们现在还没有批评他的必要。国民党诚然有不满人意的地方，若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党，自然是中国的幸事；但我们只看见有许多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党员并且实际上已脱离了国民党，大大的反对孙中山，这班脱离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既然看不起国民党，他们政治上的行动，照情理应该比国民党进步得多；然

而在事实上，他们当中象吴景濂、刘冠三等议员究竟如何，陈炯明、赵恒惕、黄大伟等军人究竟如何，政学会一班人又如何；凡是不满于国民党而脱离的党员，大都变成反动分子，竟然找不出一个比国民党更进步的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国民党并未放弃革命的口号，凡是不革命的分子自来会分裂出来。陈炯明便是这些分子中之一。

1923 年 11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七期　署名：独秀

外币与主权

世界上凡是有主权的国家，都不许任何外国的金银币或纸币在他国内流行。你看小小的香港，除港币外那一国的国币能够在香港通用？

近日北京外交部以俄国拟在东三省及新疆发行纸币，致函中俄督办事务处，请向俄代表交涉，原函如下：

> 经启者，据奉天张总司令称，俄人近在东省发行纸币，计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流通东省各地，据财厅查覆，此项纸币，系在库伦发行，俄人现拟于满洲里设立分局，以资兑换，事关币制主权，务请严重交涉，禁止在满发行等语。又据新疆杨省长三十一电称，俄人近在喀尔喝尔设官钱局，拟即发行钞票，行使市面等语准此。查俄人在满蒙新疆等处，发行纸币，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请向俄代表严重交涉，勒令停发，以维主权，至纫公谊。

又近日北京国务院对参议院质问美丰银行在重庆发行纸币之覆文如下：

> 国务院为咨覆事，前准贵院咨送议员潘江等对于美商在重庆设立美丰银行，发行纸币，政府何以茫不觉察，勒令休业，提出质问书一件，请答复等因。当经函询外交部去后，兹准复称：查重庆系通商口岸，外商在该号开设银行，照约未便禁阻；至美丰银行发行钞票一事，兹据重庆关监督分呈报告到部，当以外国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纸币，条约原无准许之明文，只以京津沪汉等处，外国银行发行纸币，相沿已久，一时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据以向美使交涉，诚恐该使借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范围，不如由当地官商协力设法阻止，较为妥善；如果美使来部提及此事，自当相机驳拒等语。兹由财政部据复在案，嗣后即未据，续有来文等因到院，相应咨复贵院查照，此咨参议院。

在这两个公文中，我们应有几个感想：

（一）外交部对俄函中说："俄人……发行纸币，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请向俄代表严重交涉，勒令停发，以维主权。"似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外交部有爱国心，有勇气。

（二）外交部对美复文中说："外国银行发行纸币，相沿已久，一时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据以向美使交涉，诚恐该使借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范围。"似此，什么金融，什么主权，都忘记了，原来他们的爱国心与勇气，是时有时无的呵！

（三）外交部又说："不如由当地官商协力设法阻止。"我们应该感谢外交部的教训，各地官绅从今后应该知道一切外国在中国发行纸币，都是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该协力设法阻止，勒令停发，以维主权。

1923年11月27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七期　署名：独秀

恢复华人领港权

可怜的中国人在张家口做点汽车生意，美国人竟看做眼中钉，横暴的帝国主义者竟喧宾夺主一至于此！

现在又有一件喧宾夺主的事，就是姚方文君向在怡和、太古两公司充当领港，此次应聘大来洋行，驾领大来海轮由吴淞到浦口，竟有洋人纠众干涉其行使职务，声言“华人不许领港”。因此全国领港公会于本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会所开全国各口华人领港会议，到有代表八十余人，主席杨洪麟君报告说：

今日会议，系应津、营、汉各口领港支会之请而召集者，讨论事件殊为重要，故不得不先行说明吾国领港之历史。查吾国向无所谓中国船用外国人领港者，自前清同治七年，政府与外人订立引水暂行章程后，于是外人领港之风日起。当时之所以雇用外人者，不过因一时人材缺乏，供不应求，暂借外材，以事调剂，故引水章程上有“暂行”二字。讵知吾国当局计不及此，不知随时取缔，遂致外人势力日益扩张，华船领港几被外人侵占殆尽，丧权辱国言之痛心。今日会议之要点，即在于“恢复华人领港权”七字，应请诸君注意。

1923年11月27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七期 署名：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维〔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

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例如在欧洲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

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护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

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

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

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

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不〕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靡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倒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

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1923 年 12 月 1 日 《前锋》第二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亡中国者留学生也

日本留学生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亲日卖国，人所共知，不用说了；其实留美学生亲美卖国，留英学生亲英卖国，也都和曹、陆、章一样。英、美同族，因此中国留英学生或留美学生并有互亲英、美的态度。杜威先生曾叹息着对我说："中国的事只有中国人自救，'五四'以来，何以欧美留学生不出来做国民运动的指导者？"他老先生那知道欧美同学会几乎是一个卖国机关，他将来会变成朝鲜的一进会。他们当中不仅是几个总、次长做英、美和军阀的居间人，许多各部老爷，画到打牌的余暇，还要做几篇媚外的文章登在西文杂志上给洋大人看。他们若怪我说话伤众，他们试自问良心，他们多数人（自然不是全体）一向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皇帝与学术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员会议席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柏林大学有一位教授对中国新去的留学生说："现在凯撒都没有了，你们来到德国学什么？"原来没有皇帝便没有学术吗？这种思想固然很可笑，但我们且莫笑，我们若仍旧迷信个人有超越民众的力量，岂不是和他们一样可笑！

辜鸿铭太新了

社会上主张和平缓进的人，往往总说主张革命急进的人太新了。

其实在辜鸿铭的眼中看来，连主张缓进的人都未免太新了；因为辜鸿铭主张复古向后退，连缓进都要不得。但是复辟之役，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很尽力，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由此看来，张勋真算旧极了，其实他也很新，因为他不但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他并且用火柴、电灯，打电报，坐轮船、火车、汽车，废了石、矢、弓、箭不用而用洋枪、洋炮，又何尝算的真旧！

基督徒望基督徒成佛

上海基督教联合会致冯玉祥函中，有云："急流勇退，还我清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成佛虽说是譬词，若直译成西文，欧美基督教徒见了岂不要大吃一惊！即此也可看出文言用典的流弊。

孔圣人又要走运了

从前戊戌政变后，反动政治与尊孔运动一时并起；袁世凯要做皇帝，同时尊孔祀天也闹的很起劲；现在南京的军民两长又接到曹锟通电募捐修理孔庙，拟各捐洋五千元。每逢中国政治反动一次，孔圣人便走运一次，可见反动势力和孔圣人本是一家眷属。

农村立国主义原来如此！

章行严奉政学会命去到杭州联络卢永祥恭维卢永祥，这本是政客们因为着包奔走权门的常态，无甚希奇；最令人肉麻的是他说："改造农国的朴质勤奋如卢君其人，居于领袖地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议员与娼妓

有人说：一班加入贿选的猪仔议员，固然人格扫地，但其中许多人的确为生计所迫，何尝不可以“不得已”三字恕之。同时又有人说：娼妓固然无人格，但其中许多的确为生计所迫，何尝不可以“不得已”三字恕之。

是猪仔呢还是无政府党人？

一班所谓无政府党人大骂马克思派加入国民党是变节，其实马克思本身及其学说本主张和每个社会的急进派合作，有何变节之可言？可是中国最反动的军阀，现在又以贿选扬名于世界，而鼎鼎大名的无政府党景梅九即景定成，也列名在山西省二十九个猪仔之中，以无政府党而做议员，已经是主义上的变节者；现在又摇身一变而为加入贿选的猪仔，无政府党一到中国，居然花样翻新了！

1923年12月1日　《前锋》第二期前五篇

署名：独秀；后三篇署名：致中



致 胡 适

适之兄：

到京想必诸事都好。

商务三百元蔡君①已收到，嘱为道谢，余款彼仍急于使用，书稿请君早日结束，使商务将款付清，款仍交雁冰转蔡可也。

弟仲甫白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号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① 指蔡和森。

答 适 之

我对于适之先生这篇序，固然赞美其能成立一家言，但有不能同意之二点：

（一）这回的争论当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的人生观是否错误?”一个是“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后者的讨论多于前者，适之说是共同的错误，其实是适之个人的错误。何以呢？梁启超、张君劢这班人，当初也未必不曾经过极肤浅的唯物即科学的人生观，只因他们未曾敲过社会科学的门，阅世又稍稍久远，接触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生观，都和科学的原理原则相隔太远，于是他们的第一观念便是“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他们对科学的信仰如此破坏了，第二观念方思维到科学的人生观本身之错误与否。并且梁启超更聪明一点，他骂得科学简直是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人类，而同时却又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争的，正是科学是否万能问题，此问题解决了，科学已否破产便不成问题了。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努力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而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无论你科学的人生观有如何具体的说明，张君劢、梁启超可以回答你：适之先生！我们佩服你科学的人生观也很高明，我们本来不曾承认科学破产；但是人类社会除了你这样高明的人生观以外，另外还有许多人生观，如先生所说的做官发财的人生观，靠天吃饭的人生观，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其余三天三夜也说不尽的人生观，却都是超科学的，却都是科学所不能支配的，他们的世界大得很哩，科学的万能在那里？适之**只重在我们自己主观的说明，而疏忽了社会一般客观的说明，只说明了科学的人生观自身之美满，未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不能证**

明科学万能，使玄学游魂尚有四出的余地；我则以为，固然在主观上须建设科学的人生观之信仰，而更须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毕竟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二）社会是人组织的，历史是社会现象之记录，“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适之说：“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我明明说“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何尝专指历史？），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我依据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讨论人生观，适之便欲强为分别；倘适之依据实验主义的理论来讨论人生观，别人若说：“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适之说的是一种实验主义的哲学”，适之服是不服？或者适之还不承认唯物史观也是一种哲学，想适之不至如此。适之好像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还不大清楚，因此发生了许多误会，兹不得不略加说明。第一，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第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世界上无论如何彻底的唯物论者，断不能不承认有心的现象即精神现象这种事实（我不知适之所想像之彻底的唯物论是怎样？）；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这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哲学者，是主张如下表：

经济 {
制度
宗教
思想
政治
道德
文化
教育

之一元论，而非如下表：

经济
宗教

之多元论。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我们何以不承认多元？别的且不说，单就适之先生所举的思想及教育来讨论。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莫如孔、老，他们思想的来因，老是小农社会的产物，孔是宗法封建的结晶，他们的思想即他们社会经济制度的映相，和希腊亚里斯多德拥护农奴制一样，并无多少自由创造。他们思想的效果，中国周末农业品手工业品之交易渐渐发达起来（观《史记·货殖传》所述及汉朝种种抑制商人的法令可知），当时的社会已远离了部落生活，已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已开始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当时挂的是道家儒家招牌，卖的是法家药料，并且自秦始皇一直到宣统，都是申、韩世界。思想的价值如此。再说教育。我们有何方法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之下，使资本社会的教育制度实现？我们又有何方法在资本社会制度之下，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漫说资本社会制度之下了，就是趋向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非不极力推重教育，列宁屡次很沉痛的说："在教育不普及的国家中建设共产社会是不可能的事。""要使教育极不普及的俄罗斯很快的变成一个人民极开通的国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以物质的条件之限制，无论列宁如何热诚，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工业家不但需学术精巧的技师，并且需手艺熟练的工人，资本阶级为发财计不得不发达教育，家庭农业家庭手工业社会自不需此，所以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的提倡教育，真是痴人说梦。教育本身的地位如此。适之说："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云云"我老实告诉适之，如果我们妄想我们的宣传他本身的力量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我们还配谈什么唯物史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

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适之又说："他（指独秀）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我的解答是：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我们不妄想造一条铁路通月宫，但我们却不妨妄想造一条铁路到新疆；我们不妄想学秦皇、汉武长生不老，但我们却不妨极力卫生以延长相当的寿命与健康的身体。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适之赞成所谓秃头的历史观，除经济组织外，"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心的"原因，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

十二，十二，九

选自《科学与人生观》 亚东图书馆版 署名：独秀

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

呜呼！联省自治派！可怜他们心目中的靠山，就是赵恒惕和陈炯明。

赵恒惕前年杀黄、庞，今年杀农民，又学吴佩孚以武力干涉水口山工人罢工，派兵占领工人俱乐部，硬说他是无政府党总机关，瞎为无政府党吹大气，这些黑暗罪恶姑且不提。他此次勾引北兵进湖南，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能说这不是事实吗？马济、沈鸿英等都奉曹、吴的命令深入湖南了，这还是省自治吗？今后赵恒惕当然不敢再向曹、吴说什么自治，而一面又不敢公然向他的部下护宪军宣布取消自治，此时正在进退维谷。我想赵恒惕必然痛恨上了联省自治先生们的当，不然他始终一意附北，何至今日进退两难！

陈炯明此时又何尝不进退两难，但他进退两难的内容，却完全与赵恒惕相反。陈炯明本是一个险猾的野心家，他附北也并无诚意，不过是利用北方经济的援助，打退孙中山，他再挂起自治招牌，做一个不南不北的广东王。可是天不随人愿，他的部下却不能体贴他这样苦心，当东江初发难时，陈炯明与诸将在汕头置酒高会，洪兆麟突举杯对陈说："什么联省自治，这是北方所不愿听的，今后总司令不要唱这种高调了！"陈炯明听了面色青白，终席间不出一言。日前陈军攻克石龙，陈得意之余电报齐燮元，齐覆电称奉曹大总统令陈某劳苦功高传令嘉奖，陈回电拒奖，而曹、吴大怒。今后陈炯明附北则不得为广东王，不附北则不独北方窥破其奸不肯加以援助，即部下将士亦不用命，这是陈炯明进退两难的情形。

以陈炯明、赵恒惕如此行为如此环境，而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还要拿他们做靠山，这真是"拿着干鱼放生不知死活"了。

1923年12月12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八期　署名：独秀

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

广东海丰农民因为天灾向地主请要求减租，并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陈炯明的军队居然将农民一万余户所组织的农会解散了，并捕去该会职员二十五人关在监牢内，至今有些还未释放，这场冤案，若是孙中山的军队早打破了海陆丰，那是不会有的了。

现在湖南衡山农民因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也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大地主兼贩米出口的商人又兼军阀之赵屠户，乘谭军退后，居然调动大军，解散此万余人集合之农会，并杀伤逮捕若干人，这场冤狱，若是谭军不退出衡山，那也是不会有的了。

因此，我们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例如曹、吴的势力不倒，民主政治不能确定，铁路工会和全国学生总会除广州外何处可以存在？

1923 年 12 月 12 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八期　署名：独秀

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

中国此时，在恢复国权上，在发达产业上，都急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民统一的国家。联邦固不妨碍统一，但现在有一班提倡联省自治的人，同时又提倡新西南主义，这明明是想拿联省自治的名义，割据西南几省，像这样消极的保守西南，而不积极的进兵北伐，不是破坏统一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国民统一的国家，是新中国主义，什么新西南主义，什么联省自治，都是割据的派头，都是国民革命之障碍。

在交通一时不易充分发达和语言一时不易统一的中国，主张适当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无人能够反对的，但中央和地方之军政、财政如反〔何〕划分权限，地方的立法权、行政权扩大至何程度，这都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上的问题，决不是旧统治阶级(即前清遗留之北洋军阀)之武装还未解除中华民国还未成立时所应决定的问题。

就将来的国家组织而论(……)若现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军阀之割据的状态，除了扩大实际需要的地方自治权以外，实无改变国家组织之必要。

至于此时有一班人依赖赵恒惕、陈炯明的力量来提倡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理论且不必谈，即在事实上亦未免过于滑稽；因为赵、陈和杨森、袁祖铭、沈鸿英处于同样的地位，一叛曹、吴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联省自治和新西南主义这等主张，以之抵抗曹、吴的武力统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运动之中，此等主张其效果不但使赵恒惕、陈炯明的借口以阻广东北伐之师，且足以乱国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帮助曹锟的功劳，实不在王承斌、吴景濂之下。

1923 年 12 月 19 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　署名：独秀

宪法与自治学院

辛亥革命时，有数军官在上海酒家聚谈战事，旁有一劝酒的苏州女郎说："不要战，脑袋要紧。"这句话当时轰传上海各报，以为可以代表江苏人的温和性质。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只以"不要战脑袋要紧"之故，隋唐以来千有余年，都是很恭顺的以子女玉帛供给战胜者，自甘雌伏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不与之抗。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现在更是全中国顺民的模范。

曹锟贿选，天下多能起兵讨之，独江苏人奔走和平最力；曹锟欲挟宪法以助其统一，天下人多愤不肯承认，独有江苏人张君劢首倡以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之，独有江苏国会议员凌鸿寿等通电赞成之；"不要战脑袋要紧"的民族，他们的见解到底与众不同。

他们这样顺从曹锟，不但脑袋平安，而且有特别的宠遇，请看国立八校经费如此困难的北京政府，居然以七万九千二百元给张君劢办什么江苏自治学院，听说还在国立名义之下，不知道这种自治学院，是否教育部规定的现行学制所有？

他们在吴淞有一个猪仔公学，现在又以拥宪之功来办理自治学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自治！自治！"不要战脑袋要紧"，我们讲自治，政府自然放心。今后自治学院的东方文化声，精神生活声，反科学的人生观声，当比吴淞的猪声更为响亮，因为这些声音都是曹锟所爱听的，和"不要战脑袋要紧"的宗旨不相违背。今后这个自治学院不知道要造就几多"不要战脑袋要紧"的顺民来！呜呼宪法！呜呼自治学院！呜呼"不要战脑袋要紧"江苏人！！！

1923年12月19日 《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 署名：致中

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事，要算

干涉海关收税权

领事裁判权

军舰自由航行内河

纸币直接流通市面

强迫租借领土

这五项最利害。这五项之中，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因为其他四项还是局部的或是一时的，不像干涉海关能够使全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

产业落后国，全靠采用保护政策的关税制，对于和本国竞争的工业品重抽进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品和外品有竞争之余地；对于本国工业需要的原料重抽出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得着廉价的原料减轻成本；如此本国的工业方有发展的希望。

中国海关收税权，操诸外人之手，税务司是必须用外人的，税则是必须得外人同意不能自由增减的，这种协定关税制的结果是：(一)外国货物得以最低廉的海关税及子口税畅销全国，资本薄弱的本国货物又加以厘金之盘剥，那里还有和外货争竞的余地。(二)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如棉花等)，不但不能禁止出口，并且不能自由加抽重税阻其出口，在求过于供的原则之下，本国工业遂不得不以高价的原料加重成本。在这样压迫的协定关税制之下，中国的工业将如何发展？中国工业的资产阶级应感如何痛苦？

中国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感痛苦，一切劳动平民的力与智都不容易得着发展的机会。全国各阶级人民的力与智不亢进之日，便是军阀生命延长之日；民主政治必然建设在人民的力与智之上，人民的力

与智不能取军阀而代之，必然是一军阀仆一军阀起的局面。在这一点，所以我们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比反抗军阀更为重要。

海关主权不收回，固然是全国民的痛苦，直接受痛苦的乃是工业资本家，按常情说，工业资本家对于收回海关运动，当十分热心。

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若起来纠正广东政府只争关余而不根本收回海关税则及用人的主权，我们到十分赞成；他们若是眼见广东政府为关税问题和外国冲突，袖手旁观，甚或表同情于外人，我们便不懂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种什么特别心了。

1923年12月29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期 署名：独秀

中央通告第十一号

——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

广州政府现拟收回海关用人管理权，本属正当办法。乃英人竟因此派兵占领海关，当此英帝国主义进攻最横暴之日，各区及地方同志应即召集全体紧急会议，筹备联络各团体发起剧烈的排斥英货运动，并通电全国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以恢复国家应有之主权。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Leo Dschan-Lung[①]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②]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签名是陈独秀、罗章龙。

② 本文副标题系原编者所加；所署时间是根据文件前后联系判定的。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①

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画，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著著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亦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著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 S. Y. 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淅〔晰〕且

① 副标题系原编者所加。

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D）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制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智〔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抵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澈，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告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Leo Dschan-Lung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①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本文原件未标明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广东战争之意义

这两年来广东的战争，一般人都说是孙陈之争，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前年陈炯明袭击中山先生，倘然是在宪法会议中，明白地拿着拥护地方权的旗帜，反抗中山先生严格的集权主张，那便可以说是孙陈集权制与分权制政见不同之战争。但事实却不如此，陈之攻孙，始终未曾发表与孙不同的政见，而且正在孙军北伐时，攻孙的口号是“请孙下野”、“赞成统一”；这明明是应援北洋军阀的统一，这明明是破坏南方革命之进行，如何能说是孙陈政见不同的战争？

去年陈炯明在东江举兵，正是为沈北军打接应；陈、林、洪各军队都受北方曹、吴、齐经济的援助；石龙得胜时，陈炯明电告齐燮元；褚慧僧君想到老隆劝陈炯明发表反曹意见，到汕头被陈拒绝前往；这些事实，便是亲陈者也不能否认。因此我们以为广东和孙军对敌的，不能说是什么粤军陈军，简直是北洋军阀派来的军队，和杨森在四川、赵恒惕在湖南是一样。因此，我们承认曹吴的兵力已打到了广东东江。因此，我们应该说此时广东的战争，不但是北江，便东江也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之战争，决不是广东内部的什么孙陈之争。

1924年1月9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一期 署名：独秀

内债与军阀

内债这个制度，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中国的内债，大部分是供给袁、冯、徐、段等北洋军阀政府兵费与豢养政客之用，这种内债便是帮助军阀为恶的一项力量，将来如有真正的人民政府出现，应该不承认这种内债，因为人民没有替军阀还债的义务。上海商界三个团体把接济军阀的公债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实在是做梦。拿公债基金的理由来替曹政府反对粤政府收取关余，更是梦中之梦。北京政府向来取用关余做水利、外交等费，你们为何不出来力争说是摇动公债基金呢？

北京参议院有内债暂停抽签之提案，金融界骂议员捣乱，我们却以为北京国会倘真能提出并通过此案，还算差强人意；因为如此一来，可以妨碍奸商们以公债的形式予军阀政府一种经济的援助。

1924年1月9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一期　署名：独秀



致 胡 适

适之兄：

前函言张申府事，据守常说，恐大学以道德问题不便用他。近有人荐之于此间某大学，亦因同样的原因而被排斥。呜乎，旧道德尚有如此威权！闻此间商务印书馆主任某君出缺，兄能否荐申府继任，请示知。

又蔡和森书稿事，也请从速解决，因旧年迫近，蔡君需钱至急也。

弟仲甫白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致 胡 适

适之兄：

昨函言为申府谋商务图书馆主任事，谅已达。前主任已病故，该馆正物色人，倘兄可荐申府，望即以快信达王岫庐君。

蔡稿亦请速解决。

弟仲甫白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

上海是全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工人在数量上居全国第一位，此多数工人中，女工占一半以上，即近世产业为丝厂、纱厂、香烟厂的女工，全体至少也有十五万人。因为种种障碍，上海许多工厂的男工还没有组织，何况女工。现在居然有一个丝纱女工协会出现，这是上海工界一桩可贺的事。我们希望这个协会能有多数真正工人出来办事；我们更希望这个协会不单是发表一篇思想腐败、文字腐败的宣言，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要而奋斗！

1924 年 1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二期　署名：独秀

日本政友会之分裂

日本没有革命的政党，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及宪政党——都是元老之附属品，因此还在半军阀阶级半资产阶级政治的状态中。究以近年工商业前进不已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终有推翻元老政制之必然的趋势；革新俱乐部之组织及此次政友会分裂，便是应此必然的趋势而发生的。政友会分裂，更比革新俱乐部的影响大得多，他的经过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东方社十二日电：政友会已决定不援助政府。又云：政友会开最高干部会，决定对现内阁态度，大启争论，总裁力说断不可支持现内阁。

同社十七日电：政友会领袖中桥德五郎·山本达雄·床次竹二郎·元田肇，四人，已宣告脱党，并从事组织新政党。又云：政友会分离派（居全党人数之半），以脱党之四总务为中心，着手组织新党，约可得议员一百五六十名。又云：新党之主要政策，大约与上院研究会提携而取援助清浦现阁态度。又云：分离派在未组党前称改革新俱乐部，据该部之发表，政友会议员共二百七十九名，分离派已有一百五十七名。床次氏代表该派，宣称彼等脱党，是因为不赞成高桥总裁，当此太子婚期及灾区复兴事业中，反对政府。

同社二十日电：本日政友会在芝公园开大会，出席两院议员一百数十名，为反对清浦内阁之决议宣言后，高桥总裁以一平民资格（本贵族）登坛攻击清浦内阁。同日革新俱乐部亦在上野公园开大会，议决宣言联天下之同志，奋然蹶起，先击破清浦内阁，排元老之干政，然后进而一扫时代错误之特权势力，以确立宪政基础。

同社二十二日电：新政党决定于廿九日举行结党式，已举小本、中桥、床次、元田四人为创立委员，党名尚未定。

分裂后之政友会，在议院虽失去一半势力，而对于现内阁投不信任

票时，以宪政党及他党一百七十人之援助尚可占，小多数。清浦内阁因之让步而辞职，或在不信任案提出以前解散议会，现在还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即议会被解散，政党与元老派之冲突，已为日本政治之中心问题，还要日甚一日，这是可以断定的。现在的冲突已至何程度，看宪政拥护各派恳亲会之态度便可知道。东方社二十二日电：宪政拥护各派恳亲会，于本日开会，出席者一千人，三派首领都出席发言；高桥（政友）加藤（宪政）两氏略谓："须倒政府坚团结，现今宪政已陷于危地。"犬养、尾崎两氏（革新俱乐部）更谓："宜葬元老，勿使拥护宪政运动如戏剧之仅演一幕而终。"

1924 年 1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二期 署名：独秀

致 胡 适

适之兄：

数寄书均未获复，不审何故？

蔡和森兄卧病在床，医药无费，弟不忍坐视其困贫而死，特函求吾兄即将他的书稿函告商务结束，余款早交，使他得有医药之费或可活命。

弟仲甫白

〔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七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

国民革命之目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是以国民主义，对外要求民族的政治经济之独立，对内要求人民政治上的自由。实现这种革命之动力，是各阶级革命的分子之合作；因为这种革命，是全国民的需要与利益；不是那一阶级单独的需要与利益。全世界各国的国民党，都是应此需要而发生而扩大而成功的。中国国民党当然也是同样的性质。此次中国国民党之改组，纯然由于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迫切所促成，这是毫无疑义；若说是因何人何氏所主张所鼓动，乃属皮相之论。

共产党之目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是以革命的手段，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改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实现这种革命之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及贫农的革命分子，决不是各阶级可以合作的，尤其不是劳资两阶级可以合作的；因为共产革命正是劳资两阶级间的争斗，而以颠覆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目的的。

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目的与动力都截然不同如此；而中国共产主义者既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也允许他们加入，这是什么意义！这种意义，在世界的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知道革命的势力不可分；知道国民革命应该各阶级合作；知道列国中能表同情于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者，只有真能主张公理的共产派。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知道必须世界被压迫的劳苦阶级革命（共产革命）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革命（国民革命）联合进行，才能够推翻世界的压迫者；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客观的条件上，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是目前的可能。

这种情形，不但中国这样，土耳其、印度、加哇的共产党无一不是这样；这差不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通则；所以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意义，在有世界知识的人看起来，原来不会发生什么

疑问。

此次国民党大会后，社会上有两种误会：(一)是国民党赤化了，(二)是共产派利用国民党做共产主义的运动。

国民党此次发表的政纲，对外六条，对内十六条，条条都是国民主义，没有一条否认财产私有权，没有一条否认一切外债，没有一条否认资本家的选举被选举权，连大地主的所有权都没侵犯，连唐代条田的政策都没有采取，不知道赤化的证据在那里？若说国民党章程采用了委员制是赤化，那么，国内外采用委员制的公私团体多得很，例如最近之上海商界民治委员会，难道都赤化了吗？

至于说共产派之加入国民党，是想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运动，那真是妙想天开了。上面说过，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目的与动力都截然不同，共产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够利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来做阶级争斗的共产运动？共产革命，这一个意义异常严肃，是要靠无产阶级(近代产业工人及农村无产贫农)中革命的分子为动力的，不是随便瞎拉些人可以混充可以乱来的。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当然不免而且应该包容许多大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内；共产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这班资产阶级，来做共产运动，来革资产阶级他们自己的命？共产派如果这样头脑昏瞶，他们还懂得共产主义是什么？他们还懂得共产革命是什么！

我们希望党内党外的人，对于共产派加入国民党，有一个明了正确的认识，因此不得不重说几句：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乃是因为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决不是因为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运动而加入的；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动力，都截然和国民党不同，是断然利用不来的。

署名：陈实庵

1924 年[1]

选自《中国国民党讲演集》 1927 年 10 月版

---

① 据本文内容，这次讲演时间，当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不久。

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

中国人民有两个仇敌:第一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是北洋军阀,后者比前者真算不得什么。

此时我们中国人对于军阀已认识他是国民的仇敌了,而对于比军阀更是仇敌的列强还没有明确的观念,我国民的感觉是何等迟钝呵!

一般劳苦平民,原始的民族观念是有的,而对于列强近代式的侵略,只感觉其如此,而不洞悉其所以;至于属于知识阶级的士大夫,一部分丑物自以为不是野蛮的义和团,却变成了媚外的奴隶;一部分有良心的自然也痛心外患,但以为这乃是内政不修军阀政治召来的,现在只应专力推倒军阀政治,有了民治政府,外患便自然退减,此时不宜兼攻列强,多树敌人。

有良心的知识者这几句话,表面上似颇有理,其实十分错误。我们第一应该知道:列强不是靠军阀而存在,军阀却是靠列强而存在的,前次英国之助袁世凯,日本之助段祺瑞,此次美国之助曹锟,这都是显然的事实;欧洲中世的诸侯王何以肯低头于市民,因为政府财政不了,非向人民拿钱不可;现在中国的军阀政府恃有洋债可借,不必低头求教于本国的资本阶级,所以不把舆论放在眼中。因此,我们以为不打倒列强的侵略,中国军阀的势力是不会倒的,因为列强是军阀的靠山。我们第二应该知道:推倒军阀是要人民有充足的力量才行,决不是利用一个军阀打倒一个军阀可以投机成功的,至于民治政府,更不待言必须建设在人民的力量上面;此时在列强势力支配之下的中国,他事且勿论,宰制全中国人经济命脉的协定关税制一日不废除,中国的工业一日不能自由发展,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即一切劳动平民的力量又何从壮大起来,以如此力量幼稚的国民,又何能推倒军阀建设民治

政府？因此我们以为不打倒列强的侵略，是不能推翻军阀建设民治政府的，因为列强是抑制吾人推翻军阀建设民治政府的力量发展之唯一魔王。

依据以上的事实，吾人欲救济国家之危亡，欲获得政治上的自由，欲发展自己的经济力，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都比反抗军阀更为紧要。我们须认清我们的仇敌，比军阀更甚的仇敌，便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列强！

英、美、法、日在华盛顿会议已商定了由各国单独侵略变为共同侵略的所谓四国协定，去年即在中国开始实行了。兹将过去一年(一九二三年)中列强对我连续不断的侵略与暴行条列左方，以告我善忘之国民：

(一) 张家口克门案　美国商人克门及美国驻张家口的领事索克宾，为中国奸商保镖，由张家口驾汽车偷运现洋六万元出境，行至西沙河地方，中国守卡兵士照章要求检查，克门竟向兵士开枪拒绝检查，连放二枪，兵士还击，中克门肩部，回京死于医院。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三条件：(一)张锡元都统向美领事谢罪；(二)张锡元以下的军官革职永不叙用；(三)恤金五万元。结果一、三条都照办，第二条办了一些军官与兵士代替了张锡元。

(二) 汉口棉花工人案　一月十日汉口英商隆茂棉花工人因工人二三百为组织工会被开除，代表三人被捕，包围英租界捕房，英捕房竟召集大队武装义勇队，向工人开枪轰击，工人王成头部受重伤，受棍伤者二十余人；英人复召集海军陆战队，布满英租界各要隘，向中国街架设大炮机关枪，准备轰毁中国街市，武装汽车满街奔驰示威。英界军警不但不分皂白，随处殴打棉花工人，连中国体面商人亦多遭其毒打。结果还是：捕去棉花工人三十三人，由英领事判决三个领袖监禁四五个月，其余三十人亦监禁一两个月。

(三) 金佛郎案　庚子赔款，据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之协定，明明说："所有应还各款，按照以上所载办法，将和约关平银依照各国金钱之价核定，中国或按伦敦市面银价用银付还，或以金钱期票，或以电汇票，均听各国所愿。……"并无须付生金之规定。同日各国又曾分别选定

协定文中三种付款办法之一，通知中国外交部，计法、比、英、美、荷、意六国选定按照各该国之币用电汇法付款，日斯巴尼亚国选定暂时按照伦敦银价至一九〇六年用期票付款，日本选定按照伦敦磅价用电汇票法付款；此项选择付款办法，曾经明文约定，继续有效，至赔款付清之日为止。自一九〇五年订立协定以来，如约实施，从未发生异议。乃法、比等国以纸佛郎价格低落，忽强欲中国照金佛郎价格付款，中国若应此要求，其损失约在七八千万元以上。以英、法、美、比、意、日、荷兰、日本八国共同对我示威，黎曹两政府均有承认之意，只因国会强硬反对，故未决定。

（四）旅大案　日本继续俄国权利租借旅顺、大连湾，今年期满，理应交还中国；乃日本藉口前次强要中国承认而未经国会通过的二十一条件中有期满续租之要求，不允交还，虽经政府及人民迭次抗争而无效。

（五）上海乐志华案　宁波人乐志华，在上海某洋人家当西崽，主人冤他偷洋八百元，骗他到巡捕房，严刑拷打，打死三次，第三次醒后，又将他临空吊起，用纸捻插进他的鼻孔，纸捻一头点起，火烟直冲心肺，急汗与眼泪并出。西探说："你若不肯招，必定打死你，我是老上海，打死个中国人，有什么稀奇！"随后又放下来，乱打重压，压得晕过去，醒转来，又用冷水浇身，如此又死去醒来若干次。后来这种悲惨的冤案，传到宁波人耳中，宁波会馆出来替乐志华在英按察使署提起诉讼。其结果：英按察使及陪审员一面以伤证确凿不得不承认乐志华伤残系出于虹口巡捕房，一面却宣告两个被告的捕房西探即亲手拷打乐志华的加布德和鲍尔庆无罪。

（六）临城案　津浦火车行至山东临城地方，被土匪劫去华人一百余、洋人二十余，英、美、法、日、意等国公使团立即共同向北京政府严厉的责问。美国在华商会主张停止华盛顿会议所予中国一切利益，监督财政，全国水陆交通要隘派外兵驻防，停止退还庚子赔款；法使提议即时扣留关盐余，续索庚子赔款；葡使要求设立护路军由使团监督；意使主张援庚子例联军入华；英商藉口此案谋占天津旧德国租界，又主张各铁道由外人办理警务；日本报纸则主张要求黎元洪亲赴临城议和；一时

列强对中国态度,简直和庚子年一样。外交团正式提出之要求是:(一)每人赔偿八千五百元;(二)特别编制护路警队,管辖于外国军官之下;(三)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津浦路局警务处处长张文通、第四次快车警察长赵德昭均免职,永不任用。其初北京政府的阁议对此通牒还有人说:"田、何免职事关中国用人行政之权,特别路警关系中国主权甚巨。"随后曹锟贿选成功,想求公使团承认,公使团表示以应允临城案要求为交换条件。曹政府遂覆牒承认:(一)关系赔偿,愿照来文所开甲乙丙三项办法;(二)关系惩罚,田中玉、何锋钰均免职,张文通、赵德昭均撤差;(三)关系路警,本国政府自动改良护路计划……聘用外国专门人才以资襄助。

(七) 淞沪共管案　上海领事团会议,根据华盛顿会议开放门户主义,请公使团向中国政府要求将上海公共租界自杨树浦以上至吴淞口,为中、英、美、日、法、比各国共管区域,在此区域内所有港务市政,由各国各派委员组织机关,共同管理。

(八) 棉花出口案　近年棉贵纱贱,国内纺纱业纷纷停工,纱厂商为减轻原料成本维持产业计,呈请政府禁棉出洋,当由北京政府照准施行。乃外交团援据条约所保障之土货购买输出权利,向政府抗议禁止棉花出洋,政府遂取消此项禁令。

(九) 查封学生总会案　上海法租界查封全国学生总会前后共三次,后两次都在去年。去年三月全国学生总会开四届评议会时,适值金佛郎案吃紧,学生会起而反对,此事正触犯了法国人,法领事遂将总会查封了。但这回查封还只是下去一块招牌,事实上机关仍存在;到了双十节,学生会散放传单,反对英人不肯退还威海卫,法捕房遂严厉的查禁学生会不许在租界内存在。

(十) 成都英教士逞凶案　五月十二日成都高师附中学生巫绍柏、陈道炎与华西大学附中学生赛球散后,突有英教士白明道自华西大学奔来,凶殴巫等,巫胸部头部均受重伤,制服扯破。成都学生开会要求华西校长命白教士向巫谢罪,华西校长竟以白教士有神经病拒之。

(十一) 日本水兵逞凶案　五月日本等军舰的水兵在沙市惨杀排

货学生案还未了，六月一日又开到长沙，以武力阻止中国学生检查日轮搭客，枪伤市民四十余人。一个小学生偶在日本领事署傍河边游玩，忽来几个日本兵，极力殴辱，将他带到领事署，诬他割断了船上的绳，强迫他认供；赵恒惕派交涉司科长去交涉，也被日本人毒詈一顿，并强迫他在小学生的供词上签字。

（十二）大来案　宜昌王汝勤军队里有个刘副官，因为酒醉滋事冒犯了美国大来商轮，美国在长江的海军司令飞尔卜竟将刘逮捕监禁起来，要求王汝勤应允将刘立时在江岸枪毙；王不允，彼竟不肯将刘交出，挟至汉口，向萧耀南为同样的要求。同时汉口美国领事也说奉到公使训令，要求将刘副官立刻在领事面前枪毙。此要求虽未照办。刘已判罚四年以上的徒刑，美使仍未能满意。

（十三）美兵逞凶案　美国兵在天津无故枪杀滦县人张学书，在上海打死人力车夫孙汝卿，在北京打死人力车夫李廷元，都白打死了。

（十四）威海卫案　本应无条件交还的威海卫，英人勾结汉奸梁如浩，订了一个继续租借并且是永远占领式的草约，其中最丧失国权的是：(一)第一条说："兹由英国政府交还中国政府接收，应划为管理专区并由中英政府特派行政长官管理之。"(二)第二条说："英政府允将刘公岛中国前有官产房屋等，一并交还中国；因此中国允将刘公岛内照单所开之房屋等无价借与英国海军作养病休息之所以十年为期，将来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并得以按照原定条件展期续定，俟两政府同意将此项供用终止之时，所有房屋等一并归还中国。"(三)第三条说："刘公岛应由中英海军各派一人组织一会以备顾问。如中国政府将刘公岛自行开放通商及准外人居留，不作海军根据地时，除本协商意见书所规定外，关于商埠市政应归并爱德华码头之市政管理之。"第十二条说："在威海卫内，现名爱德华一区由中国维持，准万国通商居住，作为自治区域，内设一董事会。"(四)第四条说："中政府在刘公岛为英政府备款浚凿加深抛锚处所之一部分，不收价款。"第六七条说："英国海军每年准在刘公岛登岸操演打靶；英国海军军需品准自由输入存储转运。"第九条说："英国军舰得由刘公岛抛锚处所，拖靶至海外操练。"照这个草约等于不交还，英国人未免太把中国人当做小儿玩弄了。顾维钧说："如欲共管案

和缓，须先对威海卫案让步以和缓英人之情感。”

（十五）纸烟捐案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所售的纸烟，只一小部分是从英美运来的，其大部分是用中国烟叶雇中国工人在上海、汉口等处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无需进口税，只照条约出一点子口半税，大批运到各省，各省的关卡厘金都不能向他抽税了。此项纸烟行销全中国虽无确数，照杭州总商会的电报，浙江每年销场竟逾千万，以此推算，每年销耗当在二万万元以上。八月间浙江等省政府拟设局征收地方纸烟捐，英美公使向北京政府抗议，北京政府遂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此项地方纸烟捐。

（十六）中东路地亩案 中东铁路所用地亩，本是旧俄时代用强力所占据，除迫令吉黑两省与之订立展地合同明定的数目以外，还强占了二十余垧。俄旧党盘据该路，凡沿路地皮，经华人呈领者，所索租价比俄人要多十倍，且每因勒索不遂，即以命令强迫华人拆屋，去年拆屋风潮竟有十余次之多，被害华人竟至一千四五百户，因此，沿站商民向本国官厅请愿收回此项地亩。新俄官场对于中国接收管理此项地亩，并不反对，却是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勾串俄旧党首领出来反抗，并且唆使哈尔滨之领事团，将中国官厅接收东铁地亩处之文卷概行查封。

（十七）长江联合舰队案 驻泊长江之英、美、日本各国海军军舰，曾于三月间，联合开会，讨论组织长江联合舰队特别警备方法，议决后，由驻京英、美、日、法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意见，以外部反对未有结果。八月间大来案发生，又因川军枪杀及逮捕为吴佩孚运送军火之日本宜阳丸船员，日美两国海军司令乃重提旧议，开会议决组织日、英、美、法联合长江警备舰队，其组织方法，将最近驻泊长江之英舰十一艘、日舰十艘、美舰八艘、法舰六艘全数编入，公举警备司令官一人，统率指挥。同时美国海军部以巨舰不便深入重庆、长沙等内河，特造浅水兵轮六艘。又拟由檀香山调鱼雷艇二只、小舰二只，均加入联合长江舰队。随后又加入意大利军舰二只，由美国舰队司令官代表各国到北京，将上海各司令官之意见陈述于外交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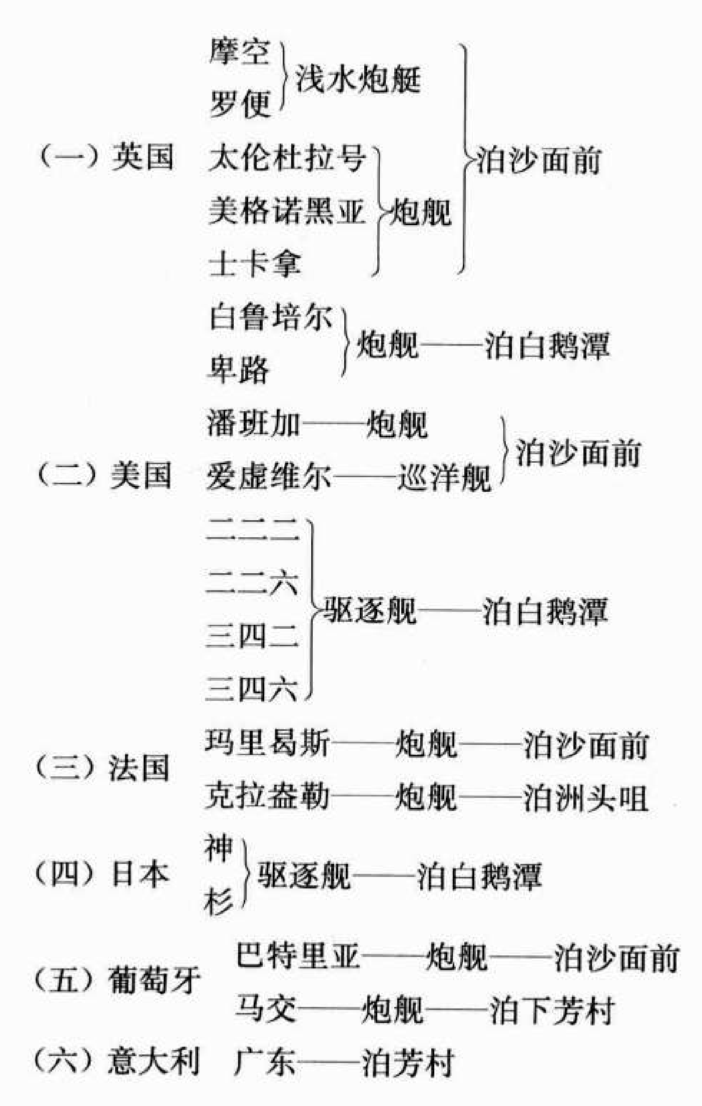
（十八）美侨会议案 上海美国商会召集美国驻华各埠之商会，于

十月十六日在上海美商会开联合会议，列席代表十一人共代表五区：上海大来(大来行)、来门(美孚行)、开尼帝(茂生行)、蓝尼(慎昌行)、非阿门(怡昌行)、伟黎(美国保险公会)、鲍威尔(密勒评论周报)，天津福罗士，北京申门，小吕宋答尼，哈尔滨汉得生。议决案凡十四，其中重要的是：(一)不承认中国征收纸烟捐；(二)要求美政府将华会中所许撤消在中国治外法权案无期延期；(三)对于增加在华海陆军队认为必要，须立即建造浅水兵轮四艘至六艘专为警备之用；(四)深愿美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协作得由外人管理路警，并对于中国国有铁路应由外人组织一技师部实行协作；(五)长江巡弋舰队司令官，在中国建功甚多，请求美政府准予联〔连〕任，俾各国组织长江联合舰队得资熟手；(六)控制中国海关税；(七)干涉中东铁路。

(十九) 疏浚苏州河案　苏州河属中国内地，上海商民主张由中国人自力疏浚，而外人勾串中国官厅(上海交涉员及江苏省长)硬要归浚浦局代浚。按浚浦局乃由条约产生之疏浚黄浦机关，以五国驻京公使推出之五顾问为骨干，以五国驻沪领事及驻京公使为后盾，此为既失之主权，若苏州河再归该局代浚，则管理苏州河之主权又将随之而去了。

(二十) 排斥华人领港案　本国船用外人领港，本是因为一时人材不足的特例，前清同治七年政府与外人订立引水暂行章程，正由此特例而起，故章程上有“暂行”二字。行行日久，未能改正，以致华船领港被外人占据殆尽，更进而有不许华人领港之事。十一月间，有姚方文君驾领大来海轮由吴淞到浦口，竟有洋人纠众干涉其行使职务，声言“华人不许领港”。因此全国领港公会在上海会所召集全国各口华人领港会议，到有代表八十余人，一致主张“恢复华人领港权”。

(廿一) 广东海关税案　广东政府主张广东海关关余应归广东所有，不应为北京政府利用之以打广东，故令饬税务司缴出历年所应缴之关余于广东政府，并拟税务司如不照办，则撤换另行委任。驻京英公使据驻广州总领事及海关税务司之报告，遂请北京外交团调遣六国军舰二十只，进泊珠江，向广东政府加以恫吓，武装英兵且在沙面登岸，并扬言广东政府如果撤换税务司，即派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关。各国军舰如下表。



最近香港英官方面，以广州市民示威运动之激昂，恐酿成排斥英货举动，主张和广东政府妥协，而北京之公使团，尤其是英美公使，则态度依然强硬。

（廿二）汉口田仲香案　汉口俄租界日商本多洋行厨役华人田仲香，于十二月二十日被该行诬窃表链，先打断田臂，又送日本捕房，用毒刑拷打，用麻绳痛绞，次日因伤致死。日捕房通知洋务公所会审员杨培往验，杨见田伤痕遍体，多数华工往捕房质问，又被武力驱逐，日本领事且派义勇队消防队武装上街示威。于是汉口市民大动公愤，由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召集市民大会，提出条件，要求官厅向日本总领事严重交涉。

除以上所述二十二案以外，更可怕的是商业的经济侵略，每年进口货价超过出口货价总在三万万两银子左右；赔款还债又复流出巨额现

金；如此，中国安得不穷，穷极安得不乱，乱起来安得不穷上加穷？我们中国这样穷而乱又复乱而穷因果循环的困苦，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厚赐，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帝国主义的列强（英、美、法、日）是我们的第一仇敌，比军阀更毒的仇敌！"

1924年2月1日　《前锋》第三期　署名：陈独秀

寸　铁

精神生活东方文化

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以为极则，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幼稚。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三万万人不认识我们这倒运的象形字，还有何脸面来高谈什么东方文化！我们若把精神生活当作神圣，把物质生活当作鄙陋，个人贫苦事小，一群贫苦事大；不但贫苦而已，而且因此辜鸿铭一班人，硬说中国人不爱清洁正是重精神轻物质的美德。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思想、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

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须我们努力砍伐)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更有一位浑沌不过的浑沌先生他在《东西文化到底能够融合吗》那篇论文(见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里说："梁先生不知道中国化是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而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变迁了。""虽然在大都市里与知识阶级里有禁不起西方化的诱惑而投降的，但在大部分的农民，仍旧勤恳地种着田，纯朴而且自然，仍旧无思无虑的过那孔老的生活，一些儿没有变动，只待西方化、印度化来到他们的中国化面前低头。"他又分析东西文化不同之点是：西方人全靠自己的力满足欲求，印度人全靠神的力满足欲求，中国人没有欲求。这位浑沌先生真算名称其实了！他有何证据断定中国人没有欲求？由古之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一直到今之饮食、衣裘、车马、客室，不是欲求是什么？他怀着西方化来到农村向中国化低头的幻想，他不看见西方化来到中国农村驱遣无数农民去而为匪为兵的事实！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的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文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这位浑沌先生还做着梦说："一些儿没有变动。"我不知道梁漱溟先生也认他是走一条路的同志吗？

国　学

曹聚仁先生说："我们的社会，毕竟建筑在东亚大陆上，社会中各个体，毕竟要受旧文化的影响，一切思想决不能离了历史独自存直的。"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他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古董学问，纯粹是把他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尤其是在社会学与考古学。但是用这样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称他为"国故"或"中国学"，而不可称他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

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夷场上的农村立国

注意农业和农村运动，在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不但是中国。但章行严所谓农村立国，不是这两个意思，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行严高车美食的在夷场上提倡农村立国论，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他自己也曾认过错；更奇怪的是他近来忽然登报发起集资十万元办《甲寅》周刊。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在欧美大工业资本社会原不算什么，连工业后进的日本还不配，何况中国；行严君所理想的农村立国的社会，比现在中国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简陋的社会，是否有此穷奢极欲之需要可能？行严君之行如此矛盾，简直是神经错乱！

圣人也得崇拜商品

古物固然应该保存，但未必定要把藏经佛像等，由陕西卧龙寺，搬到上海康有为家里，才算是保存吧？天冷了，圣人自然也须穿皮袍，但未必有向陕西官厅索取八十件皮袍的需要吧？康有为何故如此，这是很容易解释的。皮袍八十件，尤其是藏经唐佛，一到上海便是重价的商品，圣人得此，以后便可以只忧道不忧贫了。这位康圣人不但及其老也如此，他壮年在美洲在南洋也是如此。我们似不必专以此菲薄他，这不全是他的罪过；因为圣人也免不了衣食住，“忧道不忧贫”这句话，不过

说着好听，其实没有这回事。我们也不是说康圣人这种行为是正当可以取法，不过以为在商品崇拜的社会里，虽圣人也未能免俗，这是毫不足奇的事。因此，我们更相信社会制度可以左右个人的意识，个人的意识不能左右社会制度。因此，我们更希望圣人之徒梁启超、张君劢等，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或宋儒道学足以救济今之世。

1924 年 2 月 1 日 《前锋》第三期署名 独秀

列宁之死[1]

列宁死后，世界新闻杂志都纷纷评论他的为人，我现在所要说的，不是评论他，乃是讨论他的存殁和俄罗斯革命之关系。这一点，在各报评论中，或不视为重要，或语焉不详；其实这种讨论，关系思想界甚大，在这短篇文中虽不能说得很详细，我觉得有略略说一下之必要。

关于这件事的讨论，有两方面之误解：(一)是唯心派之误解；(二)是机械的唯物论之误解。

唯心派素来把历史变动之唯一原动力归到个人意志之伟大，因此将俄罗斯革命事业，无论功罪是非，都当作列宁个人的事业，因此列宁死了，他们便以为俄罗斯革命将随之寿终(即苏俄瓦解之意)。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历史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农工大群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之拥护；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他们不明白苏俄之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地位，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所以这派人的想像，是和事实不符的。

然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的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这是我们所相信之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之点。列宁生前在革命中的成绩，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死后，在新俄建设及世界革命中的损失，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的。人造的历史和机

---

[1] 1924年3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学学生办的《孤星》旬报第4期《追悼列宁专号》上亦刊有此文。

械的影戏不同，我们决不可陷于机械的唯物之误解，说列宁之生死存殁和俄罗斯革命事业绝无影响。

1924年2月2日 《中国青年》第十六期 署名：独秀

致胡适

适之兄：

尊意已由孟邹兄转知。弟朝朝所遇烦恼之事，未必减少于兄，乃以“顽钝不理”四字克服此环境，故尚少心绪不宁的现象，不知吾兄亦以弟话为然否？

蔡稿求兄早日解决，因其需款至急，弟曾为贷款二百元，若稿款久不来，弟亦陷此困难涡中也。

《努力月刊》不知何日出版，望示知。弟须答复张君劢一文，若《努力》出版尚无期，拟载之三号《新青年》也。

弟仲甫白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陕西农民的困苦

去年上海《新闻报》渭南通信云云：驻防渭南之二十师四十旅，自旅长孙积孚令其侄儿孙秉文充任县知事以来，百般苛敛，大施搜刮手段，该旅在正饷以外，每日向人民并索取麦子三十石，银洋三百元，时向人民要车辆，拉牲畜。近因招收戚友，在渭讲武，无房可容，乃派兵下乡采伐树木。该兵士每遇树木，不论大小，不问曲直，辄呼木工采伐，有赂以银元者，则转而之他，否则掠伐以后，强其送县，大烟茶膳，且要树主供给。前因河南土匪猖獗，急欲出关，又向人民索取开拔费二万元，名曰借款，实无归还之望。此款收清未几，又以阳历年关难渡，复派出六万元，限八日交齐，令出之日，即派军队出乡勒收，全邑顿现阴惨之象。统计每亩之田，出款已逾十三四元，兼之岁歉民贫，无法支持，不得已发出鸡毛传单，一日夜即传遍全县，乃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县人民，无大无小，各携农具，直奔县城而来，知事闻知，即协同团局、差局、教育局、商会、诸绅士，出城劝谕。当由人民要求一不支差，二不出款，知事一一承认。有田德全者，自居绅士，强作调人，甫说“那末准其减轻数目”，即被众人一拥上前将头打破，知事吓倒在地，忙向众人叩首，口呼一概豁免，几不成声。旋闻兵士开枪，打死人命，知事始匍匐入城，紧闭四门，只站在城楼向众农人说话。农人虽被枪击毙一人，受伤十余人，农众仍争先恐后，兵士无法，只得闭门固守。不意闭门之际，适将某排长闭在城外，众农民群起追击，某排长逃之敏捷，始免于难。后经知事百法劝谕，始于二十七日黎明散去。

本日〔月〕十五日《新闻报》上有一段新闻说：陕西东道渭南、华阴、华县各地驻军二十师及镇嵩军，年来想尽方法，敲剥百姓，去年岁尾，该数县人民被逼无奈，相继携锄持耒，赴县交农器罢工，大起风潮。该驻军与县官不惟不设法消弭，且恃兵力，强迫弹压，结果枪杀乡民数十人，

风潮遂息。兹据陕函云，华县居民今岁过年(阴历)以前，实有不堪受之苦况，驻军杨团长与县官狼狈为奸，乡间每日之横征暴敛，约分三种：(一)由粮差催截民国十四年粮银，(二)由值年(即红名子)催纳临时差徭(腊月十五日出示强派)，每石土粮大洋五角，(三)由各里民团代催烟亩罚款(共派一百六十四万元)。乡里每日差吏兵士，往来叫嚣，人民敲骨剥髓，应接不暇，而县城中现又与商号派捐大洋五万元，商民不得已，罢市数日，现为势迫，强逼开门(正兴东天祥公等字号各派五百元)，不然，则以封门查抄为威吓，此民国十余年来未有之奇祸也。前次值年在城隍庙算帐，今年四十三里差徭已出过十九万有奇，兼到腊月，又加征每石粮五角，共计银二十四万元之谱，但所有一切军用车马，仍是由民间支应，真可谓双管齐下，民不聊生。惟于此有至堪痛恨者，军队官吏如此虐民，而为其供奔走献地图者，乃系本地各机关之绅士。此辈夤缘爱钱，无恶不作，如军队县官每有苛派特捐时，必恃此辈为向导，每有事则必先以酒食飨此辈，少予颜色，则将本地城乡商民谁富裕谁贫乏，尽情献之，官军按图而索，无不如意。且甚有挟嫌诬陷，故以少而报多，威权之下，往往于卖妻鬻子破产亡身者。

由这两段新闻，可以看出陕西农民的困苦到何程度。并且在后一段新闻里可以看出农村的劣绅，其罪恶与军阀官僚相等；在前一段新闻里可以看出农民自救，只有“聚众反抗”这一条路。

1924 年 2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三、五十四期 署名：独秀



日本之政局

日本贵族派的内阁,居然不待不信任案提出,不答议员质问,仅以议场扰乱之故将众议院解散了,这是贵族派给政党之最后通牒。日本众议院被伊藤内阁解散三次,桂内阁解散二次,松方内阁解散二次,大隈,寺内,原内阁各解散一次,今为第十一次之解散。从来解散众议院,都不像此次仓卒不循程序;从来解散众议院,都多少基于政府与议会间政见不同之结果,独此次是单纯的由于贵族院之研究会与众议院之三政党争政的结果。众院解散后,各派诘责政府的文电,运动倒阁的集会,日有所闻,宪政党公表倒阁宣言,但是最后的胜利怎么样呢?我们以为:若是政府让步,三政党马上自启纷争,结果仍是贵族派的胜利;若政府不让步,三政党只争之于总选举,亦难免失败。因清浦内阁行事已不顾什么宪政法治的假面,任意的以政权金力干涉选举,这是意中的事。三政党虽都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及舆论之后援,而日本此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都还缺乏革命性,现在他们要想向武装的贵族夺取政权,那是不可能的事。

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党,要想向武装的贵族夺取政权,只有放弃议会行动,放弃一党的利益,联合全国的劳农兵士,以六千万平民,对于九百贵族做革命的行动,才能够得着最后的胜利。若死守着议会行动,今日倒这阁,明日倒那阁,倒来倒去,贵族阶级的武装不解除,终于不容资产阶级的政党得着政权。你们若以英国议会政治藉口,你们要知道:英国的议会政治,不是在议会内的议会行动得来的,而是在议会外的革命行动得来的呵!

1924 年 2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三、五十四期 署名:独秀

北洋军阀三种新借款

英美帝国主义者，素以放债的方法，一面攫取中国的利权，一面扶助军阀压革命派断绝中国改进的希望。曹锟贿选后，反直派没有何种动作，英美帝国主义者放债的方法又来开始进行了。日来直派进行的借款计有三种：(一)是北方三路借款，(二)是武昌市政借款，(三)是洛阳至汉口长途汽车借款。

北方三路：(一)天津、赤峰间，(二)烟台、潍县间，(三)京汉、津浦间即沧石线。据上海《泰晤士报》说：此三路借款，先由英商汉兰宝公司与中国方面之发起人，共同草订建筑合同，且已得交通部之许可。此项筑路计划，由汉兰宝公司借款一千万金镑，据闻伦敦之中英投资有限公司已担保付出此项借款，三路共长八百英里。据最近消息，沧石合同、烟潍合同都已经曹锟代表签字，赤峰天津线亦由华商签字，一俟中政府批准，即行交款。

武昌市政借款，是萧耀南委派英国陆军中佐麦德格，代表湖北省政府，向英商借款五千万元，建筑武昌商埠，以预计之市政收入一千二百十万六千元(地税五百万，会铺捐一百六十万，车捐十二万，码头捐二十万，营业捐二百万，肥料捐八万，戏馆捐六千元，酒楼捐十万，杂捐十万，不动产登记税一百万，奢侈税一百万，电灯六十万，电话二十四万，公市场六万)为偿还本息之担保。此项借款去年即开始进行，阴历年底成立合同十二条，现已提交省议会。

洛阳至汉口长途汽车借款，是吴佩孚派军需课长刘子青，向汉口美商借款一千万元，为建筑洛阳、汉口间汽车道路之用，路工完竣，一切收入均归该美商保管。

中国军阀借款筑路开矿，一切所谓实业借款，都不过是个名义，事实上都用做军政费。这次北方三路借款明明是英国人救曹锟之急；军

阀们梦也想不到市政问题，所以武昌市政借款，不但市政用不着，连萧耀南恐怕也不能多所染指，大部分还得供给吴大巡阅扰乱川粤的军费；至于长途汽车借款，那更不用说了。

1924年2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电报电话借款之秘密

民国七年四月与日本汇业银行所订电报借款合同,及同年十月与日本中日实业公司所订电话借款合同,五六年以来的秘密(曹汝霖卖国的秘密),此时才发现出来。电报借款合同计十二条,第一条所载借款额是日金二千万元;第二条所载借款期是五年,期满协议续借;第八条所载本息担保品是民国政府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电话借款合同计八条,第一条所载借款额是日金一千万元;第三条所载偿还期以三年为限,到期得按原定合同继续转期;第四条所载担保品是:(A)交通部所管理之各电话局及各长途电话现有及将来扩充后全部财产,(B)现在已设立之无线电台:吴淞、武昌、福州、张家口、北京六处及□收入,(C)价值日金五百万之国库证券。第五条还说由交通部于现在雇聘之日本技师及顾问中指定二人,分别助理技术会计等事。

此秘密发现后,国人当然不胜惊异,最奇怪的是卖国贼曹汝霖以还三千万日金之故,不惜断送全国国有之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及电话等极其重要的军事交通机关于外国。不但现有的断送了,并未来的都预先断送了。

在此秘密发现的同时,交通部又正进行沪、宁间长途电话工程(交通部特派员周家义及电政司营业科科长陈锡周,正在勘测路线,树立电杆),遂引起江苏省县各团体之反对。其实不止沪宁一线,洛郑间长途电话也在进行,天津、汉口又何能免。

我们应该觉悟:这种损失全国交通主权的秘密合同,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反对,决不是江苏一省的事。

我们又应该觉悟:这件事决不是向北政府或地方政府电报抗争所能收效,必须有实力对付方法,江苏人士可以抛弃和平运动、宪法运动的迷信了罢!

1924年2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新疆省之煤油矿

二月十九日上海《大陆报》说："英国工程师铎克莱少佐，前二年中曾在新疆为马可尼公司建筑无线电台，现已回国与英之煤油公司商议开采新疆绝大之油矿。铎氏曾于数日前自京来沪，迭与上海三大煤油公司商议此事，闻三家已电商英、美总公司，派矿冶工程师、地质学家及运输业专家，前往新疆查勘。据铎氏言，就其个人及俄国著名采油家某氏计算，新疆油矿广及数千方英里，且与世界著名之巴库油矿相衔接。矿已在阿克苏至乌鲁木齐之间，中间包涵库车、叶克、库尔勒等地；其间小河、池、沼水面俱有油迹，且随地都有油苗痕迹。"

二十日《大陆报》又说："美国财力最雄势力最厚之矿业资本团之三古根罕公司，及日本最大财团三井会社，现均注意于开发新疆之富源。三井方面早经其驻京代表向中政府试探，欲取得新疆之油矿权。古根罕公司系兄弟六人所合组，每人均为美国经济界有力分子；此兄弟公司向来专开发美国、墨西哥、智利之铜、铅、银矿，近复注意远东，闻已组织工程师及地学家团体，不久即由旧金山来上海，转往新疆实地调查，该公司之急急进行，殆即为铎克莱少佐赶往英伦接洽所促成。"

煤油在现代居最重要的地位，陆上之摩托车，空中之飞行机，都非用煤油不可；又如铁道、海轮，也有以油代煤的趋势；工业机械及农业工具，将来需要煤油，犹未可计量；因此一国能否在产业上、军事上占最优势，当以能否占有世界上最多量煤油矿而定。

美国煤油出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然犹供不应求，为防患未然计，势不得不与他国为油矿之竞争；其争最烈者：在土耳其，与英国有美索不达米亚境内摩塞尔油区问题之冲突；在波斯，有美孚、新克来两公司之争夺；在俄国租借库页岛油矿，是和日本一大暗斗，新疆油矿中国倘不能自保，又将为英美日三国之争端。

1924 年 2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卷烟特税问题

军阀官僚们对商民横征暴敛，商民当然应有正当的反抗。此次江浙两省举办卷烟税，他的用途固然免不了黑幕，商人反抗固然有理由；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两件事：

（一）协定关税制已制吾国工商业之死命，然洋货运入内地，华货相离之后，通过厘卡之子口税已失效力，中国官厅还有征收营业税落地税之权。此次江浙征收之卷烟特税，不但是洋货相离之商业税，而且卷烟多在中国制造，洋商从租界制造厂运入内地，不由轮船火车，不但不纳进口关税，并子口半税也即行避去，所以江浙征收此项卷烟税，外人绝无干涉之理由。北京、南京、杭州方面都有对外交涉的事实，这是明明自己承认除海关税协定外，日后国内一切税捐都须与外人协定，岂不将国家收税主权断送干净。无论外商允认百分之二点五或百分之五保护税或附加税，我们不能取消此烟税，即照官厅原案允认百分之二十，我们也断然不能开此内税协定之恶例，所争者在外人干涉内税之性质，不在他们认捐之数目。这一层希望中国商人不可助外商张目。

（二）此次江苏征收卷烟税，乃经商联会建议省议会议决，专充省教育经费；若有方法保证不移作军政费，奢侈品若卷烟税，虽值百抽二十，也不算多，担负的人将来还是消费者，于烟商并无损失，况且是专用在教育事业，这一层希望卷烟商也要注意。

1924 年 2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岑春煊派员投北

岑春煊派温宗尧于二月念六日到南京见齐燮元，接洽粤桂军事，二十七日转车赴京洛接洽。当黎元洪被逐之时，政学系大部分是助黎反直的，现在他们的首领(岑春煊)却明白地投附直系了。有一位直系的议员说："现在及近的将来，中国政治上只有两种理想与势力：一是北洋派，一是国民党，凡想做政治运动的人不加入国民党，即应归附北洋派，决没有第三者活动之余地。有些反直派而不肯加入国民党，又有些反对国民党的人而不肯归附北洋派，这班人决没有贯彻其主张之希望。"这几句话说得真是痛快，岑春煊、温宗尧这班人，老老实实投附北洋派，也比以前混在南方护法团体里痛快得多。要中国政治进步，第一步便须北洋派和国民党分成显明的两条战线，把混在中间的游移分子淘汰去或使之态度详明，才有办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政学会首领岑春煊投北，绝没有反对之必要。更进一步对于一切明白投附北洋的人都不必反对，所应反对是：既不附北洋派又不附国民党一班不南不北态度暧昧的人们，如章炳麟、褚辅丞等。

圣道一门的王芝祥夫妇

王士珍、王芝祥等呈府院，请依宪尊经，以正世道；王芝祥妻则呈请崇祀孟母；好个圣道一门的王芝祥夫妇！可是孟母果入孔庙，不怕男女混杂吗？政府果然尊经，王芝祥南北奔走所提倡的同善社，岂不是孔圣

人所不语的神怪吗？

外　币　祸

东三省官厅拒绝俄国在中国使用纸币，这件事在国民经济原则上，我们是赞成的。但同时我们要注意日本国在南满发出金票二万万元的事实，同时更要注意英、法、美各国在津、京、沪、汉、粤所发出的无数纸币，即以汇丰一行而论，除前此发行原额二千万元以外，今年又增加一千万元。

拒绝外币是应该的，单单拒绝俄币却是说不通。若说中国人曾受过俄国卢布的损失，那末，大战前北省人迷信俄国卢布，何尝不比南省人现在相信汇丰、汇理票更甚。

兵吗还是匪？

陕西省城内外昼夜抢案迭出，临潼县离省城仅五十里，该县知事亲带巡缉队捕匪，路遇劫掠旅客者追击至县城；不料驻临之镇嵩军马瑞娃部即向县署声明，谓所击非匪，乃是彼营出巡哨，即将巡缉队八人带到营部拷打，欲尽数枪毙，又向县署索洋五千元；县知事乘夜潜逃到省，结果反是知事撤任，巡缉队八人中枪决一人，余判徒刑，刘镇华督军明知其冤，而倚马为心腹，不得不如此。好个糊涂的临潼县知事，督军就是土匪头，你还剿什么匪！

呜呼宪法运动！

张君劢辈鼓吹由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宪法，汤漪、林长民辈鼓吹修改宪法，他们都设在迷信纸上的宪法有治平中国的力量。他们不懂若

是没有一种自身确能遵守宪法的力量来拥护宪法，使宪法得以施行，那全部宪法便等于一张废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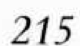
易卜圆光与北洋势力

张绍曾和吴佩孚大谈其易卜及圆光术，张又主张吴齐奉实行合作，以曹为中心，以巩固北洋势力。这两段话好像无甚关系，其实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北洋军阀的势力和反科学的思想本是一家眷属。但不知他们这种反科学的主观的人生观，也为梁启超张君劢辈所赞赏否？

列　宁　碑

列宁的伟大，我们本不能否认任何人有崇拜他的权利。但我们要知道列宁的伟大，乃在扶助劳苦平民，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军阀财阀；中国许多恭维帝国主义者或军阀财阀的人，以前极口毁谤过激派，现在也都伸出头来赴列宁追悼会，并且附和着要为列宁建纪念碑，这班人懂得列宁的伟大在那里？他们难道忘记了列宁是过激派吗？

1924年2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印度自治运动

印度新议会于一月三十日行宣誓礼，不合作党都穿着自制布衣，宣读誓词；启行开幕式，印督致词，希望此届会议有沉静的判别及好意的特性。印度国民党已宣告成立，内有不合作党四十五人，独立党三十七人，占议席一百四十三。新议会主张印度当完全自治及省自治，海来爵士答称，许给完全责任，今尚不能，惟政府将派员调查一切，俾消除实行政治时所有之困难。

不合作党领袖甘地已被释出狱，他致书穆哈默德亚里氏，深以印度教、回教徒意见歧异为憾，谓各团体行动苟不一致，则不合作运动徒属空谈。

二月二十六日议会开会时，不合作党议员动议组织委员会调查西克人民之疾苦，已经讨论通过；海来爵士代表政府反对设置委员会，亦否认政府曾损害西克人民的宗教信仰及虐待西克妇女。稚甘之印度开始不合作运动，第一步为拒纳人头税，法庭遂发出逮捕状多份，摩巴萨已有印人四名下狱。不合作党人在英国极力鼓吹召集联席会议，建设完全负责政府，而印度事务大臣鄂里维勋爵于二月廿六日在英国上院宣称反对联席会议，并说：如果建设完全负责政府（即印度独立政府），印度人民将受害无穷。

照他如此说法，大英帝国用许多陆海军保持印度之统治权，原来是为了免得印度人民受害无穷，好个慷慨仁惠的帝国主义者！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议会里，连一个调查人民疾苦的委员会都不许设置；在英国统治下的人头税，想必也是印度人民将受益无穷。

1924 年 2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商界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声

去年外人干涉吾国禁止棉花出口，上海商界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者(使团)终以不平等条约压得他们忍气吞声下去。现在英美两商会，对于外人商标注册，又要求修改商标法，并且要求列国共管，实是欺人太甚；上海总商会对于外人这样无理的要求，极端愤慨，致电北京商标局如下：

北京商标局鉴，报载上海英美两国总商会，为修改中国商标法一事，于上年十一月间，开联席会议，胪列应将现行商标法，予以修正者有十余条之多，而其议决案末节，又谓，总之本会以为中国商标局行政方面，不宜单由中国主持，一切须有列强共同管理。又本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商会在沪开联合会，其电致北京外交团有云：苟中国商标法条件，与马凯条约第七条之精神不一致之时，吾人誓不承认等语。核其要旨，不外两端，一则欲干预商标之立法事宜也，查吾国与各国所订条约，虽多失败，然只有关税须由协定之文，而无法律亦须协定之说，征诸中央商约第七条，所谓牌号注册局者，章程应如何规定，约内并无一语道及；而美约第九条，更有由中国官员查察后，经美国官员缴纳公道规费，并遵守所定公平章程，即由中国官员出示禁止冒用等语。就以上两项约文而论，足征此项商标法，我国有制定之自由，并不受如何之束缚，即谓此项法文，关系中外互市利益甚大，亦只能于事前容纳外人一部之建议，而据历来经过情形论之，此项法案，自前清迄今，已修改至六七次之多，外使建议，亦已迭有容纳，对于外商利益，实已兼筹并顾，委曲周至。嗣于去年五月间，此项商标法令文，经合法国会之议决，通行颁布，则外商欲保全其约定之权利，自有一体遵守义务，而乃多方挑剔，强令修改，是非特曲解订定之约文，即且蹂躏我国之主权。且以中

外互市利益言之，商标法之影响于华商利益者，自较外人经商在华者为巨，若事事欲得洋商之意，将置华商之利益于何地，以该两商会此次所拟修改条文而论，第四条之继续使用在五年以上，忽议改为十年以上，是此说一经采用，现时援照第四条之使用年限而核准注册者，讵非悉归无效，此华商所万难承认者一也。二则欲以商标行政，由列国共同管理也，查英约所谓由南北洋大臣派归海关管理，系因商部尚未设立，故关于商事行政，暂交由关员管理，而特以南北洋大臣总揽其成，犹之邮政未设专司时，归总税务司赫德兼办，交通未设专部时，铁路事宜，初归海军衙门，继归外务部兼办也，盖海关虽雇用洋员，而严格言之，仍系中国国家之机关，吾国因官制之变迁，而定其管理权之谁属，纯系国内行政，决不受约文之束缚。若谓海关二字一经列入约文，即无变更之自由，则约文所载，尚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字样，此缺废置已久，何以未闻有所异议。无怪日人之论此事者，谓由海关而移归商部，不过一地方官权限之变更，决不能谓为违反条约矣。然此犹得曰误解约文也，至于该两商会所谓商标行政，须由列强共同管理，是非特望文生义，抑直无中生有，充其意，凡事一经涉及外人，即须由外人共同管理，则除此中外互市，日益密切之际，无一事不可谓与外人有关，即无一事不可由列邦共同管理，国家所余之主权有几，此尤全国人民所万难承认者也。总之，外人条约上之权利，自应尊重，然约定之义务，仅以国家赶紧设立注册局所为限；我国既于上年五月份颁布法令，筹设专局，一再劝告外商实行注册，则约定之义务已尽，其余约外干涉，万难让步忍受，应请转呈，将外商要求各节，严加驳斥，以重主权。上海总商会叩。

这是中国商界反对外人干涉内政之第二声。我们更有进而忠告于总商会的是：此电文中所谓“外人条约上之权利自应尊重”之观念，你们应该抛弃了。自通商以来，外人胁迫我或蒙蔽我立下了许多侵害我国主权的条约，尤其是制我工商业死命的协定关税制，所谓外人条约上之权利，就是中国主权上之损失。这些条约不废除，外人动辄援引他来干涉我国内政，我们中国人便永无抬头之日。若主张须永远尊重外人条

约上之权利，即等于主张中国人须永远听受外人之挟持；所以我们希望总商会由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进一步而主张废除各种侵略中国主权的条约！

1924年2月27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意 械 事 件

中国军阀之乱，大部分是由于帝国主义之借款及军械的援助，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英国供给直系三项借款，意大利供给直系大批军械，正是眼前的事！

意械价值：据东交民巷方面消息，确数为四百八十七万余，已付过二百万元；据上海《大陆报》说，值价五百五十万元。军械数目：据京津《泰晤士报》，有来复枪三万枝，子弹四千万发，及大炮弹、炮车、炮架、野战炮等。其已由天津运往北京的：据上海《申报》说，大炮十二尊，炮车炮弹五百五十箱，步枪二千一百廿箱（每箱廿四枝），子弹一万一千八百廿五箱（每箱一千四百粒），野战炮十五尊，机关枪六架，炸弹七十箱，水壶干粮袋二百箱。据《大陆报》说，所有运送检验之事，均由意水兵与曹锟、吴佩孚之委员会同为之，共用货车七十辆，始运送完毕。

直系军阀何以有此巨款买此大宗军械，则恃有英国三项借款或以将来勾结英美所得之卷烟附加税担保借款，都是意中之事。直系既有钱又有械，越发要大显其作战杀人的手段了。如此，我们应该彻底认识：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军阀杀害中国人民，是何等明显的事实！

1924 年 2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之模范的改造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筹备处，兹发出党员登记通告如下："凡在此次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加入本党的为旧党员，旧党员须经过登记，方得为本党党员。从前国民党时代，各地罗致党员，单求其多，不问关于主义了解与否，所以明白分子，都发生'只要化一块钱，不问什么人都是党员。'这种叹声，分子的复杂，单就这种叹声里已经十分认的清楚了。如今可不能这样！（一）须了解赞成接受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的宣言；（二）须绝对服从党律；（三）须知登记后，在物质上到自身底生命，在精神上到个人底自由，不复由个体自由支配。具此三者底觉悟，才是本党同志；因为本党做的是革命事业，其利益全在民众，党员自身，无论革命成功以前及成功以后，不但没有比一般民众的享多余的利益，并且个人为党为国，只有牺牲，没有权利的。明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面以自力要求解放的旧党员，请按手续来登记！"

在这一个短短的通告里，充分表现出他们服从和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这两种精神才能算是一个革命党员，必须多数党员具有这两种精神才能算是一个革命的党。

我们希望浙江的党员都能这样切实做去，我们希望各省的党部都能照浙江同样的办法；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真的新生命，才不至使全国大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案仅仅是白纸黑字的决议案。

1924 年 2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告合作社同志们

合作社是阶级争斗中一种工具，不是一种免除阶级争斗的工具，这个定义，合作社运动幼稚的我们此时未必相信，然而将来总得相信。近见南京东大附中合作社的宣言，觉得他们或者没有拿合作社运动来免除阶级争斗的妄想与取巧的心理。因此，敢将去年六月第三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所议决的合作社问题译奉这班同志们：

合作社问题

(A) 法西斯蒂主义与合作社

1. 法西斯蒂主义底直接目的，就是有系统地破坏工人组织，铲除工人运动底一切靠山。在法西斯蒂派发达之地，尤其是他们得到政权之地，他们最粗暴手段就是用未〔来〕攻击合作社的。

2. 为这原故，法西斯蒂主义应为我们视为直接恐骇合作社底一种危险；不单在合作社底发展上，而尤在他的生存条件上。所以合作社中共产党员应该作一种强有力运动，使合作社加入反抗法西斯蒂主义底斗争之场。

3. 在法西斯蒂主义方式之下底资本主义进攻底发展明白地指出那一般自命为"纯粹"合作社员以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合作组织底发展有达到工人阶级解放目的底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合作社一变为资产阶级底眼中钉时，他们不客气地马上把"和平"派社员抱有无限希望底机关捣得粉碎。"国内"战争迫到合作社门前，使他不能再守中立了。相信合作社运动不受阶级斗争底影响，这种幻想是带有危险性的。所有无产阶级运动底失败，直接地便反映到合作社来。在法西斯蒂主义制度底下，换言之，即在压迫工人阶级使之处于卑劣不堪地位底资产阶级武装专政底下，合作社以前所能活动地域已经干枯，再无生产之可能了。

4. 仅仅在苏维埃俄罗斯境内，合作社才能照着工作组织计划去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底下，他才能有安全的生存和作用。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两种国家里面，合作社运动发展上之异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5. 反抗法西斯蒂主义斗争底经验可以证明那些有多数无产阶级群众为根基底合作组织方能抵抗法西斯蒂派。那些独立的和分散的小组织，在抵抗资产阶级进攻底自卫斗争里头表现出来不仅是经济的低下，而又是政治的无能。

6. 联合战线和工农政府两个口号恰好适合于合作运动底需要。为什么要联合战线？因为合作社所得利益所处危险与整个工人阶级同。为什么要工农政府？因为只有劳动群众夺得政权才能避免合作社底破产和给他以充分发展之可能。

7. 劳动群众从法西斯蒂运动初期起，便应立定脚跟制止法西斯蒂派势力增长并不使他们夺得政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合作社应作反抗法西斯蒂主义底宣传，以经济力帮助宣传底发展，并令各社员参加组织无产阶级战线以保卫工人团体及压迫反革命倾向。

8. 反抗法西斯蒂派斗争底经验又告诉我们，改良派首领所宣传的无抵抗方法是不能用的。法西斯蒂派得到政权以后，迫害合作社手段只有加增再无减少希望。因此之故，反抗法西斯蒂派底斗争更加要用全力去干，无论如何务必做到救护合作社安全而后止。共产党人应该在合作社中继续工作，纵然合作社为法西斯蒂派所得，也不应将工作中止。一个强烈运动应该举行以阻止劳动者，因合作社为法西斯蒂派所得或为其所捣乱而遽行退出。

(B) 关于工会与合作社底共同行动

因为一方面国际资本底进攻，他方面革命精神底增长，追到安姆斯坦工团国际和合作社国际底首领们也走来赞同联合战线战略了。他们还是恐怖革命，他们打算组织一个首领底联合战线来代替我们的劳动者底联合战线。二月间合作社国际联合与安姆斯坦工团国际在不律塞尔所订的条约便是属于此类。

这一点，我们很值得提起来说：合作社国际联合已经放弃了以前政

治中立底原则。他不得不承认现在无产阶级势力联合问题为合作社底生死关头问题。如果工人合作社不愿意投身资本家经济崩裂底漩涡中，如果他也不愿意当商业与财政资本底奴隶，他应该参加工人阶级斗争底政治和经济组织。

安姆斯坦国际与合作社国际在不律塞尔订条约并不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进攻底武器。理由就是这两个国际底同盟不允许有几百万革命工人底赤工国际加入他们的同盟里头。实际上说，这个同盟不过是拥护资产阶级利益而阻止工人组织斗争底团体罢了。他们并未曾真正做到各国工会组织与合作社组织相互间坚实的联络。

那么，共产党底合作社员底任务自然把这个同盟真相向都会与农村底合作社群众宣布出来，并组织合作社劳动者与工会劳动者底联合战线来抵制这个同盟。在赤工联旗帜底下革命团体，绝对应参加在这战线里头。工会组织与合作社组织，应开一个国际的代表会议。他的行动大纲应具体地规定如下：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底理论和组织，反对掠夺劳动者，反对减少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反对武装和资本主义国家底挑拨战争，反对工资与工人组织底课税，反对压迫革命党底特殊法律，废止凡尔赛条约，要求赦免在狱的革命党人，从事无产阶级武装，宣传工农政府原理。合作社特别应密切地联络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和乡村底劳动者。

合作社应该参加所有革命无产阶级底行动。我们必须要求工会和合作社底首领出来与佛兰克福会议中因反对战争危险与法西斯蒂主义而产生的国际行动委员会合作。如果首领们不答许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即刻向合作社和工会群众进行联合无产阶级战线，拥护本阶级利益而反抗反叛的首领们。

在明年合作社国际会议中，我们不免要做一番运动攻击那联合于反动派底中立论者，并要求有多数共产党代表参加会议之中。

(C) 关于组织问题

共产党合作社员国际势力底组织是必要的。因此，各国共产党所组织的合作社运动机关应开始把合作社底革命群众集中起来，并组织战斗团体同赤色工联、共产党取一致行动，预备必要时底斗争，以拥护

合作社革命底利益。

各国合作组织和工会、党之间又应有密切关系和共同行动。

国家合作委员会负有组织机关以指导共产党员在合作社行动底责任。这个组织工作是经共产党合作社员第一次国际会议所规定的，且得党执行委员会同意，能在第三国际中设合作部。组织规模(国家的)大略如下：

(A) 在执行委员会之旁组织一个合作部。这个合作部由下列机关组成：合作委员会(会员为负责的共产党战士)、合作社、党工会部代表、妇女书记部、青年团及赤色救济会。这个委员会定期开会，以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主席并须报告合作社问题于执行委员会之责。这个委员会讨论和报告一切关于共产党员在合作社行动问题。

(B) 在党底执行委员会：旁又组织一个合作书记部。合作部在可能范围内应出版共产党合作社机关报。此报应供给文章和消息于共产党出版物，联合工会作政治经济行动，与第三国际合作部、共产党议员团、工厂委员会诸团体发生关系等等。合作部底决议经执行委员会通过后，由书记部实行之。书记部又自普通工作：通讯、编辑等等。

各行省各地方共产党合作社员底行动都依同样方法组织。党底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共产党合作社员在真协社中指挥共产党小团体底行动。他方一切合作社中负责的共产党员又组织合作部以党地方委员会委员为主席指挥这一地方共产党员底合作社行动。

在合作社中和在工会行动中，共产党员若与其他革命分子联合时，在这联合内，必须再组织共产党底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底任务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去造成革命环境。第三国际合作部负有审查和规定在合作社中共产党与其余革命分子共通行动底方法，在共产党合作社员第二次国际会议中报告。

1924年2月27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新闻记者与土匪军阀

军阀们觊觎青岛，强提路款以充海军饷，滥提盐款，强截捐税，种烟贩烟，这些举动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申报》记者因此责备他们不计日人之反对，不顾外交上有约束，不问条约之信用，可见日人之反对，在这班新闻记者心中眼中，比在军阀心中眼中更为可怕；可见制中国人死命的什么外交约束什么条约，在这班新闻记者心中眼中，比在军阀心中眼中更应该谨守毋违。这班软骨头的新闻记者们，对于外人比媚外的军阀还要恭顺。他又责备土匪随地掳劫，屡及外人；他又责备武官强迫开车，殴击洋员；“外人”、“洋员”在这班记者心中眼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便是该死的奴才。所以临城案起，他们便如丧考妣的乱号，外人在上海打伤乐志华，在汉口逼死田仲青、王希天及许多华工冤死在日本，他们都闭着口一屁不放。

中国幸而还有一班野蛮的土匪和军阀，偶然还无意识的冒犯冒犯“外人”、“洋员”；若都象这班软骨头的新闻记者，外人洋员们在中国更是如在无人之境了！

联省自治的下场

主张联省自治的先生们，向来都以赵恒惕、陈炯明为中坚人物；现在赵已召集全省军官商议附北问题，陈则打算委令部下附北，自己退处海丰，不问政治。呜呼联省自治的下场如此！

陈炯明赵恒惕到底为什么反对孙中山?

陈炯明、赵恒惕反对中山先生，本是标榜一块联省自治的招牌，可是现在国民党大会宣言中，明明容纳了省宪的主张，而北方吴大军阀却非逼着陈、赵取消省宪的主张不可;我们要问问陈炯明、赵恒惕，今后到底为什么要反对中山先生，今后是否要帮助反对省宪的吴佩孚来攻打赞成省宪的国民党?

中俄交涉与东交民巷

三月八日《申报》上北京通信说:“微闻中俄交涉之完全解决，尚非三数日间可能之事;至其原因，不必求之于政府，亦不必求之于疆吏，求之于东交民巷足矣。盖中国年来政治经济上之重大变迁，操纵于幕中，皆有外人在，亦非独中俄交涉为然。”这几句话形容出东交民巷真是中国的太上政府，这几句话使我们益发相信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比反抗本国的军阀更为要紧;除英美教会学校的学生及美国青年会的朋友们外，凡是爱国的中国人，总应该有这种观念罢!

1924 年 2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土耳其放逐教主

三月二日君士坦丁电：本日国民党讨论重要议案：(一)废教主，(二)废宗教部，(三)废宗教学校。第一案规定取消教主职位，于十日内永远驱逐教主及其眷属于土耳其境外，没收其宫室，以大多数通过，提交国会。

三日电：国会已通过废教主议案，安戈拉政府命君士坦丁总督于十日内执行。

四日电：国会开会时，基玛尔将军演说极言政教分立、教育统一、澄清司法之必要，除少数宗教党及保守党外，皆欢呼不置。废教主案全部通过；基玛尔将军建议教主眷属妇女免加放逐，亦经众否决。四日晨君士坦丁总督率同警察赴教主宫，向教主宣读废位文，即令离境，教主旋率眷属起身往瑞士。

我们要知道土耳其政府这种伟大的举动，乃自复国以来，经国民党长期间的宣传运动，此时才能够实现出来；废逐教主的理由，不但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因为教主及其爪牙素来是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想推翻安戈拉革命政府，所以废教运动颇得一般爱国群众之同情。

以前尝有人说，东方有两个老大病夫，一是土耳其，一是中国。土耳其年来的伟大举动——一是毅然决然联络苏俄恢复国土并否认列强之治外法权，一是此次毅然决然驱逐教主——已经证明他不是老大病夫了；而我们中国还俯伏在列强军阀及礼教的势力之下，今后能否改变老大病夫的现状，改造后的中国国民党至少要负一半责任。

1924 年 2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致 胡 适

适之兄：

蔡稿款望速速结束，因弟为彼代借之款催还至急也。此弟事，非蔡事，求吾兄务必提前办一下。至托至托。

弟仲甫白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

二月十日，上海闸北川公路祥经丝厂兼织绸厂，晚间失火，焚毙女工多名，已检出女工尸身六十一具，其余不知下落者还有数十人。该厂工人共计五百余人，除男工五六十人及本地女工三十余人不住厂外，其余由外埠招来之女工四百余人，皆分住厂中底层及二层楼。起火时都已入睡，住底层者多已逃出，住二层楼者，因只有一门三窗，各窗都有铁栅，不能跳出，门口及楼梯均极狭小，人多抢出，反将门口堵住，故多在屋中烧死。救火会闻警驰来，乃因水管不灵，无法拯救，遂至焚毙百余人。

此事件之负责者，一是祥经厂主，二是江苏省长。上海一般丝厂、织绸厂的厂主，都防备工人如盗贼，不但门禁而且窗禁也甚严厉；祥经厂不但建筑多用木材易于延烧，而且每窗都有铁栅，数百人的卧室只有一门，门梯又均极狭小，岂不是将工人们活活地闭在屋中烧死！厂主烧点房屋不打紧，而且他还可以向协隆保险行拿得十一万保险费，工人们的保险费向何处去拿？在这件事，我们应该看出工人保险法及工厂法的必要。

闸北官办的自来水厂，万分腐败，居民拿出自来水捐钱，一月中总有几次一两天无水吃用，这种可恨的情形，凡是住过闸北的人都应该知道。闸北人民因为这种情形，极力争持将水电厂改归商办，而江苏省长始终不允，以至自来水厂至今未能改良，水力甚弱，祥经厂火起，虽救火会与警察同时驰至，而无水也无法拯救。因为救火这一点，闸北居民更有向江苏省长将水厂争归商办的必要。

1924 年 3 月 19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七期 署名：独秀

工党政府下之英国工人罢工运动

在资本进攻的欧洲，首先反攻的要算是英国工人。即最近工党政府成立以来，铁道罢工等解决，而矿工联合会可要求增加工资，矿主允将最低之工资，增加至比一九一四年者高百分之三十，矿工代表未接受，惟允各交还讨论①，三月廿六日，再集大会议决。又伦敦运输工人联合会，近亦要求将伦敦电车雇工一万七千人工之工资，每周增加七先令。

矿工将大会延到二十六日，意欲在此期间督促政府提出最低工资议案，能由法律获得较优之工资；倘此目的不达，则各代表必将二十六日决定，俟四月十七日，目下之合同满期后，在各矿区投票表决全国罢工事。

此事将为英国工党政府至难解决之问题，盖英政府前曾决议在本财政年度终止前尽先讨论公共议案，工资案乃他们所谓私案，在此期间势不能提出；政府若推翻前议提出此案，必受保守、自由两党致命的抨击而倒，若不提出，又必失工界之拥护，工党执政到底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是什么？所谓不革命而得政权的工党政府，原来不过如此这般。

1924年3月19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七期 署名：独秀

① 原文为“惟允交各还讨论”。

寸　铁

统　一

土匪式的军阀各霸一方之中国，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需要统一，所以我们并不反对统一，无论是和平统一或是武力统一，我们都不反对；因为统一并不是反对和平，统一也不是绝对不需武力。

但我们必须明白：统一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排斥外国的侵略及国内的军阀以救同胞于水火，拿统一来做达此目的之一个手段，自然非常之好；若是拿统一来达他们什么军阀统一什么北洋正统的目的，结果不但不能救同胞于水火，而且兵祸连结，使同胞更不堪其苦，这种统一，我们如何能赞成！

慎重与上当

北京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英、法、美、日之外交，一向是有求必应，从来不知道慎重，从来也不怕上当。此次中俄谈判的大纲俄国确已放弃了租界，放弃了领事裁判权，放弃了庚子赔款，这是中国外交上从来未有的胜利；而上海《字林西报》说："中国让步较多，将大为苏俄之利。"我们试问《字林西报》的英国人，我们也想对英国让步较多大为英国之利，但不知贵大英帝国能够放弃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吗？王买办等阁员对于俄约签字主张慎重，以免上当；他们对于金佛郎案、临城案、威海卫案，都绝对不慎重，不怕上当，对于能够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及赔款的协约，都主张慎重，以免上当，实出人情之外。我恐怕他们

越慎重，越要上英、美、法、日等公使的当；因为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眼见中俄会议成功，俄国将实行放弃租界、领事裁判权及庚子赔款，他们心中万分难受，怎能不设法从中造谣离间破坏！

恐吓我们的唯一法宝

近来帝国主义者对我恐吓的唯一法宝，便是华府会议许我的利益。不答应他们的临城案的要求，他们也要取消华府成议；不答应他们金佛郎的要求，他们也要取消华府成议；不答应他们干涉中东路的要求，他们也要取消华府成议。就算华府会议是有厚赐于中国，动辄便要拿回去，这种小儿间赠饼的笑话，都是一些堂堂大帝国的代表！如何好意思说出口？况且所谓华府厚赐，不过取消一笔裁判权及关税会议二事：关于前一项，俄罗斯将要先他们实行；关于后一项，议来议去，无论增加若干，还得是和他们协定，本来是应该行使主权自由增加的关税，现在由他们协商增加些须，他们便看做深恩厚赐，动辄以取消成议的要挟，此话怎讲？

无枪者连拍马也不灵！

吴佩孚想夺得山东省政权，一班无耻的省议员，以为到洛阳去数次推倒现在的熊省长，必然是最美满的投机事业，那知被吴大军阀申斥道“我对鲁政，自有主张，你们不必来捣乱。”

1924 年 3 月 19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七期 署名：独秀

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

前年一年中，中国工人运动各处都风起云涌起来，自唐山矿工京汉路工罢工相继失败，各处的工人运动便随着一落千丈，去年一年中，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在客观的条件上，中国既然有了许多工人，这种压迫的沉寂的状况理应不能长久如此，今年或者是工人运动转机的时期了。最近有几件事已现出转机的征兆：(一)胶济路罢工的胜利；(二)好几条重要的铁路工会(非公开的)已集议组织了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雏形；(三)上海华界电车工人已设工会筹备处，并开始向公司要求各项条件最要的是承认工会；(四)上海祥经厂失火烧死一百多女工，山东坊子煤矿出水淹死工人七十五名，这两件大惨事，都可以激起工人阶级的觉悟及一般社会的同情。

我们希望全国工友们及帮助工人运动的知识阶级勿轻轻放过这个转机的时期！

1924 年 3 月 26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俄会议之成败

列强对待中国的外交，向来只有两种形式：(一)是列强间自己协定处置关于中国的问题，然后通知中国照办；(一)是直接威吓中国承诺他的要求。独有此次中俄交涉，俄国以平等的原则对待中国，与中国直接交涉，并没有漠视中国的主权先向他国协商关于中国的问题，而且王加谈判①间颇表现平等至让的精神，“归还中东路”、“蒙古撤兵”、“取消租界及领判权”、“退还庚子赔款”，像这种中国外交上空前的美满，就是以前对苏俄十分怀疑的人，也都大致表示满意。

照最近的消息，中俄交涉将结成的美果，恐怕要变成空花。此政府所持的口实，都是一片鬼话，实在的暗礁：(一)是法、日、美的阻挠，(二)是直系军阀利用中俄会议不成，一以防奉天，一以倒孙阁②，顾维钧是前者的代表，陆锦是后者的代表，所以在阁议席上顾、陆二人挑剔王加协议的大纲最力。

我们以为中俄会议不成，也好也不好。好的方面是：蒙古人民免的马上就要受中国军阀的统治及中国兵的奸淫焚掠；在中国兵未去以前，他们可以多得时间充分准备抗斗自卫的武力。不好的方面是：此次交涉破裂，俄国不得不转而与日本、法、美等国有所接洽，中东路问题及蒙古问题，若由他们协商有所决定，那时中国国家的资格怎么样？那时顾维钧、陆锦又将如何慎重免得上当？

1924年3月26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

① 王加谈判，即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与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关于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

② 孙宝琦内阁。

飞律宾之独立运动

三月十六日马尼拉电：飞律宾革命老辈及工团学生等，今日整队游行示威，马尼拉市民劝募独立经费，两日间得款二万元。十七日电：富商拉麻氏独捐独立经费二万五千元。十九日电：今日新建飞律宾科仑比亚协会举立石礼，国民党诸领袖演说，公然鼓吹飞岛独立。

飞律宾独立委员团向美国请愿独立，而美国总统柯立芝致函委员团主任说："美国深信伍特总督之能干好意公正诚实，美国在世界关系目下之状态中，须仍负保护飞岛人民之义务。"如此看来，他们这种请愿的办法，除损失自己民族的尊严外，可以说毫无效果。本来民族独立决不是请愿能成的，飞律宾委员团到美国去请愿独立，和印度不合作党到英国去运动独立，都同样的错误，都同样的无结果。马尼拉的工人们学生们：

要想独立，便勿怕革命！

要怕革命，便休想独立！

1924年3月26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利用国民党

共产革命是劳资两阶级间的争斗，国民革命是各阶级合作对于外族及军阀的争斗；可以只有国民党能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决不能利用国民党。

造谣中伤

两党相争，用实力用理论都是可以的，最下流是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无政府党不赞成共产党，尽可在理论上反对；陈炯明等不满意于国民党，尽可在理论上并在实力上反对；然而他们却都不肯抛弃造谣中伤的武器。大凡一个怯懦的个人或民族，对于敌人每每缺乏公开争斗的勇气，他们最得意的手段，是藏在暗中造谣中伤。

武力统一的榜样

从前黎元洪不能令汤薌铭到湖北任省长，还可以说黎元洪不是直系的领袖；现在曹锟、吴佩孚确是直系的领袖，而且在他们直系的一统江山之下，曹拟添派江西省长，吴拟添派湖北省长，只因蔡、萧两督军[①]

① 江西督军蔡成勋，湖北督军萧耀南。

反对不能实行，这就是直系武力统一的榜样！

娼　优

西洋人重视优伶，因为他们优伶的艺术实在有重视的价值；中国人若是盲目的模仿欧风，把中国现在的优伶也抬举起来，那便是天大的笑话！论他们的人格：从前北京的优伶多半兼营业像姑，鼎鼎大名的王凤卿朱素云都是这个出身，梅兰芳到现在还不干净；湖南唱旦角的生活，向来都必须如此这般；至于南北各省淫伶所作欺骗奸拐的罪恶，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上娼优并称，其实优伶比娼妓更下流。论他们的艺术，请看上海新编的所谓新戏，如《诸葛亮招亲》、《阎瑞生》、《狸猫换太子》、《朱洪武出世》等，其鄙陋不通，真要笑死人。这班东西被那捧角的斗才名士无耻伸商捧的忘其所以，忘其为娼优的身分，对于社会上舆论之制裁，不但不自省愧，还居然拿什么伶界联合会的名义来抗辩，这尚成何世界！

1924 年 3 月 26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煤油战争

英、美、日、法四个帝国主义者，对于煤油矿之争夺已十分剧烈，未来的世界大战争，或以此为导火线。

三月十七日东京电：美国测勘员麦古鲁少佐及麦克劳林氏、墨苦多乃尔氏打算到北库页岛测勘煤油矿，在爱来桑特洛司克被日军官逮捕，释放时附以警告，以后不得再入库页岛；日本当局宣称，苏俄所租给美国新克来尔油公司之油矿，日本未经承认，故决计不准美公司从事行测勘。这是日美间煤油之争夺。

英美间在美索不达来〔米〕亚煤油，争夺还未解决，在墨西哥的争夺又将开始。据路透电，墨西哥总统说："墨国的叛乱，是受了英国煤油公司的赞助。"而美国则明目张胆的帮助墨政府，如此，墨西哥此次革命战争，内幕里就是英美两国的煤油战争。世界煤油产量，美国居第一位，墨西哥第二，高加索在大战前本居第二位，今则第三，这是世界上三大煤油区，三区中美国占有其二，英国煤油公司如何不赞助墨西哥革命党。

英国的英波公司与美国的新克来尔公司争先重贿管理波斯北部油矿之波斯当局，这又是英美两国在波斯的煤油争夺。

因战争而需要煤油，又因煤油而引起战争，煤油本是人类有用的东西，只因遭逢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便成了杀人的祸根！

1924年3月26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工界最近之惨剧

最近中国工界发生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一百多女工;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七十五个;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五十三个。

第一件事,工人的家属还正在抗议,一般社会也还有相当的同情援助;第二、第三件事,工人及社会两方面都还没有什么表示,这是什么缘故?

坊子煤矿是日本经营的,其所定抚恤章程,凡是因公致死的,每人应给恤金五百千文(合银三百元以上);唐山大部分资本及管理权是在英国人手里,那班洋工程师们虐待及薄待中国工人的事,是一向著名的。以前唐山工人因公致死,只抚恤数十元,听说现在还只有百余元,一条人命只与普通的骡马相等!

有一位唐山工业学校校长(资本主义的学者)曾说:"社会主义者所说别的话,我们不必理他,惟有他们攻击资本家苛待工人这一层,却成一个问题。即以我所知道的唐山为例,隧道中预防坍落的工程十分重要,而洋工程师以所费远过数百工人恤金之数,不肯设置,彼等如此玩视人命,我们实在看不过去。"洋工程师们计算如此精巧,所以唐山煤矿隧道中,历年以来,屡次发生变故,这次(三月廿五日)的惨剧,也是因为隧道顶层突然坍落,活埋工人五十七人,伤者无数。

全国工人们!全国有同情心的人们!对于工界这三大惨剧不但须注意现在的抚恤,更须注意将来的预防!

1924年3月26日[①] 《向导》周报第五十九期 署名:独秀

---

① 《向导》周报第59期所标明的出版日期,与第58期相同,都是3月26日。第60期为4月2日,而第61期却为4月16日,据此,第59期应为4月2日,第60期应为4月9日。

评中俄协定

关于此次中俄协定各方面之意见：在北京政府方面，一部分人想用以掀起政潮，一部分人向来是看东交民巷空气来决定外交方针的，他们不满意于王、加所定草案，吹毛求疵，本不足责；在议员方面，一部分曹家嫡系，对协定草案竟有丧权辱国的恶评，这种话匣子的作用，又何足论；在外人方面，帝国主义的列强，眼见他们不愿意的中俄直接谈判与恢复国交行将实现，并且协定中，俄国已放弃了他们所不愿放弃的许多权利，他们在中国的机关报怎得不忌妒毁谤！所不可解的是中国代表舆论的新闻记者们，也每每有不明是非的论调，最奇怪的是上海《新闻报》，竟谓俄代表态度无异于日本逼认廿一条件，这实在错误极了。第一，我们须知道日本廿一条要求，是日本逼我承认，至今不容许我取消；此次中俄协定，是承认或取消都随中政府之便。第二，我们须知道日本廿一条之要求，其内容，一方面是日本绝大的利益，一方面是中国无穷之患；此次中俄协定，的确是双方的利益，《字林西报》还说是中国片面的利益，因为所给予中国东西甚多，俄国并未拿去一件。

协定之内容，果于中国方面有利益或是损害，不可凭空瞎说，看国务院王正廷通电可知。据国务院号电及王正廷之梗电所说，中俄协定中，废弃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之旧约，承中国在外蒙之主权，抛弃租界租地及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关税规定平等，都已有成议，谁也知道这些都于中国有莫大的利益。

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并未吃醉酒，不可以随便乱说。大家若要乱说，我就问问大家，请你们试问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者，去要求他们同俄国一样，放弃租界租地及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废弃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旧约，关税平等，看他们肯是不肯？

中国的对外交涉，历来备受损失与侮辱，大家都隐忍着莫可如何；

独于此次中俄协定，得了无穷的利益，全国朝野丝毫不感觉苏俄扶助被压民族的苦心，反而借不成问题之细故(如曹党所争三点，俄国既已承认中国在蒙古之主权，则废约撤兵均不成问题，移交教堂财产，本不成问题)，横来挑剔疑谤，大放厥词；人家强暴，我们便跪在他的脚下，人家好说话，我们便欺上他的头去，我们当真如日本嘉纳治五郎所讥讽是“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吗？

我们对于中俄协定，也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苏俄承认中国在外蒙之主权，轻轻将外蒙独立的国民政府否认了。或者苏俄也有一种苦心，以为蒙古独立的力量还不充分，与其放任了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取，不如归之中国，中国侵略的力量究竟不及列强。虽然如此，中俄协定若真照草案决定了，中国固然得了许多利益，而中国人中不欲以日本待朝鲜、法国待安南的心理待蒙古者，终不能不为蒙古民族十分危惧。我们不愿为他人奴属，也不愿奴属他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既然不欲他人拿帝国主义来压迫我，我们便不应该拿帝国主义去压迫人，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之定义。

1924 年 3 月 26 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国故党与复辟党

曹慕管先生曾函讽北大教授们做事勿虎头蛇尾(大意如此),他在《民治周刊》时代,也还表示一点革命倾向;但现在可被杨贤江先生"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一句话吓得向后倒退。文学革命运动中,颇现出复辟的倾向;文学的复辟如果实现,政治的复辟也会跟着来;因此,我以为杨贤江先生所用复辟二字,硬是预言不是譬词。而且我以为反文学革命的国故党和反政治革命的复辟党,本是一家眷属,决无所谓"与性不合"的话。我绝对不承认杨贤江先生所用复辟二字是譬词,这是陈望道先生解释错了。望道先生你太过客气了!

老马与小犬

杨贤江先生用"复辟"二字批评曹慕管,曹先生勃然大怒,而他致杨贤江的信,却也自比"老马"。俗传有人对客称其子为"小犬",其子遂推论其父为"老犬",这虽然是个笑话,在形式逻辑上也容许有这样的推论。可见譬词这一个方法,在文字上在语言上,都容易发生极大的误会。

1924年3月26日　《向导》周报第五十九期　署名:独秀

湖南废省宪运动

以前赵恒惕做省宪运动时，引得一般迷信联省自治的先生们兴高采烈；现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暗地里做废省宪运动，不知道迷信联治的先生们感想如何？除章炳麟电湖南省议会外，不知道联治社一班人还有何动作？

湖南省议会为何敢违抗赵恒惕的意旨，反对废止或修改省宪？不用说有多数军官在他们的背后。湖南省宪不是今天才有的，叶德辉为何现在才明目张胆的反对省宪？不用说有赵恒惕、葛应龙在他的背后。

赵恒惕若明白的主张废省宪，马上便要失去湖南军界大部分势力；若明白的主张护省宪，马上便要受北军的压迫；他在进退两难之际，便异想天开，一面召集军事会议来疏通军人，一面制造废省宪的舆论来压迫军人，好达他借口军民人等公意来废省宪的目的。他所想制造的舆论，分新旧两派：旧的即叶德辉等；新的乃是一些做社会运动的青年，所以列宁追悼会赵恒惕也出来赞成。旧的方面他已经达到目的，新的方面恐怕不易利用罢。

赵恒惕何以想到利用青年？他以为青年们向来反对联省自治，此时他却用得着了。他不知道青年们的政治理想是国民革命，对于军阀的联省自治固然反对，对于军阀的统一也同样的不赞成；所以决不会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的情况之下反对省宪。恐怕赵恒惕枉费心机！

1924 年 4 月 2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呜呼改大！

在主观上，我们固然希望中国有许多大学出现；在客观上（人才与经费），中国此时却没有多办大学的可能，即已有的大学已简陋得不成话说。在此情况之下，偏偏南北各省学生都热心起来做什么改大运动，许多高等师范及专门学校，内中还有几处极简陋连中学程度还不及的专门学校，都纷纷起来要求学校改办大学。

青年们！你们这样重名忘实的运动，说你们要求"改办"大学，不如说你们要求"改称"大学！

青年们！你们这样重名忘实的运动，与其要求学校许可，不如要求漆匠店改做一块校匾便得！

青年们！你们的目的是在学问，大学不大学有何关系？你们倘不注意物质的设备（实验室、图书馆等）及师生两方面之学力诸条件，一味盲目的希望"改称"大学，你们这种虚荣心，怎不令爱你们的人们痛心疾首！

1924 年 4 月 2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期　署名：独秀

致　胡　适

适之兄：

特启者：《中国青年》将出特号反对太戈尔，他们很想吾兄为《中国青年》此特号做一篇短文，特托我转达于你。我以为此段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吾兄有暇，最好能做一文寄弟处。兄倘能做文，望于本月十五左右发出，二十日以前寄到上海。

弟仲甫白

〔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评中俄协定草案

中俄交涉自有了协定草案，其内容之利害得失已明白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在理已不容我们凭空说话了。《字林西报》说，此协定是中国片面的利益，俄国只得着空洞的承认；俄国白党，不以苏俄以权利付还中国为然，且因此在京、津、沪、汉、哈大肆活动；独中国人中颇有以此次协定为不利于中国者，其是非得失，决非抽象的争论所可解决，仍惟有就协定草案十五条之内容一一讨论之。

草案第一条是说：协定签字后恢复国交。第二条是说：协定签字后开正式会议。第三条是说：正式会议于签字后一月内成立，六个月内商定。第四条是说：在正式会议中，将中国与旧俄所订一切条约作废，别以平等公平之原则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俄政府宣言精神为本，缔结条约协定。其实我国对俄交涉协定，只此一条已足，大本既定，别的都是枝叶问题，都可据此原则而解决；若能得自此条之协定于英、美、法、日等列强，则中国便为完全独立国家已无外侮之可言了。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第五条是说：俄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俟撤兵条件(期限及彼此安全办法)商定，俄兵尽数撤退？彼既承认外蒙为中国之领土及中国在外蒙之主权又承认撤兵，则中俄间多年悬案之蒙古问题实已根本解决了；即吾人多方疑俄，以彼所于吾国之利益(如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为毫无价值，独于蒙古问题彼未明言取消俄蒙新约，实为后患堪虞；我以为苏俄果如此其狡，在外交的步骤与策略上，我更当签定此协定，看其将来除战争外有何法否认此协定，而不承认蒙古为中国之领土，而不承认中国蒙古之主权，而不尽数撤兵。今此机已失，北政府破坏协定，即在此点其误国之罪已不浅了。第六条是说：两政府相互不做反对秩序宣传。第七条是说：于正式会议测定国界。第八条是说：将平等的原则议定航行问题。第九条是说：归还中东

路主权，并由中国赎回该路。第十条是说：俄国抛弃在中国一切租界租地贸易圈及兵营等特权。第十一条是说：俄国抛弃庚子赔款以充中国教育费。第十二条是说：俄国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是说：将以平等相互主义协定两国关税税则。第十四条是说：赔偿问题在正式会议解决。第十五条说：协定自签字日起有效。自十条至十五条，完全是苏俄所于中国之利益，我们若想向列强取得此等利益，不知道要用多少气力，现在都可向俄国取得了，并且正可援俄例向列强要求，可惜此协定被北政府轻轻地破坏了。列强不但不肯抛弃租界，而且正在设法扩大租界；不但不肯抛弃兵营，而且正在极力增加驻华舰队；不但不肯抛弃赔款，而且须付生金金币；不但不肯取消治外法权及领判权，而且正在努力扩张此等权；不但不肯和我订立平等的关税税则，而且对于他们恩许的二五加税会议还是故意留难；列强所给我们的这些痛苦，拿来比较比较此次中俄协定，其是非事失，十分明白了。

我的朋友章行严说："此次中俄协定，即中国兵打倒莫斯科所得也不过如此。"

1924年4月12日 《民国日报》 署名：实



上海租界三大问题

上海租界近来发生三大问题:(一)是公使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以为交还会审公堂的条件;(二)是工部局在本届纳税西人会提议取缔印刷品之附律;(三)是工部局在纳税西人会提议增加码头捐。

会审公堂初只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按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的规定,自辛亥革命时,领事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已有,遂至完全华人诉讼,也须听领事裁判,视租界为他们的属地,违背约章,侵犯主权又在普通所谓领事裁判权以上;上海领事团所享此种非分之权,本应据约取消,因何理由须以推广租界为交换条件?而且公共租界永不推放,也载在条约;他们向中国索取庚子赔款,不许中国自由增加关税,不许中国禁止棉花出口,都是口口声声责备我们须遵守条约,何以他们对于上海会审公堂之权限及推放公共租界,便不说遵守条约呢?可见帝国主义者责弱小民族遵守条约,也和军阀政府责人民遵守约法及其他法律一样,凡是与他们有利的,他们便抬出来压人,与他们不利的,他们便悍然不顾了。

租界不是英美的属地,住租界内之华人仍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也载在中国与各国所订的条约;所以一八九九年推放租界时,上海道曾以告示一纸附于致葡总领事兼领袖领事之公函中,晓谕公众,该告示中明说:"所有租界内关系华人之一切章程,如未经当地中国官厅认可,不得发生效力。"(此公函曾载一八九九年工部局报告册第二六二页)工部局自己也知道,外人来中国通商,没有代中国政府及国会来制定法律之权;所以他们将要提出的印刷附律,拟附在洋泾浜章程三十五条,名曰第三十五条甲。我们以为不但三十五条原文,乃取缔马车疾驰,与印刷毫无关联;而且此项洋泾浜章程,从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过,根本上不成为法律,今所谓印刷"附"律,试问"附"在何种法律上面?因此,我们可以说:

此次印刷附律，即使通过于纳税西人会，并竟得上海领团、北京使团之核准，也只对于西人营印刷业者有效，中国人没有服从之义务；因为上海租界还未割让给外国做他们的属地，他们绝对没有自定法律来责中国人服从的权利。工部局对中国印刷业四团体代表说："如华人对于工部局行政有不满者，尽可移居租界外。"四代表应回道："上海是中国的领地，中国人当然有居住的权利；如外人对于中国人反对印刷附律之举动不满意，尽可移居中国外，不来中国经商"。

码头捐原定照货价抽捐千分之一，现在要改为照关税抽百分之三（照关税现制，当货价千分之一点五）。当此工商业不振之时，照旧额加捐一半，以后还须随着关税增加，固然是商民负担太重；根本问题还是：在中国领土之内，在中国主权之下，外人可任意收捐并加捐，而中国官厅收点纸烟捐，他们反出头抗议，这是何等喧宾夺主的世界！

上海市民对此三问题的反对运动，甚为热烈，加入运动的有二十五个商业团体，我们的同胞已渐渐的醒觉了！

我们忠告上海市民的是："此次三问题，都还是枝叶问题；根本问题是要取消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无论英、法、日、俄、美、德等何国人，要想在中国经商，必须以服从中国法律，遵守中国税则，不侵犯中国国家司法与收税的主权为条件。"

1924年4月16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三位一体的国故、孔教、帝制

国故大家叶德辉，他曾著翼教丛编，他曾奉汤芗铭的命令为袁世凯包办湖南筹安会，他现在又奉葛应龙、马济的命令为吴佩孚鼓吹统一。四月十一日《申报》上长沙通信说："自洛代表葛应龙抵湘后，陆续发现诋诽省宪之文字，湘绅叶德辉论省宪一电，尤敢公然谩骂……如前此之列名者，全为'孔道学校'之教职员，此次所谓绅界，又多为'前清状元'、'复辟派'、'王湘绮门徒'与叶沆瀣一气者。"国故、孔教、帝制，本来是三位一体，叶德辉、康有为都是这三位一体之代表。土耳其人欲巩固共和，不得不废逐教主；波斯首相宣称：共和政体与回教相抵触，不许国民谈改建共和问题，否则严惩。土耳其人、波斯人都懂得旧思想、旧宗教和旧政体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独有我们糊涂的中国人，一面不赞成复辟，一面又要保存孔教，这种矛盾的思想，不但要见笑于土耳其、波斯人，并且要见笑于康有为、叶德辉！

部落主义与世界主义

人类社会之政治观念及组织是由部落的而国家的而世界的，印度及中国民族之非政治非国家的观念，是由不进化的部落主义，不是由更进化的世界主义。部落主义和世界主义虽然都反对国家主义，而其立脚点却大不相同；还在部落时代的中国人印度人，还没组织近代国家的能力，至于国际的组织大家更是未曾梦见，若见他们反对国家主义，便

说他们是世界主义，实是天大的笑话。

部落生活的印度人中国人，世界知识简直等于零；他在国内国外关于国际的运动，也简直等于零；若说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未免太滑稽了！

谁叫他们不要皇帝！

有人问我："中国人对于肯以权利归还中国的苏俄，十分疑谤；而对于反对苏俄以权利归还中国的俄白党，反极力供给援助；这是什么心理？"我说："千不是万不是，都是苏俄自己的不是，谁叫他们不要皇帝！"

1924年4月16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一期 署名：独秀



太戈尔与东方文化

太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见四月十四日《申报》太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

在这一段谈话中，中国新闻社记者倘无误记，我们可以认识太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也不必比较的讨论相杀残破的西方文化和生焚寡妇（如印度）、殉节阉宦（如中国）的东方文化孰为健全；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社会上将发生什么影响，进步或退步。

（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认这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流行着支配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死，用不着太戈尔来提倡令他复活。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禁止男女同乘一辆火车或电车。

（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也是东洋独特的思想。在太戈尔的意中，以为正因东洋有这种高妙的思想，所以胜过西洋不知足而竞争，不能忍而不安的社会。殊不知东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

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乐；所以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

（三）轻物质而重心灵，太戈尔也以为是东洋文化的特色。其实中国此时物质文明的程度简直等于零，反之努力提倡心灵思想文化的人，头等名角如唐焕章、江神童，二等名角如梁漱溟、张君劢，其余若同善社社员，灵学会会员已普遍全国；太戈尔若再要加紧提倡，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的机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简。

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

1924年4月18日 《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 署名：实庵



导淮问题与政治

导淮和江苏、安徽两省民生问题关系极大，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来赞成，这是不须讨论的；所要讨论的乃是经费问题。

经费约需二千万元左右，所谓中央致府或地方政府，都不愿担负，遂仍旧提出借款的妙计。

借款导淮之流弊，不但像十三日北京《晨报》所言（向美国借款三千万元，苏齐①、张謇及北政府各私得一千万元），十分要不得；即果借美款实行导淮，将置沿淮三省之地于美国势力支配之下，那更是加倍的二十分要不得。华洋义赈会里美国的侦探，想支配导淮事业已经十多年了。他们想垄断导淮的工程，想支配长淮的运输，想利用陇海铁路，想开辟海州商埠，果如此一帆风顺，海州将为第二上海，而中国苏、皖、豫三省腹地遂入大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件事并不是他们的空想，实在有此可能。

所以现在导淮当以不借用美款为第一条件，至于是否苏齐任导淮督办，还不是什么要害问题，因为导淮督办由财阀或巨绅担任和由军阀担任，都是半斤等于八两。

不借美款，又用何款呢？我们主张应以江皖两省每年糟粮拨为偿还本息，向国内银行团借款；不及十年，即可摊还清楚。南糟本是东南数省人民不公平的特别负担，拨归导淮经费并以后开发沿淮事业之用，本是情理之常。若说此项办法必至牵动全省财政预算，牵动全省军费，两省军阀政府如何能赞成，这便归到根本上政治改造问题，不单是导淮问题。因此可以证明若不根本改造政治，别的事怎样能够着手进行？江苏的绅士们未尝不想在地方做点事，但总想避免触接到政治改造问题，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将来的成绩都可想见。

1924年4月23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二期 署名：独秀

---

① 江苏督军齐燮元。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

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两派，复杂的还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方在萌芽，此时不但不应各怀意见，且实际的政治运动未认真活动以前，也断然没真的左右派之意见发生，即有意见，也不过是私的感情冲突，决不是公的左右派政见之不同。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他们不同之点，所争者自然属于具体的政策；此等政策，此时我们还不能够预知，惟那时采用政策之主张所以不同，必然由于两方之出发点有一些不同的根本观念，此不同的观念，乃是左右派之真意义，这是我们可以预知的。

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不同的观念，即不同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采用妥协方法的是右派；两方的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两方所采用的方法与具体政策，便自然不同了。左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忠诚的要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与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肯出于根本的妥协；右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急于党的胜利，甚至于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

这是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照这个意义，左派乃是真的国民党，真的国民主义者；右派乃是抛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

怎样才是国民党的左派或右派，本应该是如此解释；有人以为国民党中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左派，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右派，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例如高一涵君前曾表示国民党若采用社会主义，他才肯加入；又如国民党某君曾在广州支部演说国民党应采社会主义，否则便是官

僚党；他们这些错误的见解，乃忘记了国民党不是社会党，忘记了国民党的使命和社会党的使命不同。社会党的使命是为阶级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的使命是各阶级合作为国民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固然也可以采用若干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他的使命究竟与社会党不同，所以决不能拿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而且社会党的右派（即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在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其价值远不及国民党的左派，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因此，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肯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因为真懂得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很明白国民党的分子及使命和社会党的分子及使命根本不同，不是可以随便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理论上固然应该属于左派，但事实上将来是否左派，还是个问题。因为所谓国民党的左派，他的真意义乃是“始终采用革命方法，忠诚的彻[做]国民主义，不肯妥协。”并不单是唱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高调，便算是左派。口唱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或什么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不去做革命的工作，这种分子在国民党中是右派不是左派；因为负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他的左右派，应该以革命分子非革命分子为标准，不应该以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标准。

我们希望国民党对于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及一切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都有一个明了正确的认识；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命为国民党左派的人们，对于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及左派之使命，也要有一个明了正确的认识！

1924年4月23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二期 署名：独秀

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

太戈尔在杭州及上海两次演说虽极简略，却已表示他的根本观念。兹综合其演词，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二个错误的根本观念。

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他在杭州说："现在觉着交通便利，民族很容易接近，这果然是科学的功劳，什么火车啊，轮船啊，但是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有许多便利和愉快，反觉着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在上海说："中国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乌乎可。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价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亦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恼闷。……且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太戈尔也知道科学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脱离社会；他更应该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现代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

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若并普劝天下无衣无食无住的苦恼平民也都以进求心灵愉快为重，以物质生活的奋斗为轻，这种人不但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君，而且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是同样混账，这种人还配说什么“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

中国诚然因物质文明而被创，但太戈尔要知道，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物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魔鬼是驱使物质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不是物质文明本身。中国文化诚然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但太戈尔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这种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质所迫，皇帝仍在坐龙廷，龙廷里还幽闭着许多宫妃与阉宦；男子仍在埋头读八股，女子仍旧裹着足关在绣房里；印刷店仍用雕板或木质活字，不会有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欢迎太戈尔；太戈尔坐小车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个月，太戈尔在路上犯了法，知县大老爷或许赏他数百小板一面大枷。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道可以运兵打战，也可以运粮拯饥，所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不知道人类个人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社会不能担保各个人物质的生存，各个人遂不得不各自争存并庇及子孙；阶级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垄断物质的精神的生存之权利，被压迫的阶级不得不起而抗争；民族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不但在国内掠夺劳动平民，并须在国外侵略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弱小民族，才能够维护其垄断私有之权。这三种争夺残杀之根原，共总都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良，换句话说，就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我们敢说，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所以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乃由于不明白社会制度之效用并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

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太戈尔在杭州说:“人类要用爱来调和……这些大师是代表相互的爱显现出来的,为人类友爱的模范,并不像欧美人带了枪炮等等而来,是拿了他们文化的精华来供给中国的。……前面所说两个印度大师到中国来,只要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现在我来,也如这两位大师的精神一样,因为中印两民族间,自有一种不可分离的爱。……现世可怕都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所以大声疾呼,想要回复人类精神上的乐土。”对于太戈尔这些话,我敢说:“先生之心诚苦,先生之术则疏矣。”人类社会三种争夺残杀的根源,上面已经说过;现在再单讲民族间的争夺残杀,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发展到必须输入原料输出剩余生产品才能够维护其阶级特权之时,自然形成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自然结果,也就是民族间争夺残杀之唯一原动力。欧美人带枪炮来中国,并不是欧美人特别没有良心,乃是他们资本制度发达的缘故;古代印度人只带文化来中国,并不是他们特别有良心,乃是那时印度没有资本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印度人也并非特别没有良心,可是因为受了英人支配,也会带鸦片来中国,并帮着英人带枪炮来中国。“爱”,自然是人类福音,但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太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孔夫子的仁义叫了几千年,基督的爱也叫了几千年,何以现在仍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此时太戈尔又来叫“爱”,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我看等于向老虎说:“你不要吃人罢。”你若是大声疾呼,对被人压迫的阶级被压迫的民族说:我们任他们掠夺任他们侵略,我们不必反抗不必残杀他们,还要爱他们,让他们占据这物质上的乐土,我们只要回复精神上的乐土便得了;这便等于向被老虎吃的人说:“你让他吃罢,你还要爱他,你只要灵魂到天堂便得了。”如此,老虎固然要重谢太戈尔先生,可是苦了被老虎吃的人!这就是太戈尔先生要带来中国赤裸裸的一颗良心吗?

太戈尔这两个错误的观念,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重大问题,并不

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我批评他乃根据他在杭州、上海两次演说,并不是事前臆度。这两点都应该附告《文学》周刊记者"澄"君。

1924 年 4 月 25 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实庵

丧权辱国之无线电密约

美国和日本两年来在中国独占无线电台之争，也就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军事上商业上重要的交通机关之争；最狠毒的是他（美国）要占中国重要的交通机关至二十年之久，而建设这机关的经费及其损失还要中国负担，其实中国的军事和商业眼前并不需此。中国无力负担，便要向他负借款的义务；民国十年所订此项借款密约及续约，据日来上海各报所传，说是：电台开办以后，有利益即与中国均分，但中国所得之一半须存美国银行，充作偿还借款之用；倘开办后并无利益，或有亏折，此项借款本利必须于十年还清。电台以外所有交通部一切财源，全数作为偿还之担保。

利益是美国的，损失是中国的，这才真是丧权辱国的外交，反对中俄协定主张派兵收蒙的爱国诸公何以不出来说话？

1924年4月30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三期　署名：独秀



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

去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今年广州圣三一学校的英国人又说:“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请,任从你们中国人的自由。”英美人这样反复声明他们在中国办教育的宗旨,昏瞶的中国人总应该醒觉了罢!

中国人果然有点醒觉了,效法清华留美之阴谋侵略的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朱经农君怀疑于先,北京学界戒严于后,同时奉天教育界且有收回教育权之实际运动,虽至腐旧《申报》记者亦表同情于收回教育权之主张(见四月二十六日《申报》),他并说:“外电并谓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即外人教育权)者,现惟有中国一国,此吾国向所未闻之意义也。”不过我们在《以后一切对华侵略皆将以教育的形式出之》(见本周报二十二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见《前锋》月刊第一期)、《中国教育问题》(见《前锋》第二期)等论文中,都大声疾呼的说过,可惜《申报》记者心史君都未曾注意。

《申报》记者心史君并详论最近土耳其收回教育权及奉天收回教育权两件事,这两件事实是我们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实例,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欧战以前,列强在土耳其设立的学校,中小学、女学和大学都有,最多的是法国,其次是德国、美国,不用说,这些学校之目的和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一样,都是养成奴隶人才,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大战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否认了以前与各国所定条约,于是法国在土耳其的学校都关门了,美国的和德国的仍旧开着;一九一八年协约战胜后,德国在土耳其的学校,也都破坏了,惟有美国的学校,一直到洛桑会议,尚为土耳其所应许。可是现在土耳其人已明白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侵略,和

法、德并非两样，所以在收回司法权和关税权之后，最近更收回教育权，凡外人在土耳其所设学校，一律勒令停闭，即美国新在君士坦丁设立之医学校及以六万镑经费开办之女子专门学校，亦在勒令停闭之列；这就是所谓“不受投降条件中最末之一权利”。土耳其人这种独立不羁的气概，实在令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教育家愧死！外人替他办教育便讴歌外人，军阀捐钱给他办教育便讴歌军阀，“有奶便是娘”，还论什么条件！

中国所受列强教育的侵略状况是怎样呢？全国大点的城镇几乎无处没有教会学校。除无数小学普及穷乡僻壤不计外，即在城市之中等以上的学校，据中华教育改进社报告：全国一三七五校中，外人设立者占一六二校；男女学生二六九一〇八人中，外人所设学校之学生占二八五三四人。他们在中国所设大学，几乎无一省没有；他们势力最盛的是南京、上海、广州三处，最可耻的是广州、南京，教会学校以外，即中国自设的大学及高师中，也有许多留美学生或教徒为大美国及教会宣传德意，这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伤心之事。至于外人直接设立的学校，不服中国政府管理权，以耶教经典代替中国的伦理道德功课，更不用说了，所以外电说：“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者现惟有中国一国。”试问讴歌教会学校清华学校及欢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诸君，对此外电所云作何感想？

日本人宣传的本领及工具远不及美国人，所以中国人反对日本的潮流，比反对美国不知要大过几千万倍。日本人现时虽然知道，然而他的手段仍是异常笨拙，他方在模仿美国清华式的运动，马上即被中国人看出破绽，尤其是被讴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看出破绽；同时，他在奉天方面的教育侵略也过于肆无忌惮，引起世界上最麻木的中国人也起来反抗了。

日本在奉天教育侵略的方法，是在南满、安奉两路线各站，迭次添设公学堂(即小学)、添设师范学堂，招收中国学生，推行日本风的学校，以造就日本化的中国人。去年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教育厅长谢荫昌曾提一案，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省政权所及之地域，对于奉省人民施行师范教育及小学教育。此案通过后，即由厅派调查员调查两路各站之前二项教育，报告结果，一体认为应予收回。日本听得此

消息，遂向交涉署、教育厅质问，谢厅长则主张由中国计费偿还，收回自办，日本人仍不服，最近奉天政府决定召集省教育会临时会解决此案。

日本外务省派员质问谢教育厅长时，问他是反对日本办学堂或是反对办学之人，谢答道：

> 两者都不赞成，对于用人，日人决聘不到好的中国教师，中国人稍有智识血性者，多不肯为日本用，故公学堂之中国教员，多半为中国不用的腐旧老童生。各公学堂实在办得不好，女缠足，男留辫，学生但知有清国、日本，不知有中华民国；其余功课均无足观。办法更令人不满意，学生听讲时，巡警监视，不准教员讲中国人之爱国话。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总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奉天之教育的侵略，是何等肆无忌惮！但我们同时应该知道英美教会在中国各省所办的学校，何尝不和日本人在奉天办的公学堂是同样宗旨，"三育"和"圣三一"便是标本，决不可像英美留学生一面怀疑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一面却讴歌英美对华文化事业！

我们希望奉天人，收回教育权更进一步勿以小学师范为限；我们更盼望全国教育界，不但对于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应该怀疑，对于英美在华教育侵略也应该反对；就是对于教员中美国化的留美学生及教徒也应该廓清。勿让收回教育权不受投降条件之支配的土耳其人专美于前！

1924 年 4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三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

江亢虎南游追想记上说："中国之招商轮船局与日本之邮船会社同年成立，四十余年来，彼则巨舰百数，纵横五洋，船长、技师人才如鲫；我则长江近海尚不能与怡和、太古、日清争衡，并大副、二副无本国人，其他更无论矣。"我想太戈尔若听了江先生此话，必然又要说：这些物质文明我们不必羡慕，我们"东方文化重道德"，我们重在"回复精神上的乐土"，"固不在目前侵夺胜利"。在友爱无争的诗圣看来，不但江亢虎所见不广，即哈巴克沁格在上海为英人之阶下囚，也未免自讨苦吃，你看我友爱无争的诗圣，是何等逍遥自在的在北京为英人之坐上客！

洛桑议约与中俄协定

《申报》记者心史君说："土耳其为新兴之国，朝气勃勃，一跃而入于独立不羁之位置，凡东方病夫向有之一切沉疴，若外国驻兵，若领事裁判权，若不平等之税则，洛桑议约，一举而空之，久已动世人之惊叹。"心史君所惊叹的土耳其这些独立不羁之位置，中国在中俄协定都得着，并且中俄协定明认中东路可由中国赎回及中国在蒙古之主权；而洛桑议约则土耳其不能收回莫孛尔油矿及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海峡，两下对照起来，中俄协定更好过洛桑议约，何以心史君并不惊叹呢？

1924年4月30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三期　署名：实庵

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华界行使职权吗?

奸商卖国贼郑伯昭,为图上海闸北宜乐里房屋加租翻造,被众房客所反对,遂藉洋势,假托英商泰利公司领换道契,于五月一日由泰利洋行大班白兰特,在工部局领取执照,带领印度巡捕二十五人,马队一排,西探十二人,荷枪实弹,督率小工五十余人,到宜乐里,将该里沿马路一带商店,实行动手拆屋。时在早晨七点钟,住在该里各房客均由梦中惊醒,一般妇女小孩搬运什物,如遭大难,哭声震天。当拆屋时,一部分工人涌入各商店内,拆除楼板地板,一部分工人上屋抽瓦,一时砖瓦乱飞,有房客赵子祥及某姓小孩均击伤头部。该里房客联合会及闸北国土维持会均召集紧急会议,以图对付;闸北各公团也都愤慨,开会讨论设法援助。

我们若问:工部何故派人到宜乐里拆屋,他们必说为保护泰利洋行产业。

我们若问:外人开的泰利洋行何以能在中国内地置产,他们必说泰利洋行在宜乐里置有房产,曾得中国官厅准许;因执有道契的缘故,外人在邻近租界之内地(如闸北、浦东等处)置有产业者很多。

如此,我们便要问:闸北宜乐里房捐门牌向归中国工巡局办理,明明不在租界之内,即泰利洋行翻造该里房屋亦曾向中国工巡局请领执照,此次泰利洋行何不仍在工巡局控告,或请英领向中国交涉署交涉,而控之租界工部局;工部局又遵何条约有何权力能派武装巡捕到完全华界拆毁房屋?他们敢说"租界工部局照条约能在中国任何内地行使职权"吗?

我们敢告维护国土反对推放租界的全上海市民,此次工部局拆毁宜乐里房屋,决不是单纯的宜乐里房客被压迫问题,乃是工部局越界行使职权侵犯中国国土国权问题呵!

1924年5月7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四期 署名:独秀

欢迎广州上海两学生会

中国爱国的青年学生，自“五四”、“六三”后，几乎一蹶不振，各地学生会大半有名无实；尤其是学生之重镇上海、广州学生会，连名也没有了！

好了，现在否极泰来，不但北京、武昌学生会渐渐活动起来，而且广州学生会及全国中最有力的上海学生会，都已恢复他们的组织了！

三月九日复活的广州学生联合会，在改组宣言里，已显现他们彻底觉悟。我们更忠告全广州的学生，今后将地方观念、宗教观念荡涤净尽，坚固的团结整个广州学生会，永远勿从安那其的谬见，自由退出而分裂而自杀！

“六三”运动的青年英雄——上海学生，亦于“五四”纪念日，将可敬的学生联合会重整旗鼓，出席者三十余校代表，会中职员都已选出了。我们更忠告全上海学生：(一)今后之活动应全体动员，各个都能尽职，勿但责难少数领袖；(二)应视全国学生为一体，勿存南北之见；(三)勿以宗教之故分裂上海学生团体。

我们更有忠告于上海、广州学生会的是：全国学生总会是学生界必需的组织，是学生界作战的重要工具，是敌人——列强与军阀——所疾视的，是学生界所应拥护的。学生总会应发见以前的错误，努力与上海学生群众携手合作；上海学生亦应捐弃细故而谋全国学生的大团结！

爱国的青年们！我们应该只看见敌人们——列强与军阀——压迫我们侮辱我们是何等凶猛，我们不应该单看见弟兄们的小过，大家亲密的团结起来吧！

1924 年 5 月 7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四期 署名：独秀

工界厄运重重

自“二七”后，全国工界(只有广州除外)都在军阀及中外资本家猛烈的进攻之中，最近流血的惨痛又将复现了！

第一件事就是本月十三日汉口工人杨德甫、周天元、黄惠、萧晋德、许白豪、吴玉山、钱生财、罗海丞、黄子章等被捕，目下尚在稽查处审讯中；他们大半是京汉失业工人，落在正面的敌人直系军阀手里，自然是有凶无吉！

第二件事就是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公司向官厅请兵弹压，前由湘潭县署派兵拘去工人仇六生；近又请长沙县署派荷枪兵士十余人到炭塘子取消工会，强制工人上工，工人向之理论，兵士即放枪示威，并拘去工人及旁观者四人，公司且有贿请县知事枪毙此四人之说。此矿运工工资，向来按照斤两计算，裕甡锰矿矿公司在官厅立案，以二十四两为一斤，已经出乎情理之外，乃该公司复违反成案，竟私以三十六两为一斤，工人等终日拼命搬运犹不得一饱，迫不得已乃为要求减秤而罢工，要求不着还要被捕流血，世间竟有此不平之事！

第三件事是开滦煤矿矿井，前曾压毙工人五十余名，事后只挖出尸身十七具，所有被难家属境况极其惨窘，乃矿局抚恤只给有亲无尸者二百二十元，有亲有尸者一百十元，此数只等于购买一骡马之价，虽工人家属备极哀求亦无效。

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那一样不是工人血汗所赐，而军阀资本家竟这样毒杀虐待工人，一般社会倘竟不为工人表示同情，那真是工人无负于社会，而社会有负于工人了！大家还要明白：中国社会若始终是这样冷酷，必不单是工人阶级之不幸！

1924年5月21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汉口之党狱

直系军阀吴佩孚之走狗萧耀南，近又在汉口逮捕多人，外间传为压迫工人过激运动，其实是破坏国民党运动；因为杨德甫等九人虽是工人，也都是国民党党员，并且是汉口党部之重要职员，同时被捕的律师国民党党员刘芬（即刘伯垂）和工会向无关系，况且自“二七”以来，汉口工会运动异常沉寂，那里还有什么过激运动。

国民党是创中华民国的政党，中华民国的招牌一天未下，国民党当然在任何中华民国领土内有公开的活动之权利。创造中华民国的党不能在中华民国公开，已经是奇了；不但不能公开，还要因为是国民党而被捕，岂非奇之又奇？

最近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党魁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独立奋斗的精神与决心，已渐渐得着全国民众的同情。卖国媚外的直系军阀见了眼红，遂一面在香港、北京制造传播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一面在汉口大捕其国民党党部人员；他们这样倒行逆施，爱国的民众应该对他们更加一层深的憎恶，因为得罪国民党人其罪小，摧残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其罪大。摧残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实际上便是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

1924 年 5 月 21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转机

一年以来世界的反动政治之表现，最显著的便是意大利之穆李〔索〕里尼内阁、法兰西之普恩赉内阁及日本之清浦内阁。但就近日新选举之结果看来，这种反动的政象已略有转机了。

意大利之选举，国民党从一百零六席降至三十九席，社会民主党从一百二十二席降至四十八席，独有共产党从十三席增至十七席。其结果穆索里尼一年余“清一色的意大利议会”之努力完全失败。

法兰西之选举，左翼诸党共得二百九十六席，内计急进社会党一二七人，社会党一〇一人，共和党三九人，共产党二九人；右翼诸党即政府党共得二百七十四席，内计稳健共和党一三七人，左共和党九二人，独立急进党三四人，保守党一一人。政府党既失败，普恩赉势必出于辞职。

日本选举之结果，宪政会得一五三席，政友会得一〇一席，革新俱乐部得二八席，以上反对政府之三党共得二八二席；政友本党即政府党只得一一〇席，此外商业同志会一二席，中立派五七席，政府党在国会所占议席勉强只及三分之一，清浦内阁已无留恋之余地。

此中更可注意的，属于第三国际之共产党，不但在法国获得胜利，而且在备受意大利政府压迫摧残之下，尚能够得工人之拥护增加议席。

1924年5月21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中国命运已在华盛顿会议决定！

去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今年广州圣三一学校的英国人说："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请，任从你们中国人的自由。"现在广州圣心学校的法国人又说："中国命运已在华盛顿会议决定，尔等学生无须去救，亦不能救。"

热心收蒙的先生们那里去了？

英兵侵入西藏的消息，一天紧似一天，班禅且被逼来京了，热心收蒙的先生们也应该热心收藏，现在何以一声不响？难道主张只英国应该有藩吗？

黎元洪又缩头了

黎元洪南来投机不成，已厚着脸由日本回到天津了。他自己说一生为人利用。其实有机可投时，他便由大都督而大元帅而大总统，无机可投便将头缩进去，谁能利用他？

1924年5月21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

意大利巴尔达里尼教授对中国青年说："余虽主张和平，然为弱小民族计，则自卫之战，亦认为不得已，余亦不反对君等之主张。"巴氏这样主张和平，还算比太戈尔说得有分寸。我的朋友说："巴氏和平运动是积极的向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反抗，太戈尔那比得他；太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所以在北京的英美人尤其是宰制中国的舒尔曼、安格联都很欢迎他，第二次诺贝尔赏金——和平运动的赏金，太戈尔诗圣或者可如愿以偿"！

可怜想吃天鹅肉的中国人！

美国人以庚子赔款充中国学生留美学费及在中国办清华学校，一方面可以造成许多亲美的奴才，一方面名为退还，其实这笔钱仍旧用在美国，并且博得无知的中国人歌功颂德，这是何等巧计！可怜上海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道路建设协会都想吃点天鹅肉，这是何等痴愚！

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

一班卖国贼合伙凑拢的所谓北京政府，竟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

令全国严禁人民"五七"、"五九"开会纪念国耻。湖北的军阀近又禁止在全国运动会散放排日的传单,且逮捕散传单的人。这班军阀们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是什么?

1924年5月28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七期 署名:独秀

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

太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卖阶级的工党政府

全世界的阶级对抗与阶级战争,已紧迫而且需要得万分,却只有英国工党政府的殖民部大臣汤姆斯,还闭着眼睛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说:"请各销除阶级战争,勿发阶级议论。"听你如何销除阶级战争,听你如何不发阶级议论,而资产阶级的政党——保守党及自由党,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势力瓦解以前,除非工党政府绝对抛弃工人阶级的利益事事惟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图,他们终于不能容忍工党久握政权,这是很明显的事。汤姆斯在世界社会党人中,是一个卖阶级的老手,他这种论调,也正是想买资产阶级之欢心,以苟全他们的所谓工党政府这块招牌,只恐怕英国的工人阶级终不能这样可欺罢!

太戈尔与北京

北京城里提倡道德的大官,正在严禁共产公妻的邪说,社会上一班

同善悟善等东方文化派，也相和着齐戒礼佛迎接铁牌；似乎如此这股的东方道德神佛精神已充满了北京城，用一百万倍的显微镜也寻不出丝毫科学与物质文明底影儿。太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康有为的道德

此时社会上最时髦的名词是“道德”。究竟什么是道德？康有为于二十四日在青岛讲演道德，不知道他所讲是复辟尊君等公的道德，还是劫夺经像敲索皮袍等私的道德呢？

1924 年 5 月 28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七期　署名：实庵



答张君劢及梁任公

张君劢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对于适之及余之意见加以驳诘，关于适之方面，自有本人负责答复，不劳我为代庖；关于我的方面，先讨论重要的三点，次则略论其他。

第一点，张君劢说："马氏自名其主义曰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别于翁文辈之乌托邦的理想，且推定生计上之进化，遵正反合之惟物史观之原则，故资本主义之崩坏为不可逃之数。然自今日观之，以欧洲而言，资本主义之成熟，英远在俄上，顾劳农革命，何以不起于英而起于俄乎？以俄与德较，则德资本主义之成熟又在俄上，何以德之革命成绩，反居俄后乎？"怀这样疑问的人，世界上很多，不止中国张君劢一人，都是因为不明白社会科学之方法论的缘故。因果律虽是一切科学共通的原则，而各种科学之方法论却各不相同，不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即自然科学中数学和化学、动植物学都各不相同。社会上有相类的因之现象，必将有相类的果之现象；惟其果之现象之特定的时空及现象中之个体现象，则另有其因果关系，而非社会科学范围以内之事，这本是社会科学重要方法之一。譬如，一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发达起来，其社会中劳动运动必将因之发生，此一社会科学之公例，在各国简直没有例外；而其劳动运动将发生于何日何地以及运动中之领袖将为何人，此事只有请问六壬卜算大家，社会科学无此神通。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料资本主义必由发达而崩坏，崩坏后继之者必为社会主义，此乃就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一般趋向而言；至于资本主义之崩坏与夫社会主义之现实，果在何国开始及完成，又另有其特殊的因果关系；固然，在特殊的地域内，倘有特殊的社会现象之因，亦可推见其特殊的社会现象之果（其特定的时空及个人关系，仍非社会科学之事）。然究竟和马克思所指人类历史的进化由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之一般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件

事。俄国劳农革命何以先于英、德，将来英、德劳农革命后，其社会主义实现之日程，必速于今日之俄，这是因为他们资本主义发展之进程各有特殊的原因（例如俄国资本不及英、德，而集中速度则过之），和马克思所指全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过程，是两件事。法兰西资本主义之成熟，自始至今都远不及英国，而巴黎共产团之暴动，还远在俄国劳农革命之前，马克思亲见之，原不待张君劢先生今天来驳难了。人类社会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所以社会现象也非常复杂，因此，社会科学，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决不像张君劢先生所称引的那样简单，并且一定还不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样简单。

第二点，张君劢说："且即以俄论，私有财产之废不及二年，而已许私人买卖私人土地所有权，且大招致外国银行与外国资本家，不知此等翻云覆雨之局，又遵科学的社会主义全书中何种公例乎？"有这种疑问的人，世界上也不只张君劢先生一人，这是因为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实质与意义的缘故。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学家，自始便未尝妄想一革命便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不过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了，在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下仍是这样，并未翻云覆雨。小企业初因资产阶级的怠工自己放弃，不得不由国家经营，今因他们愿意继续营业而租给他们，也无所谓翻云覆雨。战争时军需万急，不得不禁止买卖强制征发，战后停止征发，生产力又未到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时期，自然没有禁止私人买卖的必要，这也无所谓翻云覆雨。俄国劳农革命家果曾妄想一革命便马上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便马上能够完全废绝私有财产，果如张君劢所言现在允许私人买卖是翻云覆雨，因为前此已废止私有财产已不许私人买卖，如此，试问苏俄宪法第六十五条第二三项，剥夺坐食以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选举权被选举权，岂不是赘文？在新经济政策之下，这两种人仍然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实无所谓翻云覆雨。说他翻云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实质的缘故。革命的内外战争中，势不得不采用军事共产政策（其实只是"禁止买卖强制征发"，无所谓共产），非此无以应军事之急需，且非此无以覆敌对阶级之基础；战争停止，破坏事业告了

一段落，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何况半亚洲式的俄罗斯；所以此时苏俄采用的经济政策，在社会革命之经济改造的过程上，正足以证明客观上的必然性，也正足以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想不同。说他是翻云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意义的缘故。

第三点，张君劢说："我之清华讲演中所举九项，谓非科学所能解决，而断其起于人类之自由意志……独秀复胪举社会学家言以相难，谓此九端之因果尽为科学家所能解释，而归结于物质为社会变动之大因。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过去，科学家汇集各种事实，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事之可能，何待赘言？顾我所以举此者，非曰社会学家之说明是否可能也，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何自而来也。甲以为然，乙以为否，甲曰以为是者，乙曰又以为非，其变迁之速如此，而推求所以致此者，则曰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之，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也。夫不究九端之动因，而但言科学的解释，则社会学家之关于九端之说明之文，连篇累牍，我虽浅学，岂并此而不知？夫科学之大本曰因果公例，有同因则生同果之谓也，吾人据此公例，得以推定物理上天文上种种现象，虽历久而不爽毫厘；若夫人事，但能关于已过者，于事后为之解释，此种过去之解释，能视为与物理公例有同等价值乎？殆不然矣！故独秀虽能举尽社会家言以难吾九端之列举，然吾之根本主张，仍是一丝一毫不能动摇也！何也？小家族后之家庭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公有财产后之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张先生这一篇说话，说坏点，直是遁词；说好点，他的观念，他的论点，他的文义，他使用术语，都大欠明瞭。张先生果始终承认他所说的"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过去，科学家汇集各种事实，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其事之可能，何待赘言？"这段话不错，我们已经用不着论辩。汇集各种事实而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非科学之方法而何？此方法倘有应用于说明及推求社会现象所由来之可能，则社会现象亦必为因果律所支配，尚何待赘言，社会科学亦得成为科学，又何待赘言？社会现象若不为因果律所支配，虽事后亦无法推求其现象所由来；若既为

因果律所支配，则可据今果以推求前因，亦可据今因以推求后果；惟张先生如欲超越吾人犹未及闻见之今因，凭空推算千百年后之果，虽历久而不爽毫厘，此事大类神秘的《推背图》、《烧饼歌》，不独人事的社会科学所不许，亦物质的自然科学所难能。例如天文学无论如何进步，亦不能于气压之动象未现以前，预示数十百年或数年内某地某时风雨寒热之定象，虽历久而不爽毫厘。资本制度发达，宗法制度破坏，其结果小家族制度自然发生；共产制度实现，私产制度破坏，其结果家族制度将简之又简而至于无；生产力大发展，分工制度大发展，生产方法及生产工具都日趋于集合而不可分离，其结果财产制度亦必日趋公有；此等都可据今因以推求后果，过此以往，欲求知千年万年后的社会制度如何，只待富于神秘性的玄学大家重造新推背图，社会科学家惟有甘拜下风！前所辩论之九项中，一部分明明是推求社会现象变迁之动因及人类态度随此变迁而变迁之动因，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皆是；一部分明明是推求人类之人生观所以不同的动因，如第五、第七、第八皆是。乃张先生一则曰“不究九端之动因”，再则曰“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我真不懂他所谓“动因”，在术语上到底是何意义？而且张先生所指九项，究竟是说社会现象还是说个人态度，其观念及论点实在太不明瞭。在他“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何自而来也，甲以为然，乙以为否，甲日以为是者，乙日又以为非。”这几句话看起来，明明是指个人态度即个人的主观，不是指社会现象，他对于我解释的社会现象之动因，似乎已经承认，他所以说：“此事之可能何待赘言”，又说：“社会学家关于九端之说明之文，连篇累牍，我虽浅学，岂并此而不知?”（张先生倘不抛弃玄学家以个人自由意志为社会变迁之根本动因的谬见，无论他如何博学，对于我关于九端之说明，其实未曾知，且恐终身亦未必知；然而他竟自欺的说：“岂并此而不知?”他若再将我说明九端之文细心看一下，他必然自悔发言轻率。他倘不自悔发言轻率，便真是知道我关于九端说明之可能，也便真是知道社会变动及人生观变动之唯物的说明之可能了。）然而同时又说：“独秀虽尽举社会家言以难吾九端之列举，然吾之根本主张，仍是一丝一毫不能动摇也，何也？小家族后之家庭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公有财产后之制度如何，谁知之乎?”似此，他又是指社会现象而非指个人态度，其论点不明如此！吾再简单的正告张先生：社会现象变迁

之动因及大多数个人对此变迁之态度即社会心理，推求其最初原因都是物质的，而为因果律所支配，因此，社会科学家才有加以物质的因果的说明之可能(幼稚的社会科学家所说明的因果是否和社会现象之实际因果一一符合，这是另一问题)，至于个人对于各项问题之态度之变迁，其异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日以为是，乙日又以为非)，则仍是明显的社会心理或隐伏的社会实质变迁之结果；其同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以为然，乙以为否)，则因社会之新旧变迁终属相续而相错，没有截然的突变，于是个人不同的历史和环境遂造成个人不同的态度，即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个人态度即人生观之变迁与异同，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个人自由意志之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个人意志之活动，诚然是事实，而非绝对自由，因为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律并心理现象的因果律支配，而非支配因果律者。

以上三点之外，还有数事须请教于张先生：

(1) 讨论真理，当以符合实际与否为标准，不当以其说新旧为标准；张先生说我生当今日而犹守马氏之言若圣经贤传，然而张先生自己却连篇累牍的称引穆勒约翰与詹姆士(我生平论著绝不似张先生动辄称引古人)；不知穆勒约翰以后唯物派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詹姆士以后测验的心理学均大有进步，何以张先生犹守穆勒约翰、詹姆士之言若圣经贤传？

(2) 张先生说："生当今日，而犹守马氏之言若圣经贤传如陈独秀者，岂为求真哉？亦曰政治之手段耳！墨司哥之训令耳！"吾当正告张先生：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若张先生鼓吹玄学反对马克思学说，是否求真，是否政治手段，是否直接的受研究系之训令间接的受北洋政府之训令，像这类逾越讨论道理之轨道以外的话，我在此处不屑多说！

(3) 张先生所谓生当今日不应犹守马氏之言的理由，乃是"谚不云乎，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张先生(不但张先生，自来唯心论者)在社会动象中，只看见思想演成事实这后一段过程，而忘记了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实这前一

段过程，这本是各派唯心论之共同的中心的错误。他们只看见社会上一种新制度改革之前，都有一种新思想为之前驱，因此便短视的断定思想为事实之母；他们不看见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所以发生的背景，决非无因而生。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些事实底儿孙，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笛卡儿说："我思，因此，我存在。"我说："我存在，因此，我能思。"我并且说："我不存在时，因此，我不能思；而宇宙间一切物仍存在。"敢告一切唯心论者，倘不能论破我这辩证的方式，别的千言万语都是支遁之词。

(4) 张先生在此序文中，分"物质科学"、"个人心理"及"社会生活"为三类，在此三者中，只承认物质科学是真正科学，并力言社会生活之超科学较个人心理为尤甚，其论点视前文明晰，不犯笼统混淆之弊，这或者是他的思想更成熟之故。但张先生要知道：这是因为个人心理现象比物质现象复杂，社会现象比心理现象更复杂，所以我们人类对于这些现象因果之认识便有比较的精粗迟速之不同，并不是宇宙间诸现象中，一部分是有规律秩序的，一部分是乱杂无章毫没有规律秩序的。宇宙万象之有规律秩序是一件事，我们人类的知识已否认识这规律秩序又是一件事，不能拿我们主观上犹未能完全认识某一部分之规律秩序，遂断定客观上某一部本来没有规律秩序。现在不必谈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单就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来说，斯密亚丹以来，果如张先生所谓"绝无一条真正公例"吗？此时物质科学之公例视社会科学之公例多而且正确，也不过是比较之词，其实物质科学之公例仍不敷应用于一切物质现象而包括无遗及其已成的公例又时复动摇，这都是彰明的事实，张先生岂能因此更主张物质现象也不为因果律所支配，并对于物质科学也要否认吗？我想生在今日的张君劢必不至如此。但是在五百年前，物质科学即张君劢今日所承认之真正科学，那时他的公例又有几条呢？那时人们否认物质科学，否认物质现象为因果律所支配，比现在的人们否认社会科学，否认社会现象为因果律所支配，

岂不更为凶猛？

(5) 张先生说："所以以人生观与科学对举者，谓科学有一定之公例者也，人生观则可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而且在创造之中者也。"张先生又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却是他又说："事实如此……十九世纪以来，欲进人事于科学之迷梦，今可以觉醒矣。"张先生这段文章未免太逞笔锋，忘其所以了！原来张先生所说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而且在创造的人生观，不受科学因果律所支配的人生观，仍然要跟着事实走！原来事实仍然是思想之母！原来思想仍然没有超越事实的可能，超越事实的想头乃是迷梦！原来张先生也重视事实，竟不相信人类思想意志可以自由创造！

*　　　*　　　*

梁任公在非"唯"文中(见二十期《教育与人生》)，对于我们也有两个误会，这两个误会原来是各国学者对于马克思派普遍的误会，在欧洲在日本都有不约而同的误会，梁任公误会我们，也和他们完全是一样的论调。

第一个误会是他说我们是"机械的人生观"。这大概是因为他不甚注意近代唯物论有二派的缘故：一派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一派是历史的唯物论；机械的人生观属于前一派，而后一派无此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为人是物质造成的，历史是人造成的，如何说他是机械的人生观？我曾有《列宁之死》一短文载在第十六期《中国青年》，也是说到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兹摘录于下：

> 唯心派素来把历史变动之唯一原动力归到个人意志之伟大，因此将俄罗斯革命事业，无论功罪是非，都当作列宁个人的事业；因此，列宁死了，他们便以为俄罗斯革命将随之寿终(即苏俄瓦解之意)。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历史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俄罗斯有农工大群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为之拥护；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他们不明白苏俄之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地位，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所以这派人的想像，是和事实不符的。
>
> 然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

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许多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这便是我们所相信之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之点。列宁生前在革命中的成绩，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死后，在新俄建设及世界革命中的损失，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的。人造的历史和机械的影戏不同，我们决不可陷于机械的唯物论之误解，说列宁之生死存殁都和俄罗斯革命事业绝无影响。

梁任公第二个误会是他说："唯物史观的人们啊！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啊！若使你们所说是真理，那么我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环境的流年'，早已经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这个误会也是因为他把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看做一样。张君劢先生也说："假如其言，社会进化为生计条件所支配，而无假于人力之推助，则马克思之宣传与颠沛流离，岂不等于庸人自扰？"胡适之先生也曾以同样的理论质问我；最有趣是张君劢也以同样的理论质问适之。历史的唯物论不否认个人之努力及其和宿命论不同，本是唯物史观中一部分重要的理论，Boudin 的马克思学说之体系附录二中论此颇详，怀疑者觅此一读便自明了。兹再录我答适之的话以答梁任公与张君劢：

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我们不妄想造一条铁路通月宫，但我们却不妨努力造一条铁路到新疆；我们不妄想学秦皇、汉武长生不老，但我们却不妨努力卫生以延长相当的寿命与健康的身体。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

此外，对于梁先生非"唯"的意见，我也要附说几句：

原来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及人生观，向分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

两派（我不承认二元论能够成立），唯物唯心是沿用翻译佛典之名词，在西文里原没有什么“唯”字；但物质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亦为物质所生；精神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精神，物质亦为精神所生；二者结论虽正相反对，其均为一元论则同，一元便与“唯”无别。

互相联系的森罗万象，本来是一气呵成的整个世界，其根本或云都是物质，或云都是精神，却不能说是分途并进各别为一世界如二元论者之所想像。因此，二元论之归结，恒为客观的唯心论，即使他本不欲“唯”，而事实上令他终不得不“唯”；犹之唯心论者终必采纳宗教神灵之说，因为在有人类意识以前，单纯的物质世界久已存在，若不抬出神来，精神一元论的招牌便须自己取下。

二元论终不能成立也如此，无论物质或精神，世界终属一元，一元就是“唯”，不是哲学者为分门户，主观的故欲其“唯”，乃是探讨万象穷源尽委，客观的说明此现象时不得不“唯”。梁先生所信分明是二元论，二元论本无可“唯”；自己无可“唯”便责骂他人“唯”，自己主张二元便责骂他人主张一元（“唯”就是一元，唯物论就是物质一元论），便下哀的美敦书来宣战，这是何等“学术界专制帝王的口吻”！

客观的说明宇宙现象之“唯”，和李斯、董仲舒对于人为的学说定一尊绝异端迥不相类，乃梁先生竟并为一谈，这是何等浮光掠影的望文生义！浮光掠影的望文生义而不能深入骨髓解析其内容，或者正是梁先生一生治学之受病处；梁先生果真欲在学术界指导青年，须先于自己受病处深加猛省！我知道梁先生不是饰非文过的懦夫，故敢进直言。

五月二十五日

1924年8月4日　《新青年》（季刊）[1]第三期　署名：陈独秀

---

[1] 《新青年》（季刊）是继《新青年》月刊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名为季刊，实际从1922年6月创刊至1924年12月休刊，前后仅出四期。

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

据近日上海各报电传，五月十三日在汉口被捕之国民党党员工人杨德甫、周天元、罗海澄、黄志章、许白昊五人及律师刘芬，确于五月二十六日由汉口解赴洛阳，二十七晨，由吴佩孚亲自审问数语，即将杨等五个工人绑出枪毙，惟刘芬因湖北省议会电保，尚在押候讯。

他们被捕被杀的罪名，据《申报》五月二十九日汉口通信说："军署系先得沪探密电，谓杨受粤孙密令，纠集党徒回鄂，图结工人起事，故军署饬令稽查处逮捕，而工党之狱遂起。"又据萧耀南所给湖北教育厅密令说："案准府军事处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

原来杨德甫等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湖北实行共产主义而被杀，世界奇案冤案，莫奇过于此冤过于此了！

第一，孙中山并未在他政权所及之地鼓吹共产主义，何以能够派人到湖北实行共产主义？第二，杨等五人加入了国民党和在汉口党部担任职员，这都是事实；然周、罗、黄、许四人并未到过广东见过中山，杨德甫去年虽见过中山，新近个人由上海回汉口，那里有什么受密令纠集党徒之事；而且中山先生即有密令图鄂，怎会给关系很浅的党员杨德甫！第三，爽直的工人们，他们加入了国民党，向人直言不讳，杨德甫素好大言，又不择交，声称受命来鄂，因此召祸，这都是意中的事；然而说他是过激党回鄂想行共产主义，则未免太冤了，因为杨德甫、周天元在上海在湖北都曾极力反对过激党反对共产主义。

极力反对过激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竟以过激共产运动之罪名而被杀，世界上奇案冤案岂有过于此者！

可是军阀官僚们所视为过激之内容和我们大两样，例如马联甲所谓教育已经过激，平民教育更是过激，则全国教育界都是过激党，何况

工人杨德甫！更何况革命老祖孙中山！

军阀官僚们眼中心中的孙中山国民党，始终抱定三民主义努力革命，实在“过”于“激”烈，实在是北洋旧势力唯一的敌人；国民党改组后，他们更忍无可忍，所以一面增加兵力压迫川、湘、闽、粤，一面在北京、汉口大捕党人。

营私无法乱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们，他们这种行为本不足责，我们所希望的是有良心有判断力的国民，能在这些具体的事实上分出是非向背，然后国事才有可为。

1924年6月4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

停顿日久之中俄协定，忽于五月三十一日正式签字，其中有无特因，我们不必推敲，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今后蒙古问题。

在中俄国交上论起来，俄国撤退驻蒙兵，承认蒙古是中国之领土，都是应该的；但在数年来努力建设的外蒙自治政府而论，便有问题了。第一不幸是中国犹在极横暴不法的军阀统治之下，决不会有丝毫尊重蒙民自治的观念，他们如果实行派兵收蒙，所派的兵无论是直方或是奉方，都一定要重演参战军焚杀淫掠故事，可怜素受中国军队凌虐的库伦市民，才平安了数年，现在又要重逢浩劫，这是何等不幸！第二不幸是蒙古民族中还有与平民对抗的旧势力王公喇嘛等特权阶级存在，这些守旧的特权阶级，本来愤恨新得政权的平民新党，本来天天在那里做中国军阀扶助他们复辟的梦，现在他们的梦却真有实现的希望，这件事不但是蒙古现代政治进化史上一大关键，并且是蒙古现代文化史上一大关键。

在中俄协定签字之后，蒙古民族中新起的平民阶级，如何能够继续支持他们数年来新的政治新的文化之建设，而不为王公喇嘛等和中国军阀相勾结的旧势力所倾覆，中国及俄国有理想的平民，对于这件事似乎都不能对岸观火！

1924 年 6 月 4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外人对于商标之无理要求

据本月二日《申报》北京电：荷使新照会，对商标要求，(一)商标公报应用英文；(二)商标局应聘外人为顾问；(三)反对第十条更换代理人之规定；(四)反对六个月期限。农商部决采纳前两条，驳覆后两条。

此消息若确，北京的农商部真是昏聩极了！他所驳覆的后两条，第三条不过防杜流弊，第四条更无关重要，到是第一二条关系重大，他反而采纳了。商标公报用英文，不但于一般华商不便，而且中国还不是英国的属地，为什么政府所刊发的公报定要用英文？无论公私何种机关，若自动的聘用外人办事，本是很寻常的事，若以外交的拘束必须聘用外人，便于国家用人行政的主权有碍。在此互市时代，无论何项行政机关，绝对没有关系外人事务的很少；因有外人事务的关系，便须聘用外人，中国还成何国家！

海关必须聘用外人，税务处、盐务署、稽核所都必须聘用外人，铁路也必须聘用外人，司法方面更加有会审公堂和使领裁判，现在商标局又须聘用外人，从此扩充起来，将来因有外人设立的学校之故，教育部也须聘用外人，外交部更是不用说，再扩充到海陆军部及各省军民长官署，那时候中国更加体面了！

1924年6月4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

陈嘉庚出资兴学，一时颇博得社会称赞，其实他完全是个市侩，不知教育为何物，不但把学生当奴隶，连职教员也都是他的雇用人，精卫、杜威先生都曾说这校将来必糟；后来他又雇了一位孔教国学大家（其实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林文庆当校长（陈嘉庚向来自称校主），自然更大糟而特糟。

虽然如此糟，而学生从无动静，我们时常叹惜这些青年真真麻醉死了；岂知不然，今日竟能醒觉起来，驱逐校长林文庆。

起事之远因，不用说是这位校长林大孔教徒闹的笑话太多，其近因，乃五月廿六日林文庆挟嫌辞退未满约期之主任数人，学生抗争无效，风潮遂起。三十日全体学生罢课，电新加坡陈嘉庚撤换校长，三十一日在教育会招待各界，宣布林文庆罪状。林文庆请求军警捕拿学生，学生推代表向海军及警厅说明罢课原因，请勿干涉。林计不售，又于本月一日使建筑部主任陈延廷、教员林幽率土木工人及流氓四百余人，围打学生，学生会主席罗士清，纠察主任林作桢，预科代表雷荣模，均受重伤，海军到场弹压始止。地检厅将殴伤学生之陈延廷、林幽拘收县监，各界多主调停，惟陈嘉庚覆电仍信任林校长，则实无调停之余地，将来该校能否扫除林毒，能否有改善希望，全视学生们能否奋斗到底。

林文庆不但盲目的拥护旧思想，而且在南洋谄媚外人压制同胞，这种人当校长，不单是厦大学生的不幸，实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1924年6月4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以伪乱真

贼人也大呼捉贼，因此竟逃过追贼者之眼而遁去。日本人想冒充中国货，于是在劣货上大书“毋忘国耻”四字。有一班穿长衫的人，想混进工人队里去利用工人，于是也大呼逐出穿长衫的，工人事由工人自己干。以伪乱真，天下事真是无独而有偶！

诗人却不爱谈诗

太戈尔初到中国，人家都称他是诗圣或诗哲，他自己最后演说也说：“各国之有名哲学家、政治家、社会家，均到过中国演讲，供献甚多，余乃区区之诗人，如何能应诸君之要求？”太戈尔果以诗人身份来中国谈诗，我们虽不会做诗，也决不反对欢迎一个诗人，尤其不反对欢迎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诗人。所以吴稚晖先生说得好：太先生你做诗罢，管不了人家的家国，你莫谈天下事！可是太戈尔在中国始终未谈过一次诗。

太戈尔与金钱主义

我们不佩服太戈尔，明明白白是因为他反对科学与物质文明，此事任何人都应该知道。然太戈尔却妙想天开的说：“今有人反对余，或系恐惧余反对一般金钱主义之人。”难道科学与物质文明就是金钱主义

吗？太戈尔在北京未久竟染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异己！难怪北京有人说他，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而且太戈尔他自己如果反对金钱主义，便应将他所受物质文明社会的造孽钱——诺贝尔赏金，散给无衣无食的印度人。

1924 年 6 月 4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实庵

大同主义与弱小民族

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倘无此等方法，只空喊这几个名词，在强大民族口中喊出，虽未必有益而却无损；在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则是何等昏聩无耻的话！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药、催眠剂！

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联合

日本人因为美国通过了限制移民案，转过头来鼓吹什么亚洲民族大联合，还要组织什么亚洲联合会。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们最得意的压迫中国、印度人之日英同盟，你们忘记了没有？你们在中国关于廿一条强占旅大以及在汉口、长沙等暴行，你们有了觉悟没有？你们惨无人道的对待朝鲜人，你们觉悟了没有？我今正告日本人：我们的主张是“日本、中国军阀政府及一切特权阶级除外之被压迫的亚洲平民大联合，不是整个的亚洲民族大联合”。

1924 年 6 月 4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德国对华赔款问题

此时中外喧传的德发债票问题，其实不单是德发债票问题，我们应注意到全部德国对华赔款问题。

德国对华赔款，原来是二万三千三百万元，中国允以战前所欠德国债票作抵一部分。计中国所欠德债，计五厘借款，四厘半借款，津浦借款及续借款，湖广路借款，善后借款，六项共计二千八百五十四万镑，略与对华赔款相等。惟此项债票，已于欧战前后多半转入他国商民之手，曾由中国宣布作废，可抵赔款者，面额只有一千零三十九万八千七百九十五镑，其余德国应另付中国的现款，当在一万万元以上；再除去扣付战前所欠德商借款及战时没收德产，亦不过五千七百万元，其余五千万元何以竟无着落？

至于收回抵作赔款之一千余万镑债票，除去用作偿还战时德侨在华损失四五千万元，净余债票面额约尚有四五千万元；此理应销毁之四五千万元债票，为什么必须折成一千五百万元交德华银行经理？将来这二三千万元的损失归何人担负？

北京政府对于这一切都不顾，一心只顾德发债票案速签定好提用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此案并不交所谓国会通过，已于本月六日在德使馆秘密换文；换文之后，北京军阀们便可取回伦敦存款九百万元，全数用作军费。

对德战争中，中国人民尤其是赴法的华工，受了不少损失，所得赔款名为二万万元以上的巨额，东折西扣，一无所有，实际上只收回伦敦存款九百万元，供给军阀挥霍，北京军阀官僚们营私误国的黑幕重重，即此德国赔款一端，已令国民不能容忍。

1924 年 6 月 11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九期　署名：独秀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

由无政府主义到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或者有人说是退了一步，然在实际进行上，实在是进了一步。所以有些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反抗黑暗势力之联合战线上，应该是我们最亲近的好友；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之联合战线上，更是我们最得力的同盟军；因为工团主义者了解阶级利益调和之不可能，不似伪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采纳劳资妥协政策。

惟工团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之根本理论，我们非是不肯赞成，真是不忍赞成。他们的根本理论有二：

只做经济争斗，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及政治组织；

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反对一切政党。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尤其是今日经济组织复杂的社会，想把经济、政治两下绝对的分开，已经不容易，每个经济争斗剧烈起来，都会变成政治争斗；因为工人们经济争斗的对方，资产阶级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所以要占有政权，正为拥护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们政权所表现的法律之制裁。工人应该是社会之支配者，如何放弃政治不问；如何不要政权管理政治；如何将社会上最重要的机关——政治组织让给资产阶级永远专有，使他们永远支配社会支配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永远在他们政权支配之下只做经济争斗！

既然要问政治管理政治，便不能不要政党，这更是很明白的事。况且同一工人阶级里的各分子，他们的阶级意识及革命之决心不能一致，这便是不能拿整个独立自治的工人团体来代替工人政党之唯一的理由。

以上是理论，以下再就事实说。

大战后，欧洲资产阶级濒于破产，一时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俄国工人都卷入革命的漩涡，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即支配各国的资产阶级

都战慄危惧,他们自救的方法是:(一)用武力、宣传、封锁等破坏俄罗斯工人革命事业;(二)组织欺骗工人的国际劳工局,吹出几个改良政策来和缓工人阶级的革命风潮;(三)造谣诬蔑革命的工人政党——国际共产党,说他们利用工人支配工人,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指导者;(四)在各种工会中实行分裂政策,排斥革命分子尤其是共产派的工人,使工人大的团结分裂为几派。这四个方法同时并行,一九一七年以来的工人革命怒潮居然遏住了;各资本帝国主义的黑暗势力,遂因此得以保持并且复兴起来。这次黑暗势力之保持与复兴,以背叛阶级的第二国际及亚姆斯德丹之黄色职工国际为最有力的工具。他们帮着各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去实行上述四个方法;去帮着宣传劳农俄罗斯的罪恶;去出力讴歌国际劳工局;去造谣诬蔑共产国际,更是他们最得意的技能;去实行驱逐共产派分裂工会,乃是亚姆斯德丹派公开的政策。这班背叛阶级的改良派如此这般的做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足怪,最奇怪的是无政府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于是时大鼓吹其"反对一切政治","反对一切政党","反对一切国家与政府","反对共产党在工会中活动";大鼓吹其什么"独立主义",就是主张纯粹的职工联合会向共产党宣告独立,换句话说,就是工会和共产党不发生关系。照他们的主张,总括起来,是要使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脱离关系,是要使工会和政党脱离关系。他们虽说是反对改良派,而实际上这种行动,却是和改良派取了同样的步调;因此,实际上也和改良派一样帮助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遏住了工人革命的怒潮,让黑暗势力得以安然保持与复兴。工人脱离了政治运动并且脱离了革命的政党,又在高呼独立自治之下,在高呼不要支配不要首领之下,分裂又分裂,自己消灭自己集中的战斗力,那里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能。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欧洲引导工人向这样错误的道路上走,实在是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所快意的事,而是我们所痛心的事!

再讲到中国,小农及手工业的社会,本来对于政治及政党不甚关心,这是中国进步迟缓的现象,决不可说是好现象,军阀政治正是根据这个现象而发生而续价[1]存在的。主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此时

---

[1] 原文如此。

一定很受人欢迎；然而这种主张越受欢迎，越是中国人的灾难。无政府派在中国鼓吹不问政治不要政党，也和太戈尔在中国反对科学反对物质文明一样，都是拿催眠药给磕睡虫吃。

况且军阀政府最不愿人民干政，尤其不许工人干政，更不许工人和政党发生关系。最近萧耀南通令汉口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在工人中宣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到正合军阀的口胃，因为他们怕的是工人要问政治加入政党。军阀们不但不要工人干政和加入政党，并且设法截断工人阶级和知识者的关系，例如：今年日本政府允许工人"五一"游行，但以非工人的社会党不加入为条件；中国的军阀官僚们屡次向铁路工人劝戒"勿为学生政党利用"。这是什么意义呢？原来知识这件东西，是人类社会进化之发酵母，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为失去了经济的权利，便也失去了知识的权利；所以无论何国劳动运动之初期，都少不了知识者之奔走鼓吹和扶助，我们敢说这是没有例外的。军阀们有意或无意窥破这个关键，所以极力破坏工人和知识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在工人中宣传"勿为人利用"的口号，并且在每次工潮中特别注意和严惩参加运动的知识者，例如：上海因邮差罢工而监禁李启汉，长沙因纱厂工潮而杀黄庞，汉口因铁路罢工而枪毙施洋，这便是他们知道而且实行消灭工人革命之发酵母。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鼓吹工人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并且鼓吹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己干，反对一切知识者参加扶助；这简直和军阀是一样声口，这简直是阻止工人参加革命运动，这简直是帮着军阀宣传，这简直是无形中延长黑暗势力的生命。

在工人心理幼稚的中国，不但对于政治组织(政党)和政治争斗不敢出头做，有许多便是对于经济组织(工会)和经济争斗还有点怕。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劳动运动的人，不事急进，不作高论，暂时专力工会运动和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以养成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的力量，这样的方法，我们是不能反对的；若从根本上主张工人永远不问政治不要政党，说好点，这种主张是幼稚的左倾；说坏点，便是避去革命的行动，免得和现政治冲突。

中国工人所受军阀政治的苦痛，别的且不说，黄庞的血，“二七”京汉工人的血还未干，洛阳工人血又在我们眼面前流着，我们怎忍心不去革命，怎忍心不去和现政治冲突！

有人说工人即得政权也不能解决劳动问题，并引俄国劳农革命为证。我们固然不能造谣瞎说俄国劳动者已经一步登天了，而且因全社会生产力向来幼稚之故，俄国工人物质的生活当然不及英美的工人贵族（一部分技术工），比起其余任何国工人却只好不坏；至于实行八时制及其他教育、游艺等精神上的愉快与夫政治上的自由，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若依据资本帝国主义的英日路透、东方等通信社反俄的宣传，便真相信俄国工人还在失业困苦之中，那便是太无常识了。

以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肯相信劳农革命的俄罗斯，而却肯相信资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这是万分不应该的事呵！

我们以极诚恳的情绪来劝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志们，你们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加意考虑，万勿只顾攻击我们客观上正帮助了黑暗势力而自己还不觉察！你们口头上攻击我们，说我们革命不彻底，你们应该要比我们更彻底些更高明些，然而事实上你们在欧洲取了和改良派同样的步调，在中国更老实和一向反对革命的研究系合作起来，你们果何以自解？

1924 年 6 月 11 日　《向导》周报第六十九期　署名：独秀



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

自本月十五日起至今日止，上海各丝厂女工罢工已有十天了，罢工的丝厂已由两家扩大到十四家了，罢工的人数已增加到一万多了；在近来，不但是上海劳动界一大事件，并且是全中国劳动界一大事件。

此次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厂主一面公同议决每日工资至多四角二分，比去年减少三分；一面还要增加做工时间。工人方面以为既要增加时间，就不说加薪，至少也要恢复去年四角五分的工资；厂主方面坚执不允，遂至酝酿罢工风潮。其初十二日，天宝路天昌丝厂工人即有发动之意，经厂主报告警署，派队弹压乃已。至十五日，胡家木桥云成丝厂工人首先罢工，经警捕劝谕无效，狄思威路同丰永丝厂工人亦继起。十六日加入罢工者，又有梧州路之裕经、统益、元丰、长源、福华，七浦路之永泰及天宝路之天昌等七个丝厂的工人。随后加入者又有分水庙之物华厂，斐伦路之瑞纶厂等数家工人。警区在同丰永厂附近捕去女工九人，后释放七人。为首之曾胡氏及黄陆氏尚押在警厅；而罢工风潮不但不因此静止，尚有日见扩大之势。

现在女工们的口号是：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

我们平心讨论此次罢工女工之要求，是否正当：第一，在工资方面说，上海各丝厂女工工资最底额每日一角，最高额每日四角，其余二角、三角、三角半不等；向例新茧上市时，每日工资多的加到四角五分，少的也有一角五分，此外每星期每人赏工半个，每月赏工四个，现在都一律取消了。厂主减薪的理由，是说去年丝价每百斤售银一千七八百两，所以工资加到四角半；今年丝价每百斤只有九百两，所以只定四角二分。这个理由实在似是而非。丝茧总公所开会时，王抟卿君说："现在新茧

三担才烘干茧一担，干茧七担才制丝一担，成本需千元。”成本一千元，卖价九百两，还是赚钱。所以《新闻报》记者羲农君说得好：“丝市不振，固系实情，生活增高，亦为事实，欲求两全，殊无善法；惟工人方面关于生活问题，丝厂方面仅属于利益之厚薄。”第二，在工作时间方面说，厂主们要想更多赚钱，只有设法和外丝竞争市场，若要穷苦的女工多做点工，拿他们的血汗，来弥补你们的损失，漫说丧良心而且也有限呵！况且照部颁工厂通则及省长通令，每日工作不得过九小时；而上海各丝厂都是自晨五时起，到晚六时止；其间除去午膳一小时，实际做工也还有十二小时，现在又要延长时间到晚七时止；上海物价日见其高，女工们所得工资已经不够生活，凭空又要延长做工时间，他们怎能不聚众反抗！

因此，我们承认此次女工罢工所要求的都很正当；我们希望一般社会，尤其是主张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的国民党，对于这些穷苦无告女工们，公开的出来加以援助。

1924年6月18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一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

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中，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对此最重大的意义，实有了解的必要。可是现在尤其是将来实际动作时，都会竟不了解而陷于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必得详细解释一下。

第一，就国民党的主义上讲：此时任何政党党纲，都论列到社会的经济政策，可是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前造端时即注意到民生问题，这是受了德、法两国劳动运动的影响，而后进的中国国民党遂有此特色——和民族、民权并列的民生主义。什么是民生主义？简单说，就是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生"计问题，不是说解决全民生计问题；因为全民中富有的部分，当然不劳国民党锦上添花为他们来主张民生主义，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乃为着劳动平民雪中送炭，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的生计，国民政府之经济政策及农工立法，尚在将来，眼前急需的经济组织（工会、农会）及日常生活之改善，乃解决劳动平民生计之最小限度，国民党对于此类最小限度的劳动运动若不实行援助，则民生主义的理论及保护农工利益之党纲条文，便都是不兑现的支票。各种主义的党派，对于劳动运动之性质与内容及劳资间的关系，虽不同途，而于最小限度之经济组织及日常生活改善，则殊无二致。若并此最小限度而否认之，则已无劳动运动之可言，这是军阀阶级的主张，提倡民生主义的国民党当然不能如此。若恐怕参加此等最小限度之实际运动有赤化的嫌疑，这便和军阀官僚们把一切工会运动及罢工都当做社会主义或过激运动是同样的无常识了！

第二，就国民党的组织分子上讲：有人以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若出力援助劳动阶级，岂不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合作的同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错，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正为

他是合作的党，便不能只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应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必如此，才有各阶级合作之可能。国民党若恐怕援助劳动阶级，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资产阶级之同情；但是不援助劳动阶级，不怕违背劳动阶级的利益，失了劳动阶级之同情吗？国民党若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利益，若只珍重资产阶级之同情，那便是一个单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不是什么各阶级合作的党了。要他合作，却不顾及他的利益，现代的劳动阶级未必还是这样可以愚弄的罢！国民党既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应该的；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有拥护之道，就是应该站在民族及民权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站在"反民生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详言之即是：破坏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一是外人制我工商业死命的协定关税和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第二是军阀官僚之战争及厘金等苛税阻碍工商业。因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惟有厉行民族主义反抗掠夺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者，和厉行民权主义反抗紊乱中国政治及财政的官僚军阀；若不努力于此等奋斗，转向穷苦的劳动平民，要他们多做点工少拿点钱，以弥补资产阶级被外人及军阀官僚所掠夺的利益，此种"杀穷人起家"的办法，不但不合天理人情，而且在此半殖民地状况的中国，即尽杀穷人也不能起家，因为劳动平民无论如何牺牲，比起资产阶级所受外人之掠夺及军阀之损害，不过九牛之一毛。因此，我敢说：国民党若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简直没有理由；何况他是各阶级合作的党，不是单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更不是和绅士们相依为命的陈炯明。我曾在《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一文中，说明国民党的革命是于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益的，劝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国民党，因此有班朋友们指责我，说我轻蔑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实我在那篇文中并未如此说，因为我始终希望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此时他的组织分子上也实际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这班朋友们不愿意人轻蔑国民党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很对的；可是若同时恐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倒现出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来，这却不对了。我们现在所用"各阶级合作"这个名词，应该要知道这名词有两个重要的解释：（一）是各阶级合

作，不是各阶级合并，因为阶级是不能合并的；（二）是国民革命之政治的合作，不是劳资妥协之经济的合作，因劳资两阶级在经济上没有能够合作之共同点。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若不将这两个合作之意义解释清楚，在实际工作上必发生无穷的纠纷与困难。

第三，就国民党革命的战斗力上讲：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在埃及、印度、爪哇、飞律宾等国民革命运动中，劳资两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更是眼前的明证。中国又何独不然！由工人农民群众，而商联会与学生会，而总商会与教育会，这三层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总商会所代表的，又应该分资本家和财阀两派，中国此时财阀的力量更大过资本家，若新旧交通系，若京、沪银行业者，若香港、广州的富商，都属于财阀派；他们是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军阀官僚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国民党，固然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而也应该看清财阀、资本家、小有产者（学生、小商、小农、小工业家等）、工人农民这四个阶级当中，那个阶级能够供给他更多的革命战斗力。国民党若是看轻了工人农民；若是恐怕参加劳动运动得罪了财阀和资本家；若是觉得财阀和资本家不但比起劳动者是绅士，而且比小有产者更有力量；若是相信财阀和资本家能帮助国民党成功，一味交欢他们，因此便不敢和劳动阶级接近；如此，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力必然要衰弱下去，革命的色彩也必然要淡薄下去。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党，不用说，他的党纲，他的行动，都应该努力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对内对外的战斗；但同时，万不可忘了更有革命战斗力的是更向下层的阶级，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更万不可牺牲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来维持资产阶级之利益；因为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之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总观察上，在估量国民革命运动全战斗力上，都知道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不应该为任何次重大的意义而牺牲他。

1924年6月18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研究系之丑表功

研究系的先生们，居然在《时事新报》上丑表功，说当日主张对德参战只梁任公一派有此先见之明；参战的利益，此时已由德国赔款见之于数目字了。其实德国赔款的数目实际上已等于零，到是因参战所借日债的数目字，一个也少不了，研究系的先生们看见没有？这种误国殃民的日债，也应该列入主张参战者丑表功之一。

为美国排日

奉天收回教育权及一切排日运动，我们对之都非常表同情；但此神圣的国民运动中，夹杂了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侵略中国的走狗在内，实是一件极可耻的事！我今正告奉天人：最好是为中国排日，其次是为奉天排日，最下流是为美国排日！

研究系不至如此下流！

有一位朋友劝告我："你们这班书呆子慎勿冒犯研究系，他们会越出辩论事理的轨道，以'过激'、'莫斯科训令'、'第三国际宣传费'等说话中伤你们，暗示军阀和你们为难。"我说："研究系不至如此下流！"

还不问政治吗？

部令总邮政局查禁上海的劳动旬刊，此报会主张不问政治，可是现在政治却来问他了！

1924年6月18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一期 署名：独秀

智利领判权与中国主权

帝国主义的列强蔑视中国的主权，要算最近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是最露骨的表示了。

据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说："本埠智利领事是否有权过问本国人民之诉讼事件，北京来讯，外交团未与臂助云云。兹据上海消息，领事团已议定，将有关智利国人民之事交由智利领事署办理，不以中政府所称该国无治外法权为意。"又二十四日《文汇报》说："本埠领事团议定智利国应享治外法权，闻已通知会审公堂。"

领事裁判权本是列强加于弱小民族最大的侮辱，此时我国民正在要取消他；况且列强所视为神圣的华府会议也曾议决取消；况且德国、俄国都已先后实行取消；况且中智条约并未许他有领判权；而上海领事团居然硬出头代替中国政府允许智利国应享此权，这是何等露骨的否认中国犹有主权！

中国政府所应许交还的俄使馆，北京使团硬不许交还；中国政府未应许的智利领判权，上海领团硬要他享有此权；照此下去，中国的外交，到底还是中国政府作主，还是外国使领团作主呢？

外交部给江苏特派交涉员的训令说得好："查中智条约，既无领事裁判权之规定，此次智利派驻上海领事，本部发给证书时，亦经郑重声明：且此事系中智两国问题，第三者更无代为决定之权利。"

向来不说理的北京公使团尚知理曲不与臂助，而上海领事团公然一意孤行，简直是目中无人！向来媚外的北京外交部尚知据理力争，而爱国的上海市民何以没有严重的表示？

1924 年 7 月 2 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内国银行又供给军阀一百万元

上海《申报》六月廿八日北京电[①]:"外交界消息,内国银行日内可望垫百万,由德款上扣除,此百万为粤事用。"这一个很简短的电报,可以说明中国财阀在政治上的关系。

我们第一要知道财阀和资本家之不同点。资本家是运用资本力图货币与商品之辗转相生;其结果社会之生产力因以增加。财阀是勾结外国与军阀,或为卖国的媒介而分润,或为政治的投资而获利;其结果卖尽本国生产的需用品(如原料、矿山、铁路等),吸收国内生产的资本供给军阀用在不生产而且是妨害生产事业的地盘战争。

因此,我们屡次指明财阀和资本家不是一物,屡次指明财阀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仇敌,是附属外国及军阀的反革命派,若新旧交通系京沪银行业者及香港、广州商人皆是。

我们若把这班财阀当做资产阶级,那便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是什么。国民革命党若把这班财阀当朋友,那便完全不知道国民革命之对象是什么。

这班财阀们如何结托香港政府,如何以商团拥护商人罢市向革命政府抗税,如何反对广东政府取用关余,现在又供给曹政府一百万元,大家应该明白他们和列强及军阀是有何等固结不解的关系。

1924年7月2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

① 廿八日系廿九日之误。

法西斯党与中国

意大利法西斯党穷凶不法，世界上那一国不知道！中国北洋军阀穷凶不法的苦，人民已经受够了，不图混账的美国人用尽方法，又要把穷凶不法的法西斯党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去年在《大陆》报上大鼓吹其意大利法西斯党有代表在上海，劝中国商人去请教；现在又有一个私贩军火的美国人什么凯南中尉，竟将美国的法西斯党引到中国来了。日前上海破获的三K党机关，虽没有法西斯的名称，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利用憎恶黑人底群众心理，做出种种穷凶不法的事，和意大利法西斯是同派的恶徒。

他们别高兴，他们同派的法西斯在意大利就快失败了。自众院议员社会党麦台悌氏被法西斯党谋害以来，全欧洲舆论都很激昂，各国社会党在日内瓦召集大会，直斥法西斯党是凶犯是强盗。牵涉此案而被捕的法西斯党重要人物甚多，地位仅次于穆索里尼的领袖罗锡氏，亦因被控自向警局投案。参院议长狄士尼在院痛诋杀人自利之目的，首相穆索里尼亦表示异常愤懑与惶恐。据六月廿七日罗马电：意国全境本日一律停工十分钟以纪念麦台悌氏，各公共事业亦皆停顿二分钟。又廿八日罗马电：在野党考虑议员麦台悌氏被害案后，今日开会通过不信任现政府之决议案，要求另立迅速废除法西斯党军队及严厉取缔各种不法行为之政府。

日暮途穷的法西斯党，他的穷凶不法，已暴露于全世界；美国对我们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我们已领教够了，现在他们觉得教会学校青年会、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工具还不够用，又要把穷凶不法的美国法西斯党即三K党引到中国来（六月二十五日淞沪警厅破获的三K党机关，明明是美国人主持的），试问他们对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

1924年7月2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美国侵略中国之又一形式——三 K 党

穷凶不法的三 K 党，就是美国的法西斯党；但是他标明纯美国主义，不独肆行惨杀黑人，即非美国土生的白人，亦在排斥之列；照常情此党之发展，只限于美国以内，断没有走到美国以外，提倡纯美国主义，排斥一切非美国人的道理。

可是近来上海竟发见了什么中国三 K 党，纯美国主义的三 K 党上，忽然加上中国二字，奇一；什么中国三 K 党，标榜的是狭义爱国主义，而党名却用外国文字，党务则由外国人主持，奇二。

六月二十五日淞沪警厅在横浜路破获他们的机关，拿着的七个党员当中，有两个是美国籍，他们指着室中所挂美国国旗对警察说："我们是美国公民。"警察进屋时，他们正在和一个美国人名叫凯南(Kearny)的谈话；同时，附近的美国人立即通知美国领事。事后，凯南公然自己具名投函《字林西报》说："余为该党之顾问……三 K 党……认目下一部分华人及一部分外人所宣传之排外说为错误，于中国有害，故该党对于此说，力辟其谬。……该党一切党员均负有阻止排外宣传之义务。"

依据上列事实，当然可以明白所谓中国三 K 党完全是美国人的阴谋；《字林西报》说得好："其目的究竟是为美国呢，还是为中国，非有若干中国人出而为该党发言，此疑问终难解释。"我们并可以明白这党是一个为害中国尤其有害于上海治安的团体，因为三 K 党在美国多穷凶不法的行为和他们在上海的顾问是一个私贩军火的人物。

美国三 K 党本是极端排外的，而据凯南说中国三 K 党乃是一个阻止中国人排外的机关，这岂不矛盾得很？所谓中国三 K 党也曾标榜狭义爱国主义，然而以抱狭义爱国主义的人，入外国籍，受外人支配，托庇在外国国旗势力之下求生活；这不算，还要帮助外人阻止中国人排外，这岂不更矛盾得很？

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名为中国三K党，仍旧是美国三K党，仍旧是排外，他们在中国也是外人，所以阻止中国人排外；诚然是狭义爱国主义，惟所爱的是美国不是中国，并且还要中国人也爱美国；这是美国对中国总的经济侵略之下在教育侵略新闻侵略外之另一形式。

1924年7月2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孙宝琦去职与金佛郎案

孙宝琦在辛亥革命时，始而伪独立，继而取消独立，其为患得患失的鄙夫已可想见。明知曹锟窃政为正义所不容，又明知曹锟左右多佥任必不能容他人久据内阁，而竟不惜附逆以过短命总理的瘾，孙宝琦之为人更可想见。

孙宝琦之为人固糟，然尚有两件事还不算糟到极点：一是他在私的行为上尚不至象顾维钧和李彦青结拜弟兄；一是他在公的政策上尚不肯附和王克敏承认金佛郎案。

半年的孙阁，自上台到下台，都始终事事与王克敏相持，最重要的是金佛郎案。他二人半年来明争暗斗之结果，卒以曹袒王而孙去职，王之得意可想，王之政策将要如意实行也可想。

王克敏对于金佛郎案之政策，厄于孙阁不能实行，这是全国皆知的事；今孙去而继任者无论为顾维钧为颜惠庆或王毓芝，都必能和王克敏合力同心谋曹家的利益。承认金佛郎案，自然国家的损失，即于曹政府也未必有多大利益，关税会议未必因承认此案而能实现；然而曹政府，尤其是王克敏个人，终想尽力设法承认此案，以便在外人方面财政上有所活动。

在这一点，国人对于孙去王胜的局面，应该有相当的注意。

1924 年 7 月 9 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三期 署名：独秀

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

意大利人几乎是公开的在天津发卖军械，最近马联甲又在那里购去大批手枪子弹等；上海方面，法国邮船安乾尔号私带军火案才判决，本月四日又发现了美国船拖儿开脱号密运大批军火来沪，已经海关查出大木箱六十二只，内藏手枪来复枪一百九十九支，旋轮手枪四百〇一支，机关枪八尊，子弹十三万五千粒；同时，日轮白山丸船员亦在虹口马路上被巡捕搜出手枪五支，子弹三百五十粒。

帝国主义的列强，动辄以华府会议镇压我们，现在他们对于所议决的禁止军火来华案怎么样？

他们一面输入多量机器制造品，摧毁了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使多数农民工人失业而流为兵匪；他们又一面输入多量军火，使中国的兵匪得着武器更加横行。中国兵匪的势力，完全是列强制造出来的，于是他们又可以借口兵匪扰害外人，向中国政府讹索敲诈，这都是英、美、法、日、意各大强国各文明国对待我们中国的行为。

他们在中国制造了兵匪，还要责备中国政府不能维持治安，还要向中国政府敲索赔偿；可是土匪们已经光顾到列强支配的租界，近来上海租界几乎每天都有抢案发生，不知列强对于租界治安将责备何人维持，其损失将向何人要求赔偿？

若是美国人果然能在上海组织一个强有力的三K党，一面召集中国土匪，一面密运美国军器，那时上海租界上的治安，还要比现在好看十倍哩！

1924年7月9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三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

沈恩孚说："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所以叫做平民。"他这样解释平民，自然可笑。梁启超把全国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食其力的农、工、商，叫做有业平民；一部分是抢骗他人血汗的官吏、兵官、议员，叫做无业游民。他这样解释平民，固然好过沈老先生，不过官吏、兵官、议员……外，被内外资本主义挤迫而失业的，何尝不是平民？反而商之中，居奇致富的大腹贾，有时势倾王侯，那算得是平民？

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

梁启超发愤说："做官的，带兵的，当议员……种种阔人，以及他们的附属品什么太太、奶奶、少爷、小姐，他们自以为高贵，也许有人认错他们是高贵。其实这班人有最下贱不过的。因为他们都靠人养活——笼着手不做事，只会张着嘴吃饭……笼着手吃饭的人，吃的不是饭，是别人家血和汗。别人家的血汗怎么会吃得着？不外两种把戏：一是骗，二是抢。骗是光棍行为，抢是强盗行为。……唉，真倒霉，中华民国的生命，全部掌管在这班最下贱的人手里！'一品大百姓'往那里去了？哈哈，都睡觉哩，不管事。"哼！梁启超现在说得太过高兴了！他现在这样发愤，即或是一时憎恶军阀政治之真情；但是日后自食其力的劳动百姓们，如果真能起来从张嘴吃别人血汗的光棍、强盗手里夺得掌管中华民国之权，那时，梁启超倘尚生存在世，必然因为太伤了高贵人的体面，

又要出来大呼“贱民专制”。他如不服，请以今日之言留证将来！

假革命党

中山先生说：“升官发财，畏难苟安，这是假革命党。普通国民以为这就是革命人才，所以革命的名誉，被他们弄坏了，我们一定要排斥这种假革命党。”凡属中国国民党员，每日至少要自问一次是不是中山先生所指摘的假革命党！

“七一”与“五七”

日本人因美国限制移民案，以七月一日为国耻纪念日，实在没有道理。日本人以强力侵入中国，“五七”才真是中国之国耻；限制移民案，不过限制一切外人自由侵入美国，并不专为日本而设，更未侵入日本国土，何以竟是日本人之国耻？必须全世界都让日本人像在中国一样的横行才不是国耻么？

玄学家言原来如此

孙中山分明没有死，而吴佩孚硬说照易理推测一定死了。钱能训分明已经死了，而悟善社的人却说他并没有死，是陪李太白下棋去了。这班玄学大家只顾主观不顾事实竟至于此！

北京的议员那里去了？

郝莱氏即便是被人打下水，自有美国领事出来说话，何劳英国舰队

司令官直接发炮威逼地方官，不经审判立即斩杀凶手二人？此事尚有英国议员在英国众院质问，何以北京的议员竟无一人说话？

1924年7月9日 《向导》第73期 署名：独秀

给维经斯基的信

亲爱的维经斯基同志：

您从北京写来的信和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收悉。鉴于急需给北京、哈尔滨、天津和汉口派遣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同意召回的同志务必尽快返回中国，特别是张太雷①。我们也在期待教授②返回。

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在广州举行会议。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分部的声明，这次会议将讨论和决定所谓的共产党问题。据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为了明确"如何在国民党中做工作"，我们给各区委各地委和各独立组发出以下通告③。您的意见如何？我们急切地期待着您的建议。

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过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苏倾向。如果以后还以这种精神(援助反动派)给以支持，那么这就会对远东的革命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

---

① 张太雷率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参加于1924年7月15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② 可能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五〕次代表大会。

③ 可能指1924年7月21日由陈独秀和毛泽东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号通告(参见《中共中央文化选集》第1卷第282—284页)。

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陈独秀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收回教育权

教育改进社今年在南京年会中所通过的各议案，算是收回教育权案有点历史的价值。

无数在外国教会学校诱惑锢蔽之下的中国青年，受了土耳其封闭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几遍全中国，教育改进社的右派分子，竟为全国青年的呼声所迫，容纳了左派分子之主张，通过了此案。将来实行至何程度，现在虽不可知，而最小限度(一)总可以使外人感觉中国人心犹未死尽，无形的文化侵略究竟不象有形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那样便当；(二)总可以使在外人势力之下麻醉久了的青年明白教育权应该收回，是中国教育界所公认，并不是什么过激派的主张。

然而恐怕也只有这两个最小限度的效果，因为他们的议决案中，并没有明白坚决的办法；他们的办法是：(一)凡外人借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应由政府勒令停办；(二)施行甲、乙两种注册；(三)于相当时期接收外人所设学校。

这种明白实行侵略的事实，尚待调查，岂不是笑话！注册是取缔不是收回。相当时期，是不是无期？

他们堂堂的收回教育权案何以这样二百五？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一)是因为教育改进社完全在研究系操纵之下，他们如何能赞成这样急进的主张！初提此案时，研究名人范源濂犹极力称赞教会学校之成绩，经陈启天等纷起驳斥，才将会场空气转换过来。(二)是因为教育改进社社员中，有许多耶教徒或教会学校出身，他们都加入讨论，议决案怎能不二百五？

我们认真讨论起来，与其主张"收回教育权"，不如主张"破坏外人在华教育权"；因为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目下二百五的中国政府和中

国教育界，都不会有收回的决心；至于破坏的责任，便不须依赖政府与教育界，只要在教会学校受奴隶教育的二十万男女青年有这样的觉悟与决心。

1924年7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四期 署名：独秀

上海防盗问题

上海近来无论华界租界，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抢案发生，这自然是上海市民的大害，各路商界联合会群起讨论防盗方法，自然也是应该的。

他们防盗的方法是怎样呢？南京、福建两商联会提出办法六条：

（一）严查私贩军火及私藏军器；

（二）增加站岗及巡逻巡捕并改良交替换班方法；

（三）装置盗警特别电话；

（四）加严检查旅馆；

（五）取缔界内游民；

（六）设备盗警武装汽车。

百老汇路商联会的意见是：

（一）禁止诲盗诲淫影片；

（二）各捕房门首装置报告信箱；

（三）规定一律营业时间。

山东路商联会主张：

（一）清查户口；

（二）检查旅馆；

（三）救济失业游民。

其他各路商联会所提出之办法，大致都和上列各办法大同小异。

工部局及各西报恢复笞刑的办法，固然可笑；即各商联会所提出的，也都不是根本办法。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海何以多盗的原因。到是工部局总巡强森君的话还有一半对，他说："研究盗匪所以猖獗之故，其原因有二：（一）为上海附近退伍兵士众多，群以上海为生财之地，工部局无法阻其入境；（一）为枪械来源不绝，且多数为外国轮船私运……有盗有械，因之盗案迭生，诚为遗憾。"

何以说他的话只有一半对呢？因为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有械是由外国私运，这是对的；他所说第一个原因，有盗是由于上海附近退伍兵士众多，这是不对的。其实有械固然是外国之赐，有盗也完全是外国之赐。他们把持中国的海关，不许增加进口税，使中国本国工业不能发达，于是他们输入多量廉价制品，毁坏了中国的农业手工工业的经济，驱逐无数农民、工人失业而流为兵匪，这就是中国兵多匪多之唯一原因，岂非是外国之赐？内地已为兵匪搜刮殆尽，而由失业加入兵匪者还日在增多，那有不光顾到租界的道理！

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中国制造了兵匪，又为兵匪运来了枪械，"有匪有械，因之盗案迭生"，帝国主义者"诚为遗憾"！

各商联会所提办法，无一见及盗因，多仅属治标之策，必无济于事。盗匪并不怕枪毙，何况笞刑！盗匪增加自有经济的原因，岂是诲淫诲盗的影片所能诲成？何谓游民？如何取缔？告密信箱更有挟嫌指诬之弊。盗匪多自外来，不限于上海的失业游民，将怎样普遍的救济？

所以根本弭盗之策，只有止住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本国的实业得以发展，失业游民得以减少，然后才有治标的防盗政策之可言。

不然，群盗满国，上海岂能独免？

1924 年 7 月 16 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四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

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相类的名词，所以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反对国内军阀政府，只算是这工作中之一种，因为军阀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之傀儡。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便不算是国民主义的革命党，便是假革命党；阻止别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更是反革命党。

精神生活与金钱

章行严、太戈尔、张君劢，他们极力提倡精神生活反对物质文明的高论，我们都领教过。然而第一个章先生竟发起招集十万元办周刊，并且投身交易所事业；第二个太先生在香港为他自己办的学校大募捐款；第三个君劢先生因为他的自治学院经费取销了大肆咆哮。难道所谓精神生活还得要依靠金钱养活着吗？

1924 年 7 月 16 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四期　署名：独秀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①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

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作之事如左：

（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右派重要的错误是：

（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

（B）反对中俄协定，并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

（C）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

（D）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

（E）排斥共产派。

（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

① 副标题是原编者所加。

（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项组织，必须个人加入，加入时，必填写入会愿书，万不可团体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之明确，当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此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但此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接到此通告，应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此项通告对外严守秘密。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T. T. Mao[1]

一九二四、七、二十一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

在空气恶浊沉闷的北京，居然有了一个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盟[1]，虽然这个运动之分子当中可惜夹杂了一些议员，总比什么头发运动、马蜂运动有点意义。

但我们必得警告他们的是：他们宣言第三点说："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所谓任何事务，"反对曹锟政府"是否也包含在内？他们应该明白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然相互勾结，他俩是不能分家的，若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和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乃是同样的错误。

而且，在北京只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不反对军阀政府，在特定事件上，军阀政府尤其是他的外交当局有时还要利用一下；犹之在上海租界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在特定事件上，帝国主义者有时也要利用一下。

这一层，我们希望加入联盟的诸君十分注意，勿令任何好名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会变相，尤其是在官僚窟的北京！

1924年7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五期 署名：独秀

---

① 1924年7月13日，北京议员及京内外各团体在中央公园召开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会议，到会有五十余团体代表及各界人士二百三十余人，推选胡鄂公等为执行委员。20日，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发表通电："扑灭帝国主义之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本联盟除反帝国主义之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予闻。"

美国侵略与蒙古独立

据上海《字林西报》库伦通信说：蒙古政府对于耶稣教徒已下令驱逐出境，所宣布驱逐之理由：(一)瑞典教士到蒙，未得蒙古政府之许可；(二)该教士未得允许，即进行建筑学校，宣传教旨，并分布小册子于蒙古军士及人民，坚称蒙古政府系无上帝；(三)瑞典教士与在华之美国青年会及张家口美领事沙克平民接近，沙氏为煽动革命反对现政府之著名人物；(四)在库伦传教之教士，皆受赖森氏之保护，赖森氏系中政府蒙藏院之顾问；(五)该教士等之建筑物，虽为农业及传教基础，但理想上有使教士等系军事侦探之嫌，且耶教徒冯玉祥有预备征蒙之讯，盖不能不疑及该教士。

在这一段新闻中，可以看出美国在远东全部侵略形势一个缩影：

第一，我们看出后来而更急进的在中国之美国帝国主义，毫不掩饰的向中国三路进攻，第一路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第二路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第三路便是以张库线为中心的蒙古。美国想垄断张库汽车路，他们的领事和商人时常逞强恃势威吓张家口的官商。由张家口扩充他们的势力到库伦，也是张家口美领事一手办理——煽动蒙民反对不利于美国的现政府。

第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侵略中国，到处都以耶教徒、青年会为先锋；对蒙古也是这样，而且有一个教徒冯玉祥做他们更有力的工具。教徒冯玉祥、王正廷等，久有攘夺热、察、绥三区及库伦为他们地盘的野心，他们不但恃有军队，且恃有美国经济的后援；近来北京政府主张收蒙，在直系的地盘野心之外，还有冯玉祥的特别野心。

第三，我们看出帝国主义的美国要和军阀而兼教徒的冯玉祥勾结起来，并吞张、库，这是蒙古平民和中国平民共同的灾害，应共同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耶教徒及北洋军阀。目前的扼要运动，还是反抗北

洋军阀派兵收蒙；因为此时库伦虽有美商，而大批的商人和领事、教士，必须得着北京军阀政府收蒙的机会，才能如潮的涌入蒙古。在这一点，以前我们还不便自由说话，因为有一班短视的人们，一见我们主张蒙古独立，便疑心到是为苏俄保藩；现在俄国对蒙的关系已由中俄协定说清楚，我们便可以无所顾忌的大呼：尊重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反对北京政府派兵收蒙。在蒙古独立军反抗北京收蒙军时，我们便应该尽力予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这才是我们正正堂堂的民族主义，不是以一民族压迫他民族的勾当。

1924 年 7 月 23 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学校与监狱

欧美监狱中，每每有教育与娱乐的设备，尤其少年法庭，狱官与法官对待少年罪犯，简直和教师、保母一般，这等监狱可说是学校化了。

反观中国的学校，动辙〔辄〕惩戒开除，有时还要用军警来对付学生，这等学校可说是监狱化了！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当中国船员

招商局是中国轮船公司，该局的董事长要用一班中国人做江利轮船船长和大、二副，这件事在中国招商局虽是空前创举，其实也无甚稀奇，而总船主外国人竟出来反对。像他们这样排斥中国人，是排外还是排内？这又是他们在何种条约上既得的权利？

无政府党与研究系

有一个无政府派的人，在学灯上说存统稚晖加入国民党是因为有利可图。我想存统稚晖都必然不服，都要回答说：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革命。同时存统稚晖若是说：无政府党人加入研究系替该系的机关报学灯做文章，才真是因为有利可图。我不知道这班所谓无政府党人，将回答说他们加入研究系是为了什么？

收回教育权与中国学校

有些说人仿佛说：中国自己的学校并未办好，何必急急对外收回教育权？若照这样说法，中国司法也未办好，又何必收回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更未办好，那便得让外国人来主持了！

两件不可解的事

北京国立大学请胡适之教书著书，而北京警察厅却查禁他的书，上海当局属于反直派，而却遵奉直系政府命令，查禁反直的劳动旬刊与中国青年周刊，捕拿反直的吴稚晖；这两件事都不可解！

1924年7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五期 署名：独秀

新银团与中国

银团为中国之隐患和使团为中国之显患，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略中国一个政策之两方面，前者是经济方面，后者是政治方面，这两方面有时也会有私的冲突，而根本上我们没有方法说他是两件东西。

银团内部也随着列强自身政治经济之变化而变化，由英、美、俄、德、法、日六国银团，而英、俄、德、法、日五国银团，而英、美、法、日四国银团，这个大战后改组的四国新银团，实权上只是英美的银行团。

去年八月新银团在巴黎集会，英、法、美、日代表都到会，发表宣言，宣言中有重要二点：(一)本团愿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深合华会公约；(二)本团苟为中国承募国债，必须该款用于适当用途，且可到期归还，因欲达此目的，自须有若干之监督办法。第一点，明明和华会对中国由瓜分政策到共管政策由单独侵略到共同侵略，是一鼻孔出气；第二点，明明说到共管之实际。

现在，新银团又正在伦敦开会。此次开会乃由英国提议，提议的主旨有二：(一)因该银团到明年十月已满五年期限，意欲讨论可否继续下去；(二)因从前新银团内部规约过于束缚，意欲改订规约，以便各国自由投资。其结果，据路透电：议决合同满期当再延长五年，是英国提议的第一个问题业已解决，第二个问题如何解决尚未宣布。惟闻英美银团的意见，拟变政治投资而为铁路投资；同时中国大军阀吴佩孚也主张急设到库伦、新疆两条铁路；此事如果实现，一方面列强益扩张其纵横支配中国之权力，一方面中国军阀不但挪用路款，而且增加其构乱杀人的速度。

在中国现状之下，列强对华铁路投资即是间接的政治投资，这是列强和军阀勾结为患中之一大计划。

1924年7月30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六期 署名：独秀

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之又一证据

对华禁输军械之约，本是由美国提出于华府会议，而经列强议决的，现在他们因为要援助北洋军阀，不惜自毁前约，将大批军械运到中国。

意大利售大批军械于曹锟之后，接着就是首倡禁械的美国售大批军械于吴佩孚，此事虽经美使馆否认，而事实昭彰，怎容他抵赖。

发见并扣留此大批军械的乃是天津海关。此项运械并有陆军部所发一二四九号护照，护照时日是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盖有大总统印及陆军部印，填发护照之负责人，除陆军总长陆锦外，复有吴佩孚之署名盖章，照上所载军械数目：步枪一万枝，小枪一千五百枝，机关枪二百五十枝，步枪子弹一千万粒，小枪子弹二十万粒。海关所以扣留的原因，以实数只有步枪五千八百枝，子弹五百六十四万，小枪二百五十枝，子弹二十万，和护照所载不符，故不放行，现在运存关栈，经运之美国人次洛耳夫，已电告洛阳，并得复谓即派员来津交涉。

同时，日本亚尔太丸由德国汉堡运军火三百五十箱至天津，此项军火有北京政府护照，也是吴佩孚所购。

同时，我们又应该知道未来内阁颜惠庆向来的政策，是以整顿财政名义，借新债五万万整理旧债，且曾得新银团之同意，即以新银团和财政整理会为一买一卖的包办机关。在此五万万大借款内，吴佩孚可分得一万六千万元为统一费，因此他对颜阁甚表同情。

野心勃勃的吴佩孚，既得到大批军械，又得着大宗借款，有款有械，自然要向西南、东南、东北、西北四方八面横挑战祸；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是中国祸乱之源泉。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援助军阀？这是他们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惯

用的政策：扶植旧势力，抑制新势力，俾永远在他们支配之下。况且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正在猛烈的进行，他们如何不加紧援助北洋军阀！

因此，我们更应该明白：历来军阀（自袁世凯至吴佩孚）都是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而生存而恣意为恶，革命党若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

1924年7月30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六期 署名：独秀



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

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美国、南洋取缔华工，已经是人类不平的事了；然而这些取缔都还是在他们国境内行之，现在他们却更来到中国国境内取缔中国人，这是一件何等喧宾夺主的事！

沙面新警律为中国人所最不能受的是：从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粘主人照片，每晚九时后，华人非携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凡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独取缔中国人在中国国境内行路的自由，这明明是加于全中国民族不可忍受的侮辱！

沙面全体华工罢工抵制，这种为全民族受辱而消极的和平的运动，没有人能够加以丝毫非难的。现在因为沙面英领事坚持不肯让步，罢工风潮将扩大到香港，且有抵制港币之说。外国货币在中国境内直接使用，本来也是一件怪事，因此抵制不用，也是很正当的。

像这些事，都是广东革命政府应该出头做的，现在却让民众抢先做了！

现在外人方面对于此事的言论，大有责备广东政府在暗中鼓动的意思。这种荒谬的言论，固然是外人太轻视中国人的人格，也是广东政府自己态度不对所招惹的。像这种为民族争人格争自由的运动，凡是中国人都应该鼓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广东政府更应该为此事堂堂正正的出头率领民众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岂止应该鼓动。不料广东政府竟站在调人地位，而且声明和此次运动无关；此种声明，不啻说广东政府不是为民族主义运动而设的，所以才惹起外人的猜疑与责难。

“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革命的国民党是为此而组织，革命的广东政府是为此而设立，凡属此类运动，每个民族主义者都应该

站在民众前面，不应该跟在民众后面，更万分不应该站在中立调人地位。若恐怕因此触怒列强，那便万事干休！

1924年7月30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六期 署名：独秀



再论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

意大利售给曹锟的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现在美国售给吴佩孚的军械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日轮又由汉堡运到天津军火三百五十大箱，此外齐燮元、马联甲都在天津购得若干意械，这都是帝国主义者供给北洋军阀杀戮中国人民的。

七月廿四日上海《字林西报》说："昨日法国邮船盎高尔号进口后，未及半小时，关员即在船中抄出自动手枪五十枝，子弹五千粒，近来法邮各轮屡有违禁物品查出，此次已属第六次，前如肯博特号、布尔介号、安德来朋号、安博司号、安乾尔号等五轮，相继被关员查获军火。"此外上海租界发见日人私藏军火的事，几乎每星期都有。这都是帝国主义者供给盗匪杀戮中国人民的。

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责备中国不能自保治安，不能保护在华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他们却忘记了这是他们自己以商业侵略逼得中国人穷无资了和以军火供给军阀盗匪之结果。

我们敢说：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不停止，中国决无治安之可言，尤其于治安有直接影响的是私运军火。

他们供给军阀盗匪无数军火杀了无数中国人，他们向来不以为异；可是有一班盗匪竟拿这军火来光顾租界，杀人杀到洋大人身边，住在租界的任何人都难免波及，因此洋大人才恐慌起来，《中法新汇报》说："不幸吾沪秘密贩运军火者，继续不断，外洋来船时有大宗杀人器具运入，虽关员屡有所获，而破案者殆不及十分之一。吾人苟欲杜绝此项不名誉之营业，必须于贩运之人不问国籍之谁何，尽人处以死刑，夹带之船舶，在若干数目以上，不问其主人之为华人为外人，概予没收，以后犯法者庶知所畏惧而不敢为。……匪徒之行劫杀人者，治以死刑，而于彼私运军火以导其为恶者，反释而弗治，吾人自问良心，宁得谓之平允？"工

部局总巡强森氏报告董事会说:“埠内违法贩运军火之徒日多,所贩数目又不在少,皆有证据可引,外人营此犯禁事业若是其众者,全因处罚太轻所致,毫无疑虑,如某领事公堂最大罚则不过监禁三月,又如某领事公堂最大罚则谨能监禁二十九天,日前更有一私售军火与华人案,破获之后,因其为本国人故,即行释放,处罚之轻若此,无怪乎外人贪利犯禁者之众也。外人私贩军火之罚则,非至确可收禁阻之效,恐匪风未必能戢,而街中流弹横飞,危及行人之事,亦未必遂能中止。”

他们只看见盗匪得了军火,在租界中流弹横飞,危及行人事;他们不看见军阀们得了大批军火,在全国中流弹横飞,危及人民之事。他们只主张处罚在上海贩运军火之外人,他们并未想到如何处罚在天津贩运大批军火之外人,及其政府。如此,“自问良心,宁得谓之平允?”

《字林西报》说:“不幸目下有关系之各当道,并无一致行动之征象,而捕房所处地位,尤因各领事态度之大异,办理极为棘手,是故目前于防杜军火,直可谓之毫无办法;长此不改,窃恐私运之风永不能稍戢……”像这样“私运之风永不能稍戢”,像这样“毫无办法”,外国领事老爷们只有把租界之司法权、行政权交还中国人自己治理罢!

1924年8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七期 署名:独秀



日本在华侵略之新计划

南满铁路会社，不但为日本开发满蒙之总机关，亦即其侵略中国之重镇。加藤内阁成立，首先更换南满铁路总裁，以图扩张南满铁路会社之营业范围，使日本在满洲之经济尽量发展，然后再向北满及内外蒙与美国商业竞争。新任南满铁路总裁安广伴一郎氏，对于开发满蒙，素抱急进主义，赴任后，即拟定营业发展之新计划；并以上海为中国商业中心，又与日本、满洲均关系密切，亦特别派出多员调查，以为实行新计划之准备。闻所定新计划重要的是：

（一）推广抚顺（即千金寨）煤矿之产量，由现在每年最多额五百五十万吨，将来增至七百五十万吨。

（二）收并大连轮船会社，并以一百八十万元新造五千吨以上之快轮数只，专供大连、上海间之直航，以利运输。

（三）调查抚顺煤在上海方面之销路，拟以后每年在上海出售抚顺煤五十万吨至一百万吨。

（四）修改上海满铁会社之码头，增设上海仓库，并在吴淞新筑码头及仓库。

（五）将满铁窑业试验场所制玻璃商品，运供上海市场。

（六）将由上海运转大连之棉线、棉布、药料、毛织物、麻袋、面粉等，设法直接输入满洲。

（七）利用上海之标金交易，均衡满洲之银价，借以操纵满蒙金融。

照日本这个发展满铁会社营业范围之新计划，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于废除廿一条按俄旧约交还已过租借期之旅大及南满铁路，做梦也未曾想及。

1924年8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七期　署名：独秀

加哇的民族运动

欧战后，民族革命运动弥漫了东方，最成功的是埃及与土耳其，其次是蒙古、印度、阿富汗与飞律宾，最无用的是安南、朝鲜、波斯与中国。此外还有一个民族运动最彻底并且很有力量而大家不大注意的是荷属加哇。他的运动历史甚长（参看《前锋》月刊第三期），兹录《申报》通信一段，也可见其最近运动之一班：

华人张木本、许春园、陈金顺、侯永茂，及土人 So kindar Soegiri 等所组织之种族互助会，其目的在改进华人及土人经济势力之失败，与法律上之不平等，已于七月一日上午九时在三宝垅回教堂开会，到会者约二千余人，土人居多，华人约二百左右，警察厅长各番官 Tohar Patih 及警察多人，来会监视，各报记者亦莅止，由 Soek ndar 主席，对来宾致谢词，并宣布开会宗旨，次华人侯永茂、印度《星》报记者 Soengago、土人 Darsono 相继演说，华人林万魏等讨论请政府修改法律，后主席宣布议决案，及要求取消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条，至十一时散会。

警察厅对于该会甚为注意，先期曾传问发起该会之华人张木本及陈金顺等，关于该会之情形。及开会时，土人 Darsono 演说，痛诋政府，为番官禁止。其他诸人所演说，均甚重要，兹特详录如下，主席宣布开会宗旨略谓：此会之目的，在打破人类不平等之待遇，并谓本会董事华人某君，今日本拟出席，因有要事离埠，故不能到会，但曾函告本会声明，对于今日此会，华人应与土人联络云云。华人侯永茂演说："吾华人南来，为时最早，不辞劳苦，惨淡经营，此地商埠，始有今日之兴盛，华人之功不小，乃政府种种待遇，颇不平等，与日人比较，判若霄壤。譬如日人犯法，归高等法庭办理，而华人与土人，则归地方检察厅，是明证也。故今日此会，华人与土人，宜同心协力，以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吾甚希望华人与土人为种族之互助，努力猛进，冀达目的，并打破资本帝国主

义，更望华人方面，能成立一党云云。”印度《星》报记者演说：“由今日起华人与土人实行联络，应以此日为大纪念日，永纪不忘，嗣后求二种族人之权利。至于地方当局，对待华人与土人不平等之处，如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条，在荷属印度，凡有人煽动及造作谣言及侮辱等，科以四年之监禁，观法律所定如此，而当局所办理，常较此尤重，在当局自身，已先触犯法律矣。以前所成立之会，大多无能力破除此种不平等之待遇，如恩德会颇难使人满意，因其所提出之要求条件，极其细微，不关重要，欧洲战争之起，其原因为扩充商业，而饮弹以终者均为工人，所有特别阶级均无恙，倘东西各国工人，能联络一气，则大战可以不发生。现时华人之在此土者，其经济势力，愈趋愈下，已有反商为工之势，故目下之要图，为能与土人联络，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而合谋经济上之发展耳。”Darsono 演说：“法律上之不平等，吾以过去之事实证明之，如华人与土人被监禁，在狱中日常之饭食，尚不及富家饲狗用之食料，此系本人于一千九百十八年因荷人共产党事，所亲……”言至此，番官 Tohar Patin 禁止拉氏演说，拉氏谓此系事实，吾所亲尝此滋味者。番官谓所言含有抵制荷人之意味，不许再说。此时会场秩序稍乱，旋即恢复，拉氏再继续演说：“共产党对于欧人，非完全不满意者，欧人之为共产党而牺牲者，为数甚多，所不满意者，仅一部分之人而已。一千九百十九年龟突土人与华人之冲突，仅经济上细微之嫌怨耳。”华人张木本演讲：“今日此会，华人与土人实有联络之必要，此次三宝垅某某二社团之同种自杀，吾人所极不满意者也。”土人 Marco 演说：“一千四百十四年华人发显(译音)，为南来爪哇之第一人，其所抱宗旨，均与土人无忤。及一千五百年荷人 Houtman 抵巴达维亚，于是向土王请给地一方，时至今日，全爪哇均为荷人掌握，主人翁之土人，与最先来之华人，反居于后。故今日之会，华人与土人应一致联络者也。”

1924 年 8 月 6 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七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留美学生

美国限制移民律，竟影响到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以至未动身的不能动身，已动身的到了美国不能登岸，在普通感情上，我们应该愤恨美国，然而我却十分感谢美国。因为在一般留美学生成绩上看起来，几乎无一人不反对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人不崇拜金钱与美国，这种人少一个好一个；若是美国简直不许一个中国人去留学，那才是为中国造福不浅！

不要动气？

《申报》的平民周刊上有一首《不要动气》歌，歌词是："我们耕田，人家吃大米；我们织布，人家穿新衣。我们自己，为什么受冻忍饥！咳！你若是不胡乱用钱，就没有这个道理？劝你不要动气。"只有不耕田而吃大米不织布而穿新衣的人们，才会胡乱用钱，可怜那耕田织布的人，吃饭穿衣还来不及，那有钱胡乱用！我想做这首歌的睡白先生，不是"何不食肉麋〔糜〕"的书呆子，便是一位留美学生。

帝国主义者对华一致行动

帝国主义的使团，霸占俄使馆不肯交出，和北京外部往返辩论，说来说去，理说穷了，如今说出真心话来了。他们的真心话就是：加拉罕

从前言动多不利于各国，应担保不再有此言动，与各使馆融和感情，一致行动。原来使团不交俄使馆，是想迫得俄使和他们一致行动！加拉罕是苏俄驻华公使，为什么必须和使团融和感情一致行动？他们在中国一致行动干的是什么勾当？有人说苏俄也是帝国主义者，何以帝国主义的使团却以为苏俄的行动不和他们一致？

1924年8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七期 署名：独秀

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

牺牲无数劳动平民之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此时已届十周年,战败国战胜国都忙着开会纪念,大概都没有丝毫悔祸的意思,并且都还有准备第二次大战的决心。

在这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中,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因供给军需品,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因供给生活品都发了大财,被牺牲的只有各交战国的劳动平民及被蹂躏的弱小民族。这种状况在过去大战争中已经明白指示我们看过,在未来的大战争恐怕更要加甚;因此,我们不得不努力反对国内军阀主义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他们都是国际大战之源泉。

有人以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虽然造了许多罪恶,而其结果却倒了俄德两个专制皇帝,于人类社会进化未必无意义,若世界大战再来一次,或者又可以消灭几个强者;其实,这乃是机会主义者的谬见,这种谬见和希望军阀间相互战争而自己自然消灭是同样的妄想。我们要倾覆帝政,我们要倾覆特权阶级之统治,都应该实行横的国内阶级战争,不应赞成纵的国际战争;因为国际战争,乃是资本特权阶级利用劳动平民对别国资本特权阶级的战争,换句话说乃是各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权阶级各以爱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者假借爱国主义,欺骗劳动平民来拥护自国的帝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爱国主义号召全民族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不应该反对的)。关于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所谓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工具;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民族主义乃是弱小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意义,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态度是如此。欺骗自国的劳动平民,盲目的拿着机关枪向别国的劳动平民放;其结果,无论战胜国战败国,都只有劳动平民同样的伤亡、失业无法救济,即战胜国的资本特权阶级即小受伤痕也不难恢复,并且还是拿劳动平民的血来恢复。至于国内战争,

乃是劳动平民对资本特权阶级的战争，乃是劳动平民有目的的拿着机关枪向特权阶级放，其结果，至少也不是劳动平民单独的损失。

帝政及特权阶级都只有国内战争可以倾覆他，俄、德也是如此；决不是国际战争可以倾覆他，英、法、意、比就是如此。国际战争，只有国际的劳动平民白受无报酬无目的的大牺牲，为胜利国的资本特权阶级增加利益，此外别无意义。在此时代，我们不愿反对一切战争，我们只主张以国内战争代替国际战争。而且至凶极残的国际大战争，只有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者的独立战争之胜利才可以止住，此外决非空言及其他方法可以止住，这第二次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之必然的到来。

大战中，不但各交战国的劳动平民大受屠杀，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也几乎都无辜而被蹂躏；邻近欧洲的不用说了，即僻在远东的中国亦大受其影响。在这欧战十周年的纪念中，我们中国纪念的是：

日本迫我的二十一条件；

因参战而增加的外债：日金一万四千万元，美金五百五十万元；

参战华工死伤数千人；

因参战而起政潮，解散国会，复辟，南北分裂，督军割据。

不幸第二次大战若在远东发生，则中国所受的蹂躏更将百千万倍于此。我们求免之道：只有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并自己努力排除国际帝国主义，使他们不至因为争夺中国这块商场而战，战时受彼蹂躏，战后受彼胜利者之独断的处分。

1924年8月13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八期　署名：独秀



美国人又以军火供给北洋军阀

一月前上海海关曾在美国夹板船塔尔布脱号 Talbot 搜出机关枪八枝，子弹及手枪共计七十二箱，船主鲍勒生 Boressen 并与私运有关系。由美国运到天津供给吴佩孚的军火价值三百廿八万元，也是近来的事。

最近又发见美国人私运大批军火在厦门起岸的事。据本月十二日上海《泰晤士报》说："美国海军当局得有报告，谓近有大批军火在厦门上岸，现在一中国军官处，计机关枪一千枝，大批子弹及手枪若干。……美海军当局对于是否将设法取回在厦门登陆之军火一节，不肯发表意见。"

运军火往厦门，和运军火到天津同样是帮助北洋军阀攻打南方革命军，这是美国既定的政策，此外美国海军当局还有什么意见发表？此种政策，在曹锟贿选美公使首先欢迎时可以看出，在海关事件列强派军舰到广州示威时美国格外热心可以看出，凡中国人尤其是南方革命党人，现在总应该认识美国是不是我们的"好友"了罢！

北洋军阀尤其是吴佩孚，既得了美国的大批军火，若再以铁路借款及庚子赔款筑路的名义攫得大宗军饷，那么，他为统一而战争而屠杀的大惨祸就在目前。人民方面应该起来下全力阻止这残民乱国的军阀向帝国主义者取得一钱一弹；因为帝国主义者给军阀的每个钱每个弹，都是用来杀戮人民的！

1924年8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

帝国主义者、军阀、绅士、奸商，他们本来是气味相投的一串货色，在广东商人中尤其容易看得出，陈炯明便是这一串货色的串子。陈炯明自称须与绅士相依为命，他如何将中山先生外交政策向香港政府告密，香港政府又如何帮助陈炯明在香港、汕头间的交通及陈派以香港为攻击广州的策源地；省港商人尤其是二陈（陈廉伯、陈席儒）向来如何倾向北政府，如何拥护陈炯明，如何罢市反抗革命政府，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这很容易看出香港政府、北方政府、陈炯明、省港商人是一串的货色。

据《民国日报》十一日广州电：粤海关查获由外轮私运入口枪枝一万杆，子弹三百万发。据《申报》十一日香港电：商团向外商南利洋行购枪弹……政府派员查验，共七九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枝，弹二百十五万发，驳壳枪四千三百三十一支，弹二百零六万发，手枪六百六十支，弹十六万五千发，价值百余万。据《新闻报》十三日香港电：商团总部会议，闻决定不交还该械，即全城罢市；旋派出团军二千余赴帅府请愿。据《新闻报》十四日香港电：花县商团于十三日武装抵省者七百余名……三水、佛山及南鹤十四埠等商团，均备武装来省。据《民国日报》十四日广州电：陈廉伯假商团名义私运军火，现已发现证据多件。十五日电：陈廉伯已全家逃往香港。商团军都已有武装，现在又购大批军火做什么？广州商人屡称困苦罢市抗捐，现在何来巨款大买军火？动辄以罢市反抗革命政府，是不是革命之敌？商团本以御盗，现在纷纷武装到省是御谁？

我们于广东政府对待商团的优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现在这种反革命的商团军势力日见澎涨，竟至抗违政府命令，自设联防总部，竟至私运大批军火，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

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

1924 年 8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

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

中国人何以这样一年穷似一年？总原因是：每年进口货价超过出口货价约在四万万元左右，即去年最少亦尚超过近三万万元。如此巨额的外溢年复一年，中国安得不穷！

今年怎么样？即以日本而言，其地震以后，需要巨量之输入品，因此，本年上半年入超竟达六万万元之巨额；照常情论，当此日本入超巨大之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年中国对日贸易至少可望出入平均，乃事实竟大谬不然！自新年起至七月底，中国对日输出值日金九〇五七四〇〇〇元，由日输入则值日金二〇〇三〇一〇〇〇元，出入相抵，入超已达一万万元以上，以此推之，今年中国对外贸易之损失，即日本一国亦有二万万元。

日本在灾后入超激增的时候，何以独能对于中国竟至如此巨大的出超？因日本灾后积极奖励国内生产，扩张国外贸易，尤注意于中国及南洋，不惜由国库支出一万二千万元，补助商人扩充此方面商业之用，此为增加输出的政策，他方又利用关税政策减少输入，即增加奢侈品新税率是也，所谓奢侈品竟多至十七类六百四十七种，即日常需用之陶器及麻织品（中国夏布即属此类，每年输入日本、朝鲜值五六百万元）亦列入，税率增至百分之百，而且对英、法等十余国准展期三月，独于中国则限期实行，什么奢侈品新税率，简直就是禁止中国货输入日本、朝鲜罢了！

不用说，此新税率实行后，中国对日贸易之入超，更将有可惊的增加。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除输入货物以外，更有输入资本的毒计：东三省投资每年在日金二万万元以上，黄豆之输出，纺织业、矿业、森林，无一不为日商所垄断；上海纱厂，日商居三分之一以上，最近明治制

糖会社，以日金三千七百四十五万元，在上海设立明华糖厂，并强求中国免税，以与香港糖竞争（中国所用只香港糖、日本糖二种），而独占中国糖市。日本在美国被排以后，势必移用其资力来中国经营，从此日本在中国之制造业将日见扩张，其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原料，为害比输入货物更甚。

因此，我们应该觉悟：对待日本如此激进的侵略，决不是消极的排货所能抵御，排货手段，已由本年对日贸易入超的数目字证明破产，我们不应再依赖此手段了，我们宜采用积极的革命手段：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及禁止外人在中国设立制造厂。除此，中国人别无生路。

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

1924年8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关税协定之外卖国政府又与外商协定纸烟税

北京政府的烟酒事务署，近应英美烟公司之请求，电召各省派员到京，协议增加纸烟百分之五地方营业税，以撤消各省现办之纸烟特税为交换条件。

吾国国民生计，吾国工商业，已受海关协定税制压迫得不堪了；现在北京的卖国政府，因为急于筹款养兵杀人，因为急于和地方政府争收入，遂不惜将纸烟之地方营业税也要和外人协定；此例一开，各项地方营业税皆可援例协定，从此中国全部收税主权将完全丧失！

纸烟是一种不卫生的奢侈品，各国对于纸烟税都极严重，日本竟至值百抽二百。现在中国各省纸烟特税也不过值百抽二十，若与外人协定值百加五，连原有二五捐只有七五，不但目前减少收入，而且将来永不能自由增加，这是何等损失！

再进一步说，即外人应允照日本值百抽二百，吾人亦不能承认，因为征收地方营业税吾国有自由规定之主权，绝对不应与外人协定也。

前清承认关税协定，犹可说是初通商不明白外情，铸此大错，现在协定税制之害谁不知道，北政府岂不是有意卖国？

即此一端，军阀政府之卖国及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都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眼前。

1924年8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江浙战争[1]

我们不是非战论者，当然不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只注意这战争对于大多数平民有何意义。譬如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在各国资本阶级间相互争雄上固然有意义，而对于各交战国大多数平民，除单纯的牺牲外别无意义。国内军阀间的战争，在他们争夺领土上固然有意义，而对于两方领土内大多数平民，也是除单纯的牺牲外别无意义。惟有大多数平民对于军阀或资本特权阶级的国内战争，则对于大多数平民，无论是如何牺牲，都绝对有意义。

有人以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国家或可由相互战争而倾覆，中国军阀间也或可由相互战争而灭亡，这是一个痴人说梦。帝国主义者或军阀间的战争，其结果仍有一个胜利的方面支配着世界，例如：欧战后仍是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意的世界，直皖、奉直战争后，仍是直系军阀的江山，他们那会因互战而全倒。要他们全倒，只有大多数平民起来对他们的革命战争，俄罗斯就是一个榜样。

正在酝酿的江浙战争，早迟总难免发作，在浙方虽然竖起反直的旗帜，而至少须与广东革命政府协同动作，才有多少意义，不然仍是一个纯粹的军阀间地盘战争。

此次战争如果起来，我们将取何态度呢？第一，我们应该努力使此次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叫他成为两方地盘战争；第二，我们应该努力在此次战争中增加平民的力量与利益。不但帮忙一方面做留声机器（如南京商会）是下流，就是消极的哀求和平也不是办法。

1924年8月27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期 署名：独秀

---

[1] 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卢永祥由松沪护军使升任浙江督军后，原职由部下何丰林继任。江苏督军齐燮元（属直系）不满。1924年8月25日，孙传芳由闽进攻浙边，9月初江浙军队在沪宁路安亭附近接触，战争爆发。孙中山发表讨伐曹、吴宣言，声援卢永祥，张作霖也响应卢永祥。卢战败，10月13日通电下野，江浙战争结束，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即爆发。

寸　　铁

革命党怎好希望敌人优容！

越受敌人的疾视，越是革命党的荣誉；越受敌人的优容，越是革命党的耻辱；这本是国民党和进步党根本不同的地方。想减轻敌人（列强与军阀）的疾视与压迫而排除急进分子，这是革命党领袖们应该注意的危机！

国民党与中国革命

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

革命党和农民第一次见面

中山先生在广东农民联欢会演说："革命党为民族、民权两个主义，奋斗了十三年，民生主义十三年总没理过。……今日开这个农民联欢大会，这是革命党和农民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从今日起，要实行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若是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国民党改组后，几个老党员竟有"亡党"之痛，照中山先生这般演说，不但党未曾亡，并且三民主义的党如今才第一次完全叫人看见。

“亡　党”

主张民族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族运动表同情；主张民权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权运动表同情；主张民生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劳工贫农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工人农民运动表同情；因为表同情是局外人底态度，主张一种主义的党，不应该这样滑稽的不负责任。无论是什么主义的党，若党员们都取局外人不负责任的态度，那党也就去亡不远了！若再等而下之，做民族运动恐怕有伤列强感情，做民权运动又恐怕妨碍一部分军阀之友谊，做工人农民运动更恐怕开罪资本家与地主，连局外人底同情态度都不敢表示，那才真是“亡党”呵！

中俄协定与奉张

奉张为什么反对中俄协定，看七月廿八日的《申报》通信便明白了。原来奉张和谢米诺夫有那么深的关系，而且订有密约，现在还时有密电往来，他当然要反对中俄协定。日本素有利用谢米诺夫来支配蒙古、利用张作霖来支配满洲的野心，谢氏依靠日本不用说了，奉张反对苏俄，同时对于日本取何态度，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并且我们现在便应该注意《申报》十二日北京电：奉俄谈判破裂，奉日协定妥协，日在南满有三十年租地权。

佛化恶人

报载山西怀仁县水泉村王隆，虔奉佛法，阿弥陀佛不绝口，乃因其母误伤其子，锄母至死且食其心肝。大家听了此事必以为至奇，其实毫不足奇。我所知道的几位家乡熟人：奔走军阀官僚间无钱不要的何雯，

任安徽财政厅长时大刮地皮且为军阀侦探安徽民党在沪行动之马季平，敲诈民财逼成刀匪事变之六安县知事丁景炎，无一不是满口阿弥陀佛，几乎可以说凡受佛化的都是恶人！

1924 年 8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期 署名：独秀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

人之偶然的举动。即或义和团当中及纵容义和团之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而群众之附和义和团，则由于外力尤其是教会压迫的反应，可以说毫无疑义。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1924年9月3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一期 署名：独秀

给维经斯基的信

亲爱的维经斯基同志：

想必您已收到我的第一封信①。也许日内我将收到您的回信。张太雷、彼得罗夫②等人早就到了上海，而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40名学生，自己支付了费用，将分几批起程。很有意义的是，党派遣许多工人到莫斯科去学习，有20多名工人已被录取。在被录取的工人当中，有10人已辞去工作，在上海等候起程。您曾答应为他们筹集旅费，如已弄到，请马上把钱寄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③，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④，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⑤，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

原注：

① 指陈独秀1924年7月13日给维经斯基的信。

② 即彭述之。

③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鲍罗廷的报告中称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成立于1924年7月11日，其成员有：孙逸仙(主席)、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和邵元冲。鲍罗廷被聘为该机构顾问。

⑤ 电报没有找到。

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

在远东的工作中，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 7、8、9、10 月份的钱来。

既然我们的同志对我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①]的决议都很了解，而在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所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我们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给代表大会发来电报。最好，您能再来一次。

致同志般的敬礼

陈独秀

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① 指 1924 年 5 月 10 至 15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适当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实在性质及关系于国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的战乱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一对时局宣言，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此项文件，现已在印刷之中，不日即可寄发各地。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至活动态度，应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T. T. Mao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我们的回答

我们因为有促进中国国民党的必要，而以个人的资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似乎于国民党革命的倾向只有进无退，然而正因此惹起了党中一部分党员之误会，攻击；他们不但是口里攻击，还用白纸黑字写出，我们遂不得不简单回答几句，以免社会上有人在误会上又加以误会。我们在此处仅仅是答复他们的攻击，至于他们自己的言行，是否真算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他们党中是否有更反动的反革命的言行，则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以内，所以不必提及。

我们在答复之先，须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根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指责国民党任何党员，开除国民党任何党员，这都是正当应有之事；乃并不依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具体的指责国民党党员某某个人，而竟抽象的笼统攻击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并且因此攻击到在国民党之外的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若主张不肯脱离共产党的人便不许加入国民党，则虽另再召集一次国民党全国大会，取消前次大会准许共产党党员跨党的决议便得，何苦以有用的光阴与经费，发行许多印刷品，不是攻击帝国主义与军阀而是攻击我们！

以上是提出他们对待我们的根本错误，以下是分别回答他们的攻击。

一切道路传说、报纸记载及个人的谈话与书信且不涉及，现在只取《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这三种印刷品为他们负责的言论。

他们共同的唯一口号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他们所谓破坏国民党的证据、铁证，都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七号团刊所载《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份子集中于国民党”、“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种工作中我们同志应努力工作”、“使其（指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这类文句，如果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议决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分》的导言上说：“国民党主张凡赞成革命的都应一律欢迎入党；共产派则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以成就他们的势力。”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他们已否忘记了国民党宣言上“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他又说：“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主张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共产派则主张劳资斗争，惟恐国民党对劳工运动有调和的倾向。”劳资斗争是社会进化上一种不可免的革命现象，主张劳资调和是一种和缓革命的政策，无人能够相信不革命的调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权，可以限制资本，世界上那有这样好说话的大地主与资本家？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后再运用政权以实现三民主义；共产派则处处宣传，叫已觉悟革命的份子往田间去。”国民党固然应该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试问这武力要建筑在什么基础上面？若建筑在已有的军队上面，退一百步说，即令能用他取得政权，也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试看现在的广州政府实际上能管理军政财政吗？广州一切政治有一件能根据国民党的主义或政策吗？若要建筑在“国民革命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的原则上面，“往田间去”这个口号，当然不违背国民党的大会宣言。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共产派则主张民族自

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国民党大会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据此宣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却实不是单单自求解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且郑重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做那导言的人，如果真是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确有细心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那导言最终又说：“总括他的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四个要点：(1)一面说赞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一面又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2)其中措辞，未免有些污辱纯粹国民党党员的人格；(3)他们集合许多人们，成立一个共产党，但对于政党道德未免太不讲究；(4)他们破坏国民党的步骤，第一多拉无产阶级入党，以建筑他们将来的基础，第二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份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三即或革命成功，纯粹国民党员已无能为力了。”

关于第一点，所谓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不知所指何事？若是指反对帝国主义使国民党伤了列强的感情，以后不能安住租界不能亡命外国，则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回答，且亦不必回答，因为国民党大会宣言上早已回答了，国民党孙总理最近又代我们回答道：“中国欲免为印度、埃及之续，必国民合力铲除为革命成功大障碍之帝国主义。”若是指我们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是破坏国民党的左军；我们不相信任何派军阀真能为国民革命的左军，退一百步说，即全说是左军，也只是一时军事的联合，决不是主义上政见上的妥协。若说反对和任何军阀妥

协,即是全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那么朱执信便是第一个会使国民党岌岌不可终日的人。

关于第二点,我们更不知其何所指。

关于第三点,是他们明白反对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中国存在,此层前面已经说过。

关于第四点,第一步骤所谓多拉无产阶级入党,若指拉入共产党,此事和国民党无关;若指拉入国民党是破坏国民党,此事我们可以认错,并且在此处可以切实声明以后不拉无产阶级入国民党,免得有破坏国民党的嫌疑。然而这一来,国民党成了什么阶级的党?所谓第二步骤,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既然不过是国民党的左派,为什么必须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才能成立?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此时疾视共产党的,应该只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国民党还不必如此。第三步骤所谓革命成功,自是指国民革命;既然是纯粹国民党员,他们唯一的工作与目的,自然正是国民革命成功,此外,还有何事是他们应该为力的呢?

《民权旬刊》及《护党特刊》中,其漫骂及和上项导言之意见相同者,兹不论及,所论及的只是他们特殊的意见。

《旬刊》上说:"吾间闻共产党员之宣言矣,'国民党者共产党之过程也'。"国民党是何种性质,共产党是何种性质,我们不相信真有这种无知的共产党员说出"国民党是共产党之过程"这样昏话!他说:"吾又尝见共产党之行动矣,有所宣传必以共产为言论,有所进作,无必以共产为张本。"共产党的宣传进作,自应不离共产,这都是共产党的事,与他党无涉。他又比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上有三种不同之点,其比论的错误此处不必论,不同之点并不只此三种此处也不必论,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之不同,此何待论;此处所讨论非两党主义主张不同问题,乃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否破坏国民党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此次大家所纷纷争论的,还丝毫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不

同的冲突，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主张不同而冲突，此义不明，决不能了解此次争论的真相。

《护党特刊》第一号上，主张“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不然便麻烦极了。在这些议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未曾研究过各国革命前后的历史，无论是俄是法，当时革命的何止一党；各国的革命党，恒有左、右、中央政见不同，本党和青年组织各别，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若怕麻烦，那便是旧式会党简单的头脑，二十世纪进步的革命党决不是这样。他们说：“在一个党里，怎么好谈两种的主义！”我们说：诚然，在国民党里，当然只能谈三民主义。他们说：“我们只信服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其他主义，我们不必去做。”我们说：诚然，诚然，我们只希望国民党员不但信服而且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主义，国民党党员当然没有必须去做的理由。他们说：“他们要谈他们的主义，不妨在党外去谈。”我们说：诚然，诚然，诚然，只要不是疯癫，决不会有人在甲党内谈乙党的主义。他们说：“没有大元帅的命令，怎么好停止军事行动，何况是阻止他。”我们说：国民党应否集全力于军事行动，乃党中重要的政策问题；若要“以党治国”，不是要“以大元帅个人治国”，则大元帅的命令便应随党的政策而决定，党的政策不应随大元帅的命令而决定。他们说：“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为什么缘故不要妥协。”我们说：民国元年和袁世凯妥协的结果如何？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观念，确想把本党逐渐变为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说：不能把中国国民党属于中国共产党，也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国民党是一样。他们说：“苏俄常常运动帝国主义者通商或承认，也曾向中国宣布白党的罪恶，并要请中国驱逐旧俄的使领，拿这种种举动比较总理的吊电或对外宣言，谁是谁非？”我们说：国家的通商外交行动，和依赖外力解决国内问题绝对不同。苏俄只要求中国不承认驻中国的旧俄使领，取缔中国境内的白党，而未尝请求中国干涉在俄国境内的事；苏俄只于革命成功旧党势力灭亡之后，向一切外国办理国家的外交及通商，而未尝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想借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倾覆旧俄政府。试问中国革命政府统一中国时，不和外国通商吗？不要外国承认

吗？仍要各国承认前政府的使领吗？宣布旧政府的罪恶，宣布帝国主义者援助旧政府之罪恶，都是应该的，至于希望帝国主义者否认旧政府而表同情于我们的革命政府，那便万分不应该了，因为国内的事应由自力解决之，无论是非善恶，都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左右于其间！况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意义上，国外的帝国主义者，比国内军阀政府是我们更大的仇敌。他们说："本党联络段芝泉、张雨亭和卢子嘉们，与容纳他们的精神毫没有一致。"我们以为这几句话是再侮辱国民党不过的了，我们不愿回答，我们要求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加以评判！他们说："本党的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他们别有怀抱，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大喊奋斗！奋斗！我们实在不忍！"我们说：既然要谈民生主义，当然以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重要标准。宣言明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他们竟指斥主张劳动者奋斗是别有怀抱，不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不幸的事实，也是历史上必然的事实，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正是要消弭阶级；但是，若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意思；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过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来奋斗的意思。"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句话，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如何才能够达到改良之目的，乃是一个问题，由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或是由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我们以为劳资两方面的利益绝对冲突，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希望大地主或是资本家一旦大发善心，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劳动者让步，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民党。民党不革命，如何能得着政权！劳动者不奋斗，如何能改良非人的生活？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够改良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主张劳动者奋斗，却明说：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试问这样的主张改良，是不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而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这未免太忍了吧！他们说："本

党主张与苏俄联络……因为他们凭空造谣，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他们矫称接了密令，拿本党的名义做了一次苏俄的留声机。”我们说：为什么要联络苏俄，自然建立在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同情上面，既然言此，为苏俄说几句公道话，也是中国革命党正正堂堂的应有态度，用不着以做留声机自贬。至于什么“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什么“矫称接了密令”这些怪话，希望他们以后不可这样凭空造谣！他们说：“他们（指青年团）对于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为什么不受本党的指挥，而受共产党的指挥呢？”我们说：青年团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不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这个决议案又是在青年团议决的，不是在国民党议决的，自应说受共产党指挥，如何能说受国民党指挥呢！这类团体组织系统及管辖权限，他们也应该弄清楚！他们说：“这‘不必要的冲突’的话，便含有必要的冲突的意思在话外。”我们说：诚然，若有人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和军阀妥协，主张不为农夫工人利益奋斗，以及其他主张有背宣言的反革命言论行动，我们都应该与之冲突，这正是国民革命进行上、国民党进步上必要的冲突。

他们攻击我们的总口号虽然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而归纳他们所举的证据，明眼人当知道实际争点完全和他所呼号的口号不符，乃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我们的主张不同：

我们的主张：

（1）为农夫工人奋斗而拥护其利益；

（2）建设革命力量于农民工人等一切民众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尊重蒙古民族自决权；

（4）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军阀比〔并〕重；

（5）不与任何军阀妥协；

（6）反帝国主义的苏俄是中国好友。

他们的主张：

（1）反对为工人农民争利益的奋斗；

（2）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反对蒙古民族自决；

（4）反对北政府，同时可以对帝国主义妥协；

(5) 与一派军阀妥协；

(6) 和北政府订立中俄协定的苏俄是国民党仇敌。

以上实际的争点，没有一件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争，更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实在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

他们解决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他们的本怀。

他们为什么希望他们退出，这很容易明白，现在世界上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莫不极力排除革命的共产派，恐怕共产派搅乱他们妥协和平的好梦。我们明白普告天下：凡是一个真革命党都不会想到取消别个革命党；凡是一个真革命党人，都没有自己退出一个革命党的权利；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份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份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除非是反革命非革命份子或违背党纲的人！

此外我们还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声明一下，即是他们借所谓京汉路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张德惠的话来攻击我们。京汉路不幸被曹、吴摧残以来，不但总工会的职员入狱的入狱，走散的走散，即各站分会的组织都早不存在了，张德惠竟自称代理总工会委员长，不知他们何所依据？张德惠是长辛店一个工人，他攻击我们，乃是他侵吞京汉恤金数五百元受我们责问的反响；他攻击我们之点，前后都有事实证明，我们在此不必空言与辩。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各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造谣诬蔑各国的共产党无所不至，中国的军阀官僚也正在用这个方法离间工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不要这样！

1924年9月17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三期 署名：独秀

告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

中国青年急需有良好的教育，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此时中国人自立学校的发达不能尽量容纳急于求学的青年，遂使许多青年误投教会学校，这也是不可免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青年因急于求学而入教会学校，这是无可责难的；可是一入教会学校，不但得不着良好的教育，而且变成一个崇拜外国及外国人、蔑视本国及本国人的新式奴才，那便是有教育更坏于无教育了！

我们要研究科学，自然必须懂得外国人，不但目前如此，而且在国际语之文字未统一以前永远是如此。教会学校虽称注重外国语科文字，然而他们教外国语之文字之目的与方法，大半是养成通译人才，能为他们做爪牙喉舌，教者学者都不把外国语言文字，当作研究科学的工具，所以注重发音与说话而不重文法与读书。他们教授科学大半用外国文，因此科学进步极慢，名义上虽是科学功课，实际上还是学习外国文，他们对于本国文，概是雇佣一班陈腐不通的老秀才，当作可有可无的功课教授。因此，一班会说洋里洋气薰人的教会学生，不但忘了本国，并且连外国的学术文化也丝毫不懂，男学生之最高目的是外国硕士博士、本国的官吏、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外商的洋行买办公司职员、外力侵入军阀奸商卖国之居间人；女学生之最高目的是留学生中硕士博士的官太太。这种教育的结果，只是养成一班附属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的奴才，决不是中国青年所需要的良好教育。我有一位老朋友曾说："我的子女宁使他们一字不识，也不愿送到约翰大学中要塾教成洋奴。"我想他这话一定不错，我更觉得这班洋奴已有许多站在中国社会重要地位，公然为帝国主义者辩护，他们是系缚中国人做外人长期奴隶的绳索，他们是中国民族解放在内的障碍。这种民族精神在内的自腐，比外面什么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都还要利害。

可怜许多懵懂的青年，只因急于求学，误投教会学校，他们梦也想不到“急于求学”这样好的动机，竟会损坏他们底民族的精神，断送他们国家的生命！

我们以为中国人进教会的中小学自然更万分要不得，即中国自立的大学专门虽然很幼稚，也未必比教会学校还不如，大家尽可改条路走。

倘或有种不得意的原因，不得不仍留在教会学校读书的，觉悟万千，便应该努力进行左列各事。

（一）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的团体；

（二）在校内进行教育和宗教分离的运动；

（三）阻止同学间在校内校外用外国语谈话；

（四）要求学校延聘有进步思想的人物教授国文；

（五）在同学中鼓吹学外国文重在研究科学不重在说话，尤应自动的研究外国文明史；

（六）参加各本地学生会，破除学生会中教会学校非教会学校的界限；

（七）反对学校中对于教员及学生是教徒非教徒的不平待遇；

（八）其已入教的学生，也勿忘了仍旧是中国人，勿以宗教之故遂甘做外人奴隶！

在外国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青年们！别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陵，或者你们还不甚感觉（这句话或者很侮辱你们），教会学校的重重罪恶是摆在你们眼前，你们身受的比我们听说的更为密切，你们还不是外国的硕士博士，你们的环境还能使你们的思想发生变动。然而同时我们却要警告你们！去了崇拜外人的途径，千万不可去提倡国粹与东方文化等另一歧路！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时事新报·学灯》 署名：实庵

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

“西南自主”乃中国过去内战史上一名词，此名词，乃民国六七年间，由西南数省新兴的小军阀以“暂时自主”的名义，脱离北方大军阀之管辖而产生。先后加入此运动者为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闿，四川督军熊克武，贵州督军刘显世，和西南数省人民都无关系。随后由“西南自主”一变而为“联省自治”的口号，主其事者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这几个军阀，及附属他们的政客，和人民也没有关系；陈炯明且公然解释他主张联省自治是在以小军阀推倒大军阀。

自“西南自主”到“联省自治”，其性质其内容，都纯粹是南北军阀间冲突的问题，丝毫不是人民与军阀间冲突的问题象“五四”运动与“二七”事件。这种南北军阀间的冲突，和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直皖、直奉战争）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川滇黔战争、粤桂战争）等军阀间的混战，加于人民之灾害，对于国家之戕贼，都是一样；其结果不能产生新的希望，也是一样。

孙中山先生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然而民国七年一月炮击观音山，被陆荣廷派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一次失败；民国十二年八月被陈炯明军队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二次失败；最近被滇军逼迫而屈服于反革命的商团，这是利用政策第三次失败；陆荣廷、陈炯明、范石生、廖行超等这班军阀，他们本来不要革命，他们和北方军阀之冲突，纯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都可在相当的条件之下而投降的，孙中山定要拉他们上革命的路，他们如何不倒戈相向！

我们看透了所谓西南团结其力量乃建立在西南将领上面，这便是新兴的南方军阀之团结，他们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到底，

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我们于去年北京政变时，曾指斥“西南团结”是和南方军阀有关系的政客们投机运动，不是革命的方法；我并且面告中山先生“西南团结”不是革命的方法，因为西南将领不但没有一个能走革命的路，而且多是反革命的人物。中山先生回答我的话是：“我的西南运动是自下而上，是要去掉那班将领。”

现在又来了！自但懋辛、石青阳奔走滇黔以后，“西南团结”的呼声，充满了国民党的机关报。据九月二十三日《民国日报》的广州通信，所谓西南大团结之大人物如下：

（一）陈炯明

（二）唐继尧

（三）熊克武、刘成勋、杨森

（四）刘显世、唐继虞

（五）沈鸿英、林俊庭

我们看了这张人名表，好像看了“四杰村”、“八蜡庙”一类的戏报，中山先生能运用这班脚色的势力来做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革命吗？这样西南团结至多只能再闹出一个像民国七年五月七总裁军政府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中山先生若能事事俯首听命于他们的主张像此次对待商团一样，或者能得着主席、总裁的荣位；若主张民权主义讨伐一切军阀到底，他们便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至于什么离奇古怪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什么离奇古怪的拥护工人农民利益的民生主义，中山先生早晨要实行，他们晚上便请他下野。

我们实不愿看见一个革命的领袖为投机的军人政客所玩弄！

我们大声疾呼：中国国民党若不放弃国民革命的口号，便不应再走“西南团结”这条旧路！

1924年9月24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四期　署名：独秀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

C. P. 与 S. Y. 关于民校工作之合作，尚未切实规定，兹经 C. P. 中央和 S. Y. 中央决定下列办法，望各地方切实遵照执行：

（一）各地民校工作，S. Y. 地方应直接受 C. P. 地委或区委之指导；其无 C. P. 地方者，由 S. Y. 中央依据 C. P. 中央通告指导之。

（二）各地 C. P. 和 S. Y. 在民校工作之同志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 C. P. 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之，但党团开会时，S. Y. 地委或区委须派一人出席。

（三）我们在民校工作之重要点，为宣传左派政治主张（以《向导》之所指示为准），造成左派地位，对右派之反动行为及言论，务必不懈的加以攻击，此种工作不限于本地有无右派分子，即使本地民校工作完全在我们之手而无一右派分子，亦应同样的积极的进行此种工作，因为必如此才能造成真正左派。

（四）左右派的分化要在行动与争辩中才能看出，左派的地位也要在行动中才能造成与巩固，所以在民校的每一集会（如区分部地方大会等）中，我们务必提出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如《向导》八十一期后之各种实际问题），充分的做左派的政治宣传。

（五）要有左派倾向的分子，才介绍入民校，要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 C. P. 或 S. Y. ；民校中之左倾分子，除忠实的工人外，不宜勉强拉入 C. P. 或 S. Y. 。

（六）我们在民校的地位为左派，胡汉民等为中派，孙科以至叶楚伧等为右派。我们对于中派的态度，亦应照《向导》之所指示而批评之。

（七）务极力推销《向导》于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

C. 中　T. S. Chen

S. 中　Freeman Yuin[①](代)

1924年9月[②]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① 恽代英的英文签名。

② 本文原件无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都有就理论上事实上仔细研究并发表意见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见，硬闭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们所持最有力的理论是：革命党须有军事行动，也须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这种理论，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形式的逻辑，至于国民党本身状况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说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论，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内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并且也还没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军队中宣传活动，能左右这些军队的群众；建立在这些军队力量上的军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军阀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掳掠搜刮，连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曾打倒，而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因滇军勾结商团而妥协是国民党的耻辱，然而因为要做军事行动，便不得不容忍这班反动的军队；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

道反动的西南将领不可与之革命，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实力，便不得不和他们联和；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段系、奉张都是革命党所应讨伐的军阀，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声势，便不得不称他们为友军；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除了采用这些政策，本来没有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之可能。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样的军事行动，且可使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完全无效。

应否放弃广州政府，和应否停止军事行动，是两件事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既没有革命的军队，又没有强大的革命党；因此，在名义上在极少数政府首领的愿望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因此，政府中极少数首领仅仅是有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权能支配所属的军力、财政用在革命的意义上；并没有实权能制止革命政府所万不应做万不忍做的事：开赌，拉夫；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警察、商团压迫工人农民；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商团勾结妥协；这些都是广州政府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抛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分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

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之自身利益而奋斗，使这些大民众都认识国民党的确是为民众利益而革命的党，的确和军阀派及其他官僚的政党不同；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真实力量。

这样本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变动，反动的右派，在他们自身的利害上当然要反对这种变动；即畏难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赞成这变动之勇气与决心，然而这个变动确是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的领袖们若是看清了这个需要的事实，便应该拿出革命的责任心克服他们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头脑，都被军阀战争及局部政情之琐屑应付的具体问

题占领了，没有考虑全国革命所需要的事实之余地，诚然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们相信终有大家回过头来考虑这个事实之一日，如此，我们只好改日再谈。

1924 年 10 月 1 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五期　署名：独秀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此处所称中国国民党,乃包括自同盟会一直到现在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原因;而专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也是失败之原因。

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这种感情的煽动,自然也是革命运动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那有不失败之理!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是对外收回权利(矿山、铁路等),是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革命党人忽略了这种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而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当时的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满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不但首先叛党之章炳麟、刘师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满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党人都减少了革命的热忱,即革命的领袖们也真无法解释一般民众"反对清室退位后继续战争"的谬误心理,因为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而且在这单调的呼声中,竟将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反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掩住了,使帝国主义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凯解散革命的势力。当时党人的理论,未尝不是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然而这种转弯的想像,不如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号召民众,当时直接鼓动民众革命情绪的只是推倒满清,所以"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后来袁世凯死,护国运动便应中止;徐世昌

逃，孙中山便应下野，都是同样的逻辑。这个逻辑诚然合理，确是不错，只是错在“排满”、“讨袁”、“讨徐”、“护国”、“护法”一直到现在的“讨曹”、“讨吴”、“反直”、“北伐”等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有了这等口号，自然结果到那样合理的逻辑。可是中国革命运动，正是被这合理的逻辑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葬送了！

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没有民众的宣传，则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并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没有党的训练，当然无法由党的主义、党的政策来支配战时的军事行动及战后的政治建设不违背革命的意义。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败了；至于民众宣传方面：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排满的鼓动，兵事起后，连这一小部分的鼓动都停止了，唯一的机关报——《民报》，竟未曾在民党占领的地方继续出版过一次；党人自办的宣传革命的《民立报》，兵事起后，撰述权竟委诸反同盟会的章士钊之手；军事行动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无一个正式的宣传机关（《民权报》是天仇个人的关系）。因为官厅禁止出版么？当然不是。因为党中无力供给出版经费么？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党中只看见军事行动在革命上有价值，办报不过是无聊文人混饭吃的把戏，一万张报内也寻不出一兵一弹来，有何用处？从前在《民报》上《民立报》上做宣传工作的党员，兵事起后，都去做了大官，做了伟人，那还肯低头小就来充当什么新闻记者！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社会的基础之原因。

即于党的训练方面：当时的右派（首领是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附和官僚派“革命军兴革命党清”之说，固属荒谬；而左派首领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等又何尝想起召集一个全国党的会议。兵事起后，站在政府方面，开过多少军事、财政会议；而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政治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既然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与纪律训练，党员的个人行动及背党行为自

然要层出不穷：第一个背叛者便是章炳麟，公然通电毁谤党魁，力主政府北迁，推举袁世凯，非袁无人能统治中国；第二个背叛者便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多数党员，不遵党魁命令，议决政府北迁；第三个背叛者便是刘揆一，为了想做袁世凯政府的工商总长，宣布脱党；自此以后，相继叛党者，若孙毓筠，若胡瑛等，不计其数，几乎可以说是同盟会之袁党化。革命党这种失败，比较军事上政治上任何失败都重大，而且可耻。然而当时党中并不曾把这种可耻的失败看得象军事上政治上失败那样要紧。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党的训练，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现在的国民党仍然不曾抛弃这种旧观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国民党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迹，其原因乃由于地方的经济组织影响到两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领孙中山等，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领黄兴等，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这两派革命的宣传，自始也就不同：广东派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民报》上便有一些关于民权、民生的理论；而湖南派的陈天华、杨笃生等，却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满小册子——《猛回头》、《新湖南》。自从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实现，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第一步妥协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步妥协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步妥协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协定什么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美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第四步妥协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步妥协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直到民国二年，国民党完全失败，孙中山才公然指责党员不服从他的主张，才断然和黄兴派分裂，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运动。

在这继续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政策，是否因袭旧的政策——采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等——仍然是一个问题；左派自身是否也有妥协的错误——郑重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履行条约义务等——这又是一个问题。

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24 年 10 月 8 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六期 署名：独秀



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

致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

亲爱的同志们：

直隶集团与反直隶集团之间进行的内战，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中掀起了一场风暴。目前战争的性质和我们对它的态度，我们在关于政治局势的第三个宣言①中作了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目前，作战双方，即江苏与浙江，直隶与奉天，哪一方都没有取得胜利，各方都在采取适当方式加固自己的阵地。不过哪一方都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他们势均力敌，每一方都得到一个大国的帮助，所以结果会是这样：在列强进行干涉的压力下，将成立由各列强集团同国内彼此达成妥协的军阀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

在国民党内，我们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应当反对这种战争，尤其要反对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涉。然而国民党仍然坚持老政策：同张作霖和卢永祥联合，在战争期间，不做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宣传。

共产党决定10月10日以党的名义散发传单，我们要向民众说明，国内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进行的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会给农民、工人和所有阶级带来很多痛苦和灾难，对人民没有好处。

关于广东商团问题，孙中山和中派（只有共产党人代表国民党中的左派）一开始决定用武力来镇压以这些商人和帝国主义者为代表的反动派，但后来，当商团同滇军和国民党右派联合（特别是外交使团）向他和中派施加压力时，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无力镇压反动势力，另一方面由于直隶与江苏开战，他们改变了最初计划，决定开始进行北伐，并任命

① 指明1924年9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国内形势的声明》（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87—296页）。

孙为总司令。现在孙已去韶关。所有这些情况导致放弃了对商团的镇压计划。

更有甚者，中派首领胡汉民竟向商团作出让步，把广州的警察力量交给其首领李朗如，而把市政厅交给了与这些军队有联系的军阀李福林，旨在以这种方式来驱逐孙科（孙中山之子，原广州市长）和吴铁城（广州警察局长）。

中派想通过这种途径使右派同这些部队断绝联系，而实际上胡汉民想利用与他有联系的这些军阀和部分商团部队来打倒孙科及其一伙，以便自己掌权。他想在中派和商人阶级之间建立联系，也就是要造成更反动的局面。

国民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在8月结束[①]。三项决议案，即关于反帝运动计划、工人运动原则和对右派反动行为的惩罚的决议，没有提交讨论，而交给了临时书记处。临时书记处通过了这些决议案，但没有公布，也没有执行，原因是：

1. 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对中派作出的让步太多，对自己的观点捍卫太差。

2.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和广州的政治局势，中共根据瞿秋白同志的报告已作出决议，因此没有必要再重复。

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他为孙中山的军事行动制订了计划并支持这样的观点：占领广东省无论对于对内政策还是对于对外政策都具有很大意义。在如此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给广东同志造成了混乱，他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无法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也面临很大威胁，所以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在财务方面，鲍罗廷已经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停止资助国民党各省党部。我们给他去信，要求把原定给国民党省党部的这笔钱转给我们中共的省委，用来资助那些在我们控制之下并对国民运动的实际工作提供很大帮助的省党部。

1924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书记　陈独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

一个党的左右派分化，不但是应有的现象，而且或者是进步的现象。不过近来国民党中所谓右派的反动行为，说他是右派实在还是太恭维了，实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因为如果是国民党的右派，不过是比左派和平些，大体上仍要抱定国民主义，更不能违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更万万不能做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依照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不使享有民权，何况认为党员！

现在这班所谓右派的反革命的行为是怎样？在此次上海国民大会的暴行上，更是充分的暴露出来了。

据上海大学学生通电说："当我们同学洪野鹤、何秉彝、王秋心、王环心、刘一清、黄仁，在会场之下为赞成反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演说而鼓掌之时，台上主席喻育之(国民党党员)便喝令禁止，加以'扰乱会场'之罪名，台下大队流氓，闻声响应，一呼百诺，蜂拥而前，向洪、何、王、刘、王、黄诸同学施以惨酷之打击，同时，并以'这是齐燮元的奸细'之口号诬害我洪、何、王诸同学。……当时恰有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代表郭君寿华登台演说：'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一切帝国主义……'话犹未了，该会会计童理璋(国民党党员)即上前将郭君拦阻，扯下演台……不意童理璋、喻育之辈，狼毒豺狠，猛将黄仁、郭伯和、郭寿华三君一推，竟自高逾七尺之台，跌至台下硬石上面，一时怆痛之声，惨不忍闻。黄仁君跌伤腰部，呕吐交作，一时昏迷不省人事(次日已死于医院)；郭君伯和跌伤头、胸、足三部，血流不止，多时不能行动；郭君寿华挨打之后，又复加以跌伤肩背等处，时台下流氓，又加以殴打。"

安福部雇流氓包围国会，吴景濂雇流氓打学生的方法，现在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居然效法起来，而且被打死打伤的都是些同党的党员，

这情形是何等严重！

他们在卢、何势力之下，诬爱国学生为齐燮元的奸细；同样，在吴佩孚、齐燮元等势力之下的走狗，又何尝不可以卢永祥、何丰林的奸细诬爱国学生而加以残杀；这种为一派军阀捧场作伥的卑劣手段，不意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公然行之，这情形又何等严重！

前此上海执行部坐视右派数十暴徒殴打邵力子而不与以惩罚，纪律废弛，识者早已忧之。我们固然不应该因几个党中下流分子的行动，归罪全党；我们现在只十分注意党中负责任的最高党部，对于此次杀伤十几个青年学生的巨案如何处置；并同时注意各级党部的公正党员，对于党中几个反动分子取如何态度，然后才可以判断党的价值。

1924年10月15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七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近来英美人士极口称赞这位基督将军的军队如何优良，青年政治家基督教徒王正廷等如何为冯玉祥奔走联络，这都是新工具登场的广告。

这次英美更换新工具，乃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势力均衡(英美不能完全打倒日本在华势力，日本对英美亦然)和中国军阀势力均衡(直不能完全平奉，奉亦不能完全平直)之故；他们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即政变中所传天津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或加入一二财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

我们百口断定这种结局，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随后他们当中又必然互相争斗起来，加中国人民以空前的屠杀与践踏。

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呵！自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中国的经济权政治权都渐渐落在帝国主义的列强手里，我们如何能妄想任何军阀的政治行动不受列强的操纵？我们如何妄想他们给我们吃的任何东西不是毒药而是滋养品？

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若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而且

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

我们与其年年坐着失望，任他溃烂，不如奋起以自力创造和平安定的局面；我们所要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决不是什么“排满”、“讨袁”、“讨徐”、“讨段”、“反直”、“讨曹吴”、“讨冯玉祥”可以得着，只有扫荡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可以得着！

1924 年 10 月 29 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九期 署名：独秀

肃清内部

中国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境内，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

民国二年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决心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此次国民党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政学会。民国十年中山先生和买办唐绍仪决裂，此次国民党又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民国十一年的益友社。虽然经过这两次无形淘汰，而并未曾经过一次正式的洗党，因此留在党中的反动分子仍不等数，他们的反动性，由全国大会宣言发表后，党中革命的空气日益浓厚起来，逼得他们反革命的言论行动也日益鲜明起来；其事实略见国民党全体执行委员会提出，常务委员会通过之整顿纪律案如下：

> 《民国日报》记者说中国人并不愿侵犯外国已得之权利并拒绝登载废约运动的通电；顺德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周之贞，以擅立农会罪名拘捕农民领袖；广宁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李某，煽动土豪所组织的民团摧残农民协会；兵工厂长兼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马超俊，不惩办凶殴工人的护厂队长，反而破坏工人组织俱乐部；粤汉铁路局长许崇灏压制要求发给欠薪之工人；公安局长兼广州市党部委员吴铁城，派警察禁止圣心学校学生反抗帝国主义之罢课，左袒枪击酒业工会之商团，力助工头压迫人力车夫；市长兼市党部组织部长孙科，命警备队恶打请愿免捐之轿夫并不准轿夫入党；代理省长兼市党部监察委员陈树人，竟执行法国领事命令，派员查办圣心罢课学生，并在洋教师前大声呼喝立拿劝阻教员上课者；中央监察委员张继，曾公然说反对帝国主义为本党之错误。

此外若统率商团军反抗政府的陈廉伯、陈恭受；若为上海南洋烟草

公司出头摧残工人的李援、邝公耀；若利用流氓杀伤十余学生的童理璋、喻育之等；若在沙面罢工事件中，在商团反叛事件中，许多力谋和帝国主义者及商团合作的军人政客；他们不但挂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并且自称是热心护党的党员。

其实这班党员留在党内，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倘真欲护党，只有肃清内部之一法。

说到广东境内的政治军事问题，目前也非注全力于肃清内部不可。反革命的商团虽然打退了，而广州政府所受反革命势力宰制的危机并未曾稍减：第一是心腹之患的范、廖等军；第二是各县绅士大地主所统率的乡民团；第三是久据东江的陈、洪、林、叶各军；广东境内这三种反革命的势力，随时都可以单独的或结合起来向北勾引直系，向南勾引英国帝国主义者，最客气也是"请孙下野"。因此，我们总以为国民党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自己内部一蹋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

1924年10月29日　《向导》周报第八十九期　署名：独秀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

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末〔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一）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

（二）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

（三）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

（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五）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

（六）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C. T. Mao[1]

一九二四、十一、一

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

---

[1] 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六日附及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致加拉罕的信

北京，加拉罕启

亲爱的加拉罕同志：

请把红色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给华北被捕的中国同志的钱直接寄给北京组织的书记(即李大钊——译者)。

我们已经据你们的指示开始反帝工作，可是我们还没有收到您答应提供的必要的费用，我们上海现有费用600美元，请尽快告诉我们。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陈[独秀](签名)

1924年11月3日

《百年潮》2005年第1期32页

(美国)A.B潘佐夫

李玉贞　译

编者按：在这封信的下面有一段话，大概是A·B潘佐夫写的，现抄录如下："600美元给三百万人口的上海，可是为组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李大钊请加拉罕提供给天津，一个人口少得多的城市，一个月的费用是1 500美元。"



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

自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直到现在，在中国也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有许多人把他看做洪水猛兽。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误解呢？一般的总原因，是观察力薄弱的人们误信了各帝国主义者的通信社、新闻纸之造谣诬蔑及反革命的白党（旧俄之贵族、大地主、军人、官僚、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等）之奔走呼号；其次乃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加旧俄皇室以重创，此事大伤了宗法社会里人们的感情；再其次则是新俄宪法，剥夺了以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参政权。在第一个原因，本来毫不足怪，因为新俄一面自己放弃了旧俄的帝国主义，一面拒绝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之侵入，帝国主义者自然要造谣诬蔑他，可是我们被帝国主义者欺压得不成话说的中国人，也竟然误信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新俄，未免认不清敌与友了。旧俄贵族失了特权，大地主失了土地，军人、官僚失了权位，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失了和资产阶级苟合的可能，他们奔走呼号也是应有的事，可是特权阶级以外的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却没有同情于他们的必要。在第二个原因，象张勋、辜鸿铭、康有为这等复辟保皇的人们，自然应该太息痛恨俄之布尔什维克党人悖伦灭理，而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却应该承认俄人取法于法人处置路易者处置尼哥拉士，断绝后患，善于中国人之处置清室。只有第三个原因，自有史以来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之特色，这个特色自然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所不喜；然而在资产阶级幼稚的中国，大一点的资本家与地主在国民中真是少数又少数，小资产阶级若手工工业家、小商人、自耕农，都被英、美、日、法等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商业挤得濒于破产，生活艰难，也应该行向革命才是生路。

再由积极方面，说到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之真情实况，因革命而得救

的，第一是占国民十分之八的农民得着了土地，其次是工人得着了政治上教育上的优越权利，再其次是科学者、技术家得着了最优的待遇，就是小工业家、小商人亦因受国家企业之雇佣，免了被大资本企业压迫的忧危，吃亏的只有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最少数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真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更有一个重要的主义是：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经济生活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个有力的暗示。

中国的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比俄罗斯更是少数，其余最大多数的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所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欺压，比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民所受的更是厉害多少倍；因此，我们以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应该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而不应该误信谣言把他看做洪水猛兽！即令他对于帝国主义者、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是洪水猛兽，而俄罗斯最大多数人民却已由他而得救了！

1924 年 11 月 7 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的政治态度

国民党的分子本来复杂，遇了现在这样复杂的政局，各派分子对于政治的态度，自然不会一致。兹假设其不同点而略评其得失。

此时中国的一切政治局面，都是各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军阀暗斗明争循环起伏的局面，只有革命的大民众之长期的暴动，打破此循环仍旧的局面，别开一新局面，是唯一出路。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从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个争斗；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所应取之上策，因为中国只有此策可救。

或以为此策迂缓而难行，就现有的政权与军事势力，对各派帝国主义与军阀，采用一时攻守缓急不同的策略，或利用军阀中的反抗派推倒最反动的军阀，以进展革命的势力，或参加军阀会议，发表己党的政治主张，暴露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阴谋于全国民众；此种行动，虽不能根本打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循环起伏的旧局面，而却是革命的行动，可以算是中策。

若是绝口不提反对帝国主义，绝口不提打倒一切军阀，对于与己党有关系的军阀战胜他派军阀，便视为革命之胜利，以为他们的胜利可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无须革命，不惜牺牲己党的党纲政纲逢迎军阀，怂恿己党党魁无条件的与军阀合作，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冀在政权上分得若干余沥；这种下流的政治态度，不待言不能救中国，并要葬送国民党的生命！

在广东之政治态度也是如此，毅然抛弃政权，从民间去，乃是上策，因为右派与军阀利用政权压迫工人、农民，剥削小商人，不抛弃政权，民间大不欢迎；或以事实上无法即时抛弃政权，则即利用此政权，肃清境内种种反动势力若商团、乡团、善堂不法的军队等，停止种种弊政若开

赌、杂捐、拉夫等，这也不失为中策；至于日与各种反动势力妥协牵就，以保此背革命而行的政权，实是下策！

国民党将来在历史上的荣誉至何程度，当以其政治态度采用此三策至何程度而定。

1924年11月12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一期 署名：独秀



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

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并且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这是因为国民会议比较的形式严重些，决非三数月甚至半年所能正式开会，在此半年中，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暗斗明攻所加于中国之损失与危机，无法遏制；所以我们不但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并且看清此会议单是议政机关还不够，应该同时是执政机关，主张即以此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政府之职权，以期中国政权即由摄政内阁奉还于人民。今不幸段祺瑞怀抱“北洋正统”的旧观念，竟不待预备会议之召集，硬以军人拥戴，入京自为执政，自己颁布临时政府制，以延军阀政府将坠之生命。国民党领袖们及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即令能容忍段祺瑞这种专断的事实，亦应严厉的督责他马上召集预备会议，马上将摄政内阁给他的政权奉还人民——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

毫无法律根据的临时执政政府延长一日，即为中国加增灾难一日。

在外交上说起来，往事且不提，军阀政治的根性是必然要丧权误国的，何况段祺瑞在战争中所受外力的援助及最近对外的表示，他的执政政府延长期中，所谓战争中损害赔偿，所谓金佛案①，所谓无线电台合同，所谓保障外人已得权利，甚至于所谓参战借款转期案，都会为了执政之承认和东交民巷公平交易。

---

① 即金佛郎案。1922 年，法国政府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名义上为中法两国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作诱饵，要中国政府变更偿付庚子赔款的办法，以硬金（即金佛郎，这时法国佛郎纸币贬值，实际上并无金佛郎货币）计算，使中国多付关银 6 200 余万两。消息传出，全国反对。法又伙同意、西、比三国向中国要求以金佛郎计算。1925 年 4 月，段祺瑞执政府接受了法国的要求，改为照美金计算。

在内政上说起来，如果是革命的苛迭达，吾人自然没有理由绳之以法，至于反动的苛迭达，每酿成政治上极大的扰乱，吾人应许拘泥成法(指民国临时约法)等犹彼善于此。段氏对外态度之妥协，对内破坏摄政内阁差强人意之设施——修改优待条件及监视清帝，压迫反曹之国民军，恢复安福系、交通系之政权，没有一件事能够表示丝毫革命态度，所谓“彻底改革”，所谓“更始为宜”，只是毁法以便私图之饰词。这种非革命的毁法，不但无与〔益〕于政治的革新，且足以使反对派假护法(指民国约法)以争政之机会，造成将来的乱源。

欲救此对外对内之危机，只有一途：速开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现在的临时执政奉还政权于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国民政府的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各部行政的首长。

1924 年 12 月 3 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三期　署名：独秀



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运命

"真金不怕火来烧"，所以孙中山先生此次入京虽然是一个"险途"，在革命党的态度上自不应避免不去，至于他是否真金，此次一烧便能明白。

无论孙中山先生还没有什么实在的力量，然而在中国政局上，却常常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感觉不安，拒绝他呢，还是拉拢他？

此次中山由广东而上海而日本而天津，到处都有民众的欢迎。在这些欢迎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民众革命的情绪正在发展；他方面因此更使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由惊恐而各逞其拒绝或拉拢之技能。英美帝国主义者自然是到处拒绝他，而日本及段祺瑞为支配全中国计，是想拒绝与拉拢互用，使中山在投降式的条件之下和他们合作，我们所谓"险途"即此。

民众为什么欢迎中山先生，不用说是因为他屡次宣言主张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段祺瑞、张作霖为什么拉拢孙中山，只要不是痴子，便不会说他们拉拢孙中山和民众欢迎孙中山是一样的意思。这两种意思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还是接受民众欢迎的意思，还是接受军阀拉拢的意思，这是中山先生脱离或陷入此"险途"之唯一标识。

换句话说，在民众方面，正在帝国主义利害意见不一致及军阀分裂动摇的时机中，力图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中央在地方都要求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在军阀（段祺瑞）方面，正在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恢复其势力，并且想邀英、美、法各帝国主义之同情集中其势力，复兴其军人狄克推多的政治。前者是终得胜利之坦途，后者是残灯复明之迷梦。这两条道路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若走前一条路，便应始终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即退让一万步，亦不应因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压迫或拉拢，而放弃其最近宣言中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

会议两个最重要的主张，这乃是国民党与国民合作；若走后一条路，便是中山抛弃其主张，自食其宣言，实现所谓“孙段合作”。

或以为在孙段合作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实现中山的主张。这种想头未免太滑稽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罪恶，如亲日卖国，滥借外债以蓄私党，妄开兵祸以除异己等，都姑且不论，请看他现在的行为：

一、以安福派垄断政权如李思浩为财政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吴炳湘为北京警察总监，姚震为法制院院长，姚国桢为烟酒督办，曾毓隽为税务督办，丁士源为公债局总裁，王揖唐为安徽省长。

二、任安徽姜案正凶刑事通缉未取消之倪道烺（督军团首领倪嗣冲之侄）为凤阳关监督。

三、反对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纵清废帝出逃外国使馆。

四、起用全国公认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为参政。

五、宣言“外崇国信”，即是明白答覆列强保障外人既得权利之要求，亦即是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

上列诸事已充分说明段祺瑞纵庇群小卖国乱政的行为，丝毫未改。他正在拿“外崇国信”这份厚礼乞怜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援助，以恢复并巩固其安福群盗之旧日江山，他将要受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指使，压迫各阶级民族解放的运动，并且已经阻止孙中山在京津之演说及欢迎，他对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尚且骂李石曾少年胡闹，他对于废除洋大人之不平等条约更说是乱党过激的主张，希望他修改不平等条约，只有修改廿一条为廿二条，希望他召集国民会议，除非是军阀官僚的国民会议来选举他为正式执政。

军阀们牺牲民族的利益，以结帝国主义的欢心，以保其权位，这本是常态；国民党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奋斗计，揭破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阴谋与罪恶，这也是常态；军阀失其常态，便不是军阀，国民党失其常态，亦不成其为国民党。国民党与国民合作是坦途，国民党与军阀合作是陷阱，中山先生将何去何从呢？“不怕火烧才是真金！”

1924 年 12 月 10 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四期 署名：独秀

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

年来中国政局之变动，都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动力，不是由于人民的动力，民主政治决非没有人民的动力而可以实现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之工具——曹、吴等直系军阀倒后，中国人民得了表现其力量的机会，并且已经有了开始表现其力量的事实，例如各省由人民团体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最近上海促成会成立大会之宣言，已看清中国政局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人民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一是军阀恢复其势力，武力专政，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他们这种见解是很对的。

我们并且要告诉全国民众：此时政界之领袖代表第一个倾向的是孙中山，他背后是各省要求民主政治的民众，他们的目的是：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外国势力之宰制；

（二）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利益，脱离军阀政治之蹂躏。

代表第二倾向的是段祺瑞，他背后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的目的是：

（一）保护外人条约之权利与特权；

（二）承认金佛郎案；

（三）承认无线电台合同；

（四）由外力援助军阀统治中国人民，排除中国革命势力，使中国永远在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宰制之下。

这两个倾向是很明显的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全国要求国民会议与民主政治的民众呵！其速速集中你们的力量，决死反抗第二个倾向，为第一个倾向奋斗！

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间的新勾结已就成熟，倘不由人民的动力破此新勾结，则今后的中国仍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世界，所谓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都没有丝毫希望呵！

1924年12月17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五期　署名：独秀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即智识阶级与官僚），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并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不像什么西南"护国"、"护法"都是南北军人间的互斗，不但没有民众参加，而且没有丝毫民族对外的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种方法，其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其动机乃由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起。这次运动的优点有二：（一）当时所谓变法维新，较前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二）当时之变法维新运动，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变化，即学术思想上也生了大变化；所谓思想上的变化虽然不出孔教范围，而因为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遂使孔教教义起了新的

分化：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张之洞、叶德辉等之护教派。张之洞著《劝学篇》，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均以明伦卫道之正统自居，斥康、梁为异端邪说；这种辩论，使远在此前汉学派今古文之争扩大到政治上学术思想上普遍的冲突。

这次变法运动的弱点亦有二：(一)变法维新的内容，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因此，遂引起后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二)变法维新的方略，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思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当时的改革派不但没有抓住社会势力，并没有看清包围清帝之亲贵——统治阶级对他们作战的力量，因此他们遂至为袁世凯所卖，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的组织，使他们忽略了革命的准备，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一次给我们的教训！

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外货输入)成为正比例；同时，清廷一方面对内厉行反动政策，一方面图结外人之欢心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的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逼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

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凭了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教堂教徒势力薰天，政府因仿办洋学堂、洋船、洋枪炮等增加租税——这些多年的直觉，遂由白莲教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变而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恰当此时清廷反动的政局日趋极端，无论如何媚外，终不免外人借口要挟的责难，至外国容纳亡命的改革派，尤为清廷愤恨，及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延及直隶、东三省，端、庄、毓贤、刚毅辈遂思利用之以铲除外人干涉，以偿其尽量反动之大欲。

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

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义和团真正缺点是：(一)只是冲动的暴动之一群，而没有相当的组织，致一败而遂瓦解；(二)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致失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二次给我们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之失败，在国民运动上遗下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损坏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这个恶影响为害于国民运动至大，远及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识阶级；同时，内地之商业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权利收回"运动亦轰然特起，最著者，若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若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若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路拒绝借款运动，苏、直、鲁、津铁路废约运动；若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若对比之收回京汉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遍于全国，明明是对于帝国主义者依辛丑条约向中国经济进攻之反抗。当时的革命党，应看清廷乃是当时革命运动之唯一动力。

当时立宪与革命两派之争，前者是希望清廷的宪政来改造中国，后者是主张以革命的势力来改造中国，立宪论实在是当时一部分妥协的知识阶级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结果，也未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这并不是革命主张之错误，乃革命方法之错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

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对]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

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建——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

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轰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的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能固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

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1924年12月20日 《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署名:陈独秀

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

民选官吏，在理论上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在事实上亦为中国时势之急要。他省且勿论，眼前最急需民选省长的：若江苏、若浙江、若安徽、若江西、若湖北、若直隶皆是。

江苏省长现为卖省附齐的韩国钧，彼纵无耻恋位，亦必为苏人所不容；浙江省长现为卖省迎孙的夏超，浙江人如不自动的去孙与夏，将无以拒卢永祥南下之师；安徽省长现为安福首领王揖唐，安徽若容其久任省长，将使安徽人重复统治在公益维持会之下；江西现尚无省长；湖北之萧戕省媚吴，举国共仰，此贼不去，鄂人之耻；直隶已成曹国，曹今倒，万无再听曹之爪牙扬以德真除省长之理；中国政局倘不能即时进入较清明的政局或最反动混乱局面，上列各省省长都必然不能久居其位，他们虽然能指使一班走狗拥戴，若东南大学教授之拥韩，若湖北招牌公团之拥萧，决与大多数民意无涉。

惟省政府地位变动后，继任之争夺必然要起纠纷，欲解决此纠纷惟有省长民选，并且民选机关，应不由现有的省议会，而由各市各县的人民团体，自动的组织和国民会议同性质的省民会议。

我们固然知道各省现有的小军阀又盘据省政府的官僚。他们都会以权力、金钱制造省民会议或压迫省民会议以取得政权；然而各省的革命份子及爱省的民众，决不可因此便放弃其地方的政治争斗，目前只有此争斗是北方的政治争斗之发足点。

我们要求民选省长，须认清性质只是民选省长，万不可牵扯到什么“联省自治”，或什么“某省人治某省”这些昏乱方法。“联省自治”是一班小军阀巩固其现有地位的口号，和民主政治的民选官吏权、地方自治权都风马牛不相及。“某省人治某省”，也和省民的权利无关，那省人没有军阀官僚，请看苏人治苏的韩国钧、鄂人治鄂的萧耀南、湘人治湘的

赵恒惕就是榜样。

我们要将民主政治实现于地方政府，我们要得着民选官吏权，只有号召省民会议实现民选省长是正确的发足点。

1924年12月24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六期 署名：独秀

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

资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本地商人中造成一种买办阶级，不但为他们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并且为他们和本地政府间买卖铁路、矿山等利权之中间人。这些买办阶级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为了他们主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不惜破坏本国的国民运动，卖掉自己的国家。他们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发了财，有了货栈，有了大的百货公司，有了银行，甚至于有了矿山、轮船、铁道公司，在本地商人中俨然是商人贵族。

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商业畸形的发展，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比国内任何商业、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都大，除了帝国主义者，他便是中国经济之王，岂但是商人贵族！

此时多数中国国民都要求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来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政府都想制造一个官僚政客的国民会议，来愚弄中国人民。商人阶级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怎样呢？中等商家、小商人和商人贵族(即买办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不同，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就两样：中小商人和工人、农民、学生同样的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剥削压迫；因此遂同情于工、农、学生对于国民会议之要求而参加其运动；商人、贵族寄生于两种方法之上，一是辅助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一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因此他们决不协同工农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反是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军阀谋更进一步的勾结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只电求段祺瑞许他们自己加入国民会议，而不肯协同民众做要求民众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运动；他们只协同教育界、贵族和英探何东爵士合作，而不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小商人及工人、农民、学生等下层阶级群众合作；这就是说明他们不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利益而参加国民会

议，乃是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便是帝国主义者和商人贵族共同的利益——输入外资发展实业。外资势力下之实业发展，即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之发展，中国的实业即国民经济之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工业等——将随外资势力之发展尽入外国帝国主义者掌握之中，而中国民族永远是他们经济的奴隶。真正有助于中国自己的实业发展，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为国定关税是必要的；然而买办银行等商人贵族却不赞成收回海关，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海关在外人手中，内债本息的担保才靠的住，存在他们手里的债票才不至跌价。

总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人贵族本是因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发生而繁荣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即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宁可牺牲国家主权与国民利益，而决不肯侵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可以和军阀妥协的，他们所不愿与妥协的，只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众。因此，在将来的国民会议中，这班商人贵族是站在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利益方面，还是站在国民的利益方面，我们由他们的阶级性即他们的经济基础上可以推知的。

1924年12月31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七期　署名：独秀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

同志们：

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 S. Y. 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此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如左：

（一）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名称无论如何各地必须一致，促进会后援会等名称，务设法改正。

（二）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促成会，如广东有两个促成会，湖南促成会之外又有后援会，都绝对的必须合并。若因鄙视商界或国民党右派不肯忍耐和他们对于此项运动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大商阶级所号召的什么和平统一促成会等组织，民众不但不应加入，且须极力加以攻击。

（三）促成会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分，必须竭力邀请他们加入，万万不可使促成会仅仅是个 C. 与 S. 变相的团体。

（四）在促成会工作的 C. 及 S. 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 C. 地委指挥。

（五）促成会对内对外的宣传，根本应该说人民自身要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机都宣传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使民众过于倚赖中山而轻视了自己。

（六）各地促成会及其所包含之团体，应立即分别通电指摘段祺瑞最近的反动政策，并宣告所有善后会议的议决案，人民均认为无效。

（七）向他处促成会鼓吹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的必要；但实行时期须候 C. 中局审定。

（八）我们此时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会各团体于促成会，并且须乘

此时机努力使与我们有关系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内容充实起来，的确有些群众，不是空招牌的团体，并应乘机组织新团体，如教职员联合会公私机关职员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

（九）各地促成会也应该注意地方争斗，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

C. P. 中央局 T. S. Chen
S. Y. Y. N. Lin①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②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林育南的英文签名。

② 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根据文内提到的有关各地促成会成立和善后会议活动时间判定为 1924 年 12 月下旬。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

大家意见不同，甚至于利害不同，据理争辩或据事攻击都是可以的，造谣中伤是不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往往有一种人为了一种政治的作用或自觉的不自觉的由于阶级的利害关系，急于要攻击他们的敌人，而一时又寻不着敌人错处，于是遂不得不出于造谣中伤之一法。

现在有一班人对于我们大肆其造谣中伤的手段，也是出于上述的心理。攻击我们底人们，若能指出我们实在的错误，我们是应该感谢的；或者是指出疑似的错误，我们也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答复他们。可是他们现在所攻击我们的纯粹是造谣中伤，而且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谣中伤，令我们不得不对于他们造谣中伤之原因与心理加以解释。

他们的谣言有重要两点：

（一）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言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王、谌二君虽然不承认曾造此谣言，而无政府派的宋仙却有一封致郑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证。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时，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同时，他们并在《四民日报》(复辟党和无政府党合办的报)上，大造其谣言，说我假借工人名义向俄罗斯骗钱。最近又有国民党右派分子马素，在上海南方大学演说，也公然攻击我们，大意是说我们为了俄国的金钱才相信主义。我们现在的答辩是：第一，我们是第三国际的支部，向来未和苏俄发生直接关系；第二，第三国际本部自己的用费全靠五六十国的支部供给，断不能够有巨款津贴到很小的中国支部；第三，无论是苏俄或是第三国际，主持的人不但不是瞎子、聋子、痴子，其综窍名实，并非糊涂的官僚之类，而且常

有代表在中国，中国党人决没有事前借名骗钱，事后脱卸责任的可能；第四，我们在国内国外所代募的京汉工人抚恤款均交由救济委员会支配，比由该会付原捐款人以收条，所有收支详数，该会不久必有一个负责的报告；第五，我们若不是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若是为金钱所驱使，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弄钱的道路很多，并不须十分不要脸的去骗，舍此不图，而却要假借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所压迫所厌恶的主义去骗素称纪律严肃的第三国际或苏俄的钱，未免南辕北辙了；第六，或谓苏俄为外交上的鼓吹收买我们，大家须知道苏俄若取以金钱帮助外交的政策，只需贿买外交当局及大的新闻已足，收买我们无权无位的党人有何用处，并且苏俄对华外交，是遵守列宁"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与不取"的政策，他们拿种种权利与特权挟一个空洞的承认，实用不着我们为了帮助鼓吹(……)

（二）说我们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从前章炳麟说黄花岗之役，是黄兴勾结张鸣岐，受了数十万贿金，送革命党人至广东，以便一网打尽。天下事无独有偶，现在又有人自由造谣说曹、吴惨杀京汉工人，在汉口逮捕工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陷害的。我们的答辩是：第一，试问我们为什么要陷害工人？第二，京汉惨杀案中我们的施洋同志也在其内，汉口被捕人中我们的刘芬、许白豪同志也在其内，而且株连到北京同志张国焘数人，岂有我们自己陷害自己之理？第三，我们反对吴佩孚，远在直奉战争后，到了京汉工人"二七"惨剧及汉口党案发生，我们攻击曹锟、吴佩孚，比中国任何人都厉害，别的不说，单在本报上就可以随便寻出这类材料，试问有没有这样勾结吴佩孚的可能？第四，现在保定狱中的京汉工人都出来了，请问当日罢工情形，是由于工人因开会受压迫而动了公愤，或是由于我们煽动陷害？若说我们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和援助罢工的工人是陷害工人，我们便没有答辩的必要了。

这两个谣言若是真的，我们便应该枪毙，岂但是区区名誉问题！因为他们所造谣言这样不近情理，我们向来以为没有和他们辩论的必要；可是现在有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上海一两家反动派的日报，利用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谣言，来做帝国主义者在华报纸攻击我们底应声虫，因

此我们不得不答辩一下。

各资本帝国主义者，无论欧洲、美洲或在亚洲，本来都是利用许多工具，造出许多谣言，中伤他们的敌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在中国，他们不但要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并且还要造谣攻击国民主义者，因为国民主义者在中国有了势力，也是他们的不利，国内一班反动分子，遂于有意或无意中做了他们的工具。造谣中伤我们底人们，即或自己不肯承认是有意做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意的做了帝国主义者之工具了，因为他们造谣攻击我们，帝国主义者是要举起双手赞成的。

并且造谣中伤我们的人们，还有几种特别心理：(一)他们以为攻击共产党，必能博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资本家各方面的同情，于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大有利益；至少也可以免得过激嫌疑遇着压迫，他们在天津欢迎孙中山时散传单攻击我们，虽然一时疑被外国巡捕误会捉去，随即讯明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人而释放了，这便是一个证明。(二)他们以为骗钱在中国社会是最足以动人猜疑的事，陷害工人是工人阶级所痛恨的事，这两种谣言一传布，我们在工人中在一般民众中便不能活动了。(三)他们以为我们伏在各种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任他们如何自由造谣中伤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象他们时常公开的拿延请大律师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法庭控告来威吓攻击他们底人。

至于他们所以要造谣中伤我们之各别原因，我们也要指明出来。马素这等人，全身都装满了大美国的空气，一回到中国来，眼见孙中山及国民党居然冒了赤化嫌疑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他自然要气得发昏，自然要借着中伤我们的谣言来骂着出出怨气。反革命的无政府派，他们无论在欧美或中国，都是帮着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等反对共产主义者，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即是公开的向黑暗势力告密，张德惠造谣攻击我们，是因为他侵吞京汉工人抚恤费数百元受我们责问之反响。郭寄生、王光辉是要欢迎官僚的国际劳工局代表亨利老爷的，他们造谣中伤我们，更是他们的义务。

最近看见郭寄生、王光辉在上海报上登给我们的启事，没有资本家给我们钱登告白打官司，现在我们只好顺便这里答复几句：他们启

事中所指何事，我们不大明白，实在无从答复；惟他们劝我们洗心，我们以为我们若自问没有和杀害黄庞的赵恒惕、宾步程妥协及为南洋烟草公司利用这等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实，便心安理得，另外用不着洗心！

1925年1月7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

——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

同志们：

现在军阀的善后会议条例已经公布，我们对付的态度应由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及准备左列各事：

（一）通电说明无人民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之危险。

1. 此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借此勾结各省失势的小军阀结合己派的新势力和他派军阀对抗，此种新结合必酿成和他派军阀间的新战争，给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又一机会。

2. 段祺瑞悍然不顾民意召集善后会议，乃希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国民，并以对付孙中山。

3. 借此会议为他卖国的工具，如承认金弗〔佛〕郎案，继续参战借款，办理沧石借款……

（二）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之权利，并不能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法。

（三）继续要求人民的预备会议，如段祺瑞不许或善后会议悍然决定上列诸问题时，即准备有力的抗议，如一定时间的（一日或二日）罢市罢工罢课及罢税的运动并示威运动。

（四）国民党代表及名流如果出席善后会议时，即电请他们主张另行召集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

（五）函商各地促成会速在北京开全国会议，并请北京促成会担任筹备。各地和促成会同性质的组织即令是大资产阶级号召的，也应邀其参加。

又，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

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

C. C. P. 中央局 委〈员〉长T. S. Chen
秘　　书Leo Dschan-Lung①

一九二五、一、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1924 年，罗章龙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出国，这一年的通告则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署发表。1925 年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仍由陈独秀和罗章龙共同签署发表。

列宁与中国

——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

有许多中国人及其他各国许多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以为这个布尔什维克首领列宁，不知是什么一个极恶穷凶的怪物。其实这完全是幻想。列宁的外表，像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像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释迦佛说：要普度此世界众生于他世界；列宁说：要为此世界人类中被压迫者脱离被压迫地位于此世界而奋斗。我们若要指证释迦佛所说他世界在何处及超度了多少众生到那里，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宁奋斗所解放之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已经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们看见了，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工人、农民之解放及苏联境内小民族之解放与夫近在远东民族革命运动之勃兴。

欧洲人对于远在亚洲东方的中国，或视为不可知的秘密国，或视为一大群未开化民族所聚居的地方，一任其传教师、外交官、远征的军队与商人明欺暗算，而漠然无动于衷。独有同情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列宁，他对于远在数万里外的中国近代重大事变及在这些事变中所受欧洲各国的欺凌，无不注意到，无不严峻的批难到，他并不宽恕他本国(俄罗斯)政府欺凌中国人之罪恶。

自从义和团事件起，列宁即表示深厚的同情于中国人，攻击他本国政府非常严厉，当时他曾在《火星报》上说："俄罗斯与中国战争(即指义和团战争)已告结束，为这次战争调动了许多军队……对于那班暴动的中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武装的中国人，加以剿灭、弹击，无量数的妇女儿童，都被惨杀，其苦何堪！至若农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躏抢劫的状

况，更是不用说了。……今日欧洲资本家贪欲的利爪又伸入中国了，且现在力求满足私欲的俄罗斯亦转入这个漩涡之中，并已割据中国的旅顺口，由俄兵保护，在满洲公然建筑铁路；同时欧洲各国政府，相继而起，大家都热心来做抢劫中国的事，冲动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观念，由是将中国的土地，或占据或租借，事实上就等于欧洲各国政府（俄罗斯居其首位）已开始瓜分中国；可是他们瓜分中国不是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而是和暗中偷窃人家坟墓中的死人一样。假若被偷的死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如猛兽一般，烧毁其村庄，驱逐于海洋，或将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枪杀刀杀，毫不加以姑息……如现在报纸（指俄国报纸）又鼓吹兴兵反对中国，加上中国人是'野蛮黄种'、'仇视文明'的罪名。……那班无耻的新闻记者，屈服于政府及金钱目的之前，故意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鼓励民众轻视中国。"

列宁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也表示满腔同情，当时他曾在《真理报》上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对于政治生活已经有觉悟了。可以说，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睡转到光明、活动、奋斗的路上了。此事对于文明的欧洲是不发生关系的，甚至法国至今还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欧洲这种冷淡的态度，用甚么可以去解释呢？原来在西方各处都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统治，这资产阶级四分之三已经腐朽，对于任何一个野心家，只要争得反对工人之严厉方法及一个卢布有五个戈比的利息，都愿把自己所有的文化卖去。这个资产阶级把中国只不过看成一块肥肉，这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的拥抱一下之后，现在也许要被日本、英国、法国等撕碎了罢！"

列宁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也曾在《真理报》上攻击过："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掠夺中国，帮助德谟克拉西之仇人，中国自由之仇人。……中国的新外债（是指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反抗中国德谟克拉西的，因为欧洲帮助袁世凯，他原来是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一个人。欧洲为甚么帮助他？就是因为可以分点利润。中国借了二万五千万卢布的债……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那时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甚么'文明'、'秩序'及'祖国'了！那时就要装着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

迫这‘落后亚洲’的共和国了!”

在列宁这些说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人物,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本国的反动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压迫中国民众破坏中国德谟克拉西运动是何等严酷;同时,又应该看出中国民众之好友,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无产阶级,那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反动军阀之好友,也就是中国民众之敌人。

现在全世界人类对垒的形式是:

(甲)压迫者——各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军阀;

(乙)被压迫者——各压迫国之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国之民众。

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呵!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

1925年1月21日 《向导》周报第九十九期 署名:独秀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并不是因为这个名称和预备会议不同，乃是因为他是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没有人民的代表出席说话——这个反对的理由是不错的，然而仅说是反对军阀官僚包办的善后会议，还觉的太简单了。我们不但反对善后会议在形式上是军阀官僚的会议，我们必须在实质上反对段祺瑞所要的这种军阀官僚会议所包含之危险性。

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至少也有下列三个危险：(一)段氏赶速在国民会议之前，利用他的善后会议团结军阀势力，以抵抗国民；他所要的善后会议如果成功，军阀在中央及地方的势力必完全恢复，他们压迫国民运动，必然日见露骨。(二)段氏要利用善后会议，结合直系等失意的军阀，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和他派军阀——奉军及冯、孙、胡等——对抗；此种新的结合和新的对抗，是军阀间将来大战争之种子，亦即帝国主义者借口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之种子。(三)段氏要利用他的善后会议产生正式政府，选举他为正式执政或总统，此种正式政府如果实现，势必为国内战争之导火线，因其非新的代表民意机关所产生，又没有旧的法律(约法)根据，纯粹由军民长官拥戴，岂非明白给别派军阀以兵争政的榜样？

段氏所要的这种善后会议，即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人民是应该始终反对的；并且这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要免除其危险性，人民站在会议外消极的反对还是不够，更应该有力的向段政府要求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要求选举代表参加此会议，在会内积极的反对，反对此会议有权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反对此会议有权选举正式政府，反对此会议议决一切有利于军阀的议案，尤其要揭破各派军阀间分赃或暗斗的黑幕。

人民参加此会议，要取下列的态度：

(一) 为反对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而参加，不是为赞助段氏所要的

善后会议而参加；

（二）应该要求由各省人民团体集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多数代表（当超过各省军民长官代表人数以上）参加，变更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为人民所要的善后会议，不可仅由半官僚的法团派少数代表参加，成为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之装饰品；

（三）各省人民团体，不但应该为其参加此会议之代表准备有力的后援，并且应该严厉的督促其代表在此会议中确能为人民利益奋斗，而不与军阀官僚妥协。

全国人民呵！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这会议所含的危险性谁也知道，全靠人民在此会议内会议外的奋斗力增多一分，这会议对于国家人民的危险性才能够减少一分，此外别无他法。

应该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国民党领袖们呵！你们固然应该站在人民方面，反对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段祺瑞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许人民代表列席；你们自己有列席善后会议资格的，更应该出席。你们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政纲，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机会揭破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军阀派损害中国国家生命及人民利益之事实，揭破军阀间列强间暗斗或分赃的黑幕。如果段祺瑞竟不许有人民的代表出席善后会议，你们更应该出席此会议，免得军阀官僚包办此会议；你们不应该很高洁的不参加军阀官僚的会议，站在外面消极的反对，你们应该积极的参加此会议，在会议内反对军阀官僚，揭破他们的黑幕。“真金不怕火来烧”，为了拯救国家的生命，为了拥护人民的利益，就跳到火坑粪坑里都是应该的，你们若以为民党参加军阀官僚会议是一件羞辱的事，那么中山北上便根本错了。一个革命党总应该积极的奋斗，不应该消极的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之里面包含着避免和军阀派争斗的懦弱心理呵！

1925 年 1 月 28 日　《向导》周报第一百期　署名：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

半封建半资本制度的中国，他的社会势力，三种并存：第一是军阀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武装与政权；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经济权及组织宣传机关；第三是工人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军阀不待说是被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在全人类阶级根性上看起来，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在中国社会现状上看起来，中国工人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中虽然有少数领袖分子被官僚资本家利用，做了“工贼”，而决不至因此减少了工人阶级之革命性，因为工人群众的思想与行动终究是革命的，不是妥协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这件事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已经由种种事实证明了。例如民国十一年香港的罢工海员，受英国帝国主义者种种压迫，终以不妥协的奋斗得到胜利。又如民国十二年“二七”惨剧，分明是因京汉铁路工人不妥协的奋斗而失败了。又如民国十三年广州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因为是工人群众不妥协的奋斗和防止广州政府妥协的政策，才得着胜利。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人民发展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非革命是不能使他们屈服的；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助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

这一不妥协的工人阶级，不仅在决战的心理上是不妥协的革命者，

并且在客观上也富有能够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沿江沿海之运输权在他们的手里，国内军阀的兵队及军用品运输权也在他们的手里，大的工商都市大的矿区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也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起来革命，足以使全社会震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他们起来参加才足以制敌人的死命；中国国民革命之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其走狗，所以严厉的压迫并造谣中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就是这个缘故。

1925年2月7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一期 署名：独秀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

段祺瑞拿数十万元民脂民膏，召集一个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来替他捧场面，可算是中国军阀之最后豪举了！这个会议只能为段祺瑞捧捧场面，更进一步，段祺瑞可以借此结合几个失意的小军阀，巩固他的地位，再进一步，他便要借此会议为卖国机关，至于说借此会议可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本来是欺人之谈。大家如果不相信，现在善后会议已开幕十多天了，请看他在这十多天内经过的事实是怎样：

（一）国民党对段执政邀请省议会议长、教育会、农会、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认为未容纳孙中山之主张，发表宣言不加入善后会议。

（二）上海总商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各省代表均应列席，非到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不能开会。

（三）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须有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人民团体之代表占出席代表三分二以上，方有讨论国事之权，望延期以待人民代表到京始开议。

（四）段执政据善后会议意见书通电各省：会期内各方军事行动完全停止，如有争执，应提善后会议解决。然而广东、广西同时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河南胡憨两军之争，川、滇、湘、黔各军进攻湖北的酝酿，都并未因段电而停止。

（五）西南各省代表到上海者数十人，均认善后会议无解决国是之可能拟不北上，先谋西南团结，由唐少川、章太炎从中主持一切。

（六）《民国日报》七日北京电：金佛案与无线电台案，均决提交善后会议。

在（一）、（二）、（三）项事实，可以看出舆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在（四）、（五）两项事实，已表示善后会议完全破产，实更证明以善后会

议解决时局纠纷之绝对的不可能；有人以为人民代表会议的议决案没有实施的希望，现在请问代表实力派的善后会议议决案又能够在何处实施？在第（六）项事实看来，执政政府将要做出曹锟政府所不敢做的罪恶。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是否神经过敏，是否有意捣乱，善后会议自身的成绩会替我们说明。希望凡是非安心为段大军阀捧场的人，只需每日留意善后会议经过的事实，便自然懂得他的价值。不但善后会议如此，即是国民会议，人民若不能努力争得多数真正人民代表有出席权，听段政府钦定一个限制真正人民代表的组织法，则将来的价值，也必然不比善后会议高得几何！

1925年2月14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二期　署名：独秀

一封给章行严的信

行严先生：

顷见上海报载：北京司法部训令京外各机关，凡查获宣传共产党员，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如有政党为护符者，亦一律依法办理，仰即严秘检查等语。

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①]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这道训令词中有三点最不可解：第一，共产党本是代表工人阶级及贫农利益的政党，何以说他以政党为护符？第二，法律只能制裁刑律条文上的犯罪行为，岂有一宣传某种学说某派党义即构成罪名之理？第三，司法部并非立法机关，何能以一纸部令决定宣传共产党为内乱罪？

这道训令若出自军事机关或腐败官僚之手，我们毫不以为怪，乃出自应该尊重法律的司法部，并且是精通法理富有世界知识的行严先生所长的司法部，这便要令人骇怪了！

人们以为今日托足权门的章行严，已非昔日讲学论政的章行严，他已无违背军阀意旨之可能，我们和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但我仍不敢这样轻蔑行严先生，兹谨向先生有所陈述。

共产党本质，并非凶恶不法像三 K 党等秘密结社之类。其在英国、法国、德国，都是公开的政党，都有集会、出版、讲演及竞争选举之自由，先生都亲眼见过；先生若不过于轻鄙本国人，若不能绝对否认中国也有工农阶级之存在，便不能说中国不应有共产党。至于农业国不应有政党之说，无论是非，先生在论坛上尽可有此主张，而未便利用官权停止政党，更不能独禁共产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五年，其根本职任是拥护工人贫农的利益，其目前的政治主张

---

① 1924 年 11 月 24 日，段祺瑞组织执政府，章士钊出任司法总长。

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其言为天下人之所欲言，其行为天下人之所当行，别无阴谋异行有损害于国家人民而足以构成内乱罪者。与其说中国共产党有内乱罪，不如说不依法律不由民意以武力夺政扰民窃号自娱实犯内乱罪之武人已遍中国。若说共产党所根本主张的政制和中华民国现行的政制不同，因此得比附到内乱罪，这种话若出于别人之口，已失刑法只以裁制行为之原则，况出于极力赞助段执政以“革命”行为破坏中华民国现行根本法（民国约法）的行严先生之口，更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若行严先生及其他权门宠儿，向人民板起成则为王的面孔，以为权力在手，即是法律与正义之化身，只许他以法律正义绳人，不许人以法律正义绳他，这种不可一世的逼人气焰，在袁世凯时代，在第一次安福执政时代，在曹党得意时代，行严先生都亲身领教过，现在宁肯蹈此覆辙？

上海《申报》北京电，更指司法部此项训令与反对善后会议有针锋处，此电更有伤先生的名誉了！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先生即欲依附权门，以私人名义为善后会议辩论已足，似不必滥用官权，以“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防止异己者之口。反对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乃天下之公言，非共产党人之私意，国民党已公然宣言反对善后会议且不论，即如先生同一政学系之好友李印泉[①]，又如先生所兄事之太炎，都公然反对善后会议，并反对段祺瑞自称执政，先生亦将指印泉、太炎为共产党人，“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么？吾料段氏逆取不能顺守，武力专政之演进，势必日甚一日，天下健者不只一段氏，更不只一行严先生，先生竟能以“宣传共产党员”六字，诬尽天下人而杜塞其口么？先生竟想像军阀官僚的势力能够长治久安的统一中国么？中国在他们统一之下能够得着进行么？

我记得先生是一个深知政本的人，是一个反对好同恶异的人，我还记得先生是曾说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并且俄德共产党人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所以我还不像一般

---

① 李根源（1879—1965），字雪生，又字印泉。云南腾冲人。

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先生的答覆登在京、沪任何报上我们都可以看见。

1925年2月14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二期 署名：独秀



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

安福政府所拟的国民会议条例草案，我们已经拜读过了。据这个草案，安福政府愚弄国民的心事已和盘托出，其最重要而又最显明的有两点：(一)以议宪限制国民会议的职权，(二)以教育、性别、宗教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被选权。

民主国主权在民，国民会议应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问题，他的权限，应该比国会更要扩大。现在的国民会议条例开口即规定“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中华民国宪法及关于宪法施行之附则为其职权”，连以前国会享有的宪法起草权都剥夺了，至如关于国家生命的政治、外交、军政、财政问题，更一概不许过问。安福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国民代表只能前来恭听政府钦定的宪法，举手通过，通过了钦定宪法便滚蛋！这个条例将来经段祺瑞批准公布时，此点若不修改他便是对于国民谋叛！

至于组织方面，这个条例草案之愚弄国民，也足令国民十分明白他们的心事。他们明明以“普通选举制”欺骗国民，而该草案竟以“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廿五岁以上”、“于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不能解说并写作者”、“当兵役巡警者”，限制国民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又以“僧道及其他宗教师停止被选举权”。女子不是国民么？工人农民是全国人的衣食父母，其数量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大半不能解说并写作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现在一概被摈在国民以外。兵役、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师都是国民一份子，有何理由可以剥夺其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世界上何处有这样以性别、教育、职业、宗教限制选举的普通选举制？

此外，京兆只四人，各省区每道只三人，大学区、商业区、实业区均只一人至二人，人数已经比国会议员犹少；又加以教育的限制，又加以实业区乃包含从业人、工人、股东或合伙出资人都在内，则不啻明白规

定：凡是工人都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照这样选举的结果，则诚如吴稚晖先生所说："选区每区三人，安福系、国民党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类充数，大学区让了国民党研究系，商业区则有虞和德与天津、北京商会出马，实业区则周学熙、张謇等各代表三万人，这叫做国民会议，使二者蒙福，这叫做臭不可当，国民会议的名词又算永远抛入毛厕。"

军阀派本来不会有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的念头，要想真正国民会议实现，只有国民自己努力，逼得军阀政府非召集不可才行。

国民呵！国民会议条例就快公布了，你们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还是任军阀政府召集一个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

国民起来罢！政治上没有两种利害相反的势力可以并存，军阀派站在统治地位，那里会有真正的国民会议出现？国民会议我们是应该要的，不过在国民会议运动中，至迟在此运动失败时，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觉悟：怎样才能够达到真正国民会议之目的。

1925年2月21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三期 署名：独秀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

最近法国《晨报》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苏联在亚洲势力膨胀，否则莫思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

前天的《大陆报》也说："中国现在步步趋向赤俄的怀抱里去了。比如此次外人纱厂大罢工风潮，在要求增加工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

这两段议论，一方面是表示帝国主义者自供其横暴，一方面是说明苏联的赤化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之福音。

苏联援助亚洲之土耳其与阿富汗的民族运动，这是事实；土耳其与阿富汗民族都因此得了相当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发展，大不利于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更是事实；可是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恐怕苏联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于他们不利，便要联合压迫中国，这是何等横暴！明白的中国人呵！帝国主义者自己已经公然说出要联合压迫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这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在相反的方面，援助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之苏联，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是什么？因此，为了我们的民族自由，我们应该欢迎苏联，欢迎赤化呵！

上海四万纱厂工人，因为不堪日本资本家虐待而同盟罢工，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四万工人共通的要求是：

（一）不准打人；

（二）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

（三）发还储蓄金；

（四）加工资十分之一；

（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七）释放被捕工人。

不过如此而已。而《大陆报》竟说“在要求加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请问以上七项要求中，那一项是赤化？或者他以为自（二）至（七）都是普通的劳动条件及罢工要求，唯有第一项“不准打人”，含有民族自由运动的主义，这便是赤化。

如果民族自由运动是赤化，如果不准打人也是赤化，那么欧美各国都早已赤化了，怎禁得我们中国人不想望赤化呢？

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我们知道了。他们是说：你们中国人已是亡国奴，必须你们自己否认民族自由，必须你们受日本人的打一声不响，才免得赤化嫌疑。

如此我们应该认识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了！

1925 年 2 月 21 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三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

我们主张国民党可以加入善后会议,是应该为了和国民合作来反对军阀而加入,非是为了和军阀合作来反对国民而加入。然而据本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的北京通信:“孙科曾对党员言,谓奉总理之命,望同志尊重孙、段、张合作之前言,出席善后会议,以竟全功云云。”这样的加入善后会议,我们实不敢赞同。

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么?

前几天国民党中反动分子居然发起了一个什么“反共产救亡会”,同时,日本的国粹党(即法西斯派)也发出一个“亡国普选法案反对宣言”,由此说来,不但共产足以亡国,连普选也足以亡国,不但俄国要亡,连英国早就该亡了!

你们早已背叛了民党呵!

大捧袁世凯的章炳麟,为袁世凯当侦探的冯自由,为莫荣新造火药打粤军的马君武,这班人本来早已背叛民党而去了,现在乘着中山病危,忽然发表宣言脱离国民党,要恢复旧有的同盟会,署名这宣言的人虽然都是同盟会会员,却遗漏了四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

胡瑛①，一个是刘揆一，一个是陈炯明——若再加入这四位老同志，那更是脚色齐备了！

只要脸厚什么事都好干！

北京城里，有个什么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本月九日宴请国民党要人，这班国民党要人当中，居然有刘揆一、冯自由这两位。冯自由曾因做袁世觊侦探，和吴稚晖在上海会审公堂打过一场官事，刘揆一曾因热心做袁世凯的农商总长，不惜登报脱离民党，这两位听了“国民党要人”这个称呼，未免要面红耳赤罢！并且该促成会出席作陪者为该会执行委员万兆芝老爷，这件事也令人难解。这位万老爷在曹锟时代那种得意的状态，北京人都忘了吗？他现在为什么也要加入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他用何界名义加入的呢？

1925年2月21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三期 署名：实庵

① 胡瑛(1884—1933)，字经武，湖南桃源人。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胡瑛于1915年8月同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同盟会会员。1912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并申明脱离同盟会。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另组“相友会”，不与国民党合作。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

此时中国国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侵略，虽然还没有有力的反抗，然而大多数人民甚至于一部分小军阀，由身受列强经济的政治的压迫之实际经验，已渐渐觉悟到自己民族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并且渐渐由觉悟而不平而发生了国民运动。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最近的中国国民运动，表面上虽然还是轻蔑的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人民对于国内军阀，更是反对的声浪遍于全国，军阀们虽然以为有枪在手，人民无如我何，而对于国民运动的声浪终觉危险，至少也要恐怕敌派军阀利用这种声浪不利于己；因此，军阀对于国民的呼号，表面上虽然还是倨傲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其工具(军阀)既已对于中国的国民运动感觉不安，他们对付的策略是怎样呢？

国民党发布了国民运动的政纲，帝国主义者及直、奉、皖三派军阀都高声大叫“赤化”、“过激化”。

国民党在汉口组织党部，直系军阀便以“过激”、“共产”名义逮捕刘芬诸人。

孙中山宣言及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都通电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东交民巷及京、津、沪、港各西文报都说是“过激”思潮。

摄政内阁取消了清室优待条件，又表示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帝国主义者便轰传北京“赤化”了。

中国人民欢迎苏联放弃在华权利，帝国主义者便宣传中国人民倾向“赤俄”了。

广东沙面因取缔华人入境苛例而罢工，英法人说是布尔什维克运动。

上海日本纱厂中国工人受厂主虐待而罢工，西文报说是有“赤化”意味。

奉天军事会议，因京、津舆论反对段政府，遂有人主张令驻京、津军队捕拿共产党。

段祺瑞亲在内阁议席上提议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和查禁过激派。

段政府的司法部因为有人反对善后会议，遂通令取缔共产运动。

以上便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对付中国国民运动的总策略。

他们知道公然直接压迫国民运动不是巧妙的策略；他们知道“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最足以吓倒中国人；他们并且知道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尽力的分子是工人和急进的知识阶级，而这班人又最容易被人指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因为他们不是财主或官僚；因此，凡是中国一个国民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便拿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这些符咒来镇压住。他所要镇压的实际上是国民运动，而表面上却以镇压“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名义出之，这是何等巧妙的策略！他们拿这个策略来镇压中国国民运动，一方面可以妨碍急进分子的活动，一方面可以恐吓和平分子使之离开急进派，使国民运动的势力分裂。这个巧妙的策略，无知的军阀派还未必想得出，不用说帝国主义者可以教给他们。帝国主义者为了要避开公然直接压迫中国国民运动，不但将这个巧妙的策略教给军阀做他们的工具，并要教给买办阶级做他们的工具。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买办阶级，又要各自雇佣一班国民党右派及工贼或冒充工会运动者做工具，拿“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符咒，来破坏国民运动及工人运动。

真正国民运动者呵！你们要认清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工贼、冒充工会运动者——的策略，不要畏避他们符咒，中他们的奸计呀！

1925 年 3 月 7 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崇信外国

庚子赔款据约无用金的明文，付法赔款仍用纸佛郎并于国信无伤，现在段执政打算承认金佛郎案，真是“崇信外国”，不是“外崇国信”！

陈炯明与辛亥同志俱乐部

我前几天说章炳麟等恢复同盟会，尚缺少陈炯明、孙毓筠、刘揆一、胡瑛这一班老同志，现在见了章炳麟、唐绍仪、马君武、居正、白逾恒、刘白等发起辛亥同志俱乐部，才知道不但不缺少陈炯明，并且他还是这个组织的后台老板。不过陈炯明的代表刘白能垫出开办费二千元，孙、刘、胡等现时却无此力量了。

精神文明　东方文化　段祺瑞

大文学家徐志摩运动了段大军阀一封信，去到欧洲迎接活佛太戈尔再临中国，徐先生果能达到目的，届时必有一番盛况，我等何幸竟躬逢这精神文明、东方文化、军阀政治的盛世！

军阀与国民会议

段祺瑞说：“国民会议，国民程度尚谈不到。”又说：“国民会议议

决，能否强制军阀遵从，尚属疑问。”我们第一要问段祺瑞：既然是这样，你马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是何用意？第二要问段祺瑞：你自己是否军阀？

1925年3月7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五期 署名：实庵

悼孙中山先生！

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孙中山先生，一旦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中国的民众应如何悲痛呵！

全中国的民众呵！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

我们更应该知道，革命的领袖中山先生虽然死了，革命的国民党是不会死的，我们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我们警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且勿因中山先生之死而存幸灾乐祸的心理！

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的心情虽然万分悲痛，我们的意志却不丝毫沮丧，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我们相信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先生之死更加团结一致，更加遵守中山先生之遗嘱共同奋力前进，今后的国民党必仍然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所统一，必仍然为整个的党，彼军阀官僚辈所预料的"中山死国民党必分裂"，直是妄想。

即或有一部分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在中山先生死后脱离国民党，这只算是国民党内淘汰了一部分反革命的党员，决不是党的分裂，因为这班分子的行为，久已违背了孙中山主义，久已不能算是国民党党员了。而且这种淘汰党员的现象，在国民党中不乏先例，如袁世凯时代，章炳麟、刘揆一、刘师培、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都背党而依附袁世凯，难道这也是国民党分裂吗？又如李根源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政学会，

吴景濂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民宪党与益友社，这些反革命的分子脱离出去后，革命的国民党不仍然是整个的统一的吗？他们脱离出去，不但无损于国民党之统一，而且这班反革命的分子脱离一次，国民党的数量质量均进步一次，在社会上的声望便增高一次。

现在也是如此。安福党人姚震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终不免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今后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这班稳健派倘以为障碍已除，急与安福政府握手提携进于圆滑之关系，而与革命的国民党脱离，在官僚看来，这就是国民党分裂，其实这正是国民党之进化，不是分裂。

真正的国民党全体党员，必然仍旧遵从中山先生之意思命令，仍旧遵从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遗言及临终遗嘱，一致团结进行。

中山先生死了，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及政治主张，仍旧活着在他创造的国民党中并未曾死；必须全体国民党党员都变成了姚震所谓稳健派，那时中国便没有了革命的国民党，那时中山先生才真是死了！但是全中国之大，只要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不能斩尽杀绝中国的革命党，四万万人中只要有一人继续中山先生之志而奋斗，中山先生都未曾死！

1925年3月14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反……救亡会"

国民党中一班反动分子发起了一个什么"反共产救亡会",同时,安福、政学、研究诸分子也要联合发起一个什么"反国民党救亡会","救亡"居然成了攻击异己的无上利器,今后"反……救亡会"当层出不穷也!

护党呢还是叛党?

反动的国民党右派口称护党,实际上已经叛党了。他们如果党〔不〕服我这句说话,试问他们于自己党的组织以外,公然另行组织国民派〔党〕同志会,公然另立章程,公然推举一向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唐绍仪为理事,更公然推举一向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近且约同陈炯明兵进攻广东的唐继尧为理事,这样究竟是护党还是叛党?

一朝天子一朝臣

前年直系盛时,国会议员多亲到保定,向曹锟拜寿,会议为之停顿;今当奉系盛时,善后会议代表多亲到奉天,向张作霖拜寿,会议亦为之停顿,真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但不知其中有无贰臣?

社会党与政府官吏

梁鸿志答政府对善后会议用函不用咨之质问，说："执政以会员多半系政府任命官吏"，他这句话并未说错，而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却以梁氏失辞，大起非难。社会党尤其是所谓中国社会党，本来和政府官吏就是半斤等于八两，江先生何幸高攀列席那些老爷大人的会议，已算面子十足，又何苦不安分而撒娇？有人说，并非江先生撒娇，这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哩。

"过激"之第三个解释

"过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马联甲说："教育已经是过激了，平民教育更是过激。"这是"过激"之第一个解释。东交民巷里某国公使说："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过激思潮。"这是"过激"之第二个解释。现在又有了第三个解释，上海有一个某律师的翻释，听见某纱厂工人说了一声资本家，他便说："你说他们是资本家，那么你便是劳动家，你便是过激派了！"

1925 年 3 月 14 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六期　署名：实庵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本月12日孙中山去世，他的逝世产生了如下影响：

1. 段祺瑞政府对国民党的态度是：联合它的右派，攻击它的左派，特别是攻击在国民党内的我们的同志；段祺瑞的追随者公然说，孙中山死了，如果共产党被镇压下去，那么国民党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

2. 在国民党内，部分右派分子看到孙中山去世，竭力要同段祺瑞妥协，其余多数，包括较进步的右派分子，提出了“争取团结一致”的口号。现在分歧还不明显。

3. 在整个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小商人，都对孙中山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悲痛。

4. 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1)捍卫对革命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继续执行和党的团结一致；(2)利用各地悼念孙中山的会议，在广大群众中掀起国民革命运动，吸引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左派力量；(3)准备迎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

中国北方的政治形势是这样：在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人民军之间，当然有隐蔽的斗争，不过段祺瑞的追随者同人民军也有冲突，目前在河南省进行的战争，是段祺瑞的追随者秘密号召山西、陕西军阀进攻人民军领袖之一胡景翼所致；现在胡景翼将军取得了胜利，因此张作霖更憎恨人民军，但从另一方面说，鉴于安福系派垄断着政府权力，张作霖也不能泰然处之，他开始公开宣扬“支持黎元洪，赶走段祺瑞”的口号，以恐吓段祺瑞。所谓“善后会议”①，也就是由段祺瑞召开的改组会

① 指1925年2月13日至4月21日断续在北京举行的所谓“善后会议”。段祺瑞试图借助于“恢复国家统一”的会议巩固安福系和奉系军阀对直系军阀的胜利。——原注

议，由于各军阀集团的阻挠，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甚至都无法召开。同时张作霖对政府政策也不满意，所以段祺瑞迫不得已提出改组临时政府的新计划，开放中央政权，吸收一些代表人物参加实力强大的军阀的军阀统治，以延缓政治危机的到来。

吴佩孚的力量没有被完全消灭。他现在在湖南省，在秘密领导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四省的军阀和军队首领，期待着北方政局的变化。

在广州，陈炯明虽然已遭到失败，但林虎将军还有两万人的军队，准备反攻。滇军大部分开赴广西抵挡唐继尧的进攻。抵抗陈炯明和林虎的政府军东方战线，虽然有三万多人，但其真正能作战的和不致引起农民憎恨的军队数量很少，只有两千学生军①。因此，广州的军事形势还不是很有利。如果陈炯明和林虎再次遭到失败，国民党军队占领广东省整个东部，那么在东江流域的10多个县就可以建立起20多万农民的组织。

陈炯明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学生军善于作战，另一方面是由我们的同志组织起来的武装农民起来反对他。此外，其余的军队，有的掠夺农民，有的没有作战能力。学生军一边作战，一边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和农民与士兵联合的必要性。陈炯明军队害怕学生军，说学生军是俄国红军。陈炯明派许多人到东线居民中宣传："共产党来了，马上就要实行共产了……"因此我们在承认东莞战争的重要性的同时，已经两次给加拉罕同志打电报，请求为东莞农民提供军事援助②。

关于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情况，我们已给你们发了三次电报，可能你们都收到了③。罢工是一种无组织的造反。由于这次工人没有取得胜利，他们还不很信任工会。日本工厂主竭力阻止工人参加工会，因此现在参加工会的工人不过一万，但大部分工人领袖都已加入工会。工会虽然还没有得到当局的正式承认，但实际上它们是合法存在的。罢工工人当中有50多人加入了我们党（其中有3名妇女），并成立了两个支部。在65名④被捕工人当中，已有五六人获释，其余9人还没有判决。

---

① 指黄埔军校学员。

② 中共中央给加拉罕的电报没有找到。

③ 关于罢工的电报没有找到。这里讲的是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的罢工，要求满足经济要求和承认纺织工会。

④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似应为15名。——译者

蔡志华同志(不久前从莫斯科归来)虽获释出狱,但英国巡捕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暴打他一顿,他受了重伤,现在还处于危险状态。

另一方面,山东的铁路工人罢工和汉口的人力车夫罢工都取得了胜利。但单山(音译)纺织工人的罢工彻底遭到了失败①。在郑州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之后,各铁路线上的工会渐渐合法或半合法地恢复了。

从去年北京发生政变②时起,中国的工会运动渐渐活跃起来。我们决定:按照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四个组织的倡议,五一时在广州召开全国工会代表会议。这次我们争取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③。我们已给红色工会国际发去电报,让它派代表参加领导工作和提供物质援助④。此外,我们还希望共产国际也派一些同志来进行指导。

现在,由于我们党做工作,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在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我们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所以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1. 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2. 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

1. 《向导》周报 200 元
2. 小册子和传单 200 元
3. 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 人)240 元
4. 天津党组织 150 元
5. 郑州党组织 70 元
6. 安源党组织 30 元
7. 长沙党组织 30 元
8. 汉口党组织 60 元
9. 上海党组织 60 元

---

① 可能是指日本"大康"公司在青岛的纱厂。

② 指 1923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的政变。

③ 指 1925 年 5 月 1 日至 7 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了它的章程并作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

④ 中共中央的电报没有找到。

10. 山东党组织 60 元

11. 河南宣传专员(2 人)60 元

12. 西昌[①]宣传专员(2 人)60 元

13. 南京宣传专员(1 人)30 元

14. 广西宣传专员(2 人)60 元

15. 无锡宣传专员(1 人)30 元

16. 大连宣传专员(1 人)30 元

17. 通州[②]宣传专员(1 人)30 元

共计 1 400 元

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 4 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 3 650 元(中国元)。

再有，按以前批准的 2 250 元预算，我们在 1、2、3 三个月应收到 6 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 3 423 美元，仅相当于 5 887 中国元，因此还差 863 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1925 年 3 月 20 日〔上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①② 按音估译。——译者

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

中山先生之死，不但是中国一大事，并且是世界上一大事，各方面对其死后之态度，却值得我们的注意与批评。

（一）帝国主义者之态度。伦敦《泰晤士报》称为光明之失败；巴黎各晚报，均称美孙之爱国，惟惜其晚年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日本的报纸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中山先生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而段祺瑞硬召集善后会议，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则宣言"外崇国信"，英国帝国主义者称为光明之失败，是表示他们快慰的心理！我们不愿把布尔色维克这名词加在中山先生身上，乃是因为孙中山主义和布尔色维克主义显然不同，并非以为中山先生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是罪恶，也不以为不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减少了中山先生在历史上的价值，而法国帝国主义者却是因为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便说他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中伤中国民族运动的宣传，他以前宣传"黄祸"是同样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指教他的工具段祺瑞，和国民党之稳健派提携，统一中国，这是中山先生死后国民党中之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所应注意的。

（二）安福军阀之态度。中山先生死的那天，姚震对日本东方通信社记者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现在善后会议，国民党系中除汪兆铭等三人外，皆有列席之状态。按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之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之故，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然自今以后，余知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惟国民党中

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与现政府之至大方针究不相容，故将来欲望接近，实为一至难之事。”中山先生死后的第五日，段催杨庶堪[①]就职，姚震对杨说：“中山已死可不受拘束。”在中山先生未死前三日，段祺瑞也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在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想利用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来分裂国民党，正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鼻孔出气。他们所谓共产各说之邪道，大约连反对优待清室，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都包含在内；他们所谓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大约连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徐季龙都包含在内。他们知道只有这班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不能和他们相容，共产派到应该多谢他们有知人之明，所难堪者只是他们所称的稳健派，平日高声反对共产派，以护党自称，现在揭开黑幕，当真以中山先生活在世上是他们与安福派握手提携的障碍吗？好了！此时障碍已除了！可不受拘束了！

（三）研究系之态度。在全世界哀悼称美声中，独研究系机关新闻——《时事新报》，对中山先生加以毁谤与诬蔑。他以为中山先生现在是形骸之死，精神久已死了，他说中山先生之精神，一死于孙、黄分裂，再死于孙、陈分裂。其实正得其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正因一再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和反动的陈炯明分裂而格外显示出来。譬如梁任公和反动的康有为分裂，算是任公的精神早已死了吗？至于诬蔑中山先生“恃墨斯哥共产宣传费以维持生活”，这种态度，不单是《时事新报》之耻辱，简直是全新闻界之耻辱！中山先生受过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的证据在那里？中山先生宣传共产的证据又在那里？中山先生在过去是中华民国之创造者，在现在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领袖，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称赞他援助他，并不是因为他或希望他宣传共产，乃是因为他努力做那象研究系一类人所不愿做而为中国人所急需的民族自由争斗。研

---

① 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四川巴县人。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应段祺瑞邀请，一度任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

究系的先生们，常以受墨斯哥共产宣传费诋毁共产党人，今又以此诬及国民党领袖，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真多，已遍赠中国人，惟未赠及研究系。《时事新报》又说："革命时代有血气有思想之孙文也，知爱国知保种之孙文也，可惜此孙文自二次革命后已死去矣。"他们现在始如此说，其实他们忘了当年《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他们诬毁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至何程度！

1925 年 3 月 21 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七期　署名：独秀

统一与分立

关于联省自治这个问题，我们曾讨论过多次，现在文武联治派又在那里活动起来，兹再总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如下。

（一）中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各省的大小军阀分裂了，已去完全分立不远了；因此对外的政治要求，对内的经济要求，都急需一个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

（二）联邦与分立不同，仍无妨于国家之统一，然亦非语言相同的本部所需要，至少也非今日所需要。

（三）强大军阀所主张的武力统一，是兼并不是统一；弱小军阀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是割据是分立不是联邦。

（四）我们反对吴佩孚、张作霖的武力统一与段祺瑞的阴谋统一；同时，也反对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的联省自治。

（五）统一政府若属于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必赞成统一反对分立，如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自来只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统一政府，借口尊重中国统一，阻挠广东革命政府管理关税、盐政，统一政府若不利于帝国主义者，他们必阴助反动派的分立运动，如法国煽动德国莱因分立，英国援助波斯南部分立。

（六）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援助的统一，何〔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教唆的分立。

（七）（……）

（八）我们承认中国本部各省区目前急需有一个由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大军阀的统一运动和小军阀的联治运动，乃是整卖中国或零卖中国于帝国主义者的运动。

（九）我们不相信军阀的统一或联治可以停止内乱，如直皖、奉直及直与反直之战争，湖南援鄂，云南攻川、攻桂之战争；可以停止内乱的

只有由民众的革命力量所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

（十）我们承认广东政府或其他倾向民主的革命政府，他们之脱离北京政府，只是妨碍军阀的伪统一；决不是破坏国家的统一；因为他们的根本政策，是国家的不是地方的，不但不赞成各省分立的苟安政策，并且不赞成南北分立的苟且政策，他们是要依全国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只有这样才是真统一。反之军阀的伪统一和联省自治的运动，结果都要延长内乱破坏统一。

1925 年 4 月 5 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反段与降段

反帝国主义与不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农工运动与压迫农工运动，联俄与仇俄，这三件事本是国民党左右派重要争点；现在应该加上一个反段与降段了。

好个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劳工！

一个什么劳动反共产同盟会，竟有呈请上海县公署备案的趣事，呈文上公然说出“顾全资本利息”、“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钧署予以相当提携坚劳工信仰之心”、“遇有宣传出版及印刷品预先呈案察核而后发表”、“请暂予存案备查以观后效”等话。他们与其说是反共产同盟会，不如老实改名资本家官僚的走狗同盟会！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与苏俄

中山先生致苏联之遗书上说：“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

携。"不知素以"赤色帝国主义"毁谤苏俄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邓家彦等，读了中山先生这个遗言作何感想！

1925年4月5日 《向导》周报第一〇九期 署名：实庵

亡国的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的工部局向纳税外人年会所提议的印刷律案,[1]又已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搁置了,反对印刷律的中国人,断不因此案已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第一我们要知道:工部局已数次提出此案,今年搁置了,明年必然又要提出,他们是非达目的不止的;第二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所要反对的,乃是工部局及纳税外人年会根本上都没有订定此律之权,不是此律好歹的问题,也不是洋泾浜章程何条何项能附此律与否的问题。

外人来到中国做买卖,照理应该受中国的法律管理,中国人到他们国里也是这样。然而事实上竟不是这样,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硬要他们国里人来到中国仍旧由他们的领事照他们的法律管理,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把这权规定在条约上,这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

他们来到中国,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还不算,现在反拿他们的领事他们的法律来管理中国人,像这样反客为主的事,岂但不平而已么!

他们外国人不受中国的法律及官厅管理,还说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他们自从民国以来居然霸占上海会审公堂裁判中国人,这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他们现在又要自定一种印刷律来钳制中国人言论出版的自由,这又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

上海的资产阶级,近来对于租界的外国政府及本国军阀政府,都有不满的表示;然而他们的表示未免过于软弱无用了,因为他们只是在外

---

① 1924年3月16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为钳制言论自由,拟定印刷律,凡印刷任何报纸、小册、传单、招贴、新闻消息、事项评论,概须事前向工部局注册填写姓名、地址。上海各界表示反对。

人及军阀统治之下要求改良，不想根本推翻外人及军阀的统治权，这原是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根性。中国的平民应该有进一步的运动。

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的宣言上说得好："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我们平民应该主张：上海的中国人不受外国的工部局管理，不受会审公堂的外国领事裁判，取消租界代以民选的上海市政府，以完成"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而事实上现在却是外国人的上海，外国的工部局管理着上海的行政，外国的领事管理着上海的司法，纳税外人会议管理着上海的立法，上海公共租界，便是英、美、日本共管中国之模型。

上海分明是一个亡国的上海了，我们不应该因印刷附律案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我们正应该把反对印刷附律运动，当做"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运动之开始！

1925 年 4 月 19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一一期 署名：独秀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列宁主义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瞭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其更明瞭确定周密扩大之点，最重要的便是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这两个理论。后者尤于中国目前的民族革命有关，我们应该略知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和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完全不同。

列宁的意见：

（一）全世界一切有色无色人种的；

（二）行动上帮助民族解放运动；

（三）由被压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国家；

（四）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问题；

（五）联合被压迫的民族运动和被压迫的阶级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自由分立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协作而统一的。

改良派的意见：

（一）欧美白人种的；

（二）口头上的民族平等；

（三）由压迫者恩赐民族自治——在宗主国统治下的自治；

（四）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之各国内的局部问题；

（五）利用民族联合或排斥异族的名义巩固帝国主义；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统一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分离而竞争的。

据上表看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即半殖

民地），他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自由，这是一件最明白无疑的事。改良派所谓民族问题，乃是宗主国应该采用何项政策欺骗殖民地的民族，使之永久服事宗主国而不思反叛，以维持各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永久对于殖民地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剥削。他们所谓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本是正相反背的一件事。改良派不但不赞成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并且公然宣传：落后的民族，只有在宗主国统治之下，才有和平的幸福与进步。照他们的意见，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剥削，都是不可少的高厚天恩。所以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不表同情，而且公然承认各帝国主义的国家有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公然以帝国主义的国家所剥削殖民地之余沥，歆动国内一部分工人贵族，使之维持构成本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大来源——剥削殖民地，使之拥护祖国之胜利，反对本国的殖民地之民族运动及工人运动，因此更进而使之拥护本国资产阶级之政权，这是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不可宽恕的最大罪恶，这就是第三国际党指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之真实事证，这也就是革命派的第三国际党和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根本不同之一重要点。

第二国际党所谓国际，乃以欧美白人种为限，其余有色人种，都是天赋给他们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资格，不在国际之列。第三国际党所谓国际，不但绝对没有人种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乃是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之统治与剥削，跻全人类于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这就是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也是国际的民族运动；第三国际党这个理想，这个运动，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之结晶。

欧战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饱受了威尔逊所谓“民族自决”、“人种平等”的欺骗，中国人也在内，在华盛顿会议，太平洋被压迫的民族又受了哈定一次欺骗，中国人也在内；我们因为这些欺骗的教训，应该明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国际党的势力统治下的世界，决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是必须依照第三国际党所指示，亦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联合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共同打破

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锁链。

现在的中国民族运动，是不是以推翻帝国主义为对象呢？大部分是的，然却有三个危险的倾向：

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　他们现在虽未曾公然反对民族运动，然而他们始终和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将来即进化到工业资产阶级，也是卖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一向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发展他们的经济力之关系，尽有在美国人"中美提携和平进步"或日本人"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可能；他们这种勾结帝国主义所发展的工业，将用"输入外资"的名义卖尽国民经济的命脉及国家主权。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一个大患。

第二是不脱封建思想的知识阶级　如国民党一部分右派分子及青年党等；他们口中也说赞成民族运动；但是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观念，完全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对象，是笼统的外族，不是帝国主义者。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一个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两方面。在此世界经济成了整个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便不能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主义；在此世界革命运动成了整个的时代，也已经没有一个孤立无援的民族，便不会有一个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运动。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所以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为若不将资本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统治被剥削者的锁链全部毁坏，他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任何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会得着自由。因此，我们应该懂得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而不以资本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民族运动，乃是资本主义前的民族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封建时代闭关的民族运动。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前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国主义和被他剥削的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懂得现代的民族运动特性和封建时代的民族运动不同，他们认不清弱小民族之敌人是谁，更认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谁；因此，他们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们竟放过了民族运动之敌人，且会和民族运动的敌人妥协，而受敌人的教唆仇视民族运动之友人，如德意志民族党，一面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妥协承认道威斯计划，一面极力仇视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便是一个显例。中国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知识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当中，或极力主张民族运动(如青年党)，或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如国民党右派)；然而他们都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竟不看见剥削压迫中国民族无所不至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竟不觉得他们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践踏在帝国主义者的脚下，反而攻击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且竟附和官僚的研究系，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者，加以“亲俄”、“卖国”的罪名，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二个大患。

第三是工贼　在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参加的力量，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与大商买办阶级——感觉得有利用工贼来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力的必要。这班工贼有些是工人贵族，有些是冒充工会运动者即招牌工会之职员；他们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军阀官僚，他们不反对买办阶级，他们的唯一目的是破坏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买办阶级要利用他们就正在这一点。帝国主义者用以阻碍中国民族奋起的第一个工具是军阀、官僚，第二个工具是买办阶级，这班工贼便是第三个工具。这班工贼不但勾结军阀、官僚及买办阶级(交通系)是公开的，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也是公开的，他们已和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第二国际党公开的发生关系。第二国际党为什么要和他们发生关系呢？不用说是为了要利用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中重要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团结力，破坏第三国际党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在中国发展。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三个大患。

中国的民族运动，此时虽然有日渐发展的趋势；但是上述的三种力量若同时也日渐发展起来，至少也会减少中国民族运动成功的速度，和

第二国际党的思想行动减少世界革命成功的速度一样。因此，我们敢说：在中国民族运动的现代，我们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的必要。孙中山先生，他是了解这种必要的一个人，他临终时致苏联遗书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被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

1925 年 4 月 22 日 《新青年》(季刊)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

——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

C. P. 及 C. Y. 两中局兹拟定关于国民党工作最近应努力进行之事如下：

一、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并决定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

A. 用国民党名义，令各区分部组织讲演队，每星期出外讲演，宣传国民革命。

B. 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

C. 印刷请填写姓名地址加入国民党的纸条子，附载当地国民党党部的通讯处，以便愿加入者之接洽。

D. 各处县市党部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

二、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

A. 选我们的同志及民党左倾的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我们的同志做政治报告，并报告党内左右派的争执及右派的反动行为：如冯自由彭养光凌毅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俱乐部，投降段张；李烈钧石青阳谢持居正等勾结联治派唐继尧破坏广东政府；马素邓家彦周颂西到处宣传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时，右派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的名义散放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上海全市党员大会电促广东将领反对唐继尧，石克士等竟通电否认等。

B. 区分部开会，均令致函上级党部，派宣传委员出席。

三、各地同志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宣传时，应注意下列数点：

A. 说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只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仇敌，小资产阶级分子无恐怖之必要，革命的国民党更无反对之理由，不要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当，帮助他们反对共产党。

B. 根据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演讲，攻击国家主义是要阻止阶级争斗，妨害下层阶级势力（革命的主力）之发展，及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这两层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

C. 攻击国民党最流行的“家人父子的政党观”——这是最妨害民党分子认识主义和党的纪律的。

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月十号在广州开全体会议，C. P. 中央已决定意见七条[①]，各地应即用电报或快邮向此次中委会议表示此意见中（一）、（二）、（四）等条的主张。

C. P. 中央总书记　T. S. Chen

C. Y. 中央总书记　太雷

一九二五、五、五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所载之《关于国民党第二〔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意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

寸　　铁

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

路透电说:巴黎中国国民党人士,近于追悼孙文时,发激烈演说,宣传过激主义,欧洲报纸多谓华人好过激主义。华人何以好过激主义,他们应该有个解答。我们的解答是:过激主义本是结合一切被压迫者反抗一切压迫者,可怜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军阀层层压迫的华人,怎禁得不好过激主义?

卖国乱〔贼〕与国民党右派

段祺瑞所派临时参政院参政三十人中,我们应该注意三个人:一个是"五四"运动的对象卖国贼陆宗舆,其余两个是国民党右派彭养光、凌毅。

赤化与软化

何香凝女士,在国民党上海女党员大会演说,最后述及中山先生临终时恐同志们被敌人软化情形,语时悲切,几至下泪。可是国民党此时在事实上不赤化即软化,没有中立的余地;除非学某君躲到湖州,打个把电报向右派讨讨好,或者算是中立。然而软化的人们终要将赤化头衔加在某君头上!

你们当真外抗强权吗?

现时世界上唯一的强权就是帝国主义,有一班人一方面主张外抗强权,一方面却不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这已经是滑稽极了。这姑且不论,可是你们既然主张外抗强权,实际上也要起来抗一抗才对;然而眼前强权践踏着上海的同胞,最重要的如日本纱厂虐待中国工人,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提议印刷律及越界筑路等事,你们竟没有丝毫行动或言论的反抗,你们当真外抗强权吗?你们欺骗谁来!

今年"五一"的感想

今年"五一"运动,除苏俄外,各国均被军警干涉。在中国,北京江亢虎老爷拟在公园演说,尚且被警厅禁止了,而广州的五一节,竟有二十万人游行;在上海租界华界都禁止开会演说,只有苏俄领事馆大开其五一纪念会。在这些事实上,我们应该发生什么感想?

反共产与军阀

现在上海反对共产党的报纸以盛称直系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时事新报》为第一;同时,有一个什么上海反共产男女同盟会代表孙宗昉赴京请愿,执政府对他颇愿成全。于此可以看出反共产与军阀间的关系了!

段祺瑞解散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义

段政府的警察厅,居然把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及促成会联合总会、

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国民会议协进会、国民会议后援会一齐解散了，并禁止私行开会，这是什么意义呢？这是段祺瑞明白的告诉人民：公开的国民会议运动的时机未到，你们还是去做革命的军事运动罢！

1925年5月10日 《向导》周报第一一四期 署名：实庵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

——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

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同志们:

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前次罢工所争得的条件,在工人方面十之八九已算失败了,讵日本资本家于工潮解决后,每借端为难,不履行双方签定之条约,近则借故开除参与上次工潮之工人代表,致激成第十二厂工友的罢工。到昨日(十五日)第七厂工友照常上工,日厂主不许。乃要求其发给工资,该日本厂主不但不许,竟以手枪向工人轰击,当场击毙工友顾正红,王福金两名,受重伤者四人,轻伤甚众。现小沙渡一带在日厂作工的工友以无端受此奇辱,死伤多人,议决从十六日起,全体罢工,以与日资本家奋斗。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

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

二、由各种团体发启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款项可寄钟公龙转交。

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

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馆示威。

中央总书记　T. S. Chen

〔一九二五年〕①五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原件未标明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们：

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号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

（一）各地应即邀当地 C. Y. 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如在上海杀伤纱厂工人，东京侮辱中国国旗，在北京武昌指挥中国军阀摧残中国学生国耻纪念运动，在山东在上海侵夺中国渔业，霸占旅大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

（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并可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至少其已经自行停闭之上海纱厂永远不再开工。

中央总书记　T. S. Chen

一九二五、五、十九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反唐”与国民革命

商团事件以来，广州将要发生第二次有价值的革命战争，乃是意中之事。

这战争便是反唐战争。反唐战争何以算得是革命战争而且是有价值的革命战争？这是因为反唐战争表面上虽不过反对唐继尧，而实质上乃是破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阴谋，并且是破灭国民党右派勾结唐继尧破坏革命政府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力助他的傀儡张作霖与段祺瑞占住了中国的中央政治机关，然而北方有个国民军，南方有个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他必须去了这两个障碍物，才能达到支配全中国的目的。日本对付国民军的政策，自然不外居中调停段、张间冲突，使之合力向国民军节节进攻；他对付广东政府的政策，却不是帮助陈炯明、林虎——因陈、林是直系——而是利用唐继尧及国民党右派向广东政府进攻。

云南地瘠民贫，唐继尧拥有多兵不能向川、黔发展，忽得日本意外之后援，自然不惜抛弃其联治假面，遣兵进窥桂、粤。

国民党右派已和左派有不能两立之势，他们一面北依段、张，摧残左派分子在北方之活动，一面南联唐继尧，以图覆灭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

杨希闵、刘震寰（都是国民党右派军人）在香港和唐继尧代表、段政府代表及其他国民党右派重要分子共谋倾覆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的目的如果进行，一方面是国民党右派完全取得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挟住段、张，一手挟住唐继尧，来支配中国，来由日本统一中国南北。

帝国主义者对于半殖民地，本立在间接的统治地位，所以必须采用当地一种势力（军阀或地主买办阶级）做工具。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

国所采用的工具，北方便是段、张，南方便是唐继尧，国民党右派又是这两个工具的工具。所以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反唐和反段、张有同样的重要，都是摆在全中国革命分子面前的紧要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把广东将要发生的反唐战争——反对唐继尧及其羽党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当作革命战争，无论成败，都是商团事件后第二次有价值的战争。因为商团事件是镇压买办地主阶级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反唐战争是镇压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

唐继尧电粤港商会，以反共产为号召，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军阀段祺瑞、张作霖、陈炯明等，买办阶级陈廉伯等，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素等，都异口同声的反共产、反赤化。所以“凡是反共产反赤化的人必然勾结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已经成了一个公式。

1925年5月24日　《向导》周报第一一六期　署名：独秀

《热血日报》发刊词与六篇社论

编者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室藏有《热血日报》合订本的影印件，原件据说为杨之华所收藏。在合订本封面上有几行毛笔字，全文为“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后附‘小言’二则作为补白可也)——每篇悉仍原题下以小号字注明年月日”。合订本后附目录，末页有“注：凡目录前标的‘○’者为瞿秋白同志著作”。在多篇社论中之所以要标出某篇为瞿秋白所作，其目的是编辑《瞿秋白文集》，后因政局变幻，未成。本报首篇《发刊词》及收入本书的六篇社论之前均未标有“○”者，可见这些作品非出自秋白之手。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郑超麟老先生的鉴别，认为这些是陈独秀的作品。(《史实与回忆——郑超麟文选》第二卷第137页)

《热血日报》发刊词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

1925年6月4日　《热血日报》第1号

洋奴乎国民乎

上海几乎成了洋奴世界,因为吃外国饭的人太多。现在因为外国人屠杀了几十个中国人,大部分热血未冷的中国人,都起来反抗此次屠杀,为国民争一口气。现时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凡是起来反抗外国人屠杀中国人的,才不愧为国民;仍旧帮助外国人的,固然是实质的洋奴,不帮助外国人也不帮助本国人起来反抗的,也是间接的洋奴,我们不做国民,便是洋奴,中间绝无余地。

现在中国的政府尚未与外国宣战,还可以立在为人民向外国外交官抗议地位,再软弱十二分便立在调解地位:至于人民团体,如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都应绝对立在国民地位,即是和屠杀中国人的外国工部局立在反抗地位,万分不应调人自居。调人是第三者地位,立在国民与工部局之间,凡有国民资格的,断然不能以调人自居。听说法国商会拟出任调人,那是可以的:因为法国商会不是中国国民组织的。中国商会若出来做调人,那便是笑话,因为中国商会中人都未曾入外国籍,如何能离开国民地位来做第三者的调人呢?

可是本埠西文报上,竟有总商会出来调解的宣传,这简直是有意侮辱商界的领袖。商界的领袖也是国民一分子,并不是吃外国饭洋奴,如何可立在调人地位!

现在国民爱国的高潮,已冲动了全中国,在万目所视万手所指之下,谁也不能捏造事实,谁也不能遮掩事实,商界领袖,将来是否离开国民地位自有事实来告诉我们,现在不必胡乱猜疑!至多我们只能拿这种传言看做商界领袖的试金石。

1925 年 6 月 5 日 《热血日报》第 2 号

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

"团结"、"坚持"

受了工部局多年不平待遇的上海市民,现在第一次起来反抗,反抗的牺牲非常之大。在这样大的牺牲之下,如果只办到惩凶赔偿了事,那

便太不值得。

我们固然要惩凶赔偿,但仅仅惩凶赔偿,而于市民的生命与自由没有保障,种种不平的待遇不能废除,将来的压制与怨愤,必要酿成不断的惩凶与赔偿这些不幸的现象。因此,我们的要求,除惩凶赔偿之外,收回会审公堂,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撤退租界外国军警,外人不能在中国擅定法律(如印刷律等),征收税捐(如码头捐等),不禁止中国人入公园,都是必要的。

我们若得不着这些要求,而中途妥协,草草了结,不但对不起大马路的牺牲者,而且我们自身也后患堪虞。因为外人已经认识了上海市民反抗的威力,事了之后,必然要设法加紧钳制,使中国人不能再起反抗。

我们要想得着这些要求,必须用"坚持"与"团结"这两个武器,二者缺一决非侥幸所可得着。"团结"尤为重要,因为不团结便不能坚持。坚持的反面是"速了",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与"分裂"这两个口号,都是奸人暗中破坏我们此次运动之武器,我们要防备!

团结之道有二:一是现在的团结;二是将来的团结。现在的团结,是商界不能与商界分裂,学界不能与学界分裂,工界不能与工界分裂。并且商学工三界团结一致,不相分裂。必如此,才能使工部局无法向市民团体各个击破,才能使工部局让步。

将来的团结,是参加此次罢市罢课罢工罢业的团体,旧有组织的如商会学生会海员工会纱厂工会店员联合会等,都须切实扩大起来;新组织的如电车工会码头工会电话工会洋务职工会电灯工会自来水工会华捕联合会等,都须团结一个永久的组织。

外人欺负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国人虽多而无团结,好像一堆散沙,任他们作弄。只有我们有了永久的坚固的团体,才能免得他们作弄,才能得着此次流血的胜利。胜利后所得的要求条件,也只有我们有永久的坚固的团体才能保障实行,至少也能够抵御他们不履行条件而且反攻。

1925年6月6日 《热血日报》第3号

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

此次风潮的性质,是政治的不是法律的。详言之,即此次风潮乃是

全幕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之一幕，不仅仅是几个巡捕杀死几个市民这样法律上刑事的问题。上海及其他各处中国人，受列强的剥削与凌辱为日已久，不平之声，年来日益增高与普遍，现在一旦爆发，大马路巡捕杀人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决不是根本原因。

此次风潮根本原因，乃是中国民族对于英美日本高压政策之反抗。

若仅仅是巡捕杀了几个人的刑事问题，自然可诉诸法律解决，用全上海罢市罢课罢工来解决一个巡捕杀人的刑事问题，那真是用杀牛的刀来杀鸡了。可是事实上不仅是巡捕杀人，并且是英国工部局纵令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学生，并且是肇事后英美日本各国领事又复命令海陆军登岸，帮同外国商团巡捕，连日惨杀中国市民，占领中国学校，这分明是英美日本政府当局公开的摧残中国人民的政治问题，决不是民族间私相仇杀的刑事问题。若说是刑事问题，应该是国际间的刑事问题，不是私人间的刑事问题，负这刑事责任的是英美日本政府当局，决不只是杀人的巡捕。

我们若认清了此次风潮的性质，便不能承认仅以惩凶赔款了事，因为惩凶赔款只是惩罚犯罪的个人，不能解决民族间的政治问题。

1925 年 6 月 7 日 《热血日报》第 4 期

警告总商会

在此次事变之始，总商会站在调人的地位，颇□起市民的怀疑。自从特组委员会以来，从调人地位进步到国民地位，市民对总商会之疑念顿消；总商会会员中竟有称此次特组委员会为总商会之和平革命，市民对于总商会更怀了莫大的希望，以为市民所不满于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十三条件，现在可经革命的总商会加以修正及增加，令市民满意了。孰知事实适与之相反。总商会所提条件，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中之六、十二、十三等条（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完全删去，则比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更大让步而特让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尚在未遭外人否拒之前，已为总商会所否拒，此次总商会之和平革命，诚为上海市民之大不幸，还

是以前调人的态度，有利于上海市民。

外交当局接到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以为过高，不愿提出，而又不便公然拒绝；正在进退两难之时，适逢总商会发生和平革命，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大加修改，此举诚大便于外交当局，亦且有利于外人，总商会和平革命之动机究竟是什么，也应该远嫌明疑才对。

此外我们要有一事不得不警告总商会者，总商会以前自居于调人地位，现在摇身一变即自居于主体地位，前冷后热，热而至于包办，漠视一切，吾人诚不能无疑。总商会在上海诚为有力团体，然亦只是一个有力团体，此次运动乃工商学各界市民一致行动，总商会断不能抹杀工学界，更不能抹杀商联会，而妄自尊大，竟以唯一主体自居。

前年的民治委员会，总商会乃以包办而孤立遭失败，前车可鉴，和平革命的总商会其三思之！

1925 年 6 月 16 日　《热血日报》第 13 期

贺上海交涉破裂

上海交涉破裂了，可贺可贺：官商勾结，牺牲多数平民利益去换少数巨商参政的买卖做不成了，可贺者一；蔡廷干手中一副好牌已经揭开不能再骗人民了，可贺者二；总商会应该觉悟须与全国各阶级人民合作才有胜利的希望，牺牲平民利益单独向外人让步讨好只自取辱了，可贺者三；六国委员对我取一致态度，我们应该觉悟，我们放过人家，人家并不肯放过我们了，可贺者四；连惩凶赔偿谢罪都不办到，“速了”的心理我们可以打断了，可贺者五；蔡郑会的公告尚且声称“此案之重大为自有租界以来所未有，租界当局当负其完全责任，更无推诿之余地”，我们人民万不至再说“当归罪于老闸捕房及捕头爱活生”这样的下流话了，可贺者六；我们可以彻底觉悟，靠政府交涉得到胜利是不可能的了，可贺者七；六国委员不但不承认工部局的杀人罪，更要华界官吏负责，我们应该觉悟在中国欺压中国人的外国人，并非只是租界工部局了，可贺者八；蔡廷干尚说：“吾人提出之十三条件实系将重要问题让步”，这可证明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条件之罪了，可贺者九；局部的交涉

既然破裂，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得着改变地方的枝叶的要求，而为全国的根本的要求之机会了，可贺者十。

全国的根本的要求，是废除自通商以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取消外人在中国一切不法的特权；具体说起来，就是：

（一）取消领事裁判权；

（二）撤退外人驻华的海陆军及巡捕；

（三）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四）废除协定关税制并收回海关管理权；

（五）禁止外国军舰自由驶入中国领海；

（六）取消外国商轮在内河的航行权；

（七）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厂；

（八）禁止外国一切货币在中国境内直接使用。

那一个不承认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全国一致反对他，继续断绝商业的工业的交通的关系，尚有进而以武力强迫我们恢复这些关系的，我们进而诉诸武力自卫，亦所不惜！

1925年6月21日 《热血日报》第18期

开市以后怎样？

上海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及纳税华人会已经宣布上海今天开市了。开市的宣言里说："但同时仍本初衷为伸张公理而努力，抵制英日货物与停业工人之援助"。——这是上海市民对于开市后继续斗争的办法。

可是，我们应当说，这宣言里有两个缺点：

第一，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办法没有指明出来。抵制仇货的运动——经济绝交的方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们至少可以说，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这十年的经验怎样呢？五四运动的时候，曾经于轰轰烈烈的排货运动，可是我们没有得到丝毫结果。这因为什么？因为学生群众的爱国运动，虽然能激起大多数商民的同情和热心，然而竟有小数大商人，本来是以贩卖仇货为业的，他们贪图私利，用种种方

法偷运冒牌，破坏这一运动。这次必定要有切实的监督办法，真正实行抵货，方才可以免蹈覆辙。第二，至于工人停业(罢工)，却是这次运动中的新方法，全中国对英对日的大罢工，这是规模极大的运动。这是中国工人比较前十年的一个极大的进步。然而罢工的方法要得到胜利，必定应当有持久的力量。譬如大前年海员大罢工及广州沙面华员的罢工，便是两个先例。海员及沙面华员的罢工胜利，都是因为他们能组成工会而且得着国民党的努力赞助，使他们能够坚持。如今单论上海一埠，罢工的也有二十万人，要切实援助罢工工人，第一必须巩固工会的组织，第二须有统一的筹款机关。最要紧的，尤其是要使学生会及工会得以参与这样机关，随后工会方面才能有一定的筹款计划。假使没有这种办法，工人群众绝无一种自信的决心，不幸而发生参差不齐的现象，这一运动便一定要完全失败。

如今要补这两种缺点，一定要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赶紧组织两种机关之一，监督抵制英日货运动的一关，定出一严厉的制裁办法，惩罚一切汉奸；二、维护罢工工人的委员会，统一收款机关。这些办法应当赶紧公布出来，否则开市的宣言里虽说"免除非必要之牺牲，即所以蓄养长期折冲之实力"。实际恐怕退兵一步，全局瓦解。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层——开市宣言里，没有明白的号召全国对外的大罢工。这似乎不关重要。其实不然的，因为上海方面开市，很容易被全国看做民众运动"退兵"，假使我们在说明"长期折冲"之后，不指明扩大罢工运动于全国，恐怕各地认上海的宣言是空谈而没有实行的决心。不仅如此，我们应当更进一步。上海是运动的发展地，各团体应当赶快再联合起来，共同发起全国有实力的民众团体代表大会。我们上面所说，监督排货运动及援助罢工工人的工作，都是全国的。我□这□全国大会的目的，便在于组成全国统一的行动机关。而且我们各地的民众要求，应当汇合起来，成一统一的主张，以便对外交涉。

以上所说的，都是上海开市后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希望为上海运动中心的各团体，极端的注意。

1925年6月26日 《热血日报》第23期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

前年临城事件，土匪掳去念〔廿〕几个外国商人，外国人对中国政府闹得天翻地覆，惩凶、赔款、罢免地方长官以谢罪外，还要要求直接管理中国铁路；现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行凶，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连日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商人及其他市民数十名，伤者数百，中国人将向外国政府要求什么呢？

被土匪掳去的外国商人即令是无罪的，而要求工作的工人，游行演讲的学生，过路观看的行人，都是没有武装的市民，有何罪状应该枪毙呢？

即令上海是英美领土，行政官厅公然下命令，向无罪状无武装的市民开枪轰击，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犯罪行为；况且租界毕竟还是中国领土，外人来此通商，根据何项条约，有何权利，可以任意开枪杀伤中国市民？大约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是上帝赐给英、美、法、日等国剥削与践踏的，如有不受剥削与践踏者，便违背了神意，便是过激党，便犯了罪，便应该枪毙。或者他们以为此次大马路的屠杀，也和在欧洲屠杀犹太人在美洲屠杀黑人一样，即令在人类的法律观点上说不过去，而在道德上是合神意的；因为除了神意以外，他们找不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可是不懂得这样扶强抑弱的神意的中国人，我们亲眼看见同胞的热血染遍了大英大马路，我们已经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

此次上海大马路的屠杀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是：

（一）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英国固然是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而附和日本人的什么大亚细亚主义，鼓吹什么美国是中国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奸细。

（二）一切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剥削践踏，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决不是什么过激派所捏造的海外奇谈；商人、学生、工人一切市民大群众实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践踏：把持海关，在中国遍设工厂，不许禁止棉花出口，不许中国增收纸烟捐，封禁全国学生总会，以军火给军阀战争，动辙〔辄〕拘捕惩罚中国新闻记者，越界筑路①，提出印刷律，增加码头捐②，枪杀请求工作的工人，拘捕爱国演讲的学生，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一步加紧一步，逼着中国人不得不起来反抗，决不是由于什么过激派的煽动。此次上海学生与商人之奋起，都明明白白是自动的参加民族运动，若说是由于过激派之煽动，那便未免过于诬蔑学生、商人，并且过于恭维过激派了。

（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之剥削践踏，和德、俄、奥等非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平通商，这些事实已证明“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是同一意义的两个名词。此次大屠杀更使我们的确认清了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的敌人。

（四）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欧战损失过巨，须长期的加紧剥削弱小民族以弥补，中国即是他们所要剥削者重要部分之一，他们向中国剥削日益加紧，他们恐怕中国人民觉悟反抗的心理亦日益加甚；年来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勃兴，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指〔措〕，一面利用中国军阀政府抑制人民，一面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不敢团结起来反抗他们，不敢做自由运动。可是他们这种恐吓手段，在此次大屠杀中，完全失了效力；因为不管过激不过激，赤化不赤化，帝国主义者枪杀了数十无罪的中国人是真的。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

---

① 1925年2月间，上海领事团向各国驻华公使团“提议租界边境应展放，至距现有边境约当来复枪弹最远之路程”。公使团电复，“谓此项建议案，已审查完毕，认为合宜”。于是工部局在北新泾、徐家汇、虹桥等地强占民田，掘坟毁茔，拆除民房，强行筑路。仅在沪西开辟之新马路达十余条。

② 1925年4月间，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举行大会。工部局再次提出增加码头捐等提案。按洋泾浜土地章程第九款规定，码头捐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而拟定的新码头捐规定“捐数不得逾该货关税百分之三”。按值百抽五的百分之三计算，为千分之一点五，较原来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我们应有决心：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

（五）在此次屠杀中的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我们并可以知道各国的工人、学生必能对此次中国民族被外国强盗——帝国主义者屠杀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是应该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应该立脚反动的国家主义上，笼统的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

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痛苦中所得的教训，很可以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向正确的路线上发展。

上海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势力集中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民族自由运动，亦应以上海为中心；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使这个运动的中心——上海的学生、工人、商人更坚决的前进，尤其要监察大商阶级中途和帝国主义者妥协！

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本领事；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

（四）收回全国租界；

（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

我们要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争斗，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

1925年6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一一七期 署名：独秀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

凡是一个较大的工潮，在社会上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人和厂主争斗问题，至于中国工人和日本厂主间的争斗，其意义尤其复杂。

此次上海及青岛日本的纱厂和中国工人的冲突，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一个很简单的劳资争斗，我们应该推求这次争斗之经济的政治的背景，明白了这些背景，才懂得此次工潮意义之复杂与重大。

此次工潮之经济的背景是日本纱业向中国纱业及中国工人进攻。世界纱业状况本在衰落时期，比英、美资本幼稚的日本照情理不能进展；然而日本资本家，一面正因纱业状况不佳，极力要维持资本的利益，渡过这衰落时期；一面却又想此时期扩大他的企业，独占中国之纱业；因此遂不得不向在他们纱厂的中国工人加倍榨取（如增进工作能率，改用女工、养成工等）与压迫（如打骂、罚金等），以达其保守而且进攻两个目的。日本人欲平安无事的施行其榨取与压迫，工人不至反抗，则首先须破坏工人的团体——工会。中国工人受不了这样的加倍榨取与压迫，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政治的背景，在全部局势说起来，整个的国际帝国主义，正在向整个的中国民族运动进攻，压迫中国工人是他们整个的进攻之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进攻也最严厉。这种最重要，中国人现在还不大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是认识的；所以日本某报曾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次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咸认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影响。"单就日本说起来，直系倒后，日本挟有段、张这两个鹰犬的势力支配中国政治，制服中国人民，因此日本对于中国民族运动之进攻，比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更加紧

出力，中国人对于他的种种加紧进攻，自然也特别感觉，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各方面对于此次工潮的态度是怎样呢？英美帝国主义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有冲突，而压迫中国民族运动他们是一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帮着日本工厂拘捕中国工人，拘捕同情于工人的学生，枪杀同情于工人的学生与市民，他们来到中国通商，他们居然在中国的地方——上海，有在法律以外任意枪杀中国人的特权。排日在此次上海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一切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民族是一致的，从前单独仇视日本，是错误的。

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他当然有替日本镇压中国人排日运动的义务，上海警察署曾对工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本不应摧残同胞，但怎奈日本领事压迫及长官命令何！……"山东张宗昌所统的奉军，更是听日本人命令，解散了纱厂工会，杀伤了工人数十名，驱逐工人领袖数十名出境，还囚送工人领袖六人到济南要枪毙。在此次青岛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国内军阀的确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的军队即是替日本屠杀青岛工人的刽子手！

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回想临城劫车时，全国报纸那样如丧考妣的号叫责骂，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

只有可尊敬的学生，为了工人，为了同学，前仆后起的以热血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在中国民族运动中，那些社会成分是最急进的最勇敢的先锋。

1925 年 6 月 6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一七期 署名：独秀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

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之屠杀，曲在英捕横暴而不由于学生、市民之暴动，已由本月十一日会审公堂第三次研讯被捕者所宣布的判词完全证明了。

此次屠杀之最近直接原因，乃由于上海的学生、市民对于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而抗议，为租界英捕所屠杀。

同时，日本派遣军舰在青岛强迫中国军警，使其屠杀中国工人八名，伤者十余。

上海、青岛同时的大屠杀，激起全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国民公愤，罢工、罢市、罢课、集会示威，遍于全国。在这全国国民公愤中虽然有和平急进之分，而愤恨外人戮辱同胞，并且忆起历来的不平待遇，却已成了全国共同的心理，虽军阀、银行家亦为此心理所征服。

苏俄政府及人民对于此次屠杀事件及中国国民奋起，极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国际已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工人及中国民族运动。英国的工人及自由主义的学者已起来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抗议此次上海屠杀事件。

英、日、法、美、意的海军在上海登岸驻扎，占领学校，搜查行人。英、日、法、美、意的公使团始终坚持上海西捕开枪杀人是应该的。

汉口英领事召各国海军登陆，英国义勇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八人，伤四十余。

段政府下令各省保护外侨。萧耀南、赵恒惕均令军警严阻学生游行演讲，并宣布戒严，以“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威吓市民。

依据上列各项事实，便可看出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了。

英捕英兵在上海、汉口杀人，不过是此次争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凶暴现象，此种现象之真正根由乃由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醒

觉与反抗之示威。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仅以惩凶赔偿了事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示威,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第二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缩小战线对英、日或专对英国是错误的;因为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或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争斗之起因。第三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法律解决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第四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看做一个地方的问题,上海人只管上海,青岛人只管青岛,汉口人只管汉口,妄想住在各个租界的中国人得着一点市民权利便可永弭未来的冲突,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即此次屠杀也不但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种根本问题,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第五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依靠现政府交涉解决是错误的;因为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能得着相当的解决,现在对于各处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并不向外人严重交涉,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刑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只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现在上海的外交当局蔡、曾、许那一个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些错误,便应该懂得此次争斗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争斗的方法,不可依赖法律,亦不可依赖现政府,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

因此,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新政府第一个宣告,即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个宣告,即是那一国承认废约的宣告,并派代表来华商订相互平等的新约,便许那一国通

商，否则请他们将一切商品运到别国去贩卖。

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

1925年6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一一八期 署名：独秀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

上海交涉破裂①是我们的失败么？当然不是的。反之，上海交涉〔不〕破裂，或竟至帝国主义者对于总商会十三条要求一一允许了，国人以为目的已达，停止一切运动，那才真是我们的失败。

主张上海开市是总商会的罪恶么？也不是的。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不在主张开市，而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

上海交涉移京是局部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及其附庸（高等华人）之妥协更是当然的事，这都不是我们的失败，只有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不能继续团结前进才是我们的失败。

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尚继续工作，六月廿五、卅两日，全国都还有盛大的示威行动，香港、沙面运动之进行比上海更加猛烈，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工人、学生、中小商人都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失望。

在敌人方面，法、美帝国主义者虽取和缓态度，而英、日仍然联合向我进攻，尤其是英国还在广州继续屠杀。英、日帝国主义者直接屠杀我们还不称心，更寻得一个有力的工具！大胆无耻的胡匪张作霖替他们做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张作霖的军队在奉天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到处压迫民众爱国运动，汇丰大借款喧传于伦敦，张学良在上海与英总领事之密谈，这些事实都是说明英、日帝国主义者需要张作霖替他们在此次风潮中做什么及张作霖已经替他们做了些什么。自从段祺瑞提议修

---

① 1925年6月16日，由北京公使团组织的英、美、法、日、意、比六国委员会同段祺瑞政府交涉员蔡廷干等在沪就“五卅案”举行谈判。18日，六国委员会以收回会审公堂等条款与“五卅”无关，不予讨论，谈判即破裂。

改不平等条约，更使英国感觉着利用他以前不愿利用的张作霖之必要；同时张作霖的政敌冯玉祥却明白的表示站在爱国的民众方面，张作霖更要倒行逆施了。这乃是此次反帝运动最近发展的新局面。

我们民众对于此新局面如何应付呢？

第一，要扩大工商学兵农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运动。

第二，急须在北京或上海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

第三，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

第四，扩张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军于全中国，以扑灭张作霖、萧耀南等媚外残民的军阀势力。

第五，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非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已。

1925年7月2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〇期 署名：独秀



广州战争之意义

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争，社会上有三种误解：第一个误解说是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之战争；第二个误解说是胡汉民和杨希闵争夺地盘之战争；第三个误解说是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由此三个误解遂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在广州的共产党人诚然反对杨刘，并且努力援助国民党政府讨平杨刘；但他们反对杨刘并非因为杨刘不是共产党或不相信共产主义，乃是因为杨刘勾结香港政府及反革命的唐继尧、陈廉伯、马素等背叛国民党政府。广州政府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是共产党政府，并且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立政府——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并未曾直接负政治上的责任。大家明白了这种事实，便不会有第一个误解。

据我们所知道的，开战之前几天，胡汉民、汪精卫都还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坚决主战的是谭延闿与廖仲恺，因此我们便可以明白第二个误解也非事实了。

至于第三个误解之非事实，更属明显；因为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应该知道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一不是什么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二不是什么胡杨争地盘，三不是什么粤军排斥客军，乃是国民党政府讨伐通敌的叛将——杨希闵、刘震寰等。

唐继尧借重日本势力，谋攫两广，杨刘均为唐军内应，这是杨刘之罪一；在香港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及其走狗陈廉伯、马素，谋倒广州国民党政府，这是杨刘之罪二；杨刘有这二罪——国民党政府乃加以讨

伐。因此,此次讨伐战争之意义,可以说:一方面是直接驱除反革命的军阀盘据广东,一方面是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势力侵入广东。

国民党政府若从一致对外的瞽说,不用兵对内讨平杨刘,则现在广州市民仍在杨刘的反动势力压迫之下,日受香港政府命令钳制人民爱国运动;不独香港工人无广州后援不能罢工,而且枪杀广州游行示威的市民,并不须英人亲自动手杨刘的军队即可效劳。此次广州政府所没收英国帮助杨刘的大批枪弹,即是杨刘将以阻止广州市民爱国运动的利器。并且若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那能够像现在让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及爱国学生在广州存在与活动,更那有什么青年军人参加运动的事?杨刘军事势力了结,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所以广州讨平杨刘之对内战争,在此次五卅运动上即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简直是胡说!

不错,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事实上"一致对外"乃是一个幻想,听你"一致对外"这口号叫得如何高如何响,尽有人不但不愿一致对外,并且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杨希闵、张作霖之所为;我们若是对于这类人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有意或无意放过在内的敌人。在内的敌人和在外的敌人倒是一致的,在此次争斗中,我们若不能否认有在内的敌人,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

1925年7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我们认识江亢虎了

我们以前只知道江亢虎自称是社会党首领，还不晓的他究竟是什么一种人；现在看见他求见宣统皇帝的信中自称："寒家三世仕宦，五人科甲，先祖韵涛公曾侍南齐，不佞少时亦供京职，……曾痛论兴汉灭满十二大不可，驰书民军，几以身殉。"我们现在认识他了，认识他乃是一位"颇念旧恩"、"尚不忘本"的复辟党！

《醒狮》与《诚言》

英国帝国主义者废了许多气力，印了许多《诚言》，意图在中国民众中毁坏苏俄的信用，实际上只惹起一些反感，因为他们的方法太笨，他们若用《醒狮周报》替他们宣传，定然有效得多，并且《醒狮》攻击苏俄诬蔑苏俄，比《诚言》还要起劲十倍，可惜英国人太忽略了。

孙宝琦与《醒狮》

孙宝琦对美国记者说："中国人之所以亲俄者，则亦因年来国人感受种种不平等之待遇，久已疾首痛心，俄人独能开风气之先，首先解放我国之束缚，抛弃种种不平等之利益，以与列强对我之束缚压迫者两两相比，弥觉俄人可亲，而列强可畏，自属人情之常。"由《醒狮》记者看来，

孙宝琦这段话真是亲俄卖国，而由孙宝琦看来，《醒狮周报》的见解，或者是人情之变。

1925年8月10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三期 署名：实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

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此次中国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买弄中国人心。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国人一致行动，并且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相当的同情；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英美间遂现了裂痕，加之在华商业竞争，美国一部分舆论表示对华和缓态度，并主张有条件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即至五卅事变造因之日本，亦以单独调解的声浪恫吓英国——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此孤立的状态中。

外交手腕最敏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一面捏造"报告未到"、"华人排外"、"列强一致"等话搪塞国会之质问，一面力与法、美、日本谈判，以英、日续盟威吓美国，乃成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新局面。英、法利害冲突过甚，不易调协：无条件的与英国一致，固法人所不愿；为拉拢法国一致对华，而在东欧或小亚细亚向法人让步，也非英人所乐为。这就是华盛顿会议所产生的四国协同对华政策现在不易实现的缘故。

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局成，在政府外交上或增加多少困难，而在国民运动上却有很好的影响，因为"单独对英"及"美国人是中国好友"这两个口号，都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自相分裂。现在英、美、日本联合在一起，懦弱的资产阶级撇开日、美之心理虽然仍旧存在着，而事实上日、美却不许他们撇开，所谓"单独对英"明明白白成了一种幻想的单相思。在这样情势之下，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之分裂不至过分的发展。

此时英国的政策是：(一)联合日、美一致对华以免孤立；(二)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惫，再图有利的结果；(三)勾结中

国反动的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四)以关税会议①诱惑中国军阀政府，准备在此会议，由要求清理外债进而共管财政，向中国进攻。日本仍旧采用他的传统政策，即是追随英国，取一致行动，获得在华和英国不甚冲突的利益。美国虽不全然赞成英国的政策，然而为维持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威严及实施门户洞开致策，他是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的。

这时的国内军阀又是怎样呢？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也就是第一反动的军阀；他的对内政策是急须打破国民军，以免妨碍他的势力在中部自由发展，他的对外政策是公然压迫在他的势力下(从奉天到上海)的国民运动，结欢英、日以取得援助。国民军和奉张更在相反的地位，他们在张家口在河南都同情于国民运动；惟其因反奉而联络直系若一过相当程度，不但立刻失去社会地位，并将失去政治地位。直系尚有举足轻重之力，无论其联奉或联国民军都以直系重兴为目的，此时他们联奉之计划已归失败，同时，张宗昌与杭州间，开封与武昌间，已有不断的联络。直系和奉张本是反动相等的军阀，只因他们在政治上失了优势，压迫国民运动还不敢象奉军那样横行无忌。段派虽无实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举动在政治上亦颇有意义；他的反动性也不减于奉、直，此时因与奉张利害冲突，其实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别开生面，向国民运动及国民军表示敷衍态度。

依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运动中眼前的死敌，在外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在内的是奉天军阀，他们又正勾结一气。此外如美国的经济侵略及和平愚弄和直系重兴这两个危险，国民运动中若采用过当的利用策略，都会为了眼前争斗遗下未来的祸根！

1925年8月15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四期　署名：独秀

---

① 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曾规定实行值百抽二点五的附加税。1925年8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照会参加该会议的各国，要求召开关税会议。12月26日，英、美、法、日、意、比、荷、葡、挪威、西班牙、丹麦和中国，共十三国在北京举行关税会议。由于军阀混战，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会议毫无结果，连各国已经同意的二五附加税也未得到。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

驻在上海小沙渡的奉军兵士对工人说："大帅派咱们南来时，说是到上海打洋人，早知道是叫咱们打本国人，咱们真不应该来。"这几句话把奉天军阀对于上海民众运动的态度形容尽致了。张作霖父子为什么要骗兵士说是到上海打洋人？这是不但派兵到上海占地盘和垄断私运鸦片报效不便说出，在民气激昂之初期，也不便明说来替外国人压服本国人，所以只得顺口说是到上海打洋人！

奉军进驻上海到底打了洋人没有？不用说是没有。其实上海市民并不曾主张他们来打洋人，不过张学良、邢士廉[①]对英、日人那样亲密恭顺，对本国人这样的压迫凌辱，相形之下，未免难堪。说他们对本国人压迫凌辱，奉军未必承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保护爱国运动，不过为地方治安计须制止越轨行动罢了。可是邢士廉一到上海便宣布戒严，爱国的民众集会一概禁止，连提倡国货的游行都不许；工商学联合会派人上街演讲，马上便遭封闭；海员工会及洋务工会也同时因惩治破坏罢工者而遭封闭；接着电车工会也遭压迫；小沙渡是罢工最初发动地，奉军特别驻军该处监视，连少数工人集会都不许；禁止学生会检查英、日货——这就是奉军在上海保护爱国运动的事实。京戏《逍遥津》中曹操拔剑威吓献帝，杀死伏后及二皇子，犹口口声声自称"忠良"、"忠心保国"，奉军保护爱国运动，又何以异是？

奉军这样的保护爱国运动，连他们的兵士也看穿了，所以说"叫咱们打本国人"。

---

① 五卅运动爆发后，邢士廉率奉军约6 000名，于6月13日至29日之间，先后到达上海。6月22日，江苏省长郑谦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士廉为淞沪戒严总司令。10月中旬，奉军被迫撤出上海。

奉军这样举动，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关系。上海是奉军初到之客地，和直隶、山东是他们已占据的地盘不同，所以他们在上海的举动，至少也要顾及上流社会的意见。

上海的资产阶级，还不像汉口、天津的商会那样反动向军阀告密，也还没有勾结所谓工团联合会的那班工贼来破坏工人团体；可是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件外，别自提出十三条，这些举动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的民众势力发现显然的分裂。开市时，总商会也取了独断的态度，和工商学联合会不能一致；开市后，总商会是并没有履行"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宣言。当总商会提出十三条件时，加入总商会的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登报声明一致拥护总商会所提条件，意在抑制工商学联合会之急进的主张，可是总商会的十三条件也未得结果，这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并不出来拥护，却想压迫工人总复工，好让大老板们照旧安稳发财。商联会虽然比总商会高明一点，而自从奉军戒严以后，对于急进的工学界，现出恐怖而鄙恶的态度，甚至于动辄要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这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民众势力有了第二次分裂。民众势力有了这两次分裂，敌人焉有不乘机加紧进攻的道理？

上海商界富厚，为全国之冠，而他们对于罢工工人救济费，只经收外埠捐款，而本埠总商会及商总联会自己却都一毛不拔，并且不努力设法去募捐，只忙着求日厂单独解决，以减少救济费，这种苟且不负责任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看轻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像是一种滑稽剧了。

五卅事变初起之时，帝国主义者着实吃了一惊，假使民众势力不分裂，全上海工、商、学界一致团结努力前进，假使军阀不摧残爱国运动，民众有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之自由，则影响到全国运动之发展和北京交涉之进行，必和今天沉滞的状况不同，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呵！

1925 年 8 月 18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五期　署名：独秀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

（一）

上海工人两个半月的罢工运动，香港、沙面两个月的总同盟罢工，其他如南京、青岛、河南、北京各局部的罢工，在此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中，已表示极伟大的力量。经过这一时期，对于以后的发展途径，我们应当有个明确的答案，以为民众争斗之指针；并应该有详密的策略，以决定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反抗国内军阀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及压迫，而力争解放中国之革命的道路。

（二）

对于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答案，便必须：（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瞭敌人方面——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利用之。

自从上海工人总罢工以来，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起来奋斗，始则在上海，随后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大致以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堂，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改良工人待遇，惩治凶手，赔偿死伤损失为共同的政纲。上海之外，首先有力的响应的便是沙面和香港宣布总同盟罢工，接着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这两个月全国民众运动奋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见工人阶级所得的胜利——群众的工会组织，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铁路一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

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因此，除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如工头、工贼等之外，全国一般民众，都对于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表示同情，并予以物质的援助。

（三）

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得着这种胜利，是因为自己勇敢的反帝国主义争斗，并且和其他被压迫的民众联合。

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瞭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争斗才能继续下去。

工人罢工运动所得的胜利还不止此，他在现时中国的情状里，一天一天的集中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且使政府及军人中还没有象张作霖那样完全站到帝国主义那边去的，也不得不自相联合起来，应付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工人群众力争民族自由运动，更使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暴露他们那反对国民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如邢士廉之于上海，张宗昌之于山东，李景林之于天津。

（四）

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力设法扑灭上海、香港的罢工，他们知道这两处罢工停止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大打击。他们也知道中国排货运动是他们的大损失，所以竭力运用下列政策，使中国民族运动根本摇动。一、他们以炮舰威吓广州——香港沙面罢工的策源地；二、传播谣言，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隔离；三、勾结奉系军阀，压迫上海、青岛、天津的罢工运动和上海禁止学生检查英、日货，这是他们最毒的政策。美

国帝国主义者要想利用反英、日的运动，而发展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因为怕中国民众过于开展，他的政策客观上仍旧是帮助英、日，形式上维持帝国主义者在华联合战线。惟我们也应当知道英、日与美国内部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他对于中国解放之形式上的问题比其他帝国主义者容易让步。

（五）

上海、香港罢工都已在两个月以上，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交通之阻隔，政治之分裂，中部、北部各省的工人没有能及时响应，汉口、青岛、天津的罢工，都被军阀高压政策所破坏。这种情形，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工人和一般民众主观上的愤激不平，还在一天一天的增长，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罢工运动，在客观上一时不能为有力的发展。北部、中部的罢工既然一时不能发展，上海、香港的罢工，便有孤立难以久持的危险，特别是上海罢工群众受政治上经济上双层压迫，比香港罢工群众所遭的环境尤坏。

在上海有一部分先进工人，他们看见落后的罢工工人，因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开始恐慌，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是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拼命”办法，想借此泄愤，或拿他来代替现时困难的争斗。现在是群众的政治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

（六）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便可以答复今后的发展途径是怎样及今后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的策略是怎样。

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

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他对外让步，使他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

上海、香港的罢工，从全国性质的民族争斗，变成经济的争斗和地方的性质的民族争斗之后，工人阶级的奋斗却进了一个新的途径：不但对外争斗，而且对内争斗；不但和资本帝国主义争斗，而且和反动的军阀争斗；不但为民族争斗，而且为民权争斗。本来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不能和力争民权自由的争斗分开；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中（如五卅事变初起对上海官厅及北京政府对人民之让步）；而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如段政府之交涉成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如奉系军阀摧残天津、山东、上海的民族运动）。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争斗中的民权运动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国内军阀中，第一个公然做英、日帝国主义者走狗的，第一个以武力破坏民族运动的，第一个蹂躏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的，就是奉天军阀。打倒奉天军阀乃是去掉国内反帝国主义争斗之最大障碍，乃是我们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所必取的途径。

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其他阶级的群众，如果还存着用和平方法可以达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心想，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去尝试一下，尝试失败了，他们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所以今后我们的总口号应该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

1925 年 8 月 23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罢工与法律

当五卅事变发生，上海工人对于要求条件，提出“承认工人罢工自由”时，有些人以为工人要罢工便罢工，为什么要求有罢工自由？现在北京警厅已经正式布告答复这个疑问了。布告上说：“按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其聚众为强暴胁迫或将为者，依骚扰罪第一百六十七条之例处断。同律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以文书、图画、演说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依上例处断云云。”原来工人没有罢工之自由，罢工在法律上是犯罪行为，工人安得不要求这个法律上的自由。

孙宗昉三出风头

上海有一位孙宗昉先生，我们看见他的大名第一次在报上大出风头，是代表“上海反共产男女同盟会”到上海县署呈请立案和赴京请愿；第二次在报上出风头，是用中华工会会长名义，勾结顾雪樵向日本人冒领顾正红的恤款一万元，事败，害了顾雪樵坐监牢；最近第三次在报上又大出风头，是骗取丝厂女工入会费，被众女工向警厅告发，警厅已将中华工会发封，并限令获案之同伙三日内交出该会长到案。

江亢虎的人格

江亢虎自己辩白复辟罪是冤枉，却不曾否认报载他给金梁的信是

伪造。其实复辟还是一种政治的公罪，他因为求见宣统皇帝，不惜以科甲仕宦自矜，又自向清帝丑表功，在常人为之，已经肉麻无人格，比阴谋复辟还要下流，何况是一个自称新社会民主党的首领！

江亢虎的宣传之道

江亢虎自称求见宣统皇帝亦宣傅之一道、他的社会主义专向善后会议及各国君主宣传，已经有点特别；并且他在未见宣统宣传社会主义之前，已宣传保皇主义，自表保皇功劳，更是特别。他为了要见清帝宣传主义，便以反对兴汉灭满之功自荐；那么，他将来要见英王宣传主义，也须以反对保华抗英之功自荐吗？

1925 年 8 月 23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六期 署名：实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简单的和你谈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时的

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

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

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

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公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织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的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

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侨〔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

成，是以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都比现在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 C. P. 或 C. Y. 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 C. P. 非 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 P. 和 C. Y. 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像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 C. P. 和 C. 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 C. P. 的很少很少，比较 C. P. 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 C. P. 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 C. P. 发展，还是 C. P. 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 C. P. 非 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 C. P. 非 C. Y. 的国民党员得着失却训练的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像

要想一举便把非 C. P. 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改〕组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 C. P. 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 C. P. 同受压迫，并且对于 C. P. 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

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　　　*　　　*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么？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甚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卅日

1925年9月11日、18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九、一三〇期

署名：独秀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

——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

各级同学①们：

本校②第四次大会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条新生入学③时，须有正式入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只须有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补同学，凡在此次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改为正式同学。

又关于校团④组织厘定如下：

一、校团之重要作用，系于各种社会团体机关而有本校同学参与之代表大会中临时组织之，以主张本校之政策。全国代表大会中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代表大会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

二、工农学及其他联合团体（如工联、学联之类）总机关负责职员中有本校同学者，亦得组织某机关之校团：全国总机关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机关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其各个团体机关（如一工会、一学校之类）则不必常设校团，有特别会议发生时由支部书记召集该机关全体任职同学临时组织校团以应付之。

三、校团讨论该大会或该机关中本校应采行之重要策略，报告中

① 中共党员的代号。

② 中国共产党的代号。

③ 指新党员入党。

④ 中国共产党党团的代号。

央，区或地委，并接受与设法执行中央，区或地委对该大会或机关所议决本校应采行之策略。

四、上级机关之校团，于某事项须对同性质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所命令时，须先得中央，区或地委之同意。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事须呈请同性质上级机关之校团时，同样须得区或地委之同意。

五、校团书记由中央，区或地委指定之，或由参与该大会本校同学及该机关中本校同学推定而经中央，区或地委之允许。校团人数多时，则可指定数人组织干事会。

六、一切校团均应照第四次大会组织议决案第七条会同少校[1]同学[2]合组之。

七、校团与支部之区别如下：支部为本校基础组织，在一固定机关内负发展本校及指导该机关内之本校政治工作两重职位；校团则在各种临时会议或各种联合机关内其中并不能组织支部者负指挥本校同学一致行动之责任。

中央总书记

一九二五、八、三十一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号。

② 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代号。

《向导》①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本报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刚刚三个周年。这三年中，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本报的革命政策之主张如何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现在需要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叙述，以贡读者。

本报创刊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一方面反动的奉天军阀虽然失败了，另一方面直系军阀有代兴之势，尤其是曹党阴谋夺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无力支持；因此，我们在本报未刊行以前，在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中，即已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所以本报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张都根据在这三个口号之上：发刊宣言上，(一)指出须推倒为国内和平与统一障碍的军阀之理由，(二)指出须反抗为中国自由与独立障碍的国际帝国主义之理由；进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更具体些是主张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同时根据这个革命的政策之理论，反对当时一切非革命的理论，如"法统说"、"制宪说"、"武力统一说"、"联省自治说"、"整理财政澄清选举说"等。在此时我们总的政治口号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这口号一方面是继续着辛亥革命的观念而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军阀无论皖、奉或直，无一不是武力专政的魔王，让他们统治中国，民主政治是丝毫没有希望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

① 原标题为"本报"。

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次年（民国十二年）"二七"京汉屠杀事件，这半年间，直系军阀的反动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军人及其附属品——政客之横暴，惹起各地进步分子，不断的反抗，至"二七"京汉屠杀案发生，直系军阀之反动已达最高度，正式与民众宣战。此时本报的主张是：统一国民运动的势力，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在统一的国民运动中，（一）须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以绝军阀后援；（二）武装平民；（三）须主张民主统一，反对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四）须集合各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一切战略；（五）须各派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要有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六）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知识阶级、工商阶级都应竭力赞助工人阶级的组织及运动，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在这一反对直系军阀时期，本报为鼓动积极的民族革命运动，遂不得不反对当时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和孙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携和平统一之主张。

从"二七"屠杀到去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年半间，是直系军阀全盛时代，中间经过黎元洪出走和曹锟贿选两次变故，中央政局现出向所未有的腐败与紊乱，各帝国主义者乘此局面，自临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国进攻；同时，中俄协定适在此时期成立，苏俄自动

的放弃了种种特权，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国民众看出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之残暴无理，此为现在“五卅”运动的重大动因之一。黎元洪出走离“二七”屠杀只四个月，工人阶级尚未能恢复集中其势力，出来向直系军阀作战，拥黎的政学会，想联合安福、交通等系成为反曹同盟，他们公同的政策是运动国会议员南下，然而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学会想国会南下拥黎，安福、交通意在拥段再出，同床异梦，他们的反曹同盟计划自然有始无终。当时上海总商会也表示反对直系，尤其是反对曹锟，其所组织的民治委员会，因与民众隔离及内部冲突，随即无形消灭。此时我们反对那已经投降直系军阀背叛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有南下解决国事的权能，更不信政学、安福等政蠹拥黎拥段能得民众的同情。我们乃向国民党提议，要他在上海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来取决国事。我们知道国民会议这个运动即令一时不能实现，亦须继续不断的宣传，于武装暴动外，给民众一个撇开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自己出来解决国事的一条和平道路，实际上是集中民众势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后四个月，曹锟于双十节贿选登台，登台后立即承认临城案全部要求，以为各国公使觐见的交换条件，帝国主义者知道曹锟的贿选为中国舆论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于是乘机敲诈，无所不至。此时民众深恶曹锟与曹锟损害于民众利益的，还不在贿选之道德的法律的问题，乃是媚外卖国的实际问题。此时本报的主张，于“打倒国贼曹锟”之外，还要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承认苏俄；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扩大国民党。

其结果，乃发生国民党改组及反帝国主义同盟、废约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组织和宣传运动。这两件事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开始之显著的表现，惹引了帝国主义者十分注意。适于此时，因广州政府向税务司索取关余事，帝国主义者大派军船到广州示威，广州的工人阶级及革命学生异常愤激，主张收回海关，而各地资产阶级因关余和内债基金有关，反同情于把持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者。本报当时即向资产阶级指出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五件具体事实：(一)把持海关；(二)领事裁判；(三)驻扎海陆军；(四)外币直接使用；(五)强

迫租借领土。五项之中，尤以把持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死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应该加入工人、学生的收回海关运动。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中国政治上发生了一大变化，即是：(一)民权民族运动之勃兴(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几遍全国，每个促成会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的要求)；(二)工人阶级之再起；(三)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之发现。直军失败，不过是这些变化之导火线，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潜伏在直系全盛之时，即是：(一)列强进攻和中俄协定，给民众以剧烈的刺激；(二)胶济路罢工胜利，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组织，上海电车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在直系全盛之后半期，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在民族运动刚要开始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渐恢复其反攻的力量；(三)国民党改组和反帝、废约、收回教育权之宣传，引起北方一部分军阀之民族的感情。这些原因，适逢直系失败，一派强大军阀势力统一而高压的局面一破，社会上各种潜伏的意志，遂乘时表现出来，而形成各种运动。本报应付此次政变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诉民众，不可妄想此次战争中，依赖任何一派胜利的军阀可以解救中国；一方面指明各省督军的和平会议有使军阀势力分而复合之危险。——只有召集全国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同时，国民党也主张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种团体的国民会议。可是安福的段政府，并不但段政府，任何军阀政府，没有真正的人民武装，那会让真正国民的会议出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都起来了，民众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国民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遂郁积半年，一发而为“五卅”运动之怒潮。

我们这一次号召国民会议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时大不相同，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都有群众的组织和要求的内容，在各种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有开始的基础了。然而盲目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几乎日日向中国进攻(见本报《外患日志》)。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伤乐志华案起，接连着美国轮船船主枪杀中国水手十六人；领事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筑路；工部局提议增加码头捐取缔印刷律及交易所注册；工部局派武装巡捕，为英商越界拆毁宜乐里房屋，驱逐房客，击

伤二人，并拘捕房客联合会代表；领事团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美国人在华界组织三K党；工部局副捕头踢死工人叶乾章；哈尔滨路捕房西捕无故击伤某店伙；西人无故殴伤天寿里黄姓佣妇张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学，逮捕《民国日报》记者，焚毁书籍；工部局因登载日本纱厂工人泣告书，控告《民国日报》、《商报》、《中华新报》，处以罚金之罪；日本纱厂无故枪杀工人顾正洪——积这些怨愤，"五卅"事变因此遂在上海发生。在这个运动的开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学生，有意的或无意的说：大马路血案是西捕杀了人的法律问题，不必牵扯到对外的政治问题，本报乃大声疾呼，告诉民众，此次反抗屠杀案，乃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法律问题；并向民众解释屠杀案所给与我们的教训：（一）不分英、美与日、法，一切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一致的；（二）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事实，不是共产党人捏造的；（三）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等国，和非帝国主义的俄、德、奥等国之不同；（四）懂得了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可被"过激"、"赤化"这些头衔吓退；认清了只有工人、学生是此次运动中的勇士，各国的工人、学生都对于中国人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应该反抗践踏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者，不是拿国家主义来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本报当即主张：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国民革命政府。随后全国民族运动的怒潮，因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受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本报鉴于现状，遂主张改变此种民族争斗的新途径是：（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天军阀。

我们相信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之更大的发展，须在打倒奉天军阀及中国工农阶级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由之后。

1925年9月7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

北京国民党俱乐部[1]开会，议决通电粤、桂将领，一致讨伐广东共产政府，并联合同志发行反共产出版物。最好这些反共产的出版物，都请戴季陶去主持，因为戴季陶近来的思想都和该俱乐部前月卅一日发出的通电根本相同。

奉军在北京之治外法权

奉军驻京机关，因北京《民报》误载张作霖逝世消息，既将该报发封了，并直接逮捕该报经理陈友仁，押送天津奉军之法课，听说还要解到奉天去。北京自有司法及负地方责任的军警机关，奉军何以能够撇开这些机关，自己封报馆捕记者，捕人后还要解出北京？即令奉军在北京享有治外法权，可以自行拿人治罪，也不必由北京解到天津或奉天！这种举动，未免使段政府的面子太难堪了！但这乃是军阀的惯例，从前曹军逮捕长辛店工人，也是不解北京而送到保定府；不过长辛店毕竟还不在北京城内！

1925 年 9 月 11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二九期　署名：实

---

① 1925 年 3 月 8 日，一部分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大会，其主要成员有冯自由、张继、郭泰祺等人。4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各省，否认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本党毫无关系”。5 月 25 日，通告全体党员，“有列名北京俱乐部者，速声明否认”，否则“应即严惩”。

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

现在的中国关税问题，已经不是一简单问题；不但在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是第一重要关键，中国人民应该力争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间及军阀间，都会因此次中国关税问题，惹起极大冲突。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付五卅怒潮的政策，一眼看定中国军阀政府只要有钱便肯卖国，故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便提议和五卅事件毫不相关的关税会议，以饵中国军阀政府，使之抑制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他这政策现在果然收效了。关税会议如果真能平息五卅怒潮，关税会议如果只能有二五加税的结果，则英国所得已多，所损失的进口加税，以他的精制品，比日本的粗制品所损失的犹少。

然而帝国主义的日本，为什么也赞成关税会议呢？日本有大宗粗制的日用品输入中国，因增加进口固小有损失，但是他能在关税会议攫取中国总税务司的地位，则所得甚大，保证西原借款的利益，犹在其次。对华贸易额，日本已驾英国而上，居于第一位，在法律上已有取得中国总税务司之口实；在政治上又有安福政府的暗助，他看出奉张会竟至祖英，遂乘国民党与国民军有单独对英的主张，设法接近他们，利用他们，尤其要利用冯军，以威吓奉张，因此或者能遂其野心。不过总税务司一致用日本人，便是支配中国财政的特权从英国手里，转移到日本手里，这件事英国帝国主义者又何能忍？

美国帝国主义者，又何以赞成关税会议呢？美国对华贸易额本不甚巨，受中国进口加税的影响尚小，却正可因缘关税会议，发挥其华盛顿会议之最得意的主张——门户洞开，机会均等。关于总税务司问题，美国必助英而抗日。

法国帝国主义者，对华贸易更不及美国，所以也赞成中国关税会议，藉此保证其金佛郎案所得利益。英、法两个帝国主义者冲突甚烈，

关于中国总税务司问题，法国会左祖日本。

以上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在中国关税会议中的利害冲突。

在国内军阀方面，无耻的奉张，对于各地五卅运动，始终是用高压政策，把参加五卅运动的主要团体看做眼中钉，时刻想拔去而后快心；可是到了由五卅运动所唤醒帝国主义者久已忘了的关税会议，他却当仁不让，想垄断未来的二五加税，使梁士诒组阁，做他的外府。安福政府，对于日本想攫取中国总税务司，固然是一桩好买卖，就是二五加税，他们不到山穷水尽，也未必肯睁着眼让奉张拿去，段、张间也许为此问题，由暗斗而至明争。恐怕民众运动拆散了他们二五加税的好梦而取高压政策，这是段、张同样的心事。以前段政府因为藉外交以固位的政策，对于民众运动，取敷衍态度，现在不但修改不平等条约已抛到九霄云外，而且深恐爱国人民坚持关税自主，触怒了外人，破坏他快到手的财喜——二五加税，因此拿出本来面目，公然禁止罢工，干涉集会结社，查禁共产党，封闭报馆，封闭上海的一切工会并拿办其领袖，以取悦于外人了！攫得二五加税者非张即段，当然于冯无与，所以冯主张关税自主，不主张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可是他近来颇接近日本，将来关于总税务司问题，他是否能够贯彻关税自主的主张而不袒，还是一个疑问。

以上是军阀们对于关税会议的利害冲突。

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五卅以来参加民族运动的民众，对于此次关税会议，应取如何态度呢？会议是定要开的了，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的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即使不以废厘为条件，进口加二点五，每年不过二千万元左右，而加至一二点五，也不过七千万元左右，以岁收二千万元或七千万元，出卖国家主权及国民经济发展之命脉，军阀政府固优为之，人民决不甘如此！

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起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税则能自主，然后进口税何项应加重（如奢侈品），何项应减少（如机器及教育用品），出口税何项免税（如丝、茶及工业制品），何项应重税或竟至禁

止出口(如谷物及棉花等工业原料),才能够照实际需要,随时自由增减,以保护本国工商业之发展,这就叫做保护关税政策。管理能自主,然后税务司不论任用本国人或外国人,一切用人行政支配税款,才能由中国自由处置。现在中国的海关,税则不自主,无论进口或出口,都须得外人同意,不但不能自由加税,并自由减税或免税也不能;管理不自主,全国税务司等高级职员千余人中,竟至无一华人,总税务司则须任用对华贸易最优越国之人,大权外移,驯至中国政府不能够支配税务司,税务司倒可以支配中国政府;不但海关税收不存中国银行,并且拒绝中国钞票。这样不自主的海关,在名义上虽然是中国海关,实际上,简直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管理中国财政,保护外国工商业和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总机关。

因此,海关自主与否,的确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第一重要关键,倘舍此不图,只想在不自主的现行关税制之下增加关税,则保护关税政策不行,国民经济便无自由发展之望,即所加之税,无论加至若干,也是用整理外债及政费名义,归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手中,于中国国民毫无利益可言;不但无利益,而且进口税一加,物价因之高涨,常言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增税额,仍要辗转归消费者中国国民担负。五卅以来,中国国民流了多量热血,倘若连一部分经济解放的关税自主都不得着,结果反要国民拿出血汗来增加帝国主义者军阀的收入,如此,五卅运动,不算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成了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增加收入的运动了,试问我们怎能甘心!

现在关税会议快开了,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奋起力争关税自主,反对在现行关税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一切人民团体,都应该立即表示一致的态度:对于在此次关税会议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加以罢工排货的长期抵制;对于只图加税不力争关税自主的中国政府,立即请他下野。

中国如果真有爱国的军人,他能拿起枪来讨伐卖国军阀,则这种战争,才不是军阀间的地盘战争,才比什么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国(国民军)奉战争都有价值,因为他是爱国与卖国之战争,不是为了一派军阀的个人私利。

我们也要忠告全国商会，你们须要坚持现在的态度，并须联合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力争关税自主到底，不可因为容你们在内债方面分得点赃便中途妥协；更不可持单独对英的谬论，附和安福政府为日本人争得总税务司地位！

我们说要废除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说要调查司法；我们说要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又说要调查什么？除不平等条约外，帝国主义者直无丝毫理由可以拒绝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若以担保外债及庚子赔款为词，也是无理取闹，即令我们不否认外债及庚子赔款，关税自主仍与外债及赔款之担保无伤，因为用做担保的只是海关收入，并不是海关主权——税则制定权及管理权。

裁撤厘金，固然是全国人民急迫的要求，但绝对不可拿做关税自主及加税的条件；因为关税应该自主，厘税本来自主，裁厘应该是自动的，关税自主及加税应该无条件的。

我们所要求的关税自主，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不加限期，有条件有限期的关税自主，便是帝国主义者一个骗局。在限期未到以前，他们当然不须实行，不妨仅以口惠和缓中国人民的空气，即将来限期到时，他们又可藉口中国未曾履行某项条件，搁置前议，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会议之执行延宕至今，便是一个榜样，这也是关税自主运动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要点！

1925 年 9 月 25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康有为与奉系军阀

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复辟犯，不但是既往，现在还是继续活动。他于本月六日由青岛到济南，公然下榻督办署，公然到东鲁中学讲演，马上还要到奉天去，这尚成何世界！奉天军阀一面压迫爱国工人学生，一面欢迎复辟犯，这又是何种世界！上海人只知道攻击江亢虎，未免有点欺弱吧！

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

戊戌前后的康有为，未尝不是一个新奇的怪物，随后那样开倒车。爱国学社的章士钊，何尝不反对康有为；即《甲寅》月刊时代的章士钊，又何尝不是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民权报》时代的戴季陶，何尝不大骂章士钊；《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更是大谈其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我盼望他将来不至跟着章士钊开倒车！

段执政的《甲寅》

自《甲寅》周报出版，许多人责备章士钊过于开倒车，胡适之竟说“老章又反叛了”，滑稽的吴老头儿更至登报报告“友丧”。其实大家都错怪了章士钊，因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并不是章士钊的

机关报，只看该报登载许多肉麻的话恭维段执政便知道。又有人说：《甲寅》周报记者孤桐，不是章士钊吗？这我更为章士钊辩护了，办理《甲寅》周报的股款，都被章士钊送到交易所了，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那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呈请戒严司令部，出示禁止罢工，“以维实业而保穷‘民主’计”。这些仁爱的资本家，想必是受了戴季陶的感化，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

“赤化”与“过激”

每个爱国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便大喊是：“赤化”、“过激”。现在江西方小军阀逮捕焚烧英货的学生后，复派人检查各学校有无“赤化”形迹，仿佛爱国运动只有赤化的先生们才肯去做的，如此，赤化！赤化！你真可宝贵了！

帝国主义者不可无走狗

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压迫罢工运动，都收了效果；可是据上海《新闻报》香港电：除某国(指英国)外，驻粤各领事联合请求罢工委员会，取消对外罢工，恢复商业。为什么他们不用在上海的办法，要求广州军警封闭罢工委员会，反而向那“败类不良分子以及地棍流氓”所组织的罢工委员会去请求呢？帝国主义者必然说：这是因为我们选用的走狗杨希闵、魏邦平都失败逃走了！

1925年9月25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一期 署名：实

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

现在的广州政府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现在的北京政府是继续前清以来的军阀官僚政府(即袁世凯亦称北京是一大臭虫窟)。这种历史的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北京政府及其所统辖的各省虽然挂着一块民国招牌，实际上，一切制度、人物、思想、习惯，仍然是光宣时代的故物，一切民国成立的基本条件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仍然丝毫没有，连双十国庆的集会游行都被禁止，这是什么民国？这还有什么双十纪念之可言？

反之，革命的广州政府究竟是怎样呢？我们批评广州政府，应该把他分为两个时期：在讨伐杨、刘以前为一时期，讨伐杨、刘以后为一时期。在前一时期，广州政府建设在西南小军阀及买办阶级的势力之上，因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闹得一塌糊涂，实在不成个民国的形象；然而政府领袖们确是有革命意志的，他们眼见政府不能实行党义确是痛心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在广州政府之下是有相当自由的，所以我们自始即不能不承认广州政府比起北京政府来确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在后一时期，即讨伐杨、刘后的广州政府，乃建设在革命的民众与革命的军队之上，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了。这革命政府中可敬的领袖们，一秉中山先生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对内毅然决然的废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这些秕政，毅然决然的谋军政财政之统一，更毅然决然的驱逐那些寄生于秕政阻挠军财统一的军事领袖，而毫不顾忌；对外则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计成败利钝的与香港政府作战，成了此次五卅运动中为民族利益最后力斗之孤军。如何拥护此为革命而力斗的孤军，使他不至为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所破灭，这是今年双十纪念运动中全国革命的民众所应第一注意的事，因为双十节所纪念的是革命的势力之胜利，不是反革命的势力之胜利。

广州政府现称国民政府，我们可以承认他确能名副其实，他此时虽然未曾统一全国，而他的工作，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国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这班国民政府的领袖，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们这种英勇奋斗，才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协的革命主义完全表现出来了。只有这班英勇奋斗的领袖们才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若口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还徘徊依违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那便是中山主义的叛徒；中山主义的信徒与叛徒，只有在实际的革命争斗中才能够分别出来，别的著书立说都是欺人之谈。

民国六七年，京沪间的官僚甚至于国民党党员，对于中山先生有一个很流行的批评道："孙中山是一个有革命癖的人，无论到何时他总要革命，恐怕他的儿子孙科做了总统，他还是要革命咧。"他们以为这几句话是讥诮孙中山的，殊不知这几句话却真能将中山先生可尊敬的全人格表现出来了。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一个人，只要赞成他革命，虽巨恶如徐树铮、梁士诒，他也肯与之周旋，若不忠于革命，虽多年共患难的同志如黄兴、陈炯明，他也不惜与之决裂，若孙科为总统而不忠于民国，他当然起来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从来不以爱憎亲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东方民族中，他的确是杰出的人物，在国内一切主义不同的革命派都钦佩中山先生，也就在这一点。现在广州政府的领袖们，只计是非不顾利害的英勇奋斗，无论成败，中山有知，必定是含笑称赏的。十二年四月间，余正在大元帅府和中山先生谈话时，有人匆匆来报，大元帅府会计主任，为刘镇寰索饷不遂拘去，中山先生大怒，立召蒋介石参谋长，即谓须严惩此等不法军人，宁可失败而离开广东，也不可不和他们一斗，言时声色俱厉，其实当时所谓孙大元帅蒋参谋长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终于隐忍过去。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为党建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

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现在和广州国民政府为敌的内外恶势力是些什么呢？国内恶势力出头来破坏国民政府的，为主的自然是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叶举、魏邦平、邓本殷这班括广东地皮还没有括够的小军阀。这班小军阀的势力，曾为革命的党军所击破，为什么现在又能结合起来向国民政府进攻？一是因为许崇智妥协姑息政策所留下的祸根；二是因为他们新近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各方面的援助。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子弹到汕头；港商资助陈炯明百多万现金，内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来的；段政府帮助陈军三十万元，又派遣海筹、永绩两舰助战；福建派张毅的军队到潮州助战也是公开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准备援助陈军向粤进攻。陈炯明等除了得到上述各方面的实力帮助以外，还有国民党中反动派的声援：谢持、石青阳等勾结熊克武，密谋在广州响应陈军；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的和陈炯明、杨希闵合作，该俱乐部所挥霍的就是段祺瑞所给杨希闵的招待费三万元，他们更打算广东外交代表团到京时，开会欢迎林森、邹鲁等代表，劝其通电联陈反蒋；廖案一大批罪犯，更是奔走上海、香港间密谋勾结广州残余的反动军队，候在党军出征东江时，起来叛变。陈炯明等小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及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他们攻击国民政府之共同口号就是“反共产”，和以前唐继尧勾结杨、刘在广州谋叛的口号一样；其实广州国民政府里，可以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党员，更未曾并且未打算采行一点共产政策（反动派军队所衔恨的国民政府政策，如军政财政统一及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赌博等，难道都是共产政策吗?）。他们所谓共产，便是指革命，“反共产便是反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罪状，真是不打自供了。国民党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头上自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对于真能为中山主义在广州奋斗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诽，并且公然致函蒋介石阻其急进，又请张静江函劝蒋介石离开广东；他们这种举动，实际上也算帮了陈炯明的忙，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不赞成陈炯明与反动派。

国外的恶势力，不用说主要的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抑制中国民族运动与抑制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以期长久保持他们的在华特

权，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尤其是英国的香港政府对于广东的政策。广东迫近香港，恰好近几年来广东的政权又落在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人手中，真所谓"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因此香港政府不断的利用陈炯明，利用商团，利用杨、刘，阴谋破坏广州政府。可是他的阴谋都着着失败了，尤其是杨、刘失败后，英人失了一切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工具，同时香港沙面大罢工的工人得以广州为根据地，又以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得以坚持，使香港英人眼见每天损失四百万元，而不能使用在上海利用奉军压迫罢工的方法，英人正在无可如何，适逢粤军中的反动派领袖，反抗国民政府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开赌，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等政策，香港英人遂乘机利用之以成刺廖案；幸而国民政府有肃清内奸的决心，不姑息的逮捕诸反动领袖，解散诸反动军队，是时香港英人老羞成怒，遂至鼓吹直接以武力攻取广东，美其名曰为中国谋统一，究因国际形势不容英人能够这样横行，其计又不得逞，于是决心再以实力援助陈炯明、魏邦平、邓本殷等，以成现在东南两路夹攻广州国民政府的局面；全国的反动派——北洋军阀，香港大商买办阶级，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小军阀，国民党的反动派，遂在此局面之下，形成了中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一齐拿着"反共产"、"反苏俄"的旗帜，向广州国民政府进攻，为英国帝国主义效劳！据本月八日路透社香港电说："港督今日在立法议会提出预算时演说，谓渠信广东有智识之人，必不能再容外方及他省营利之徒施行暴政，大约本年底来年初可望恢复秩序。……今在本地募债，未必成功，而此时请助于伦敦市场，据所接英国消息观之，亦属不利，盖投资者以为香港状况不佳，非有极优之条件，必多迟疑也。故非俟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已遭失败，不宜募债云云。"在这小小一段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他所谓过激派（英人眼中的过激派，一切爱国运动者都包含在内，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等，更不用说了）破坏香港之企图，所加于香港英人经济的打击，实在万分明显，所以他不得不运用阴谋，利用中国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推倒广东革命的势力；（二）他明白供认他曾经教唆广东有智识之人（当然是陈炯明）排斥外省人，排斥客军；（三）他已经很有把握的计算他所利用各方面的势力，在本年底来年初可以占领广州；（四）香港的经济状况，已

无法得到伦敦的救助，只有俟反共产反苏俄的广东有智识之人占领广州，使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遭了失败，才有救星；（五）革命派及反革命派在广东之成败，关系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之利害，是非常明显的了。

这样在内外之恶势力四面八方的进攻之下，广州国民政府也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失败的不只是广州国民政府，实在是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命脉。成功的是谁？不用说是陈炯明及国民党的反动派，尤其是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这就是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在今年双十纪念中所以不应忽视这一件大事的原故，更不可把这件大事看做广东的局部问题！

又有人以为广州国民政府联俄拒英，不免以狼易虎，失了民族运动的意义。像这种错误的观念，实是中国民族运动一大危机。第一我们应该明白：所谓民族运动，其意义是要求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不受他民族之政治的压迫与经济的剥削，决不是一民族的闭关主义，并且在这一民族运动中，要得到他民族同情的援助，才格外容易成功。第二我们应该明白：此时世界上各民族能够以实力援中国民族运动的，还只有苏俄，若印度、若土耳其、若朝鲜、若加哇等被压迫的民族及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只有精神的援助。第三我们应该明白：在理论上，援助被压迫的民族，是苏俄立国之信条，他若不以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便是言行不符；在事实上，苏俄也刚从西欧经济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现时也还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四面进攻中，他正需要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如印度、加哇等）及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德国、土耳其等）结成联合战线，抵抗帝国主义之进攻，他援助中国，即是援助他自己，不但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应避讳苏俄的援助，并且到了民族革命成功，还应该更进一步和苏俄缔结同盟，共同防御帝国主义之进攻。第四我们应该明白：在实际事例上，苏俄实行其立国信条，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援助了波斯的民族运动，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运动，都是无条件的同情援助，他对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不曾有过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发生；即对于中国的中俄协定，苏俄自动的放弃了那帝国主义者经过五卅大流血还不肯放弃的许多权利，他所得的是什么？苏俄实是援助了广州国民政府，而

都是无条件的，也丝毫没有什么压迫或剥削的事实发生过，若说聘用苏俄军官改造海陆军便是授权于外人，那便是把苏俄看做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不能够接受他军事的援助了。“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欧洲帝国主义者造出来离间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和苏俄联结的方法，现在中国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学舌，真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帝国主义者好比是些强盗，苏俄好比是和我们守望相助的邻人，若把邻人也看做强盗，拒绝他们的援助，这正是强盗们暗中称快的事。像陈炯明等及国民党的反动派，更是要竖起大旗来帮强盗攻打邻人，所以他们竟会把“联俄”算做广州国民政府的一桩罪状。

1925 年 10 月 12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三期　署名：独秀

给中共莫斯科区委的信

中共莫斯科区委：

派去2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67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共计103人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应加入区委。

旅行期间，中央指定以下同志为领导人：俞秀松同志(临时委员会书记)、胡彦彬同志、刘铭勋同志、朱务善同志和张琴秋同志。

这些同志将在中山大学学习，同你们编在一个区委。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

我们指定下列同志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

俞秀松、张琴秋、朱务善、刘铭勋、陶淮、董亦湘、李沛泽、郑子瑜共计8人。你们还要指定两人，所以共计10人，他们将领导学生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雅诺夫斯基①译)

1925年10月28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① 即袁庆云。

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

我们为什么反奉？这是因为奉系已成为国内最有势力的军阀，他对内可以造成一派军阀势力统一中国的局面，使军阀政治格外演进，他对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有力的最信托的工具，使民族运动格外遇着摧残；所以我们反奉之目的是在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这本来非常简单而明瞭。

一个简单明瞭的反奉问题，现在却含着一些复杂性质，这是因为反奉运动中潜伏了直系复兴的危险。

不用说，直系是一派反动的军阀，他不但以前是反动的，现在仍旧是反动的，他的反动性并不减于奉系，然而他现在支配政局的力量却非奉系可比，他在反奉运动中的力量，比起民众及国民党国民军来，他只是百分之几。在这全国反奉运动中，虽只百分之几的力量，我们自然也应该一律欢迎，若在反奉运动中攻反奉之直，客观上便是助奉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告诉直系，人民虽不念旧，而现在只是为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而反奉，决不能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反奉。所以章太炎还知道说："吴佩孚出山讨奉，目的须纯在国家，方可得国民同情，若涉报复或争地盘，则不可预知。"

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当然是直系真实的心理，由这种心理而表现出来的政策，就是所谓维持法统。在吴佩孚、孙传芳通电中虽然未曾涉及法统问题，章太炎致岳维峻电中虽然明言此时不议及此问题，而事实上直系终须用法统这个假面，做他们复仇复兴之工具。他们所谓法统有二解：军人派所谓法统是指曹锟的宪法，政客派所谓法统是指民国约法。维持前一个法统，便是所谓护宪，也便是拥护曹锟；民众对于贿选的余怒犹未全息，直系若拿出护宪拥曹的旗帜，直是为奉方宣传，直是自杀政策，直系中稍稍有点头脑的人当不出此。维持后一个

法统，便是拥护约法，即是讨段；段祺瑞、章士钊诡称革命破坏约法，自然是可笑的很；但是约法本身的好歹且不论，此时民众迫切的要求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对外的民族自由，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对内的政治自由，决不是什么一纸空文的约法可以使民众满足的。况且缘约法法统而发生的问题，便是恢复旧国会，这种千夫所指的旧国会，即令没有选举吴佩孚为大总统的预定计划，即令除去贿选分子，也不能得国民之信任了。现在救济这个法律之穷的出路，惟有倒奉后，在事实上占据北京政府者，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家根本问题。所谓国家根本问题，正是现在民众迫切要求的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对内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因为这才是中华民国真实存在之基础，写在纸上的宪法还在其次。

什么法统问题，决非民众的迫切需要，不过是直系拿来做面具，来遮掩他们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的隐衷罢了。

所以为反奉而战，虽直系我们也可以不因既往而阻挠他们现在的行动；他们若终于为法统而战（实际上是为直系正统而战），民众反奉胜利之后，继以反直，这也是意中的事。

1925 年 10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四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戴季陶之道不孤矣

张作霖的爪牙张宗昌在国庆日演说:“我中华立国四千年来,莫不以道德为根基,山东系圣贤桑梓之地,尤为注重,而近年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二字,几致沦亡,其弊端约有五项:(中略)三则我国学生,自沾染新文化后,日趋日下,近来各校添设讲经,实所以挽已倒之狂澜;四则近日之工潮,若赤俄传来之共产等语,贻害人民,良非浅鲜,非严加取缔不可。……”赵恒惕的走狗荆嗣佑在长沙报上发表组织国民党的谈话说:“我们有一重要的话,要普告国民大众,就是我们要以中国的人力,中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志,正人伦,明天道。我所谓中国方法,就是指王道而言,王道之纲要有三:一曰黎民不饥不寒养生送死无憾;二曰谨庠序之教;三曰申之以孝悌之义。”想用旧的道德文化救国之戴季陶,想把中山先生从被人轻侮的革命党方面拉到被人尊敬的圣贤方面来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之戴季陶,他听了张、荆二位的议论,定会眉开眼笑的说一声“吾道不孤矣”!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近年来每一运动发生,反动派便说是共产党主持的,以至段祺瑞、张作霖都发严令光顾到中国共产党,李景林、张宗昌诰诫人民勿信共产党的告示,更是贴遍了直隶、山东全省的城镇乡,为共产党登了一个大

规模的广告，并且一般痛恨李景林、张宗昌苛税的乡民，反疑心共产党或者不错。浙军一到上海①便首先注意共产党，吴佩孚一到汉口便对路透社记者说："彼殊反对共产党与过激党，若辈皆害国之徒，渠拟以坚决手段对付之。"我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何等力量能够使军阀们这样惊心动魄！

又是一个共产军！

杨宇霆在天津对东方社记者说："万一不幸而有国民军一致对抗奉军之事，是则共产军与反共产之战争，正期待日本以下列国之同情与援助云云。"说国民党的军队是共产军，已经是离奇了，现在又说国民军是共产军，岂非奇之又奇？树起反共产的旗帜以求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这是全中国南北大小军阀一致的策略呵！

1925 年 10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四期 署名：实

---

① 1925 年 10 月 15 日，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率部讨伐奉军，浙奉战争爆发。16 日，浙军占上海和宜兴一带。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受了帝国主义侵略八十余年的中国，为什么欧战后渐渐才有了有意识的民族运动？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一方面中国的工业乘欧洲大战机会一时有了相当的发展；一方面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因弥补战中的损失，加紧向中国等经济落后的民族剥削进攻，促起了反抗。(二)在主观上，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

苏俄十月革命之内容是：(一)城市工人打倒资产阶级而得了自由；(二)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而得了自由；(三)俄国境内的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得了自由；(四)全俄人民脱离西欧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得了自由。前二者是阶级运动，后二者是民族运动，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开端。这两种革命运动，在苏俄同时并行，不但没有妨害，而且正因为工农阶级奋起得了政权，对外拒绝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合作，对内取消前俄帝国主义的政策，即强迫民族同化于大俄罗斯的政策，因此民族运动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否则若照当时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政策，至今全俄人民仍旧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协约国羁绊之下，俄国境内诸小民族仍旧屈服在资本主义的大俄罗斯政府威权之下，这是毫无疑义的。

工农解放民族解放这种双管齐下的苏俄十月革命，他自身的成功并影响到世界革命，后者更胜过前者。盖自十月革命后，多年不能解决的俄国境内诸小民族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俄更进而援助近东、远东诸弱小民族与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这些事实已足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比在工农解放运

动上更为成功。

按道理讲起来，现在全世界凡是被压迫的阶级以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大家才有出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该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可是还有许多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人们，竟不是这样想法。在一班深受了英美帝国主义教育毒的博士们，不但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根本大患，并且不承认世界上真有什么帝国主义，仿佛是共产党人捏造的名词；因此，中国也自然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这班人我们不必去论他。又有一班人很明白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并且明白非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无由解放；可是他们以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只好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不必联络苏俄，因为联俄有三个危险：(一)是联俄中国便要实行共产了；(二)是联俄中国便要被俄国侵略甚至于被俄国占领了；(三)是联俄则帝国主义者更要严厉的对付中国了。他们因为怀疑联俄有这三个危险，遂至甘心退出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独立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之所愿，而是中国之不幸呵！他们所怀疑的三个危险，现在略为解释如下。

第一，苏俄许多主要人物固然是共产主义者，苏俄实际政治固然也有若干小小部分采行了共产主义的政策；然而决没有不问青红皂白，随意推行于任何国家的道理，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决不能不待其国内自然发生而可以从外国宣传出来的。至于苏俄援助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这和共产运动更完全是没有连带关系的两件事。苏俄所援助的波斯与阿富汗，都还是专制君主的国家，难道也是共产运动吗？苏俄又曾援助蒙古，难道游牧的外蒙也能实行共产制度吗？苏俄确实援助广州政府，然而除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陈炯明等造谣以外，广东可曾采行一点共产制度呢？

第二，旧俄罗斯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苏俄若要侵略中国，自然是继续旧俄政策，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作同样的行动，取同样的态度，他为什么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对中国，都放弃了旧俄所得一切特权，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怖呢？苏俄如果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便

自然要站在帝国主义者那一边,决没有站在被压迫的民族这一边做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运动的道理。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乃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离间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结合,如果苏俄真是赤色帝国主义,我们便不必怕赤化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必恐怖我们赤化了。在经济上说起来,苏俄方在刻意消灭资本主义,那里还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可能,因为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说起来,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乃苏俄立国之方针,"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宁之遗训,他们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等,都不曾违背此遗训,岂有单要侵略中国之理。

第三,中国自来不曾联俄,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不算不严厉了,反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正因其民族运动得着苏俄援助而发展,帝国主义者遂有所顾忌而让步;即以中国近事而论,帝国主义者虽然大叫五卅运动是赤化,然而他们正因为中国有了赤化的五卅运动,终不得不于关税会议有相当的让步,尤其是他们对于联俄赤化的广东,五个月以上的总同盟罢工,几乎使香港变为荒岛,广东政府竟不许经过香港军商船进口,日船违令进口,政府军枪杀日本船员二名,日领只得一面向政府道歉,一面请求抚恤死者每人二千元,英、日帝国主义者竟未能以一枪一弹害广东。这是因为:(一)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甚烈,已没有向我们联合进攻之可能;(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之民族革命,都有乘机奋起之势,帝国主义者已没有以武力消灭此革命大潮之可能;(三)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内,随时都有阶级革命爆发之可能,帝国主义者若以武力压迫苏俄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必为工人阶级所反对,尤其是运输工人足以制其军事运输之死命。并此诸因,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严厉的以武力对付中国政策已不适用,他们今后的政策乃是:(一)以金钱军器收买中国军阀,替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二)教唆中国的反革命派,大喊其赤色帝国主义和反共产,以破坏中、俄联合;(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中国商人及英、美博士们,使他们协同军阀官僚阻挠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之发展。我们敌人不但在国外并且在国内,他们都根本不要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因为联俄,帝国主义者才要严厉对付中国。

我们若明白上述三个联俄的危险都非事实,同时便自然明白全世

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必要；并且同时便自然明白所谓“反苏俄”是破坏国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所谓“反共产”是破坏国内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因为国外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苏俄，国内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共产党。

1925年11月7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五期 署名：独秀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

在全国的工人、学生流血奋斗正热烈中，而全国商人竟一致反对排货，天津、汉口、青岛的商会竟反对工人、学生之爱国运动，向军阀告密。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竟丝毫不肯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时报》竟为工部局删改上海市民大会的电报，新、申两报竟为工部局登载"诚言"。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即所谓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谊的磋商"与"双方谅解"，竟公然说：此次惨剧发生的责任究竟谁属，现犹不能断定，中外当局应先从事调查，真相明白然后始可言解决，现在之罢工、罢市、罢课的紧张局面，首先应设法使之和缓（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五卅事变恰恰发生在上海；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他的态度可分为四个时期略略述之：（甲）罢市之初为第一时期；（乙）从罢市到开市为第二时期；（丙）从开市到总工会被封为第三时期；（丁）从总工会被封到现在为

第四时期。

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带反动倾向，其表现之事实是：一、经学生、工人群众胁迫而哀求，总商会始肯宣布罢市；二、当时一般群众的呼声是反对外国人惨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而商会在全市商店门窗所揭罢市要求，只是取消码头捐；三、罢市后总工会、学生会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为全市运动指挥总机关，各马路商联总会赞成加入合作，而总商会则坚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罢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员会成立止，这十天当中，总商会都站在调人地位。在此时期中，上海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鄙弃民众的心理，已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这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最反动事实，即是不顾民众的要求单独向帝国主义者提出条件问题。因为商联总会之牵制，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已为民众所不满，而总商会则更蔑视民众的意见，迎合军阀政府委员的意旨，别自单独提出十三条，这十三条中，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取消领事裁判权"这十二、十三两条完全撤销了，第六条优待工人当中，他们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之自由"这一句也去掉了。他们这样的妥协，颇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嘉奖，当时《大陆报》说："总商会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们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银行家，有体面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决不急进的。"他们的十三条并未为六国委员团所容纳，上海谈判决裂，总商会不但不坚决的作更进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并不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协商而单独议决开市。

开市之宣言，本来说还要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然而实际事实上是怎样呢？开市后，所谓抵制英、日货，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因为学生会严厉的检查英、日货，和总商会及商联总会起了不断的纠纷与冲突，尤其是总商会以检查五卅以前存货之名为推销英、日货方便法门，和学生冲突甚烈。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总商会和商联总会始终只是经收全国各处捐款，他们自己原来是一毛不拔的，开市后他们一致鼓吹单独对英，尤其是总商会更是勾串奉军戒严司令及交涉员压迫总工会令日厂罢工工人几等于无条件的上工；日厂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给各

厂电力,总商会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军阀官僚压迫总工会令工部局电气处工人上工;总商会又主张码头工人上工两星期,专为中国商人运出存储英、日堆栈的货物,议定在此项存货物价三千余万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约三十余万元,作为五万余码头工人一个月的救济费,此办法由总商会议定,此业务由总商会管理,其结果三千余万元的货物如期运尽,而缴纳的捐款只有三万余元,总商会简直不负责任,码头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继续罢工了。大部分罢工工人既已上工,总商会遂进而勾串奉军戒严司令部封闭总工会。总工会既已被封,所有英厂罢工工人,遂被迫而陆续上工了;至此,资产阶级所谓抵制英、日货,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所谓单独对英,都成了公然的骗局!在此第三时期中,资产阶级已经是不掩饰的反动起来了。

奉军司令部的人说:封闭总工会是事前得了总商会同意的。虞和德对工人代表会的人说:你们代表会就是总工会的变相,断然不能存在,你们若能承认李征五去主持,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公开的存在。霍守华对人说:总工会不应该和总商会冲突,老实说,总工会被封的时候,总商会若肯出来说几句话,司令部是不能不顾忌的。照上述之种种说话,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感激上海总商会的盛意了!总商会不但要和总工会过不去,近来并且指挥他的武装队(保卫团)和他的爪牙(警察厅长江政卿)帮同军阀摧残所有的工会及工人学校,查禁学生或工人的集会。在此第四期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联总会,以前和总商会是对抗的,比总商会是急进的,现在事事依附总商会,不敢自作主张了。他们跟着总商会反对学生、工人,跟着总商会不参加一切民众运动,禀承总商会的意旨,公然宣告没有恢复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必要。最可笑的是:学生会邀请商联总会共同发起各团体代表大会,主张关税自主,他们竟会说出"关税已经自主不须开会"的梦话来!

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既是如此,那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那些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运动中,是否应该反对阶级争斗呢?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戴季陶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有一个忠实的解答。

1925年11月21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六期 署名:独秀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

我们要明白国民党中的左右派是什么，这不但是国民党之重要问题，并且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重要问题。我们若是把国民党看做整个的而无左右派的分别，便无由判定国民党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了；我们若是懂得国民党中有左右派之区别，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然后拥护国民党的人才不至受人指摘，非难国民党的人才不至一概抹杀。

有些人不相信国民党有什么左右派之分别，可是在事实上，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同时，左派的思想亦因之明了而正确了。

有人以为共产党是国民党左派，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产党是共产党，国民党是国民党，国民党自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产党做国民党的左派呢？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与政策，无论如何左倾如何急进，终究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就现有的事实而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程潜、于右任、徐谦、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丁惟汾、王励斋等一班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党员。

国民党的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些什么呢？在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前后，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

在的左右派，都不是这样简单的分别了。以前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信仰三民主义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实际上脱离了国民党了；现在新的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说主张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实际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理想与策略，他们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之方法，都完全与左派不同。

在理想上：左派之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物，右派之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乃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同时他们并企图中国民族也发展到帝国主义；左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民主政治，右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仁爱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谓仁政现代所谓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右派则反对联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阶级之阶级利益的争斗而失其同情，所以右派虽然口里也说要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口里也说要国民革命，然而实际上只能口里说说，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之实际工作，一步也不能动手去做。他们口中所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说的"国民革命"，都和不能兑现的支票一般。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争斗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饭睡觉，至多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他们虽然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可是不曾为革命流一滴血，不曾为革命坐一次牢监，并且不曾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举行过一次示威运动散过一次传单；他们不但自己不去做这些革命工作，并且还极力向广东、上海、北京正在革命战线上拼命的左派加以不断的攻击，袖着手不革命的，还算是右派的好分子。

右派所谓"真正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只是一块骗人的招牌，他们并不曾想过如何才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他们极力排斥国外最反对帝国主义的苏俄，极力排斥国内最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极力排斥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人、农民之阶级争斗，试问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实行民族主义？他们轻视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之

阶级的利益，试问他们所要实行的是什么一种民权主义？他们反对阶级争斗，试问在资产阶级争斗之下，有何方法可得保证农工平民之民权？倘若不让工农阶级由阶级争斗而形成他们的势力，足以挟制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节制资本与大产业国有，足以挟制地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平均地权，试问国民革命政府另有何种力量可以实行民生主义？不实行的三民主义，岂不是骗人的招牌？左派知道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宗教，单单信仰主义是不够的，单单信仰主义，只是一个主义者，一个信徒，不是革命家；左派知道单单宣传三民主义，而不能指陈其实行政策，也便是胡适之所讥诮的"名词运动"；左派为了要实行三民主义，便不得不采用"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不反对阶级争斗"这些实际需要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中现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

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信仰三民主义，

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其右派。

1925 年 12 月 3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七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中国军阀之左右派

十一月卅日东方社电:“张作霖现已开始运动,将以李景林、张宗昌为干部,与旧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相提携,结成联盟;此项运动之主要目的,即为对抗冯玉祥、岳维峻、郭松龄左倾派(即过激派)军阀起见,组织右倾派之大同团体,以期于全国政治上出现一大纵断线。”在我们看起来,冯、岳、郭的政治态度实在都过于和缓,而至于油滑,说他们是过激派,直是冤枉苦了。至于说他们是现在中国军阀中的左倾派(各种社会或集团,都有左右倾分化之可能,这里所谓左倾,并不是什么过激赤化的意义),把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等奉系,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都列在中国军阀的右派,这却是很正确的事实。这些右派军阀之间的冲突非常厉害,如果他们真能组织大同团体,乃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付中国政局的如意算盘之成功呵!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

北京市民直接惩罚安福诸孽,国人称快,独有著名的工贼张德惠,假托长辛店工人名义,替安福派说话;他说:“民众表示首宜遵守纪律,否则有意破坏群众运动之真精神,若有放火及其他无意识动作,决非真正民意。”照他这样说,所谓真正民意,所谓守纪律有意识的群众运动,不知是怎样?想必是以规规矩矩的开会、游街、请愿为限。那么,历史上一切民众的暴乱武装革命,都一概可以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等话抹杀之

了。如果是这样，不但此次北京市民运动非民意，即以前五四运动赵家楼之火，也是学生的罪恶了，这样的话，正是安福老爷们所愿听的呵！

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

国民政府解散了一些反动军队，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许多人说他赤化了；冯玉祥锐意练兵，预备和奉张打仗，主张救国、关税自主、平民政治，又有人说他赤化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理金融、便交通、尽地利六事，也有人说他赤化了。原来赤化不过如此！然而据本月六日上海各报所载东南通信社消息，国民党右派却正打算在上海设立执行委员会“预防赤化”咧。

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

郭松龄仅仅说了一声“优遇劳工”，张作霖便通电攻击他赤化，奉天全省商会联合会也跟着通电说：“查改革劳动待遇，即俄国赤化之倡言。……世界各国皆视之如洪水猛兽……就我商民，誓当同心仰戴张上将军保境安民之盛德，以赤化为仇敌。”原来赤化反赤化就是如此，不知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对于仰戴张上将军盛德的奉天商会此电作何感想？

说　假　话

久矣就要对付奉张的冯玉祥，偏偏说出许多要与奉张携手希望和平的鬼话。已经明明白白向张作霖倒戈的郭松龄，偏偏还要通电称颂张大帅“凡兹惠政，久勒穹碑，敢不斠守成规，恢宏余绪”。这就是惯说假话的社会中一种怪现象。

1925年12月10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八期　署名：实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一个党内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较之词，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党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则以前的左派会比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脱离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倾分子，也会形成新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早已有过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历史，我们已常常说过。自去年正月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中山先生死后，党内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正式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谋在北方发展势力；后者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谋在西南发展势力；这两个俱乐部对于段政府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国民政府，则是一致的。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因为一个党中的左右派，虽然有政策的左右倾及行动缓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国民党，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离开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来破坏国民政府，已明明不但离开而是背叛了国民革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国民党，还算得什么国民党右派呢？右派毕竟还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之国民党啊！

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中有没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在具体事实

所表现的就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极力和反动的总商会结合起来，反对工人及学生，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国民党党员，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一个党，总不免有比较右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可是现在国民革命的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这都凡是忠于中国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们加以不客气的警告。这一新右派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他们虽然竭力自别于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实他们当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如谢持、居正、周颂西、孙镜亚等)。

季陶先生对我说：他们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只是在国民党的立场不便鼓吹阶级争斗；然而事实上近几天的《民国日报》上反对阶级争斗之论调都非常之高。

他们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然而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以维持苏俄”；又说“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任何属性，不用说所谓“赤色帝国主义”也包含在内。

他们反对共产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说共产党只要民族主义，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唾弃而且加以攻击；其实共产党不但努力民权运动(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之要求)，并且他的民生运动(工农解放)比任何党派的政纲都彻底。他们说共产党是反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实不幸此时各处国民革命的工作几乎是共产派在包办。他们说共产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其实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各种机关报各种印刷品，宣传他们的主义与政策，从来不曾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在事实上又何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都不曾作此

惊人之谈！他们口里虽说不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其实他们公然著书通电（例如最近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通电及孙镜亚告国民党同志书等），捏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无稽之谈，诬蔑得共产党人简直阴贼险狠不成人境；最近为广大问题，不但说共产党早已开除的陈公博是共产党人，并且硬指顾梦渔先生也是共产党人，借以证明共产党夺取广大的阴谋。他们口中虽说承认共产党和他们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党（孙镜亚都说是“貌为同舟，实类敌国”呵！），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其实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无论民族运动民权运动民生运动，他们都表示不和共产党合作，并且他们自己也不独作；他们虽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会，他们竟不肯参加，在北京的反段国民大会，他们虽然参加了，而他们的首领邹鲁，都硬逼鹿钟麟下令压迫国民大会，说这次国民大会是赤化运动。

自讨伐杨、刘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见他们致各级党部电，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论文，孙镜亚致汪精卫书等）。他们不但这样攻击汪精卫，并且在西山开会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不许他任国民政府职务；他们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有意动摇国民政府，为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熊克武等复仇。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

他们说共产党惯以反革命反动等罪名加诸异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实，他们应自问和冯自由、邓家彦、马素相去几何？即客气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说是反动的倾向罢！

他们这反动倾向的根本，是不识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们口中虽然不赞成国家主义，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和国家主义者一样，同是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因此，他们遂至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阶级争斗反对主张阶级争斗的共产党；因为左派

联合苏俄及共产党，他们遂至反对左派；因为国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们遂致反对国民政府；他们的反对倾向就是这样相因而至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至于反动派，则在于联合战线外了，因为他们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此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则所谓“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

1925 年 12 月 20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三九期　署名：独秀

